

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



# 抉择与分歧

——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

[美] 爱德温 W·马丁 著  
姜中才 韩华 苗立峰 译  
姜中才 校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年·北京

根据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原版书号 ISBN 0-8131-1591-4

## 抉择与分歧

——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

[美] 爱德温W·马丁 著

姜中才 韩华 苗立峰 译

姜中才 校

---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1928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昌平东沙屯印刷厂

---

850×1168毫米 32开 8.625印张 220千字

1990年 月北京第1版 1990年 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

ISBN 7-80023-171-2 / D·19

定 价：4.90元

## 译者前言

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早期关系，是近年来国内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翻译出版爱德温 W·马丁的《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一书，无疑会对早期中美关系的研究起到有价值的参考作用，这不仅因为作者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时期美国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职业外交人员，而且因为他使用的许多资料是最新公布的。更有意义的是，作者不是单纯地论述新中国初创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而是将这一过程与当时中苏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变化相交织，尤其是与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相对照，从而使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能从一个较新的角度得以曝光，并进而使这段历史中一些长期未公开的情况得以为世人所知。

不仅如此，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不单是史学界，而且国内政界、知识界的有关人士也越来越对中美早期关系发生兴趣，并试图从中发现对中苏和中美关系在50至70年代发生的戏剧性变化的历史性解释和说明。翻译出版本书，无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

最后要指出的是，由于受作者立场的限制，书中一些观点及引用的部分资料带有一定的偏见，而且对某些事情的叙述和描绘也有片面、不准确以至歪曲和附会之处，这些问题，望读者阅读时加以注意。另外，书中正文内凡以“译者注”和“编者注”的形式出现的注释，均为中译本的译者和编者所加，特此说明。

大连市的王志峰同志、陈本娟女士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89年11月

# 目 录

原版前言	( 1 )
作者前言	( 2 )
致 谢	( 4 )
<b>第一章 原地不动</b>	( 5 )
1 对胜利示威的反应	( 5 )
2 领事馆坚持下去	( 8 )
3 苏联和中共	( 18 )
4 英美的政策	( 23 )
5 司徒雷登大使的主动	( 28 )
6 司徒雷登和黄华的晤谈	( 33 )
7 周恩来的新方针	( 38 )
8 郁闷的上海	( 48 )
9 毛泽东发出邀请	( 52 )
10 徽离中的坚持	( 58 )
11 封锁	( 65 )
12 英美之间的政策差异	( 75 )
<b>第二章 承认与撤退</b>	( 84 )
13 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 84 )
14 沈阳的考验	( 90 )
15 英国考虑承认问题	( 98 )
16 美国考虑对台湾的政策	( 107 )
17 英国承认人民共和国	( 113 )
18 扣押美国领事馆财产	( 119 )

19	中苏条约.....	( 128 )
20	英国的挫折.....	( 133 )
21	离境的风险.....	( 141 )
22	美国的一个试探性举动.....	( 151 )
23	中英相互不满.....	( 155 )
24	外国企业受排挤.....	( 163 )
<b>第三章 朝鲜战争的影响.....</b>		<b>( 169 )</b>
25	台湾的中立.....	( 169 )
26	对中立的反应.....	( 176 )
27	对贸易的影响.....	( 185 )
28	英国残存的立足之地.....	( 190 )
29	焦点在联合国.....	( 197 )
30	中国在朝鲜的介入.....	( 205 )
31	灵活性的终结.....	( 215 )
32	被监禁和阻留的人.....	( 228 )
33	苦果.....	( 243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转变.....	( 251 )
<b>第四章 总论.....</b>		<b>( 259 )</b>

## 原版前言

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关系中的拖延承认政策的失误，曾引起了长时期的争论。在这一争论中，人们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直至1950年仍在努力使自己以官方形式留在中共统治区域的真相。而且，在对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问题的争论中，由于一些重要的事实被偏见所掩盖，或者说遭到了歪曲，以致很难作出公正的判断。本书作者爱德温W·马丁试图通过运用权威性的文献资料的方法，详细叙述美国对得胜的中共自1948年11月占领沈阳至介入朝鲜战争、拒绝联合国停火建议期间实施的政策和行动的反映，将这段历史中被混淆的部分澄清过来。

非常难得的是，马丁还根据近期发表的英国外交部文件，平行地叙述了当时的中英关系，这对人们了解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很有益处。更意味的是，英美两国政府向中共接近的初期努力都失败了，它们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影响中国政局的能力和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脆弱性。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时候，中共才改变了它在1949—1950年间所坚持的外交政策和立场。

本书关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关系的新观点，必将受到关心亚洲的历史和外交事务的各界人士的欢迎。



## 作者前言

当我开始为本书搜集材料时，本打算侧重写一写美国对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因为在我看来，在现有的中美关系题材的著作中，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例如，长期以来我就发觉：一些有见识的人一般都不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几个月中，美国官方曾试图继续留在中共统治的地区，美国代表曾徒劳无益地试图和中共官方讨论一些具体问题。

按照这样的设想，我原来只打算在书中附带地写一下自美国官员于1950年春撤离中国后，英国人充当美国在华利益代理人的情况。然而，在查阅了英国外交部的文件之后，我决定改变原来的写作设想，对中英关系的描写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通过详细对照当时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对共产党在中国实施的政策反应，能使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那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当年英国选择了美国应该选择却未能选择的对华政策，然而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并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在英美分歧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本书所要探索的主要问题是：当年英美的对华政策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分歧的。

本书的大部分笔墨都花在了1948年底至1951年初英美对华政策的演变方面。这是比较合乎逻辑的，因为在1951年春天以后的几年里，英美的对华政策没有发生什么有意义的变化。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追加了两章篇幅来描写1953—1954年间英美对华政策的进展，因为北京的对英和对美政策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英美的对华

政策。如果北京的这一政策变化发生在朝鲜战争之前而不是之后，中英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就远不会象当初那样曲折了。

## 致 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美国科学研究会从彭罗斯基金中对我提供了支持，使我能够到英国档案局进行研究工作；哈福德郡大学的教授特雷弗·梅为我写了极有帮助的介绍信；英国档案局也对我的工作进行了大力协助。在此，我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美国档案处的萨莉·马克思还干练和情愿地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诸多方便。

我特别要感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拉尔夫·克拉夫先生，他为本书的写作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和建议。凯瑟琳·福曼耐心细致地多次审阅了本书的底稿，罗伯特·艾尔沃德向我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在此我也向他们致谢。我还要感谢格拉迪斯·哈伯德·斯威夫特，她向我提供了他父亲的信件以及口述历史录音带，并允许我在本书中引用。傅泾波、菲利普曼哈德和威廉N·斯托克斯等人也为本书的写作提出了深有益处的观点，在此我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 第一章 原地不动

## 1 对胜利示威的反应

1948年岁尾的几个星期，在中国内战的战场上，共产党取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军事胜利。11月，刚刚征服满洲的共产党军队又马不停蹄地向关内挺进，开始威胁华北平原的两大城市——天津和北平。次年初，共产党军队先后将这两个城市占领。与此同时，在华东的淮海战役中，据中共自己报道，“达60万”之众的共产党军队歼灭了50多万中国政府军队，并使国民党中国的首都南京“直接遭受到人民解放军的威胁”<sup>①</sup>。

在这一系列示威性的军事胜利中，中共主席毛泽东于1949年1月1日向中国人民发表新年献词（这篇新年献词写于1948年12月30日——编者注），宣布：“中国的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现已认识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因此，他们越来越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即“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他们的）‘和平’阴谋”。但是，毛当时没有和谈的兴趣，他接着宣布：“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4卷本（北京，外文出版社1961—1965年版）第4卷第280页注释。

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sup>①</sup>。

早在一年前，在向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一个报告中，毛泽东就宣布，在全世界范围内，“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势力”反对“帝国主义和反民主势力”的斗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毛的报告，并在决议中声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sup>②</sup>这样看来，如果说毛的1949年新年献词反映了中共之决心的话，那么，这种决心又由于当时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而更加坚定了，迫使其革命的对象没有考虑调和与妥协的余地。

英美决策人物对共产党力量在中国急剧壮大的戏剧性现象几乎再不能漠然视之了，他们开始尽可能地制定应对计划，使自己的政策适应于变化了的形势背景。1948年12月13日，英国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外交部提交的关于“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反击共产主义在中国及毗邻的远东地区的扩散”的备忘录。内阁会议断定，美国是唯一能够在中国采取反击行动的力量，但它却不可能采取这种行动，即使采取了，效果如何也是非常拿不准的<sup>③</sup>。1949年1月11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反映英国内阁会议上述观点的政策文件，指出，只有美国能够“为反击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提供财政、物资和军事装备上的支持”；而英国在中国的最好希望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关系，调查贸易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4卷本（北京，外文出版社1961—1965年版）第4卷第301—303页。

<sup>②</sup> 同上，第158—169页。

<sup>③</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Office document，以下英文名称一律省略——译者注）371/89547F17714。

的可能性”<sup>①</sup>。

恰好也在1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一份代号34/1的文件（NSC34/1），将美国在华新目标表达为“让中国人自己发展一个对美友好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中国”。然而，该文件清楚地意识到，任何一个中国集团都不大可能被指望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译者注）难以指望还能生存多久，共产党又持不友好态度。鉴于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短期目标应该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在准备NSC34/1文件时，美苏之间的冷战已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柏林墙也全力修建达数月之久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明确指出美国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来避免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但却建议美国政府制定有关计划，以准备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机会，使美国政策“保持灵活性，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身上”。在如何认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方面，该委员会在34/1文件中规定了一条重要的限制性条款，即：“把中国排在另一些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更加直接攸关，与美国为之花费的财力更为相称。”<sup>②</sup>

毫无疑问，中共的军事胜利对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译者注）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在当时情况下，不仅公众愈加失去对蒋介石的领导信任，国民党政府内部的主和势力也迅速强大起来。出生在中国的传教士、1946年年中以来一直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约翰·莱顿·司徒雷登，于1948年12月21日以个人名义发给乔治·马歇尔国务卿一份电报，称“蒋是多么彻底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要求他隐退的愿望是那么广泛”，以致“被政府内各

---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英文名称一律省略——译者注）1949年第9卷第821—822页。

<sup>②</sup> 同上，第474—475页。

个阶层的大部分官员所持有。”<sup>①</sup>就在这份电报发出一个月后，蒋便终于宣布了隐退，把和平谈判的任务丢给了他在国民党内的主要政敌——副总统李宗仁。

随着中共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李宗仁几乎没有什么指望在和共产党的谈判中捞到任何挽救其政府失败的稻草。而且，共产党在1949年1月14日通过电台广播宣布的和谈八项条件，也几乎没有为促成和谈作出半点让步。其中第一条就是“严惩战犯”，蒋介石名列榜首。美国驻华大使馆把共产党的条款叫作“几乎类似无条件投降”，并指出，“现在最直接的和最无法调和的分歧，是国民党要求在和谈开始前停战，而共产党则坚持在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后停战。”<sup>②</sup>

尽管和谈已没什么希望，李代总统还是决定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北平，共产党也同意接待它，但必须以八项条件为基础。在美国大使馆看来，这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条件，李“或者是完全投降，或者是继续抵抗”，没有其他选择；大概李会继续抵抗<sup>③</sup>。事实正是这样，当这个代表团在北平白白呆了三个月之后，李终于选择了抵抗。结果证明，其抵抗没有任何作用。

## 2 领事馆坚持下去

当共产党在满洲和华北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之际，英美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反应步骤——原地不动。首先是在满洲的重工业城市沈阳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时，美国驻那里的总领事馆仍然开放办公。其次是天津和北平失守时，美国驻那里的总领事馆采取了类似于在沈阳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当时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至少美国企业和慈善机构会继续存在下去。它甚至鼓励这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7卷第674—677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65—66页。

③ 同上，第86页。

些企业和机构中的重要人员原地坚持，并向他们保证，在特殊情况下，他们将作为美国领事人员继续留下。国务院尽管知道中国内战的发展势头会置其所有在华外交业务机关于不顾，但它仍明显地希望通过实施保留这些机关的政策，鼓励那些对美国在华的宗教和慈善机构的继续存在具有重要作用的非官方的美国侨民继续留在中国<sup>①</sup>。与此同时，那些无足轻重的美国侨民则不时被警告继续呆在中国是危险的，并被劝告离开中国。

英美等国家的政府在共产党占领的城市继续开放领事馆的决定是符合国际外交惯例的，但是，要其在驻华大使馆的问题上做出类似决定，政治上就比较敏感了。1949年1月26日，司徒雷登大使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团的大使接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正式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sup>②</sup>。对这个照会，司徒雷登在其自传中是这样评论的：“政府为保持其声望，自然要求外交使团随它迁往广州，在法律上，我们都被委任给它，所以也应该合乎体统地跟它到‘临时首都’去。”<sup>③</sup>

只要考虑到共产党在淮海战役后对南京构成的威胁，就不会对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上述要求感到惊奇。事实上，司徒雷登大使和他北大西洋条约国家的同事讨论这种可能性已经有一些时间了<sup>④</sup>。在1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向他们各自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往广州，每一位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派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伴随其他一些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身要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sup>⑤</sup>。这个建议与上一个月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应急计划是一致的<sup>⑥</sup>。不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8卷第901—903、907—910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663页。

③ 约翰·莱顿·司徒雷登：《在中国50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纽约：兰登书屋1954年版）第215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7卷第850—855页。

⑤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659页。

⑥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8卷第859页。



过，在美国国务院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之前，还要经华盛顿再次复审。

关于这个决定的基本道理，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斯在给代国务卿罗伯特·洛弗特的一份备忘录中做了清楚的表达<sup>①</sup>。在巴特沃斯看来，在华的大部分美国商人和传教士很快都要处在共产党统治地区。如果司徒雷登大使从南京撤出，看上去就好象美国倾向于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并由此使美国失去在共产党统治地区的位置。“如果美国要在这些地区保护自己的利益或促进这些利益”，巴特沃斯解释道，“就必须有官方代表和这些地区的中央统治当局进行接触。”<sup>②</sup>

巴特沃斯承认，国会中的一些人和新闻记者会严厉地指责不让司徒雷登大使跟随中华民国政府到广州去的决定，但他强调，这些人没有认识到军事形势已处于绝望的境地。他引证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大维·G·巴将军的评述说，要使国民党政府在华南立住脚，美国就得提供无限制的援助，包括直接部署美国军队。巴着力劝阻这一行动路线，认为美国政府绝不应该为救中国政府而走得这样远。只有两个选择：或美国从中国全部撤出，或用一个尽可能解救美国在华利益的方法努力影响最终的结局<sup>③</sup>。把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会有助于实现后一个意图。

杜鲁门总统考虑再三，最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司徒雷登在南京原地不动的决定，但前提条件是这一指示的贯彻要和北大西洋条约国家同步<sup>④</sup>。不管怎样，在共产党占领南京前的3个月中，美国和其盟国将它们的大使留在南京的明智决定，最终经受住了考验。

---

① 巴特沃斯虽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却也是一位外交老手，在外事处工作20多年。1947年任职国务院之前，任美国驻南京大使帮办。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665页。

③ 同上，第665—666页。

④ 同上，第667—668页。

与此同时，中共在其占领的城市中却发出通牒：如果西方的国际惯例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按照这种惯例去玩外交游戏。不过，自11月1日占领沈阳起，他们似乎有两个星期是按照这种惯例应付外国人的。11月5日，新任沈阳市长朱奇温（译音）代表当局召集英、法、美总领事到他的办公室，当面允诺将给领事馆全体人员发放身份证，并为领事馆的汽车发放三角旗，作为识别标志<sup>①</sup>。四天后，这位市长又以官方身份回访了各国领事馆。在此期间，美国总领事安格斯·沃德收到了“几封来自地方当局的信件”，注明收信地址和收信人为“美国总领事馆总领事，或美国总领事馆办公室”。这使沃德断定：“在当时，共产党的意图是承认我们，并允许我们作为美国官方机构行使职责。”<sup>②</sup>

共产党在沈阳给予外国领事馆的待遇是非常符合国际惯例的，以致美国国务院都引证此例来减轻其他被共产党军队解放的城市中的美国人的恐惧感<sup>③</sup>。但是，好景不常，没过多久，这种待遇就不复存在了。正象当时美国驻沈阳副领事威廉·N·斯托克斯随后回忆的那样：

一份注明日期11月14日和注明收信地址“前‘美国领事’”的通知书（同样的公文也寄给了“前”法国和英国领事），要求所有外国人必须在48小时内交出他们占有的全部无线“电台”。总领事要求会见市长，讨论这个通知，但没有得到市政当局的答复，尽管询问了好几次……然后，沃德博士通知当地驻军指挥员（他组织起草了那份通知书）：要答复这一通知，需要多于48小时的时间，因为美国政府是这些设备的主人，领事馆必须同它商量；不过，他允诺尽快作出反应。那位指挥员拒绝了这个处理方法。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7卷第828页。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7卷第828页。

<sup>②</sup> 安格斯·沃德：《沈阳事件》，见美国国务院1950年2月15日《外事公报》。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7卷第828页。

<sup>③</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7卷第882—883页。



当时领事馆用的通讯设备和编码机都是临时凑合的，要在48小时内得到华盛顿的指示是不可能的。规定时间过去后，显然得到了明确指示的共产党地方当局，立即派部队包围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切断了它的电源、水源，并把领事馆的编制人员一律软禁起来<sup>①</sup>。

这样，沈阳新政权就突然地、单方面地被灭了美国通过领事官员与他们建立工作关系的希望。当时，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人都是自愿留在那里的，他们兴奋地期待着就任于美国在中共控制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作为总领事的沃德，曾从国务院得到指示，去寻求和共产党地方官员对话的机会。他为此也进行了诚实的努力，并在一开始似乎还取得了令人乐观的进展<sup>②</sup>。

在一段时间内，国务院没有意识到其驻沈阳领事馆发生了什么事，只认为那个领事馆是被禁止传输文电。这样，国务院便于12月2日指示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乔治·霍普尔派人就沈阳形势通知中共驻香港代表，并探询一下他们是否能让沃德接收一份文电<sup>③</sup>。这个努力被证明是没什么结果的<sup>④</sup>。次年3月2日，国务院再次努力，指示其驻北平总领事埃德蒙·柯乐博寻求会见“尽可能高级的共产党领导人”，代表美国政府就“沈阳通讯继续中断和领事馆人员遭到共产党限制的持续传闻”向中共方面质询。同时要柯乐博指出，“国际惯例是允许外国常驻领事在政府间尚未承认的时期继续在其领事职权范围内行使其合法而恰当的职责。”他要承认，出于军事和行政的紧急需要，临时中断美国总领事馆的通讯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要强调，由于在“这样长的时间内”得不到总领事馆的任何通讯联系，并“持续收到关于

① 威廉·N·斯托克斯：《中美关系的未来》，见1988年1月15日《外事处日志》。

② 1985年9月29日，斯托克斯与我谈话时说，沃德被单独软禁之前，“处于极差状态”。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7卷第841、842—845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8卷第933—934页。

美国领事人员遭到限制的尚未证实的报告”，已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关注<sup>①</sup>。

柯乐博带着质询信来到北平外国侨民处，当面把信交给一位级别较低的官员。45分钟后，这位官员带着一位据闻是侨民处负责人的官员从里面出来。他叫“李立华（译音）”，他告诉柯乐博说，信的意思全知道了，柯乐博可以把它收回了。李未说是否给予考虑，因为侨民处和市政府的职权只限于北平，他不能做出尽早答复的允诺<sup>②</sup>。李的小心是明智的，因为事实证明，美国这封信从未得到过答复，尽管这对美国是十分重要的。

国务院给柯乐博的质询信同时也电告给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责其转交给中共驻那里的高级官员。然而，这位总领事和北平的柯乐博一样，努力的结果等于零。在“没有得到承认”的情况下，中共驻香港高级领导人是不会会见美国总领事的。无奈，只好由副领事理查德·塞维斯把信转交给新华社驻香港代表乔木，请求他再转交中共当地最高领导人。但乔木于四天后把信退给了塞维斯，同时给他一张私人便条，内称“很抱歉，我不能转递这样的信”<sup>③</sup>。

此后不久，英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通讯也被切断了。英国外交部试图通过香港政府就此事与中共接触，但香港总督不想“在目前情况下给中共以官方承认的印象”，而且也不想遭到美国副领事那样的冷落，故拒绝了英国外交部的要求<sup>④</sup>。英国外交部在分析后也“同意了总督的看法——现在通过香港建立接触只会再次招致冷落”。但外交部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指示其驻南京大使写信“平寄”给沈阳和天津的英国领事官员，使中共“无论如何都

① 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8卷第943—944页。

② 同上，见第944页。

③ 同上，第944—948页。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0F4351。

能知道我们的态度。”<sup>①</sup>

就在这个时候，英国驻南京大使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美国大使馆记给柯乐博的关于和北平共产党当局探讨处理沈阳问题的指示看作是美国的“最后尝试”；如果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境遇通过这次尝试不能得到改善，美国就将它撤出。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彼得·斯卡尔特接到这个报告后颇感惊异（尽管他没有远东事务方面的经验），因为英国一直在和美国国务院探讨对共产党施加压力以使其“按正常礼节对待我们领事”的可能性问题，他从未听到过给柯乐博的指示就是最后尝试的说法。斯卡尔特“未能看出他们能从其沈阳总领事（安格斯·沃德）的撤离中得到什么好处”。他判断，“如果必要的话，沃德博士是有意被选来经受困因之考验的，其总领事馆内现有的生活必需品至少可用一年”<sup>②</sup>。

总部设在新加坡的英国政府派驻东南亚最高特派员马尔克姆·麦克唐纳与斯卡尔特的观点相类似。在3月17日发给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他强调指出，有希望劝使美国不撤出它驻沈阳的总领事，因为这样撤离只会符合共产党的愿望。在他看来，共产党的政策“明显是要使我们的领事机构失去作用，并因此而撤离”。他表示要设法避免造成西方盟国间“坚固阵线的任何破裂”<sup>③</sup>。

英国外交部中国处官员帕特里克·科茨在评论麦克唐纳的建议时说，“美国国务院是否会理睬我们关于他们的人应该留在沈阳的建议是值得怀疑的”。他觉得，“更可能的是”，美国国务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0F4351。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5F3866。且不管安格斯·沃德受困沈阳是不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单就他既熟悉那个地区又了解苏联的事实本身，就注定他是任职沈阳的最佳人选。当他于1946年出任沈阳总领事时，他已经在外事处工作21个年头了，其间在中国工作9年，而一开始就被安排在沈阳（1925年），之后又到苏联工作了10年，离苏时已任符拉地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下同，——译者注）总领事3年。见英国国务院《传记名册》，1954年，第82页。

<sup>③</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5F4062。

院反倒会劝说英国外交部“立即撤出陛下的总领事”。科茨的上司彼得·斯卡尔待同意科茨的看法<sup>①</sup>。

然而实际情况是，当英国外交部忧心忡忡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并没有做出总领事馆撤离沈阳的决定，更不用说要求英国也这样做了。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仍反对撤离，因为在他看来，满洲是苏联扩张的战略地区，沈阳作为那里的一个观察站，对美国很有价值<sup>②</sup>。当然，无论是柯乐博还是英国外交部，当时都没有意识到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已变得多么没有价值，只是到1949年3月底，他们才醒悟过来。3月30日，英国驻南京大使馆收到其驻沈阳总领事瓦尔特·格雷厄姆发来的报告，说从上一年11月初起，美国在那里的领事馆就“不存在了”，“虽然英法领事的存在的确激励着士气，但他们基本上也无力保护其侨民了”，<sup>③</sup>外交部收到这份报告时很气愤，就象科茨评论的那样，认为共产党的行为“比我们知道的还要不光彩，这个消息毫无疑问会加强美国采取强硬行动的愿望”<sup>④</sup>。

在其他被人民解放军占领的城市中，虽然各领事馆未遭到沈阳领事馆那样的命运，但每个城市的当局都很坦率地表示，他们不同意传统的观点——在没有政府间的承认和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领事官员仍有权行使其职责。共产党的观点是，在没有相互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领事官员只是一般侨民，没有资格行使官方职责<sup>⑤</sup>。这样，英美等国家的领事官员虽然尝试了许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5F3886。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949—950页。埃德蒙·柯乐博是美国国务院外事处中一位非常认真、博学且能讲中国话的官员，有着长期的在华经验，曾在满洲和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7F4793。格雷厄姆总领事在中国工作达20年，任过好多地方的领事职务。

④ 同上。

⑤ 英美驻天津领事官员当时都报告过这种情况，见《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54F7100和《英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057页。

多次，但终未能将一些对其政府来说非常紧迫的问题向适当的共产党官员提出。

他们为什么会遭受如此的尴尬和挫折，其中的原因，在下面一份译电摘要中大概能得到强有力的说明。这份译电是北大西洋联盟国家驻北平领事于1949年4月12日联名致北平市长叶剑英——一位中共高级官员的。译电摘要如下：

自从中共军队占领这座城市以来，我们和地方当局一直没有正常的接触，进而不能就一些突出重要的官方问题直接向地方当局提出。我们几次试图通过侨民处来建立这种接触，但都没有结果。

……我们注意到，根据共产党的习惯做法，地方行政组织通常以没有外交关系作为拒绝和我们北平领事机构打交道的唯一解释。就此我们应该强调，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促进贸易、交流、相互援助和保护海外侨民等问题上，领事职责的行使一般不与国家间的承认问题相关连，承认问题只与国家政府间的行动有关<sup>①</sup>。

这份联名信照旧被退还给诸国领事，没有任何答复<sup>②</sup>。这表明共产党仍未松动其强硬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实际效果上堵死了美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与中共地方各当局进行联系的渠道。此时，北平已成为中共和人民解放军的总部。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周恩来等中共高级官员，从3月25日起就驻进了北平<sup>③</sup>。虽然不可能指望共产党最高级领导人直接和外国领事打交道，但他们在北平的存在本身就保证了权威性的政策指导，而且这种存在还直接影响着低级官员，如果被允许的话，他们是能够同外国领事进行接触的。

在外交部，科茨由此想到了19世纪初期中华帝国的形势，当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077—1078页。

<sup>②</sup> 同上，第1080页。

<sup>③</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7F4653。据3月30日《北平文摘》报道，“3月25日下午4点钟”，毛泽东、朱德及“其他中共领导人一行抵达北平”，在一个飞机场受到“大约1000名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的欢迎。

时外国人也不能获得接近其官员的机会，因此也“不能解决甚至讨论任何问题”。在4月2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回顾了历史后说，如果英国能被允许保持“和共产党的不固定接触”，“紫石英号事件”就不会发生了<sup>①</sup>。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在4月20日。那天，从上海出发的英国护卫舰沿长江向南京航行，以解救被困在那里的英国驱逐舰协力号，结果被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严重击伤。英国三艘战舰在这次炮击中被驱逐，包括前来援救紫石英号的协力号，伤亡非常惨重。英国人的自尊心被刺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得以满足。正象司徒雷登大使在其后来的自传中所说：“我感觉到，更多的中国人为这次胜利而自豪。多少年以来，以英国为主的外国商船和军舰任意地在这条大江中上下航行，现在则不然了，至少受到了勇敢的挑战和行动限制。”<sup>②</sup>共产党当然要利用这一事件进行出色的反帝宣传。例如，4月25日的新华社社论宣称：“英帝国主义必须知道，中国不再是1926年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时的中国了，也不再是大不列颠和美国联合轰炸南京时的中国了。长江现在已属于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不再属于奴隶般卑躬屈膝的卖国贼。……英国侵略军必须撤出中国。”<sup>③</sup>

科茨关于共产党官员若能同英国领事官员进行不固定的接触（在天津和北平），灾难性的“紫石英号事件”就不会发生的推测也许离现实太远，但他关于解决问题必须讨论的观点则为英国政府信守不疑。针对共产党的无外交关系就不讨论任何问题的观点，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回答议会的询问时指出，中共要和英国建交，起码前提是“宣布建立国家特征的政府”。贝文还回答说，“我们希望我们在中国的代表能够和共产党当局就

① 见《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9F5972。

② 《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34页。

③ 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1949年4月25日，第1—2页。约3个月后，当紫石英号从中国逃脱时，英国海军的自尊得到一些宽慰。



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不进行不固定的接触。不幸的是，这些接触要求都被拒绝了。”<sup>①</sup>他认为，由于中共拒绝和外国领事或外交官员讨论问题<sup>②</sup>，所以，他们必须对这次误解和挫折承担主要责任，他们与外国公众的关系也将由此受到困扰。

### 3 苏联和中共

与英美截然不同，苏联对中共关于领事地位的观点持完全支持的态度。基于和中共没有外交关系的理由，它关闭了其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中的领事馆<sup>③</sup>。可能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中共占领故都南京时，苏联大使早已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这些步骤非但未被看作是对中共的冷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恰当的外交举动，意味并显示着它与中共在观点上的一致<sup>④</sup>。这种观点很可能首先来自于苏联。中共之所以采取拒绝与西方领事人员进行任何实质性接触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很可能是出于苏联目标的需要，这就是恶化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无论如何，在1949年的头几个月中美英都已经注意到，在苏联的宣传机器中，对中共的赞誉之词日益增多；同时，中共的宣传媒介似乎也在加紧表明它对苏联的支持和对美国的谴责。例如，2月3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醒国务院注意两篇文章，“其一是苏联最近关于中国形势的社论”，它“清楚地证明了”

---

① 在那次辩论中，当下院议员、共产党员威利·加拉赫问毕时，贝文一方面告诉中共当局“拒绝和我们谈话”，一方面建议说，由他（加拉赫）“把话捎给他的朋友们，告诉他们”有关英国的观点，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1F9683。

② 参见《英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27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54F7099。另见《英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291页。

④ 参见文伦·劳伦斯著《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事务》（伦敦：劳特利奇——基根·保罗1975年版）第22页。

克里姆林宫和中共之间的“牢固联盟”。大使馆从这篇文章中感到，克里姆林宫关于中国形势的路线终于出台了，他们“近来对这个问题的回避”态度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大使馆提请注意的另一篇文章，则把中共看作是和平与民主权利的最忠诚、最一贯和最无私的奋斗者<sup>①</sup>。

关于中共对苏宣传口径的新动向，英国驻南京大使馆是这样报告的：3月18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虔诚地采取了共产党的一贯模式，一方面谴责美国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一方面把苏联的动机和行动理想化”。这篇社论不仅宣布是苏联促使日本投降的，而且还赞美中苏1945年条约，赞美苏联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友谊。外交部的特科斯指出，“这是共产党暂时提供给我们的最好材料，它证明……毛泽东将军将继续采取传统的政策”<sup>②</sup>。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也认为，新华社的社论表明中共已完全支持苏联。大使馆报告说：和毛于1948年11月1日在共产党情报局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及刘少奇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sup>③</sup>一文相比，陕北广播电台广播的那篇社论，使中共的“对外政策更加卫星国化了”。它把美国作为攻击的唯一目标，把苏联对旅顺和大连港的占领，合理化为“阻止美帝国主义”<sup>④</sup>。

在3月19日的日记中，司徒雷登大使把那篇广播与北大西洋条约联系起来，写道：

这是最后的日子。

1. 北大西洋条约正文的发表，表明美国已加入对事先就显露出的侵略

---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05—106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0F4291。

③ 毛的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83—286页。刘的文章最先于1948年11月发表，后又收入《刘少奇文集（1945—1957）》（香港，联邦研究院1989年版）第123—151页，选自北京外文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译本。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92—194页。

行为的抵抗，同时表明美国政策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

2. 陕北广播电台明确地宣布要支持苏联和斯大林——明确宣布了它的反美意图，以谎言和颠倒黑白为前者辩护——敌视后者，——或许是在莫斯科指示下和上述美国的态度形成对照①。

4月4日，北大西洋条约签字的那天，“中国解放区所有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主席代表中共签署的“庄严声明”，宣布：如果大西洋条约导致反苏战争，他们就帮助她抵抗侵略②。英国外交部的盖伊·伯吉斯指出：“北平——中共的活动中心，在广播中直接宣布，在和大西洋诸强国的战争中，中共将率先支持苏联。”在伯吉斯看来，与莫里斯·多列士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代表法共和意共发表的类似声明相比，中国的声明不受法国和意大利那样的环境的限制③。

科茨在评论彼得·弗莱明在4月22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时，表达了远东司对中共正统性的看法，指出：“我认为，那位作者很少注意到共产党在中国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严格的正统性，攻击铁托和大西洋诸强国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4月18日，我们驻南京的大使馆报告……‘共产党突然地而且显然地强化了他们忠实于苏联的宣传，如果再看到其最近的一些行动，有理由认为他们已在实际上开始运用苏联的教条’”。④除科茨所在的远东司外，调查司也对中共有类似的看法。2月3

① 见《约翰·莱顿·司徒登日记》（《危机之年大事记——1949》）（帕洛阿尔托，加利福尼亚，美利坚合众国燕京大学同学会1980年版）第29页。

② 《伦敦工人日报》1949年4月5日。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7F4723，另见371/74759F5496。盖伊·伯吉斯是远东司中关于苏联和中苏关系问题的专家。1951年他消失在欧洲，最终于1956年出现在莫斯科。鉴于他和苏联的密切联系，他的估价虽易遭怀疑，却是英国外交部记录在案的，而且他的观点似乎当时也被其远东司的同事普遍接受，其同事的大部分都是伊顿公学的学生。参见约翰·费希尔著《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伦敦，罗伯特·黑尔1977年版），道格拉斯·萨瑟兰著《第四个人》（伦敦，塞克-沃伯格1980年版）第75—76页。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9F5626。

日，调查司发表了一份长篇备忘录，强调了中共对苏联路线的忠诚，并辩解道，毛是否有与西方建立关系的愿望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即使他有这种愿望，也不可能转而反对苏联。在概述了毛在1947年12月25日对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后，这份备忘录接着指出：

六个月以后，中共开始对铁托和南斯拉夫进行谴责，所用措词均是非中国化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中共已追随莫斯科。然后，似乎墙上的字迹（原文有“恶劣”的意思——译者注）还不够清晰，1947年（原文如此）11月1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世界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其中详细地表述了共产党执政后将继续遵循的路线，所用措词同样是而非中国化的，并且登载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共产党情报局杂志上<sup>①</sup>。

在满洲发生的一些事件，也使英美察觉到中苏在1949年头几个月中的日益紧密的关系。首先是1949年4月1日中共分支机构公开出现于大连。在这之前，该机构虽然和控制这个城市的苏联军事当局一直有紧密的联系，但从未公开过。当时美国驻大连领事保罗·帕多克是这样报告的：“中共地方支部已正式地从地下出现，并宣称它隶属于中共东北（满洲）局。各种前线组织机构也都更改了名称，有的还公开承认是共产主义团体。在此之前，中国国民党和苏联的旗帜一起飘扬在公共建筑物之上，以象征苏联对华政策的‘正统’性。现在则不然了，中共的旗帜取代了国民党的旗帜。各种前线组织、政府职员、工厂工人和警察等，都游行庆祝中共的正式出现。”<sup>②</sup>帕多克不能理解，“俄国人为什么

---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5F4062。这是同一内容的文章，实际上发表在1948年11月1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引用它证明中共追随苏联路线。毛向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7—173页。

<sup>②</sup> 保罗·E·帕多克：《中国日记——大连的外交危机》（艾姆斯：衣阿华洲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48页。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807F14700和《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875页。保罗·帕多克在领事处供职41年，先后在好几个亚洲国家任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呆了一年，但先前没有在华工作的经验。

要把关东的民政权力交给中共，首先是在1946年暂时移交，最后又在1949年加以确认”。他指出：“一开始，俄国人担心国民党和他们抵触，并担心国际舆论，故从1946年起，始终于暗处扶植中共关东行政机关。今天，它使这个民政机关掌权，并公开让中共为之配备人员，大概是因为中共在此时才获得政治优势。”<sup>①</sup>

苏联和中共的紧密来往，不仅表现在关东民政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经济开发方面。据新华社1949年4月17日报道的一个讲话，中共旅大区委书记欧阳钦详述了苏中联运公司所取得的进展，并“感谢苏军司令部的积极援助。”<sup>②</sup>上海《新闻日报》记者张柏（译音）于同年6月初参观了旅大，并写了许多报道文章，其中说道，到1947年10月底，“一些中苏联营工厂已经重新合作”，“两年以后”的今天，“中苏联营工厂的生产能力已得到增强”。1950年初，另一位中国记者进一步证实了张柏的报道提到的有关日期，写道：“在1947年10月，中共号召大连和旅顺港人民增进他们城市的工业生产，并明智地按照苏联的经验进行努力。”<sup>③</sup>

苏联占领大连和旅顺港，当然是根据1945年8月14日中（国民党）苏两国政府签订的那个条约。该条约不仅恢复了苏联在沙俄时代就取得的一些在满洲的特权和特殊待遇，而且还象科茨在3月26日的备忘录中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侵华标志”<sup>④</sup>。然而，中共宣传机构却一直赞誉它，并谴责1943年中国国民党与美英谈判所签订的条约——它们使英美放弃了在“不平等条约”时代获得的特殊权利和待遇的最后残余。

① 帕多克，《中国日记》第152—153页。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07F16173。

③ 同上，F17870。《人民中国》，1950年3月16日第7页。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6F4220。

## 4 英美的政策

当中共和苏联关系日益紧密的时候，英美则开始在对华政策上发生分歧。应该说，英美两国在对中共的贸易政策上一开始是相当一致的。在华盛顿，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制裁对中共的贸易，一是允许对中共的贸易。头一个方案需要动员“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通过威胁和直接压力，与中共政权公开对抗”。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有两个：“(a)或通过严厉的经济限制，迫使中共抵制克里姆林宫的压力，采取美国能够接受的内外政策，(b)或使中国完全孤立于日本和西方，致使中共政权倒台或崩溃。”审查完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案予以否决，因为“很难预计西方国家能够采取必需的一致行动，以有效地实施对华严厉限制或贸易禁运政策。”<sup>①</sup>尤其反对这一政策的是英国，因为它在华的投资不仅比美国多得多，而且香港的经济地位也仰仗和中国大陆的积极的转口贸易，由于这个缘故，英国在华公司“经常表示要在中共统治下继续和中国做生意”，英国驻美国大使馆还暗示美国国务院，英国“最关心”的是保护英国在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sup>②</sup>。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反对经济限制政策的其他一些论据也是值得一提的，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美国在以后采取这一政策时为什么遭到失败。这些论据是：中国相对的经济自给和低水平的消费会减少经济限制和禁运的效果；以外力实施这种限制政策，将使共产党得以树立其抵抗外国迫害和捍卫中华民族利益的形象；限制还会妨碍日本重建与满州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的进程，导致日本延长对美国的经济依赖；顾虑最多的，也是最害怕

<sup>①②</sup>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9年2月28日制定的NSC41，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826—834页。

的，是贸易制裁会促使中共政权完全处于苏联的隶属地位，进而使美国的基本对华政策落空，这就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sup>①</sup>。

考虑到这些反对意见，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在不影响基本安全的情况下，美国、日本及西欧国家均可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至于安全问题，则由一套控制程序予以保证，这就是对华出口审查制度，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国把重要的工业、交通和通讯物资转口给苏联和东欧。同时还决定，美国应利用其经济地位，“加剧”中共与苏联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冲突”，“不断加深中国对日本和西方的贸易依赖关系”<sup>②</sup>。

3月21日，在和英国人商谈对华贸易政策时，美国官员解释说，美国打算将目前只应用于欧洲的控制出口的限制程序扩展到中国。按此程序，所有对欧出口都必须有出口许可证保险，以使美国商业部可根据战略考虑，决定是否发放许可证<sup>③</sup>。

自1月11日以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系列有对华政策内容的备忘录，其中3月23日的备忘录提出了英国关于对华贸易政策的如下观点：虽然英国意识到中共在长期内将“对外国在华利益采取剥夺和驱除”的政策，但英国仍然认为，“在开始阶段，严重的经济困难将使共产党不得不逐渐地面对现实，并在一个时期内，对外国在华利益采取相应的容忍政策”。英国还相信：“在开始阶段，任何施加经济压力的企图，都可能加速第二个阶段（指“剥夺和驱除”阶段——译者注）的到来。”<sup>④</sup>

美国官员否认他们正打算对中共施加制裁性的经济压力。4月7日，巴特沃斯向英国驻美使馆参赞休伯特·格雷夫斯指出，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826—834页。

② 同上，第834页。

③ 同上，第835页。

④ 同上，第837—840页。

虽然美国要以“充分的控制措施防止军用品和某些战略物资到达共产党手中，并防止这些物资得以贮存或转口给苏联”，但美国不想“卷入和中共的经济战之中”。<sup>①</sup>不管怎样，英国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美国人在真正想要使用经济制裁武器之前，就会不自觉地扳动这一武器的机关。故此，格雷夫斯于4月11日给彼得·斯卡尔特写了一封信，说他已告诉巴特沃斯，“陛下政府得出的结论是，在共产党胡作非为而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积极行动之前，他们一整套的经济武器不应再使用”。他还说，英国的态度和美国的建议不同，“按照美国的建议，我们应该晚些时候再安排我们的对策”<sup>②</sup>。

当英美正在华盛顿商讨对华贸易政策时，美国国务院收到了来自中国战场的建议：以经济压力迫使共产党当局允许美国领事馆行使其正常的职责。例如，起码在2月初，驻上海总领事约翰·穆尔·卡伯特就告知国务院，在天津和沈阳，共产党当局以未承认为由，拒绝和那里的领事馆进行任何接触。鉴于此，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我们应该采取最有效和可行的措施，迫使他们在取得上海后和我们打交道”。卡伯特建议，美国要使共产党知道，如果没有上海领事馆按照自己的职能提出建议，那么，“上海和美国之间的任何进出口贸易都将不被允许”。象大多数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喜欢夸大中共经济的脆弱性一样，卡伯特说，采取这样的措施，“会在实际上迫使”共产党和美国领事馆打交道<sup>③</sup>。

无论如何，以经济压力迫使中共承认领事地位的建议，最后都遭到了国务院的否决。4月14日，国务卿向国家安全委员会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841—842页。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9F5523。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906—907页。约翰·穆尔·卡伯特在外交处工作约43年，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外交官，其外交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拉丁美洲。上海是他在亚洲任职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地方。



执行秘书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宣称：这种压力“从策略上看目前是不能指望的，而且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所规定的政策相矛盾”。备忘录提出，“领事职责的履行……应从它本身的法律依据去寻找”，领事职位应按要求以领事签证作保证<sup>①</sup>。

英美间更主要的分歧不在贸易政策，而在对台湾的政策上。两国政府都想和共产党中国继续进行贸易，而且都看到了对这种贸易实行某些控制的必要性。他们的分歧主要围绕在贸易控制的期限和程度上。至于台湾，他们的分歧则是比较严重的，概括起来就是：是把它看作中国的一个省，并认为它注定要落入共产党手中——英国的观点，还是把它看作一种特殊类型，并阻止它落入共产党手中——美国的观点。

美国的对台政策似乎是受几方面的考虑所影响，其中考虑最多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台湾和澎湖列岛对美国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另一个考虑是台湾的合法地位还未最后确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就按照1943年开罗会议的诺言，把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给中国，但在中日和平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这些岛屿的地位容易引起争议，还不能合法地将其主权移交给中国。与这种考虑相比更具政治意义的，是在台湾人民中存在着一个独立运动和广泛的反中国政府（指国民党当局——编者注）的情绪。这就使华盛顿能够想象出通过将台湾与中国分离的办法，阻止它落入共产党手中<sup>②</sup>。

对台态度上的分歧不仅在美英之间发展起来，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也发展了起来。1949年2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虽然认为“目前对台湾承担任何公开的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但却建议，“可在台湾一个或数个港口上驻扎少许舰队，辅以维修、空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843—844页。

<sup>②</sup> 同上，第282页。

中通讯和人员娱乐等所相关的岸上设施”。参谋长联席会议承认这个行动方针会引起外交困难和风险，但认为，“在共产党控制台湾的情况下”，美国的安全将“无疑地”受到威胁，为免遭这种威胁，承受这些外交风险和代价是值得的<sup>①</sup>。

国务院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并重申了“它的坚定立场”，认为这样一个行动方针“不仅在外交上是不利的，而且更严重的是，我们将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另外，军事力量的炫耀“会引起全中国严重的政治反响，并在我们正谋求利用苏联在满洲和新疆的行动时，引发领土收复的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普遍支持国务院的观点，并决定，“海军舰队目前既不要驻扎在台湾，也不要撤离台湾，以支持”国务院正在采取的阻止台湾落到共产党手中的“政治和经济措施”<sup>②</sup>。

国务院虽然承认，实现美国在台湾的目标，最终将不得不使用武力，但它却强调指出，单方面使用武力的作法是不可取的。一如迪安·G·艾奇逊国务卿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释的那样：“在未来的某些时候，我们会断定，用目前的手段实现我们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而且那时我们还会建议重新审查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要对那个海角进行干涉的话，我们完全有可能与志趣相同的诸大国一道这样做，甚至可以让联合国这样做。我们还有可能用武力实现我们已声明的意图——保证台湾土著人民的合理要求，由他们自己决定是由联合国托管还是独立。”<sup>③</sup>

当美国国务院正把台湾独立运动作为其阻止中共占领台湾的便利工具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运动的实效上时，国民党政府却更快地扼制了这一工具，因为其军队已经在这个岛屿登陆。面对着1948年底中共军队在中国东北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总统已开始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284—286页。

② 同上，第291—292页。

③ 同上，第295—296页。

在台湾贮备军事装备和其他资产。例如，1949年1月8日，司徒雷登大使就向国务院报告说：“委员长正将大量的金银和流动资产运往台湾，这明显是要使台湾成为一座堡垒，以避免和共产党继续作战。陈诚和蒋经国已分别被委任为台湾省的省长和国民党省党部主席，并把空军司令部、海军和工业设备带到那个海岛，其意图已被这一切所证明。”<sup>①</sup>虽然华盛顿最终不再把国民党看作是在大陆的有效抵抗力量，但国民党的前景由于防守台湾而出现好转则是事实，最起码在短期内是这样。鉴于此，英国驻美大使奥列弗·弗兰克斯按照美国国务院当时的观点，于3月22日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将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统治的持续而得到更有效的保卫，哪怕这个海岛只是一个临时军事基地。”弗兰克斯还非正式地指出，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说，台湾的问题将不得不引起联合国的关注，并由联合国就可能的美国托管问题安排一次公民投票。目前，无论如何，“美国对台湾前途的选择还没有明朗化”<sup>②</sup>。

英国外交部的帕特里克·科茨审阅了弗兰克斯的报告（包括美国国务院附送的一份备忘录）。他从中感到，美国的政策缺乏深思熟虑，它“使美国更加可能为应付中国形势的某些方面而设想出愚蠢的尤其是草率的决定。”<sup>③</sup>

## 5 司徒雷登大使的主动

英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没有妨碍它们既定的原地不动政策。1949年4月，英美和其他北大西洋条约国家一道，重申了它们在是年1月份作出的决定——在共产党占领南京后，各国大使馆一律不动。当时（指1949年4月以前——译者注），虽然中华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20—22页。

②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7F4596。

民国政府的各部，包括外交部已于2月份迁往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则仍然留在南京，以寻求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然而，到4月初的时候，谈判的前景看上去已模糊不清了，在长江北岸已完成进攻准备的共产党军队，看来要不了多久就会发动向南京的进攻。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于4月9日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重申了英国的对华立场，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就驻华代表的住在场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一如英国所看到的那样，如果撤离南京，就很可能丧失“与共产党中国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的机会，另外，已经被共产党侵扰的在华商业利益也将被迫放弃，并且，英国领事人员将被置于一一种无法容忍的境地<sup>①</sup>。

美国国务院同意美国和其他大西洋组织成员国一道，将外交使团的首要人物留在南京，并给司徒雷登大使发出一份电报，命令他留在南京。这份电报和司徒雷登发给华盛顿的请示电报在内容上是相类似的<sup>②</sup>。司徒雷登在4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务院消息，答复了我们大使馆的电报，批准了先前我留在南京的建议——我非常高兴。”<sup>③</sup>

英美把其大使留在已被共产党占领的南京，基本上是由于同样的考虑，但司徒雷登大使的特殊资格则为他留在那里提供了一个特殊理由，这是其英国伙伴所不能相比的。巴特沃斯在1月26日的备忘录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政治领域有着广泛的经历；而且，作为前燕京大学的校长——“据说该校有近50%的学生在共产党阵营中”，“在和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他都处于“老师的地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676页。

② 同上，第676、677—678页。

③ 《司徒雷登日记》第33页。

位。”<sup>①</sup> 司徒雷登本人也相信，这种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但是，他的一位亚洲同行、印度驻华大使K·M·潘尼迦却相当怀疑他的这种自信。潘尼迦是这样描述司徒雷登的：“一个非常正直而又非常天真的人，……对人世间的邪恶总感到惊异。”他的“弱点之一”就是喜欢“过于主观地判断中国人的品性，他已在一些方面意识到这一弱点”。潘尼迦接着回忆说：“他过去常告诉我，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他作为许多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sup>②</sup>

英国至少和美国一样渴望使其大使留在南京，但拉尔夫·史蒂文森爵士却没有其美国同行司徒雷登那样的特殊资格。他缺少在华工作的经验，在对密切英中关系方面，长期内也没有什么个人建树，而且，和司徒雷登还不同的是，他很少能发现能够影响共产党领导层的要害。他对中共的态度可由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罗伯特·厄克特建议努力使上海和平移交给中共，他却答复说：“……共产党一直避免和我们进行任何直接的接触，要能对共产党施加影响，就必须与之建立事实上的关系。为此我们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却全无结果。”他还认为：“按照中共目前的态度，即使这种关系能够建立，也不能希望他们在这时候理智地响应外国的任何接近，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接近，以及遵从广泛的公众舆论，这都是不现实的。”<sup>③</sup>

由于司徒雷登相信他在中国的个人关系具有特殊价值，所以他认为，如果他能够和共产党领导人谈谈，他就能对他们施加影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665页。另见巴特沃斯1949年3月18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行政听证会上的发言，收录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行政听证会》丛书（华盛顿：政府印刷所1976年版）第45页。

<sup>②</sup> K·M·潘尼迦：《在两个中国——一个外交官的回忆录》（伦敦：乔治——昂温1955年出版）第48页。

<sup>③</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6752F6681。

响。3月10日，他给迪安·艾奇逊国务卿发去一份长篇急电，建议美国政府授权他“不仅以美国政府官方代表的资格，而且以个人资格”和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作为个人”，他“不仅长期居住在中国，而且还由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而闻名：一方面坚定地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一方面坚决主张首先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密切中美关系”。司徒雷登还希望，无论共产党会怎样把他和“好战的帝国主义”相等同，他以前的活动以及和许多共产党人的关系，都“不会被完全漠视”<sup>①</sup>。司徒雷登也承认，“指望通过我或其他什么人的影响使中共采取更宽容的政策，是天真幼稚的，但考虑到时局的致命危险性”，他又确信，“影响中共的努力是完全值得一试的。”<sup>②</sup>

从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看，他之所以认为自己能对共产党施加影响，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的反美情绪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信念和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憎恨，而且也由于对非共产党国家的过份怀疑和对美国意图的深切误解，他写道，如果这种误解“能被消除，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少，就能求得在中国的继续存在”。司徒雷登建议，要减少共产党的恐惧和误解，就得“在友好的商谈中”使他们的领导人知道，美国过去一直是中国的朋友，并坚定地支持中国的独立，承认中国人民选择自己政体的权力；若能在此基础上消除相互间的疑虑，并为共同利益合作，那么，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将是有益的<sup>③</sup>。

司徒雷登真诚地希望找到与中共建立工作关系的途径，对此我们没有理由加以怀疑；但是，这位老师也随时准备对他先前的学生加以责罚或与之断绝师生关系，如果他们被证明是不顺从或是不如老师之意的话。这样，他就要警告那些他要与之谈话的共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849年第8卷第174页。

② 同上，第176页。

③ 同上，第174—175页。

产党领导人，如果他们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现代民主，而是把苏联模式的专制政体移植给中国，美国就会“感到有义务去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并“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在向国务卿提出这一建议后，他似乎觉得有些不妥，便强调说，他不会将这一警告作为官方信息转达，“更不会作为带有任何最后通牒性质或威胁性质”的信息转达<sup>①</sup>。

在仔细考虑了司徒雷登大使的建议电报后，国务院于4月6日回电司徒雷登，授权他与“高级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当面向他们陈述他建议中的要点，但不要带有威胁和最后通牒的色彩，尤其不要讲美国在某种情况下会“援助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或“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一类的话。在国务院看来，这类的话，即便是由非官方的形式讲出来，也会被理解为一种威胁，而且，“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无力承担对（国民党）中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义务”<sup>②</sup>。

3天前，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就把他在华盛顿和艾奇逊的谈话内容电传给英国外交部，说此时授权司徒雷登与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反映了美国对华态度。还说，艾奇逊告诉他，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国民党已经不行了，普遍的感觉是，支持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策已经破产了。另一方面，要在中国实现新的统治，得花很长时间。莫斯科化了的共产党势力将“逐渐削弱”，“中国人的腐化和普遍的低效能，将使他们逐渐沮丧”。但是，国务院必须注意避免因停止对国民党的支持而遭到谴责。于是，当51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总统以表达他们对不再支持国民党的忧虑时，艾奇逊坦白地解释了形势，使得“他们勉强地承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75—176页。

<sup>②</sup> 同上，第230—231页。

认，美国政府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了”<sup>①</sup>。

## 6 司徒雷登和黄华的晤谈

司徒雷登不久就找到了会谈的机会，即使不是和“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会谈，至少也能和直接接近周恩来的共产党官员会谈。这个机会的出现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4月下旬占领了南京。

4月16日，共产党谈判代表将一份和平协议草案交给国民党政府在北平的代表团，限其在4月20日子夜前接受。国民党没有接受这一草案，认为它“是对被征服者的处置”，但是，他们要求停火，以便为达成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继续谈判<sup>②</sup>。共产党的回答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给其全体武装力量的进攻命令，即“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sup>③</sup>。

司徒雷登大使的日记记载了这道命令在以后几天对南京和美国大使馆的影响。

4月22日，星期五。早晨……叶公超（代理中国外交部长）来访，正式地劝我迁移广州。……

11时——就迁往广州问题会见外交使团——一致表示不迁——都观望美国。

4月23日，星期六。中共昨夜占领下关——警察消失——有秩序地移交。

中共报道有30万兵力渡过长江——到处都是背叛。

使馆人员举行长时间的会议——为我们自己的安全打算……处在包围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747F4804。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参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7卷第1138—1141页。

<sup>②</sup> 参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255、263—264页。

<sup>③</sup> 同上，第259—260页。



之中

到处都是抢掠。

4月24日，星期日。昨晚——一整夜都是火光、射击、爆炸……

中共在今天早晨开进——从容地叫当地人民观看——有秩序——有条理①。

大约在南京被占领后的一个星期内，司徒雷登一直呆在家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②。5月7日，他向国务院报告说：“自5月3日以来，我每天都正常地到使馆办事处一趟，没有任何人妨碍，还去过城里其他几个地方。5月6日早晨，我院子里的警卫被撤走。”③

就在同一天，傅泾波拜会了黄华——前者是司徒雷登信赖的一个知心的中国人，他的私人秘书，后者是新到任的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主任。在以后三个月中，司徒雷登大使和周恩来各自的代理人大约会见了12次。5月6日的会见是第一次，为司徒雷登在一个星期后与黄的首次晤谈奠定了基础。

在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生涯中，傅泾波扮演的角色，大概是美国外交史中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机会接近美国的秘密文件，但在大使馆给国务院的众多秘密报告中，有许多涉及中美关系的情报，就实质内容来说，都是他提供的，因为他和国共两党的官方均有交往。傅生活在司徒雷登的官邸，这一安排，首先至少会令安全官员反感至极。一如司徒雷登所说，甚至马歇尔上将也为之“瞠目吃惊”④。但司徒雷登却不然，还在他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就把傅作为自己的助手，并在其外交生涯中把傅看作是不可或缺的伴侣和知心朋友。他这样评述傅的贡献：“他经常替我拜会那些有必要保持接触的人，而这些拜会又

① 《司徒雷登日记》第16页。

② 同上，第37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3页。

④ 《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92页。

不会完全受到应有的礼遇的约束。当我拜访中国官员的时候，几乎总是把他带在身边，而他从不泄漏秘密，这一切意味着，和正常的可能情况相比，我和中国各阶层的交际更广泛了，知己也更多了，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场合，他都能代表我。”<sup>①</sup>

中共派黄华到南京来，是专门和留在那里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他是周的门徒，是一个注定会有辉煌的外交生涯的年轻人。30年之后，他升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职位。黄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不仅和司徒雷登有师生关系，而且和傅还是同学关系，当然，傅是司徒雷登非常器重的人。如果这种关系能有其价值的话，那么，司徒雷登大使和黄的会晤就会比较容易地进行了。

然而事实上，在和傅泾波及司徒雷登的会见中，黄华不仅坚持毛在新年献词中重申的中国共产党的反美政策，而且坚持毛在3月5日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制定的路线——“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治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sup>②</sup>这条为黄华所遵照执行的路线，不仅反映了中共的疑虑和误解，而且也清楚地表明，中共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直至摧毁国民党政府，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

在5月6日和傅泾波的第一次会见中，黄华“严厉地指责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向傅讲明了中国共产党以美国为敌的原因

---

<sup>①</sup> 《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93页。关于评价傅的其他观点，参见布赖恩·克罗泽著《丢掉中国的人》（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桑斯1976年出版）第334页，约翰·E·梅尔比著《天命——中国内战实录》（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第181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370页。

所在。黄还告诉傅说，中共有两个目标：“（1）消灭封建主义，（2）驱逐美英帝国主义。”当傅建议黄拜访一下“老校长”时，黄表示同意，但他不会把“老校长”看作大使，在谈话几次涉及到司徒雷登时，黄都极力避免使用大使的称呼，因为司徒雷登是委派给“国民党政府”的大使<sup>①</sup>。

一星期以后，当黄华拜访司徒雷登时，后者采取的态度基本上是抚慰式的。他谈到了避免战争和缓解“目前紧张局势”的必要性。他说，他愿意长期留在南京，以证明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福利，从整体上是关心的。他还希望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当黄对美国承认中共问题表示关心，并提出以平等和互利为先决条件时，司徒雷登答复说，只有按照公认的国际惯例，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才会奠定承认的适当基础。他还说，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府，纯粹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共产党尚未建立起任何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在建立起这一政府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除了等待中国的事态发展外，其他什么也不能做。司徒雷登还阐明了外国领事馆与事实上的地方当局保持非正式关系的职能<sup>②</sup>。

在和黄华的第一次会见中，司徒雷登没有特别明显地提出沈阳总领事沃德和其全体领事人员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是美国政府特别关心的。4月15日，美国国务院就曾指示其驻北平的总领事柯乐博，要他通知共产党当局，除非他们“立即制止沈阳形势的恶化，给在那里的美国领事官员提供普遍认可的必需的便利条件，以使他们能够恰当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否则，美国政府将毫无选择地将他们撤离”。柯乐博还受命指出，“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只有美国领事官员能够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我们的政府才能为中国对美商业贸易提供基本的服务和安全保障。”<sup>③</sup>但是，柯乐博的陈请既没有得到答复，也没有见到共产党当局采取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41—742页。

② 同上，第745—747页。

③ 同上，第92页。

相应的行动。到5月中旬，沃德和其全体领事人员在沈阳已被监禁快六个月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要他使黄注意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所处的“境遇是无法忍受的”，美国政府正在努力设法使这种境遇得以改善。司徒雷登还将向黄说明，之所以向黄提出沈阳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无法弄清楚美国先前发出的信息是否传到了共产党的高层，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大使，对总领事沃德及其工作人员有责任；希望黄能使北平有关当局对此事引起注意<sup>①</sup>。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判定，自柯乐博最后一次接触共产党当局以来，有足够的时间供共产党做出答复，但这些时间却付之东流了，故指示柯乐博通知共产党，因为“他们专断地实行非理智的限制”，美国政府将撤出驻沈阳总领事馆全体人员，关闭该领事馆。柯乐博还受命要求共产党向沃德及其全体工作人员提供交通等便利条件，使他们能够携带其私人财物和适当的办公用品及设备撤离沈阳。一如既往，柯乐博的信一去无回音<sup>②</sup>。

6月6日，司徒雷登大使应黄华的邀请，以茶话会形式和黄进行了第二次会见。会见充满了师生及同学情谊。大使一方有傅泾波陪同，黄一方有另一位燕京同学冷轲一（译音）为助手。司徒雷登找机会提出了沈阳问题，告诉黄说，他非常关心打开目前的僵局，在驻沈阳的美国领事人员安全撤离以前，他不愿按程序高华回华盛顿述职。黄说此问题不在他职权范围之内，但当司徒雷登向他指出，“我们通过柯乐博，用尽了我們所能想到的一切接近方法而未能得到北平任何答复”时，黄又说，他将重新考虑他能做些什么<sup>③</sup>。

自黄上次与司徒雷登会见以来，黄在北平的上司起码有三个

---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6卷第956页。

② 同上，第967页。

③ 同上，第962页。

星期年的时间考虑那次会见的谈话内容，但在这一次的会见中，黄在很大程度上仍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黄只是再次强调了美国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必要性，并再次提出承认问题。在答复中，司徒雷登指出：“共产党政权目前最要紧的是击败国民党军队，稳固地占领正在扩大的国土。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还拥有很大面积的国土，而至今，共产党自己还没有宣布成立国家性质的政府机构。要外国与共产党打交道，只有成立了国家性质的政府机构才有可能”<sup>①</sup>；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各国外交使团（苏联除外）仍留在那里”。司徒雷登还告诉黄，如果国民党政府要迁往台湾的话，我们将“尽一切可能”阻止其迁移。

在这次会见中，黄华没有对司徒雷登在上次会见中所表示的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愿望做出答复，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当时，当司徒雷登问黄能为进一步密切美中关系做些什么时，实际上就给了黄一个答复的机会，但按照司徒雷登的报告，黄的即席回答“几乎是唐突的”——中国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共产党所要求的，只是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sup>②</sup>。

## 7 周恩来的新方针

在司徒雷登和黄华第二次会见的前几天，美国驻北平官员得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个暗示，其内涵和黄华所转达的那个消极暗示相当不同——或者说至少看起来是这样。5月31日，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基翁，向具有长期在华经验的美国助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转达了一个据称是周恩来给英美两国政府的值得注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52页。

<sup>②</sup> 同上，第753页。

意的口信。为传达给国务院，包瑞德随即把周的口信转达给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

周突然发出的口信表明，在中共领导层中，以刘少奇为首的极端亲苏的激进派和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后者主张尽早和西方大国建立关系，因为只有它们能帮助中国摆脱紧迫的经济困难。虽然毛泽东作为无可争议的领袖凌驾于两派分歧之上，但党的政策的最终方向是由获胜的一方决定的。周派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中共不会总是追随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而且还会施加一种起缓和作用的影响，以减少战争的危险。然而，周一直无法控制党的宣传机器，他对大量而尖锐的反美英宣传感到遗憾。

周的口信详细地讲述了中国严重的经济困境，同时表示信赖美国的经济实力，需要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根据柯乐博对这一口信的电报译文，周表示“中国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并且，如果毛的政策得以正确贯彻，在长时间内，中国仍然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周还友好地回忆了美国和中共在战时的接触，并希望“美国当局记住这些，相信在党内有真正的开明人士，他们关心的是与中国人民的福利和‘我们时代的和平’有关的一切事务，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理论”<sup>①</sup>。

1944年，包瑞德曾率美军观察组进驻中共总部所在地延安<sup>②</sup>，故对周很熟悉。他和柯乐博似乎都不怀疑周的口信的权威性。对于柯乐博来说，问题在于是从表面上理解这一口信的价值，还是把它看作经过党组织充分考虑的、甚至可能得到苏联赞同的对经济援助的请求，柯乐博选择了后一种判断。他把周的新方针看作是“共产党偏激政策”的松动，而这一松动是基于中国“严重的经济衰落”和随之而来的对美国经济援助的需要。他感到，苏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357—360页。

<sup>②</sup> 关于包瑞德对周的看法，参见他著的《迪克西使团：美军驻延安观察组1944年中国调查报告第8篇》（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64—65页。

联和中共大概都很清楚，苏联无法满足中国在经济上的需求。他认为，苏联和中共都将不得不需要和美国进行贸易，以避免“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同时，中共将和苏联保持紧密的政治关系，以便“在用美国的经济蛋糕弥补食物不足的同时，继续得到苏联的政治面包”<sup>①</sup>。

尽管周强调过对他的口信不必给予答复，柯乐博还是建议给予答复，以使中共明确地知道美国是愿意和中国保持关系的，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理解、尊重、合作、互惠和平等的基础之上”<sup>②</sup>。显然，在柯乐博看来，这种关系将不允许中国在损害美国经济利益的情况下，跟着苏联的政治利益跑。

司徒雷登大使在6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收到了一份“由柯乐博和国务院根据包瑞德转达的口信发来的绝密电报，告知周想要和英美当局进行联系——这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努力线索”<sup>③</sup>。6月7日，司徒雷登回电国务院，认为周的口信是“呼吁援助”，同时意味着，“美国应就其可能的政策，给予一个极其重要的说明”。很显然，一个怀疑这一口信诚意的人，是不会说出这番话的。他建议答复周，如果“中美之间能重新建立起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美国“现在就准备一如既往地援助”中国人民“为获得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经济改善和技术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他还建议，在答复的最后，应对周的亲西方主张表示真诚的欢迎，但必须指出，“在这一主张转化为能使美国人民确信美国继续援助中国将是互利的实际行动之前，他们不能指望得到美国的援助”<sup>④</sup>。

柯乐博和司徒雷登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的采纳。根据后来由杜鲁门总统批准的一份密文透露的情况，国务院曾在6月14日指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363—364页。

② 同上，第364页。

③ 《司徒雷登日记》第40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372—373页。

示柯乐博“准备一份没有署名或不标出处的普通文件作为答复”，但只能是在“没有泄密危险的情况下”，直接地“或通过完全可靠的中间人”转递这一文件<sup>①</sup>。

实际上，这个答复表明，美国希望“在相互尊重和理解以及平等、互利等原则基础上，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和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上述咨文也表明，美国对于某些违背以上原则和已被公认的国际惯例的事件是非常关注的。从咨文引用的3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它们是：对美国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行动，不断进行大肆的歪曲性宣传；非理性地限制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行动和通讯，并拒不答复美国就此提出的多次抗议；拒不采取释放史密斯和本德（两位美国军人，他们于1948年10月驾机误入共产党控制地区的领空而被捕获）的行动，并拒不答复美国就此提出的抗议<sup>②</sup>。

美国努力答复周的新方针，但答复信始终未能传递出去。国务院指示柯乐博不要把答复信交给迈克尔·基翁，但要把他作为一个中间人，通过他做出安排，使包瑞德上校或柯乐博能亲自把答复信交给周或周的秘书。然而，共产党不准备做出这样的安排，并且告诉基翁少管这类闲事。6月24日，柯乐博电告国务院说：“中间人向我们流露出懊恼情绪，但表示愿意用其他可能的方法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通过新的渠道进行接触。我说，在我看来，共产党方面的坚定答复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美国方面对周的口信的任何形式的答复，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请他就此进行更多的努力了。包瑞德也同意我的看法”<sup>③</sup>。早些时候，根据毛在5月15日召开的人民政治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388页。

② 同上，第384页。

③ 同上，第397—398页。



协商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包瑞德就建议全面终止这项工作<sup>①</sup>。一如包瑞德所说，毛的讲话使美中之间恢复友好关系的可能化为泡影<sup>②</sup>。

毛在讲话中清楚地预言，帝国主义者是要继续与革命为敌的。他认为：“有必要唤起人民的注意，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将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对中国人民”；他们将钻进中国的内部，进行“分化和捣乱”工作；他们不仅要“煽动”中国的反动派，甚至会“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而且他们派出部分军队“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他警告不要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sup>③</sup>。

尽管美国试图答复的实际上是周发出的一个毫无结果的口信，但柯乐博还是认为，这一努力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检验周派是否愿意就此继续努力，（2）探索一个新的接触领域。”至于共产党为什么不愿意接受美国的答复，在柯乐博看来，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周的新方针“是用来服务于政治目的的，这就是使美国更加同情共产党领导人，并或许由此影响美国在贸易和直接援助上的态度，这并不是共产党观点的真诚表露”<sup>④</sup>。

虽然基翁告诉包瑞德，周想要（基翁）把他的话也转告英国人，但美国国务院却认为，让英国外交部也得知周的口信是不妥

<sup>①</sup> 英国外交部的佐古斯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议称为“傀儡的聚会，其背后有一个坚强的操纵核心”，那就是毛、周、李立三、朱德等；科茨则认为，其“常委会主要由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组成，也有一些误入歧途的左翼知识分子，但他们不是诚心的”，其中包括他的朋友张士久（译音）。《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0/F9195。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394—395页。

<sup>③</sup> 引自新华社发表周毛讲话的英译本，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由柯乐博报告给国务院（6月26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392—393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40—47页（翻译时稍有出入）。

<sup>④</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398—399页。包瑞德认为，“根据周的性格”，这种解释“是靠不住的”，很难相信基翁会弄鬼，详见埃德温·W·马丁：《周的新方针，英美失去了改变战后亚洲历史的机会吗？》，载《外事处日志》1981年11月16日。

的<sup>①</sup>。英国外交部是8月10日才得知周的口信的，那天，香港总督亚历山大·格兰瑟姆发回一份“绝密”电报，报告说：“三天前，前英国社团驻北平代表菲茨杰拉德抵达这里。他带来了周恩来给香港军管政府的一个重要口信。口信是通过迈克尔·基翁转给他的。……周不愿通过领事馆的渠道将口信转达给香港军管政府，而且在通过基翁转达口信时一再强调，千万小心不要暴露他的姓名<sup>②</sup>。”

拿菲茨杰拉德带给香港的口信和两个多月前基翁在北平转给包瑞德的口信相比，尽管内容基本相同，但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区别。这些区别看来是有意做出来的，目的在于弄清英美的现点有何不同。例如，在给美国的口信中，周详细地讲述了中国严重的经济困境，并讲述了对美国经济实力的信任，表示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而非茨杰拉德带来的口信，对有关美援的事只字未提。9月中旬，基翁到香港时，向英国人转达了一份更详细的口信，其中甚至认为，中国不能期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因为美国一向是援助国民党的。在给美国的口信中，为请求援助则说：“中国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如果毛的政策得以正确贯彻，在长时间内，中国仍然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而由菲茨杰拉德带给英国人的口信，却称中国共产党人“是百分之百的令人信服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sup>③</sup>。

英国外交部对周的口信做出的第一个反应，记录在盖伊·伯吉斯的一份备忘录中。伯吉斯指出，“周的口信实际上是一个明显的欺诈，他将这一绝密的消息如此广泛地扩散，并选择新闻记者这个渠道，就说明了这一点。”接着他指出，关于“我和我的朋友都是温和的人，让我们通力合作把极端分子赶出去”的说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385页。

② 《英属外交文件集》351/73788F1201/G。

③ 同上。

法，是“一个骗局……这是日本人和纳粹经常使用的手段，甚至当他们事实上已制定了敌对政策而为获得敌方让步时，也经常这样做”。然而，伯吉斯断定，周的目的可能是想和西方进行经济合作，在这个限度内，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基翁的话，英国的政策看起来都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sup>①</sup>。

帕特里克·科茨和缺乏在华工作经验的伯吉斯不同，他是一个中国通。从1937年至1946年，他先后在中国从事四种职业，最后一个职业是任英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代助理秘书。在这期间，他还曾在军队服役两年左右，其中部分时间是服务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科茨同意考虑“这个口信可能是一个欺诈”的看法，但他又感到，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和他的一个最主要的支持者（林彪）“对所有外国人都怀有强烈仇恨”的表述，带有某些“使人消除疑虑”的意味，这就使周的口信带上了“某种真实性”<sup>②</sup>。然而，如果科茨看过周给美国的口信的话，他就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因为在那个口信中，丝毫没有他所引证的使人消除疑虑的内容。

8月16日，助理次官埃斯勒·德宁（日本问题专家）向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递交了一份关于周的口信的备忘录，指出，现在很清楚，“美国人得到这个口信的要点已有一些时候了”，但是却“未透露给我们，也未和我们讨论”。德宁声称，应该看到，这个口信不仅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且在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他认为，周关于党内“有一个温和派，如果这一派不能得到西方的让步，一个更极端的派别就会掌权”的说法，实际上是周使用的“由来已久的手段”，英国不应该过份地受这种说法的影响，因为周毕竟承认“他的党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并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他接着警告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sup>·</sup>1/75786F12(7)。

② 同上。

说：“毫无疑问，美国人会说，这个口信是一个欺诈，我们不应理睬它。……而如果事情真象周恩来说的那样，当对手获胜并将我们彻底撵出去时，美国人又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这一点’。”<sup>①</sup>

德宁之所以如此严重地误解美国对周的新方针的反应，原因在于美国国务院一开始就没有把周的口信坦率地告诉英国人。实际上，和英国人相比，美国人更愿意对周的口信做出积极的反应。美国人不但没有把周的口信看成是骗局，反而还郑重其事地努力予以答复。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把周的口信看作是骗局而不予考虑的，正是英王陛下的首席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他在8月17日的一份简短的记录中就表达了这一点。“这位外交大臣说，周恩来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使他想起了苏联卫星国各种比较激进的政治家在以前不同时期所采取的态度。他指出，对于来自所谓温和派的亲近表示，不管我们是否做出反应，激进主义者总是要取得胜利的。总的说来，这位外交大臣倾向于认为，这种举动是和苏联的标准手法相一致的。”<sup>②</sup>似乎很明显，贝文自己同东欧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决定了他对周的新方针所做的反应。在分析了他的外交部专家德宁和科茨的看法后，他更加相信自己的经验。和伯吉斯一样，对周的口信，贝文基本上也持怀疑态度，但有趣的是，贝文是根据他同苏联的卫星国打交道时的经验行事，而伯吉斯却是从日本人和纳粹那里找到先例的。

继外交大臣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之后，英国驻南京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爵士又评论道，周的口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虎头蛇尾的，但却是值得记录在案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口信表达了中国人的观点，另一方面是它为史蒂文森的美国同行莱顿·司徒雷登的热切反应提供了一个对照。两位大使的不同反应，或许是出于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6F12673。

<sup>②</sup> 同上。

他们的不同背景。史蒂文森是一个没有中国背景的有经验的外交家，司徒雷登则是一个有深远的中国背景的没有经验的外交家。

由于注意到口信传递的方法是兜圈子式的，以及它自开始传给基翁以来在时间上的间隔妨碍了它的准确性，史蒂文森发现，要分清什么是原始口信，什么是传信人翻译的口信，是很困难的。他感到，“无论是基翁，还是菲茨杰拉德，都不能认为是可靠的（外交部质疑说：至少有某种观点是属于菲茨杰拉德这位值得尊敬的学者的）。”史蒂文森认为，“周所宣称的动机，就真实性来说，至少是易被怀疑的”。他发现，“周决不会期待他的口信得到任何答复，甚至也不会期待任何关于口信最终怎样能被收到的暗示”，对于这样一个传达信息的目的，是很难做出判断的<sup>①</sup>。

尽管拉尔夫爵士感到，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口信进一步证实了他的看法——例如，当时在华的许多外国人都都普遍认为的在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两个对立派别的观点——但他对其他一些要害问题仍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周通过共产党在上海的中间人一再向我们透露的要求——让我们不要过于认真地对待中共核心集团大肆鼓吹的亲苏反英政策——是非常不可信的”。不唯如此，对共产党想要进行贸易的陈情，史蒂文森也持有疑义，用他的话说就是，“只要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和排外倾向占支配地位，……他们就不会急于采取解救正在遭受破坏的外国企业的具体步骤”<sup>②</sup>。他的判断对于外国商人来说，都不幸地被证明是非常准确的。

另外，有一些人，由于对口信发送人非常熟悉，故非常怀疑周的口信的权威性<sup>③</sup>。傅泾波不认识基翁，但他很早就认识周，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8F129:2。

② 同上。

③ 几个当时很熟悉的人就这样对我说过。

他对周用这样的方法传送这样的口信，持非常怀疑的态度<sup>①</sup>。然而，当时在中国的三个最博识的人——包瑞德、柯乐博和司徒雷登——都把口信看作是来自于周的，并且都郑重其事地对待。而且当英国官员后来收到周的口信时，也没有怀疑它的权威性。对于这些事实不予考虑是很困难的。而且，周的口信似乎合理地解释了黄华所执行路线的转变，否则的话，这一转变就难于解释了。6月8日，傅泾波应黄华的邀请前往黄处拜访。黄说，对于傅在先前一次会见中提出的中共首先是要共产化还是要工业化的问题，他不能答复。但他又说，中共急于恢复经济，美国的援助将是决定性的。司徒雷登随即报告华盛顿说，这是黄第一次提出美国经援问题，“虽然未直接地提出。”实际上，仅仅两天前在同司徒雷登本人的一次谈话中，黄还说：“中共对美国的全部要求是，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并且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sup>②</sup>

从6月6日到6月8日，仅过两天黄华就突然提出美国援助问题，只能说明中共总部发出了新指示，这和周在5月31日给柯乐博和包瑞德的口信是一致的。不必注意黄是否知道周的口信，但必须注意到，黄所陈述的美国援助的重要性，实际上是最敏感的内容，这不能不使人相信，从要义上看，周的口信是具有权威性的。

很清楚，无论这一新方针的权威性如何美国都努力予以答复的事实表明，美国希望并期待在共产党胜利后，继续和中国保持事实上的关系。同时证明，美国想要通过共产党和美国官方之间的商讨，克服保持这种关系的障碍<sup>③</sup>。一如柯乐博当时所说，美国

---

① 1948年4月3日傅泾波访问过周恩来。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377—378、753页。

③ 关于美国人对周的新方针所持的不同看法，请参见如下书目：沃伦·I·科恩著《艾奇逊和他的顾问们与中国，1940—1950》，收录在多萝西·博格、沃尔多·海因里希斯主编的《未定之秋——1949—1950年中美关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迈克尔·沙勒著《20世纪的中国与美国》（纽约：奥克斯福德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121页。

的答复“清楚而坚定地”表明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然而不幸的是，柯乐博转送这一答复的努力失败了。但另一方面，在和黄华的晤谈中，司徒雷登大使也发出了几乎完全相似的信号，而且毫无疑问，黄完全能够把这一信号报告给周恩来<sup>①</sup>。

## 8 郁闷的上海

1949年5月26日，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港口上海被共产党占领，共产党和英美官方之间的磨擦也随之成倍增加。在共产党看来——或许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由于西方人的存在，上海集中了中国一切丑恶的东西。老练的记者和中国问题观察家理查德·休斯在一篇有关上海起源的生动描写中，不无启发地说明了这一点：

上海原是一片泥淖，座落在泥泞的黄浦江岸。英国侵略者在1843年首次踏上这片土地。他们的入境签证是由贾丁·马西森和帕默斯顿颁发的，而使签证生效的则是火炮……

西方人无所顾忌地建造了国际租界和法国城。他们吞并了20多个邻近的中国村庄。他们强制实行他们自己的法律和法规……

由于上海所征的税种是五花八门的，各种财富均在征税之列，加上贸易税和以长江为生命线的各种航运税，故使上海不仅生存下来，而且逐渐繁荣起来。其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原文如此——译者注），其贸易也占中国总贸易量的一半……西方人在12平方英里的国际租界和法国租界里，象老板那样控制着开始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中国<sup>②</sup>。

在上海，胜利的共产党面临着新的挑战。他们长期在乡村革命，现在要统治大城市，得掌握一些有自身规律的复杂的技术问题，准备是很不充分的，特别是上海，它所容纳的外国人在中国

<sup>①</sup> 《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48页。

<sup>②</sup> 理查德·休斯：《香港：租借地——灾难斯》（伦敦：安德烈多伊奇1968年版）第113—115页。

是最多的。至少当时许多在华的西方官员和商人都持这种判断。他们觉得，共产党在这里所面临的困境，将使他们采取比其在北方城市时更温和的政策。上海陷落前夕，英国大使史蒂文森电报英国外交部说：“自天津落入共产党手中之后，一系列事件表明，我们的判断——共产党在应付大工业区的经济问题时缺乏管理经验和行政能力——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将使他们面临更无穷尽的复杂问题，他们对外国援助的需要，近期内将日益明显和紧迫。”然而，司徒雷登警告说，尽管他们需要援助，也不会屈服于西方的经济压力。“毫无疑问，”他说，“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共产党似乎会不犹豫地把极端的痛苦强加于他们的国民，而不会屈服于经济压力。”所以，他反对美国人所倾向的用经济制裁达到政治目的的企图<sup>①</sup>。

史蒂文森还认为，和美国一道筹划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英美在华的商业利益不同，控制其在华商业企业的手段也不同。与英国相比，在诸如银行、沿海航运、纺织等行业及其他实业领域中，美国不大干预其在华企业的经营贸易活动。而且，英国企业占外国在华企业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共同的经济政策都难于控制这些企业。不仅如此，若实行经济制裁，势必遭到共产党的报复，并势必使这些企业遭受沉重的损失<sup>②</sup>。英国在华经济利益不仅在物质上多于美国，在种类上也多于美国。英美对共产党接收上海的反应之所以不同，这些经济利益上的差异是基本的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在上海，英美侨民所希望的是，由于管理这个城市的复杂性，共产党会被迫为寻求援助而向他们靠拢，或由此变得灰心丧气。但是，这里的外国商人和他们在其他由共产党控制的城市中的同胞一样，不仅面对着许多繁杂、拖拉的办事程序和与共产

---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1F7235。

<sup>②</sup> 同上。



党官方联络的困难，而且还面临着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美国总领事卡伯特称之为“工潮的困扰”<sup>①</sup>。当时，劳资纠纷是共产党接收的城市中的普遍现象。在劳资纠纷中，工人们将他们的工厂围困起来，在经理们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之前，不允许他们出门。

英美企业均遭到上述麻烦，但相比之下，美国商人很少愿意忍受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这些麻烦，也不愿忍受经营中兴败盛衰的突变，美国企业界很少有人愿意留下。而英国企业界在中国国内贸易中，以大于美国人的总投资，已牢牢地扎下根来，他们坚决拥护原地不动的政策。正象卡伯特在上海陷落1个月后的6月26日拍给华盛顿的一份长电的结尾处所说：“最近几个星期所发生的牵涉到外侨的事件，减弱了外侨一开始时对共产党统治前景的乐观估计……在美国商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准备收拾行李，撤离上海，而不愿忍受目前的羞辱和危险。”<sup>②</sup>两天前，卡伯特在他的日记中还写道：“参加商会会议——沉闷悲观的气氛。古尔德和科尔特曼描述了目前的危境——实际上每个人都提出要离开。”<sup>③</sup>

和英国总领事不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和英美私人公司一样，也遭到了工潮的困扰。1949年初，美国海军撤离上海，解雇了他们所雇佣的中国工人。这些失业工人由于对微薄的解雇费不满，开始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交涉。总领事馆就失业工人的要求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遭到工人们的拒绝。于是，失业工人准备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卡伯特确信这一行动会发生，并于6月28日报告了有关传闻，说有可能“象最近其他外国企业发生的劳工事件那样”，发生被海军解雇的工人的“大规模清忍”事

---

① 约翰·M·卡伯特：《第一道防线——一个外交官40年的经历》（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1970年版）第67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184—1185页。

③ 卡伯特：《第一道防线》第67页。

件，“他们将携带家属一窝蜂地占领总领事馆”<sup>①</sup>。翌日，卡伯特的日记揭示了这一骚扰给他带来的心理后果：“我们准备用水龙管和催泪瓦斯对付暴民对领事馆建筑的进犯，但我发现有些高级官员反对这样做——或许这种反对是正确的。……我感到彻底的沮丧、灰心、厌倦和精疲力竭，只想尽快离开。”<sup>②</sup>

除遭受工潮的困扰外，美国领事馆人员还遭到了他们的英国同事同样没有遭受过的其他一些骚扰，最典型的事例是美国副领事威廉·奥利夫因一个不太重要的交通指控而遭扣押和殴打<sup>③</sup>。美国领事人员无力按传统的或者是合理的方式应付这种情况，故更加感到灰心丧气。美国总领事馆的官员到拘留奥利夫的警察局质询时，受到了羞辱、威胁和嘲弄。据总领馆对这一事件的报告，警察局政委显然是“要在一大群警察、军事人员及旁观者面前竭力羞辱总领事馆官员。人越多，他越声高，越放肆。总领事馆官员象犯人一样被称呼，并一直不许坐下”<sup>④</sup>。

三天后，奥利夫被放了出来，他是被单独监禁的，食物是面包和水。当时总领事馆建议国务院“公布监禁和殴打副领事威廉·奥利夫的前后过程，指出这是羞辱外国人的计划的一部分。”<sup>⑤</sup>无论是否存在这个计划，当地的新闻媒介机构毕竟迅速地利用了奥利夫案件，以便再一次表明，共产党是把上海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解放者。例如上海《解放日报》就曾这样评论：

在违犯交通规则后，奥利夫仍以帝国主义者的惯用方式傲慢地、粗暴地对待我公安人员。他还想以先前对待国民党反动派的“主人”态度对待我公安人员。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189—1190页。

② 卡伯特，《第一道防线》第67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189—1200页。

④ 同上，第1202—1205页。

⑤ 同上，第1201页；奥利夫遭殴打一事，有一个非美国的见证人予以证明，参见第1221页。

但是，奥尔夫完全错了。解放后的上海，人民已成为主人，人民政府绝不会容忍和允许外国人侮辱和欺凌我们的人民！

在人民政府统治下，帝国主义者的一切违法挑衅行动，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滚出中国去①！

卡伯特向国务院评论说：“这件讨厌的事使我更加确信，在中国，现在已没有美国人的安全可言。”②

## 9 毛泽东发出邀请

6月28日，司徒雷登大使从黄华处收到了他称之为“基本上”是来自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要他“在公开访问燕京时和他们谈谈”。在向国务院汇报这一邀请的背景时，司徒雷登指出，在6月初，傅泾波就背着司徒雷登“非正式地”问黄华，当司徒雷登过生日（6月24日）时，他是否有可能象往年那样，到北平去访问他过去呆过的大学。黄当时未说什么，但到了6月18日，他问傅“时间是否允许”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傅只是回答说：“早在两个星期前他就提出了这个建议。”③

傅和黄之间的这些交谈，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授权，甚至当司徒雷登收到毛和周的邀请时，国务院也没有接到有关情况的汇报。北平则从这些交谈中感到，司徒雷登将要来北平。司徒雷登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6月26日，星期四。

周雨康（译音）从北平返回。……得知黄华是因为我而被派到这里来的——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请求——毛表示我可以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受到欢迎——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等等。

① 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1949年7月13日，第2版；《美国外交文件文集》1949年第8卷第1213—1214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222页。

③ 同上，第766页。

黄华显然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请求。

6月28日，星期二。

傅拜访了黄华，被告知收到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的一封措词强烈的信，同意我去北平访问。他说毛、周衷心地欢迎我去，但明显重申这一信息的是他下午来时带来的另一封电报——黄华来了，带着那封电报，呆了大约一个小时①。

在报告黄的口信时，司徒雷登没有向华盛顿提什么建议，只是列举了北平之行的利与弊，并要求给予指示。在他看来，此行的基本好处是：他可以有一个机会直接向毛和周表明美国的观点，并把有助于“判断中共倾向的最权威的信息”带给华盛顿；另外，还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开明的反苏派势力，并“表明美国富于想象和冒险的坦率态度，这一态度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政治倾向，或许还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产生有利的影响”②。

当时，有些人已察觉到司徒雷登要使他的北平访问成行——至少上海总领事卡伯特就察觉到这一点。他在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肯定他要去。我表示要帮助他，并告诉（国务院），如果司徒雷登成行，不仅有助于上海总形势的改善，而且有助于保护西方在上海的利益。”③然而，国务院更多地考虑了司徒雷登引证的不利后果，并以此为主要理由，指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访问北平④。司徒雷登所说的不利后果是，北京之行将使由美国发起的南京外交使团的“联合战线”破裂，各使馆的头面人物将效仿司徒雷登纷纷前往北平。而且，“一个美国大使在这个时候前往北平，会在国内外大大地提高中共和毛本人的威望，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次要步骤（首要步骤是我留在南京）还

① 《司徒雷登日记》第42—43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66—767页。

③ 卡伯特，《第一道防线》第68页。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69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69页。

会有助于使共产党政权得到承认”<sup>①</sup>。

事实上，在尚未坚定地表明中共与苏联结盟和以美国为敌的态度的情况下，毛绝不会期待司徒雷登对他的邀请做出反应。他在于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sup>②</sup>。

毛的一边倒，决不是什么新的姿态，也不是由于近几个月来事态发展的缘故。正象司徒雷登在拍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分析的那样，毛“只是形象地概括了他先前的著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阐述的政治理论和在许多重要的中共声明中表述的与苏联的团结一致”<sup>③</sup>。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就把联俄看作是“新的三民主义或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之一。“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毛预言说，“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sup>④</sup>

到1948年秋，当“帝国主义”和苏联的斗争明显地进一步尖锐起来时，毛便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66—76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415—417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405—407页。

④ 《毛泽东》（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7页。一如邹说指出，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原本本中，英美被指名道姓地说成是帝国主义国家，见邹说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3—1953》4卷本（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120页，注释第210条。

侵略》的文章中，重新提出联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1948年11月1日出版的一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杂志上，其中写道：“三十年的历史，在许多国家中，难道还没有证明所有那些既要为帝国主义满意，又要为苏联赞同的人们的十足的虚伪和彻底的破产吗？难道还没有证明所有那些企图摇摆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阵线和反帝的人民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力量’的十足虚伪和彻底破产吗？”<sup>①</sup>这篇文章——或其大义，在几个月之后，又发表在中共控制地区的一些报纸上<sup>②</sup>。

在美国对毛的“几乎是一个邀请”的答复举棋未定时，毛坚定地重申一边倒政策，致使“探讨和解条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错过了<sup>③</sup>。毛在充分了解到美国愿意与中国继续保持关系的情况下，又不断地强调他对以苏联为首的反帝阵营的忠诚。司徒雷登不仅向黄华转达过美国的立场，而且在6月10日还将这一立场告知一个中间人，即所谓“第三种力量”的人物之一陈铭枢将军。陈在3月下旬分别和毛、周谈了话。司徒雷登告诉陈说：“美国人相信，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是可以相处的。”美国人“首先关心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他们选择的政体，前提是政府必须得到全体国民的支持，并愿意和能够继续遵守国家准则”。美国的态度“是等待和观察。无论如何，我和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首领（苏联除外）继续留在南京的事实是有一定意义的，相信中共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意义。”<sup>④</sup>

6月24日，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说，他间接听说陈已和

---

① 这句话在《毛泽东选集》译本中未出现，见约翰·吉廷斯著《中国军队的作用》（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注释第21条。

② 参见《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4F11127；另见帕多克著《中国日记》第113页，在毛于1949年6月30日重申“一边倒”政策前三天，共产党情报局杂志发表了刘少奇写的与毛的文章主题相同的一篇文章，参见《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0F8903。

③ 见沃伦·I·科恩著《艾奇逊和他的顾问们与中国》，收录在博伦和海因里希斯主编的《未定之秋》第38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56—757页。

毛、周谈了话<sup>①</sup>。显然，在同一天，他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的英国同行拉尔夫·史蒂文森爵士，因为次日史蒂文森大使便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英国外交部：

我的美国同行绝对秘密地告诉我，他已和李济深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陈铭枢进行了接触。陈最近在从上海去北平的路上拜访了司徒雷登，后者简要地向陈讲述了中国在未来与西方民主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好处。

陈对北平的访问显然是事关重大的……他似乎已经和毛泽东及周恩来谈了话<sup>②</sup>。

不管两位大使对陈的北平之行寄托怎样的希望，最终他们都落了空。当陈从北平回来时，将载以谈话内容的书面报告交给司徒雷登。阅后，司徒雷登感到十分沮丧，因为报告中“没有任何偏离他们目前的政治路线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迹向”<sup>③</sup>。

为了严厉打击中国内外那些以为经济困难就会迫使共产党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达成某种妥协的人，毛采取了一条绝不调和的路线：一方面以《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苏联拥抱，一方面否决所有那些认为西方的援助是必须的想法以及请求这种援助的意图。毛断然否认了黄华在6月8日向傅泾波说的中国需要美国援助的话。事实上，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黄当时是有意向傅说出那番话的，旨在象征性地表示他两天前还执行的路线已发生了变化。毛的文章还否决了周的新方针，这和中共为拒绝美国就新方针所给予的答复是一致的。

这样看来，黄重新回到他6月8日前所执行的路线上来就不令人奇怪了。这种转变是在毛的文章发表几个星期后，通过黄与司徒雷登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见表现出来的。正如司徒雷登就会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64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4F9315。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82—783页。

、见内容所报告的那样：黄说，“美国人最好不要插手中国的事情，商人、农民和学生无不这样认为。他还说，没有援助，中国照样能应付她所面临的工业建设等问题。”司徒雷登接着报告说，他自己是“带着一种狼狈的感觉”从这次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见中脱身的，黄的思想是“不能通过辩论甚或事实摸透的”。这位大使曾希望通过讨论来改变共产党的见解，但到此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见解”<sup>①</sup>。

司徒雷登大使以去北平见毛未遂为由，反对再去广州见蒋，7月11日，杜鲁门总统告诉艾奇逊国务卿说，他认为“大使在返回美国之前，对广州进行访问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他还推论，“作为一个大使，在长期和驻在国的政府脱离接触后便回国，是不会被美国公众所理解的”<sup>②</sup>。

开始，当司徒雷登被指示去广州时，他并未表示强烈的反对<sup>③</sup>，然而，当他听说蒋委员长正好也抵达广州时，他辩护说：如果他在此时去广州，势必要拜访蒋，而这是不合时宜的。实际上，司徒雷登是不想由此而影响他在和共产党领导人打交道时的作用，因此他指出：“在我拒绝去北平之后，马上访问广州并会见委员长（如果去了广州，这是不可避免的），肯定会被共产党认为是对他们的一种蓄意的侮辱，并为此而采取强烈的反应措施。……他们绝不会原谅我去广州见他们的头号敌人，因此，我将完全失去在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存在过的。”<sup>④</sup>他进一步辩解说，去广州会增加“美国在上海和武汉所面临的困难”，并可能引起对美国大使馆及其他机构官员的“报复性行动”。最后他说，“当我赞同国务院不让我去北平卑躬屈节地拜见毛主席的决定时，我也同样感到，改变我原先的行动路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801—802页。

② 同上，第781页。

③ 同上，第782—783页。

④ 同上，第791页。



线，让我去拜访蒋主席，是不明智的决定”<sup>①</sup>。

美国拒不授权司徒雷登去北平一事表明，在寻求妥协的方式上，美国是有限度的。对于一个尚未形成全国性政府的政权，美国是不会采取“次要步骤”而予以承认的，同时，在这个政权的领导人还象柯乐博指出的那样“明确表示要以美国为敌”<sup>②</sup>的情况下，美国是不会助长其威望的。另一方面，华盛顿同意司徒雷登不去广州的请求一事表明，它还不愿无端地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对抗，进而堵死可能存在的未来谈判的渠道。

## 10 撤离中的坚持

7月的到来对英美来说是不祥的，因为毛公开重申的一边倒政策，使两国官方，特别是美国官方变得更加沮丧和恼怒。这种情绪的变化最终使美国的政策发生了改变。司徒雷登在其自传中回忆道，“共产党的政策倾向，使我不得不建议国务院，着手将美国人从共产党控制地区特别是上海撤出，反美宣传更加尖刻，对苏联的忠诚更加坦率，对外国人的歧视更加公开，甚至连私人事务也在歧视之列，国家管制政策和贸易控制政策更加一如既往”<sup>③</sup>。

7月15日，中共上海外事处召见在那里的美国新闻处代理负责人，“寻衅似地”命令他立即停止美国新闻处的一切活动——“总领事馆的电影院，音乐厅，图书馆的开放及新闻报道和宣传”<sup>④</sup>。7月19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也接到类似的书面命令，所不同的是，这一命令是公开发布的，原因是“人民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外交和领事关系”<sup>⑤</sup>。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91页。

② 同上，第779—781页。

③ 《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57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232页

⑤ 同上，第1095页。

当然，对于这种解释，美国领事官员都是很熟悉的。他们按照通常的方式答复说，美国新闻处是领事机构的一部分，其存在不“取决于官方的外交承认。”在上海，沃尔特·麦康瑙希副领事也表示抗议说，这个命令不仅违背了“世界公认”的领事机构的工作原则，而且“和苏联在这个城市中还在自由进行的某些类似活动比”，还是对美国新闻处的歧视<sup>①</sup>。

出人意外的是，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在早些时候采取抵制美国新闻处的行动。早在3月份，毛在向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中就指出，共产党不仅“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而且还要“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在关于命令美英关闭其新闻处的报道中，新华社宣称，自从上海“解放”以来，这两个处就从未停止过宣传活动”<sup>②</sup>。

共产党对美国新闻处采取的制裁行动，发生在司徒雷登因不能回国述职而感到灰心丧气之时。按计划，他要在7月18日回国，但却延误了大约两个星期，原因是共产党坚持要他象任何一个普通侨民那样，在取得出境许可前，必须有一个“职业保证人”对其可能遗留的未付债款和未清财产予以担保。国务院鉴于原则、声誉和惯例，对这一要求采取了非常消极的态度，并指示司徒雷登，其一行中的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得接受任何保证人。最后，中共当局实行了妥协，同意免除司徒雷登寻找保证人的手续，并免除其行李检查<sup>③</sup>。

司徒雷登推测，他在撤离问题上的麻烦，与他未去北平见毛有关。7月14日他这样告诉国务院：“当我拒绝去北平时，我感到他们都丢了面子，特别是黄华，他在这里是最先采取主动的。这种感觉，在黄华的第二号助手陈英（译音）最近与傅的谈话中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第8卷第243页。

② 新华社：《每日新闻报（发布）》，期号83，1949年7月20日，第3页。

③ 《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55—256页。

得到进一步证实。对于我和我的随行人员在取得出境许可一事上的麻烦，他是这样对傅说的：‘如果司徒雷登大使去了北平，所有这些小问题都会轻易得到解决’<sup>①</sup>。

和对共产党与美国官员间的其他一些磨擦的态度不同，在这次事件中，英国对美国持同情态度。7月15日，史蒂文森大使就司徒雷登遭遇的麻烦电告英国外交部说，我和我的民主国家的同行一致认为，共产党的态度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大使和其随员的“自由离境权”“从来不成为问题”，“即使在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也不例外。他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让步，哪怕使馆负责人被当作人质扣押在这里”。的确，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司徒雷登大使就写道：我和民主国家的使馆首领们共进了午餐，“在外交方面反对职业或私人保证人的问题上，他们的感觉比我还要强烈”<sup>②</sup>。在评论史蒂文森的报告时，英国外交部的科茨认为，共产党的“目的是要使外国外交人员丢脸”，他“毫不怀疑”共产党有一个“使在华的欧洲人尽可能丢脸的既定方针”<sup>③</sup>。

共产党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这样的既定方针，但到这时为止，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政策的目的在于使美国在华的三个最高级官员修正美国在共产党占领的城市中继续保持领事馆的政策。在他们看来，不仅各国领事馆最好不要再“自由行事”，而且在共产党控制区域内的外国人也最好减少到最低限度。鉴于此，公使衔参赞刘易斯·克拉克在冲绳与返回华盛顿途中的司徒雷登大使和总领事卡伯特会见后，建议美国政府迅即采取撤离行动。8月5日，他在广州报告说，司徒雷登和卡伯特“都有着丰富的生存于共产党政权之下的经验，这是我所不如的，故此，他们对问题的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84—785页。另见《司徒雷登日记》第45—46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3F10513；《司徒雷登日记》第44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3F10513。

感觉要比我强烈。……他们的经验表明，领事馆官员已完全无力履行他们的职责。置他们在不友好的共产党政权之下于不顾，将招致不必要的人身危险。”克拉克继续报告说，“根据在共产党中国的经验，我日益认识到，在无法忍受的条件下，和共产党做生意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决心按照其目的要求，消除美国在华利益和宗教慈善机构；我们无论怎样表示亲近，都不会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从我们最根本的利益考虑，对任何即将出现的共产党政权，我们都不要表示亲近。”<sup>①</sup>在撤离问题上，克拉克的观点基本上与司徒雷登和卡伯特的观点一致，所不同的是他走得更远。他建议安排船只，撤回美国所有官方人员。

司徒雷登和卡伯特本来就怀疑领事馆在中共控制地区的实际效能，当他们在8月2日离开中国时又得知副领事沃尔特·麦康瑞希被阻困在美国在上海领事馆办公室中达四天之久时，他们的怀疑态度就更加坚定了。阻困麦康瑞希的是美国海军先前雇佣的中国雇工，他们因不满失业而携带家眷占领了美国领事馆建筑物的一部分。据事后麦康瑞希对这一事件的报告：“虽然当局最终在幕后予以调停……但没有给我们补偿，也没有承认他们进行了调停，当然也没有表示歉意，最后也没有向我们保证，在以后的劳工危机中，当我们遭受到类似的侮辱时，他们会采取不同于这次的行动，只是表示官方没有干涉”<sup>②</sup>。

当司徒雷登和卡伯特抵达华盛顿时，他们便能当面向国务院陈述他们的观点了。8月12日，他们出席了一个会议。代理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瑟普等国务院官员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在广州陷落于共产党手中之前，关闭美国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308—1309页。刘易斯·克拉克能讲中国话，1925年成为美国国务院外事处官员，之后10年在中国任许多职务。但他1947年在南京接替沃尔顿·巴特沃斯时，离开中国已12个年头了。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276—1279页。在1948年秋任职上海之前，麦康瑞希已在外事处供职18年，其间只在中国任职一次—1941年在北平。然而他以后的任职都是与中美关系有关的，他长期担任过美国驻台北“大使”。

在那里的领事馆<sup>①</sup>。

国务院在这之前已决定关闭在重庆、昆明和乌鲁木齐（原文迪化——译者注）的领事馆。在那些地方，美国没有多少利益<sup>②</sup>。司徒雷登离开南京前曾建议，“在得到承认之前”关闭在青岛和武汉的领事馆，因为它们在事实上已无法保护美国的利益，其人员很可能处于更加艰难和危险的境地，而且也不大可能从中国外部向领事馆提供补给<sup>③</sup>。这样，到8月中旬，根据那些试图在共产党控制的中国继续保持领事机构的美国官员的体验，美国已决定关闭在中国六个城市中的领事馆，以使其人员免遭同样的磨难。在作出这一决定时，美国人当然还清楚地意识到，在乌鲁木齐、重庆和昆明等边远城市中，保持美国在那里的利益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当地的领事馆继续行使其职责的法律依据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决定虽然修正了自1948年秋以来美国所遵循的在共产党领土上继续开放领事馆的政策，但却没有改变在天津、北平和上海的领事馆与南京大使馆一道继续开放的政策，尽管司徒雷登大使已离开了中国。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5月份关于关闭沈阳领事馆的决定，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做出的，并不表明美国改变了有关领事馆的总政策。

美国决定关闭六个领事馆一事，对英国的影响是不小的。美国的行动不仅多少偏离了英美关于在共产党领土上继续保持领事馆的共同政策，而且也给英国驻华领事代表和外交部增加了负担，因为美国请求英国在美国撤出领事官员的地区，对美国的利益予以保护。

非常出人意料的是，在向英国外交部提出这一请求之前，美国国务院已开始在中国战场上就此事接近英国领事官员。8月15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拉尔德·F·蒂勒尔电报英国外交部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316—317页。

② 同上，第1303页。

③ 同上，第1136页。

说：“我的美国同行接到华盛顿指示，要他在我的保护下，并在我愿意承担这种责任的情况下，安置美国的动产和政府所有的建筑。国务院问他是否有必要就此事和英国政府谈判”<sup>①</sup>。蒂勒尔告诉他的美国同行，在承担这种义务之前，他必须得到本国外交部的指示。在他看来，这种义务不可避免地要扩展到对美国侨民的保护。接着他又告诉英国外交部说，“在美国正式撤出广州之后，他不想对任何美国利益承担责任。这种撤离可能正在进行之中，因为他们预先估计到，共产党占领广州后，他们会遇到许多麻烦。”蒂勒尔指出，“如果这样的话，与美国利益过份密切，就会使我们在这里的总领事馆完全卷入美国的麻烦中去，我们要坚持下去也根本不再可能”。他还担心，如果英国同意美国的请求，“我们很可能在某个时候发现，我们已成为美国在华利益的看管人”<sup>②</sup>。

在接到蒂勒尔的报告之前，英国外交部没有听说美国要英国保护其在华利益的请求，甚至也没有听说美国打算关闭它在那里的部分领事馆。科茨同意蒂勒尔对接受美国请求的担忧。他觉得，英国有“极好的借口”谢绝美国人的请求，这就是共产党不承认外国领事馆的官方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广州的领事馆“没有和共产党当局打交道的正式地位，故不能保护美国政府的财产……或美国侨民的利益。”

科茨在远东司的上级，F·S·汤姆林森却以某种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他指出，“正在为其逃避政策而谋求我们支持的美国人，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接近我们，似乎并不是什么反常的现象”。他认为，“美国人不可能既从英国滞留人员的工作中获取好处，又非难英国人的原地不动政策。”由此他看到了美国人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947F12104。蒂勒尔能讲中国话，经验丰富，在天津、重庆和上海也任过职。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949F12104。

回报给英国人的“极有价值”的利益<sup>①</sup>。

南京的史蒂文森大使也同意广州蒂勒尔的担忧，认为承担“对美国驻广州（很可能扩展到中国其他地区）总领事馆及其利益的保护和看管义务”显然是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然而，“从长远看”，他又相信，“承担这一友好的任务，虽然可能增加我们现时的窘迫”，但却符合英国的利益<sup>②</sup>。他还是建议接受美国的请求，只是提出了一些旨在减少英国领事馆在财政和其他方面的负担的条件。

虽然英国很快看出美国要为其在华侨民和财产向它寻求保护，但其可能的具体要求的提出，则几乎是被国务院牵着鼻子走的。8月17日，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向英国外交部递交了有关请求保护的第一份备忘录，其中所要求的，只是对美国政府在广州、乌鲁木齐、重庆和昆明的财产提供保护，并允诺美国将“尽可能地提供资金……以支付看管人的薪水及美国财产的基本保养费”。第二天，英国外交部通知美国大使馆说，英国驻华领事官员将得到指示，承担对美国财产的保护义务，但保护的“程度”则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的领事地位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承认<sup>③</sup>。8月19日，美国大使馆又向英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英国在华领事“对美国侨民承担和对英国侨民相类似的保护义务”。外交部马上答复美国大使馆说，准备同意这个进一步的要求，但再次强调英国所能提供的保护是有限的<sup>④</sup>。

英国虽然愿意为美国在华侨民和财产提供保护，但英国外交部要使美国明白，英国政府不打算仿效美国的政策。8月16日，埃斯勒·德宁致贝文一份备忘录，提醒他说，“现时内阁的政策，应该是使我们留在中国，并站稳脚跟”。他建议英国外交部新闻司就美国关闭其在华领事馆的声明表态说：“不要期待联合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949F12104。

<sup>②</sup> 同上，F12190。

<sup>③④</sup> 同上，F12104。

王国也采取类似的步骤。”他感到，这个表态对消除英国在上海和其他地区侨民的疑虑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们的信心“已经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不能恢复贸易而动摇”<sup>①</sup>。德宁的建议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采纳。

## 11 封 锁

德宁在其备忘录中提及的国民党的封锁，是指国民党政府在6月底开始封锁不再受其控制的港口及其临近海域<sup>②</sup>。英美政府都认为这一行动是不合法的，也都为此提出了抗议，但从基本反应看，抗议中所预示的则主要是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异。6月28日，美国大使馆驻广州办事处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转递了一份照会，大意是：对这一行动美国政府“尽管表示最友好的同情”，但对宣布封锁港口及其邻近海域的“任何行动”，却不能“认为是合法的”，除非国民党政府能有效地实施这一封锁<sup>③</sup>。和美国不同，在英国的抗议中，有意忽略了对国民党政府这一行动的任何同情暗示<sup>④</sup>。而且，英国人既强调“封锁企图”不会有什么作用，又申明，由于国民党政府从未承认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国民党只认为是“剿匪”——译者注），故没有取得交战权利资格<sup>⑤</sup>。

7月4日，英国大使馆驻广州办事处发给英国外交部一份电报，简要地汇报了国民党政府对英国态度的反驳：“英美关于封闭港口的照会已在本星期发出，并迅即得到答复：在必要情况下，一个国家可以关闭其领土上的任何港口”<sup>⑥</sup>。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646F12876。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1103—1104页。

③ 同上，第1104—1105页。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900F9198。

⑤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2F9820，371/75900F9206。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1111—1112页。

⑥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2F9792。



国民党对上海港的封闭令，未见之于任何官方文件。它是由驻长江口的国民党海军实施的，辅之以空军对长江三角湾和上海港的空中轰炸。6月25日，宣布港口封闭后不久，撤出长江三角湾的英国海军巡逻舰报告：国民党有足够的军舰对这条江实行封锁<sup>①</sup>。开始，国民党的P—51S轰炸机轰炸了在三角湾的英国商船安奇塞斯号。对此，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中国（指国民党政府——译者注）驻伦敦大使提出强烈抗议<sup>②</sup>。国民党的封锁措施很快见到了成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电报就说明了这一点。电报说：“自6月25日所谓的封锁开始以来，整个7月份，进入这个港口的船只只有英国的一条拖船和日本的一条小船，前者将受伤的安奇塞斯号拖往神户<sup>③</sup>。”

国民党的有效封锁，不只引起英国在华侨民的信心动摇，而且也向英国政府的“原地不动”政策提出了挑战——这一政策的依据是指望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特别是上海被迫需要同外国贸易和寻求外国的技术援助。英国在上海的商业界，拼命地要打破封锁，重建贸易。但是，在缺少现实力量的情况下，这能变成事实吗？从哪里能得到这种力量呢？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海空力量似乎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们自己几乎没有这种力量。

开始，南京的史蒂文森大使反对任何英国船只强行突破国民党封锁的企图。他不相信，在中国现实状况下，为了贸易的潜在利益值得冒船只遭损坏和生命财产受损失的代价。他敦促英国外交部应该“尽可能严格地”坚持“我们对中国内战所宣布的同情中立”政策。他争辩说，帮助共产党获得供给，不仅是冒险，而且也与英国的基本利益相违背。“在他们得不到（一直都不能得到）供给时，虽然会坚决地反对英国海军存在于他们的领海，但为取得供给，却可能为在其领海的英国商船提供保护。”他坚定地认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0F9121。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1110页。

③ 同上，第1129—1130页。

为：“如果我们小心地退缩，共产党就会迫于形势，开始重视我们在中国的贸易，并相应地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态度<sup>①</sup>。”

史蒂文森对封锁的谨慎，得到了英国远东海运代表德里克·艾伦的非直接支持。6月27日，在给运输部R·C·莫尼少将的一封信中，艾伦说，“能和中共港口打交道的，只有巴特菲尔德和斯怀尔”。他还说，在香港的一些较有见地的商人，不再无异议地认为，“我们必须无条件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地与在很大程度上尚不熟悉和尚很陌生的中国进行贸易”<sup>②</sup>。

巴特菲尔德和斯怀尔对中国人（指国民党人——译者注）的封锁及心理有自己独特的看法。6月22日他们给伦敦的约翰——桑有限公司的信，就集中地反映了他们这种独特的观点：“西方得不到向新来者（指中共——译者注）证明自己的机会，这就是只要他们和西方达成妥协，他们就能从西方得到许多利益。……我们应该证明，只有我们民间商人，才能从根本上使中国人发生兴趣。……我们相信，共产党进占上海这一西方乐园，并使之马上重建，对我们来说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意义。希望我们的决策者们会大胆地考虑这一问题”<sup>③</sup>。几天以后，该公司果然“大胆地”致电约翰·斯怀尔，敦促他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为从英国到上海的海上商运提供海军保护<sup>④</sup>。

和最早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商人一样，巴特菲尔德和斯怀尔也过高地估计了上海这个资本家的乐园对普遍中国人的诱惑力。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几个月之前，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发出这样的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900F9310。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903F10739。

③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3904F11601。

弹面前要打败仗<sup>①</sup>。”这样看来，毛和中共是欢迎封锁的，因为封锁可以阻止西方的“糖衣炮弹”。或许还有一个因素使他们欢迎封锁，这就是为上海的经济困境找一个替罪羊，具体说就是把上海的困境归罪于美国，说是它向国民党提供了船只和飞机才使封锁成为可能，并导致了上海的困境。

尽管这样，中共仍不会甘受封锁的困扰，而是致力于突破封锁。7月20日，共产党向英国总领事罗伯特·厄克特表示亲近，并公开诱使英国帮助打破封锁。帮助实施这一努力的中间人叫韩明（译音），一个“忠诚可靠”的记者，在一些年中曾为英国总领事馆全体人员所熟悉<sup>②</sup>。在和英国人（不包括厄克特，他认为他不宜去）的一次会见中，韩说共产党有一些轰炸机，但未装备雷达；这样，使商船进入上海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吴淞口（黄浦江口）开始用军舰护航；这些船将不得不在吴淞口和上海之间碰运气，当然，共产党将在两岸用高射炮保护；在吴淞口外的长江三角洲，他们将对外国护航舰熟视无睹<sup>③</sup>。

巧合的是，就在韩明在上海向英国人接近的那天，外交大臣贝文也指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请求美国国务院答复英国的建议：“组织基本物资——主要是米和燃料”，援救在上海的外国人。贝文表示“完全同意美国政府的观点，即只要共产党坚持他们现时对我们商业利益的态度，就不宜采取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共产党经济的援救措施”，但他感到，在因燃料缺乏或米骚动而引起的共公事业的崩溃中，外国人所面临的危险是不能不予考虑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374页。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903F10816。美国驻上海的官员对韩明的评价也很好。他们把他看作是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明显属于民盟中亲美的温和派”，同时，他们还认为他“非常了解”共产党“现行的思想路线”，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193—1195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903F10816。罗伯特·厄克特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手，因为其外交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英属地中海东岸国家的领事馆事务上。在任上海总领事期间，他被封为爵士。

的。他问是否有可能采取措施迫使国民党松动一下封锁，为援救船只让出一条通道，或者使援救船只有可能“在护航队的保护下运行”<sup>①</sup>。

但是，美国国务院不想在这个行动中与英国人合作，因为这一行动会减轻共产党在上海的困难。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口头答复英国大使馆，反对英美联合向上海提供援救物资的想法，但不反对英国人自己以“权宜援救措施”的形式实施这种行动<sup>②</sup>。

7月22日，彼得·斯卡利特致贝文一份备忘录，供他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参考，其中就援救问题指出两点：首先，南京的拉尔夫·史蒂文森爵士虽然完全同意提供援救，但反对任何在海军保护下强行突破国民党封锁的企图，因为国共两党都想通过随之而来的事件为其捞取政治资本；其次，美国国务院不准各分拒任何这类任务，而在英国远东司看来，没有美国的合作，联合王国不可能单独承担这类任务。这种观点说服了英国内阁。7月23日，外交部致电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说，大臣们已考虑了援救上海的问题，认为在海军护送下强行突破国民党的封锁是不可能的<sup>③</sup>。

一个星期以后，韩明“在周恩来的许可下”，在上海告诉英国航运界代表说，共产党欢迎英国海军护送商船突破封锁。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将同意突破到吴淞口；在这个限度内，不会遇到任何共产党炮火的阻拦。在报告这一令人高兴的进展时，总领事厄克特认为，英国人的“谨慎和顽强”“已开始奏效”。他还说，“美国人陷入目前的困境，确实不是由于我们的过错，而是由于他们的反复无常”<sup>④</sup>。

在厄克特看来，美国的政策已发生了突然的、令人讨厌的变化。在7月28日致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绝密”电报中，他报告了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6卷第1122页。

② 同上，第1122—1123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303F10861。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304F11235。

## 这一“上海观点”：

……

4. 战领上海后的一个月左右，这里的美国人和我们所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我们都设想共产党已经稳定下来，我们试图用恰当的讲话和姿态消除他们的敌意，以开始商业交往，达成承认之前的妥协。……

5. ……我们没有象美国大使那样，在这里发放棉花之类的储备物资，也没有象美国大使和美国总领事那样与当地官员进行接触——一种不成功的接触。

6. ……我的美国同行……曾对我说，使这样一个规模的城市陷入非依赖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的一个救济性组织——译者注）而不可的混乱状态，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他特别强调要保持公共事业的运转，并提醒我说，在占领之前，美国人就认为，即使形势有利于新政权，也要保证一个月的基本物资储备。

7. 现在，这里的英国人已警觉到，美国人的态度发生了突然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据认为，美国已开始支持国民党的封锁，而这种封锁首先对外国人是一个灾难，其次对那些主张和西方贸易的温和的共产党人也是一个灾难。……但是，这种情况不会严重妨碍目前已准备就绪的政治和军事计划的进展<sup>①</sup>。

象前边已经指出的那样，当美国官员在觉察到中共继续在语言和行动上敌视美国人时，便于7月间修改了其原地不动的政策。然而，要说美国在这个阶段支持了封锁，则是言过其实的，虽然从其受害者的角度看待这种看法完全可以为人们所理解。

在上海的美国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对封锁行动持和厄克特相同的敌视态度，但敌视的原因却有某些不同。不象英国商人那样“耐心地忍受”变革时期的“困难”（厄克特在一份电报中就这样认为），大多数美国商人想要脱身离去，并就其所处的困境对国共两党进行同样的谴责。国民党的封锁重压在他们和共产党的纠纷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01/75763F11304。

之上，并使他们在上海坚持下去的愿望终于破灭。在美国商会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长篇备忘录中，有这样一些揭示他们心境的陈述：

国民党的最后抵抗是封锁中国的港口和空袭中国的城市，而这一行动成为可能，则是由于有美国提供的军舰、飞机、燃料、炸弹和弹药。这些恐怖战术的结果之一，被激怒的暴民在排外宣传的怂恿下，使在华的美国侨民遭到进一步的危害。

.....

战后，许多在中国遭到失败的美国商人，普遍认为继续抵抗的代价太高，而且也很危险，并认为时间会给中国以补偿，会给中国留下应得到的一切。

.....

所有的美国侨民都得不到应有的法律程序的保护，并面临着米骚动带来的危险，其原因是共产党所歪曲宣传的美国人对封锁的鼓励和支持①。

.....

目前局势表明，对外国工作人员的安全要予以考虑，美国各公司要求完成这些人员的撤退工作②。

商会按着要求美国国务院与国共两党谈判，以使它能够为美国公司人员的撤离提供安全的运输条件，同时建议国务院不要怕和国民党关系破裂，或者起码不要再向其提供支持，直至美国人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几天以后，在上海的美国协会会长发表声明，不反对商会的请求并表示基本支持，而且比商会走得更远，敦促国务院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永久地解除封锁，“否则撤离就会遭到阻拦”③。

在接到这些请求之前，美国国务院就意识到，对于一些美国公民来说，上海的形势“正日益变得无法忍受”，政府应该“帮

① 关于这种宣传，请参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457—458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1278—1281页。

③ 同上，第1282—1283页。

助提供撤离的便利条件”<sup>①</sup>。这种感觉显然使美国反对穿过封锁线运送援救物资的立场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变化。8月1日，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处长菲利普·斯普劳斯会晤了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参赞查尔斯·米德。就美国在上海的团体要求安排援救物资运输一事，斯普劳斯说，美国政府愿意和英国政府一道，“使中国政府为携带有这种物资的疏散船只让开通道”。但他警告说，国民党尽管可能同意为疏散船只让开通道，但“如果为外国人携带粮食，就不会让这些船进入上海”<sup>②</sup>。

英国大使馆将斯普劳斯一米德谈话的内容报告给英国外交部，指出，美国国务院非常担心共产党会把外国人作为人质，故把援救船一事和撤离联系起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F·S·汤姆林森感到，美国“国务院的态度远不是令人满意的”，虽然它奠定了“联合行动的基础”。他还指出，很清楚，美国人更关心的是撤离上海，而不是在上海坚持下去<sup>③</sup>。

美国国务院的重点放在撤离上，故反对向在上海的外国人提供援救物资，这一点，在斯普劳斯和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J·F·福特8月20日的谈话中得到了部分说明。根据福特的报告，“斯普劳斯说，他愿意看到每一个美国侨民都能从上海撤出。遗憾的是，在美国对共产党无可奈何的时候，中共把如此多的美国人当作了人质”。<sup>④</sup>斯普劳斯还表达了美国人对封锁无可奈何的心境，他说，“国务院曾希望以控制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为影响手段，但封锁却使这种希望破灭，这是最令人恼怒的”<sup>⑤</sup>。

美国对封锁的态度实际上是矛盾的。一方面，封锁符合其意

---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1274页。

② 同上，第1123—1124页。1938年斯普劳斯因懂汉语被派到北平，直至1947年才被调回华盛顿。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904F11338。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649F12919。

⑤ 同上。

图——用经济压力使共产党的政策变得温和一些。而另一方面，封锁又是一种错误的手段，因为其目的在于阻止一切贸易，不能象贸易控制那样随心所欲，产生适度的效果，而且，封锁还为共产党进行损害美国的政治宣传提供了机会，使共产党更有成效地分裂西方盟国。

在共产党方面，依旧以英国为主要争取对象。8月26日，中共上海外事局负责人章汉夫召见了英国总领事厄克特，并要求他不要将召见一事告诉其美、法同事。章告诉厄克特，虽然共产党对外国在华的外交和领事机关不予承认，但希望和外国商业界建立正常关系。章把上海的困难归咎于封锁，并确信这种封锁是得到美国支持的。他说：共产党准备占领舟山群岛，以解除这种封锁，但是，英国保护商船的军舰开到吴淞口是不成问题的；共产党将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封锁。厄克特认为，这次会见所取得的进展是，“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继续存在下去是有指望的”，当然他承认，这种进展毫无疑问是由封锁带来的<sup>①</sup>。

此后，共产党仍继续进行这种使英国消除疑虑的努力：8月28日，准许在上海的英国商会主席约翰·凯瑟克会见章汉夫；8月30日，又允许凯瑟克会见陈毅市长。陈市长告诉凯瑟克，共产党正在驱使外国人出境的说法纯系误解。陈要求外国人要耐心些，对未来要有一个较乐观的期望<sup>②</sup>。

厄克特承认，共产党当局有可能只用安抚的语言来使外国人消除疑虑，除此之外，不会再有什么实际行动，但他又说，凯瑟克和英国商会感到非常受鼓舞<sup>③</sup>。实际上，后者的宽慰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到当时为止，外国商业界一直未见到当局的好脸。只是在几个星期以前，上海商会还向在伦敦的中国协会抱怨说，它一直没有找到和有关当局建立接触的方法，以致不能使它的观点被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8F12960。

② 同上，F12961。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289—1290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5F12961。



当局知道<sup>①</sup>。在共产党控制的城市中，外国人一般都是被冷遇的。例如，英国驻天津总领事7月初就向英国外交部抱怨说：

“无论什么问题，那些一无所知的低级官员都不能予外国商人以书面答复或说明。对待外国商人，不是怀疑，就是蔑视，甚或是公开的敌视”<sup>②</sup>。

共产党这时所显示的温和政策——至少对英国商业界是这样，不仅在上海得到证明，而且在天津以至北平都得到了证明。英国驻南京大使馆注意到，在来自上述地区的电报中，普遍提及的是：当局正在克制任何损害英国利益的倾向，并表示愿意建立商业关系。然而，大使馆还注意到，迄今为止，这些亲善的表示缺少“可信的行动依据”，“与共产党的行为不相符合。”在大使馆看来，这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在起作用，共产党正在玩观望游戏，期待着西方大国之间、特别是在远东的英美联盟之间的分化<sup>③</sup>。

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麦康瑞希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他评论了凯瑟克对陈毅市长的拜访，并猜测“共产党正忙于实现他们的一贯计谋——利用一伙外国人反对另一伙外国人”。他说：这种猜测“在过去的三至四周内，为一些对美国人的直接面明显的慢待和对英国人的重视所证实……同时为英国代表和中共的一系列接触所证实”，这种接触不仅在上海进行过，而且在天津和北平都进行过；无论如何，这种姿态显然没有对美国人做出。麦康瑞希还说：“共产党的行动似乎是要在每一件事上都使美国侨民，特别是美国政府工作人员遭到骚扰和诘难，以挑起一些枝节性的事件，用于反美宣传；或通过歧视性对待，暗中破坏西方人在上海形成的联合趋势。”麦康瑞希认为，对这些“卑劣的小动作”要予以“相当程度的忍耐”，一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32F10663。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32F1011C。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9。

般说来，“美国侨民正表现出这种忍耐性”。他还特别提到英国大使将于9月12日来上海一事，说此行的“目的是和英美领事馆及商业界代表讨论联合阵线一事，需要一周的时间”<sup>①</sup>。

至于英国大使，则向外交部表示，希望能使美国人相信“我们的坚持政策”是互利的，并劝说美国人不要以“令人为难的对立和危害性批评”拆英国对华政策的台<sup>②</sup>。

## 12 英美之间的政策差异

面对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日益明显的分歧以及共产党的以夷制夷政策，华盛顿和伦敦都意识到有必要就中国问题在英美两国间进行更周密的磋商。1949年7月20日，艾奇逊国务卿指示美国驻伦敦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面见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远东问题进行一次坦率的意见交流，并把对中共的态度作为应着手处理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提出。艾奇逊特别提到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的问题，“以及特别是在共产党会扩展其统治，有可能得到苏联支持和宣称它就是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不承认共产党政府所必然招致的后果问题。和共产党的贸易，是艾奇逊感到应该讨论的另一个问题。他还提到，英国商业界正在向共产党官方靠近和“建议合作”的传闻，使他感到“有些心烦意乱”<sup>③</sup>。

作为对艾奇逊这一主动性的答复，英国外交部次官助理埃勒斯·德宁敦促有些勉强的贝文，以欢迎的姿态就艾奇逊所提的问题和美国人进行磋商。在致贝文的一份备忘录中，德宁宣称，

---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第8卷第1282页。尽管这个报告说美国人遭到歧视，但到8月底为止，美国商人的境遇还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以致原打算乘“戈登将军”号船撤离的许多美国商人都放弃了撤离的打算。见南希·塔克著《尘埃中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纷争，1949—195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125页。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9。

<sup>③</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第9卷第50—52页。

“在过去的三年中”，英国一直努力使美国人在中国和日本问题上对英国人坦率些，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美国人“一意孤行，结局悲惨”；要使美国政策走上正轨，“最好的办法就是英美间不断进行磋商”<sup>①</sup>。贝文同意了德宁的观点，结果在8、9两月间，英美两国举行了一系列正式的或部长级的会谈，就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8月16日，埃勒斯·德宁向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阿瑟·林沃尔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交流中的第一个实质性问题，但附带一个说明，说该备忘录“提出了各部对中国问题的观点，但不一定就是各部大臣的观点”<sup>②</sup>。英国外交部还警告其驻华华盛顿大使馆，“不要将该备忘录看作是英王陛下政府的观点”<sup>③</sup>。然而，无论是贝文还是其他内阁大臣，后来都批准了这个备忘录，并使之成为9月中旬贝文—艾奇逊华盛顿会谈的基础性文件<sup>④</sup>。

这个备忘录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英联邦和北大西洋诸大国与中共政府的关系，在最坏情况下，也要“遵循他们在东欧与苏联诸卫星国的关系模式”；无论如何都有这样一种可能，即这种模式最终会向着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方向发展；所以，“西方诸大国应注意，不要一开始就对共产党政权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以免破坏这一未来的可能”。备忘录虽然明确地“反对在政治上突然承认”中共政府，但却指出，拒不承认一个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不仅“在法律上是讲不通的”，而且还会“对西方在华利益的保护造成严重的实际困难”。备忘录还指出，“迫使中共接受任何特殊的承认条件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因得不到承认而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耽搁承认”，就有可能在某一阶段后“不仅严重地损害西方在华利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3F10976。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56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3F11633。

④ 同上，F12748。

益，而且也得不到任何利益补偿”<sup>①</sup>。

该备忘录发出几天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告诉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说，英国“对所有中国问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过去的历史所影响的”。例如，他认为，那样长久地承认满洲政权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还说，英国人相信，“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俄国人”。他最后概括其“基本态度”时说，他“倾向于留在我们原先就驻在其间的中国，并努力避免不得已的撤退或是被赶出去，同时努力突破封锁，提供最低限度的供给物资”<sup>②</sup>。道格拉斯一再回答说，对于封锁问题，美国倾向于相反的观点。

英美对封锁问题的不同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起因于双方在对中共和台湾贸易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从3月份到夏季，英美两国一直在就实施所谓的对华有限贸易措施问题进行讨论。原则上，英国不反对贸易控制，但要求列出一份比美国想象的范围要窄得多的禁运物品名单。而且，他们比美国人更热心于得到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合作，并且不愿拖着香港、新加坡等贸易中心一道强行实施贸易控制。美国人则不然，在他们看来，要防止控制系统出漏洞，必须使这些贸易中心也加入进来<sup>③</sup>。

美英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不同立场，集中地反映在一份备忘录上，这是9月12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和往常一样，这两个盟国就总体目标达成了一致，而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英国的备忘录断言，对于美国提出的贸易控制的总体目标——影响中共政权的方针政策、保证西方的贸易而不增强中共的军事力量——，“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没有什么差异”。“实际上”，备忘录还宣称，“英国政府凭其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地位，有着直接的和完全令人信服的理由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3F12748。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4F12843。

<sup>③</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867—869页。

由，保证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该备忘录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在实际上，英国只对后一个目标有把握；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武器装备进入中国，或通过香港转口中国。对于前一个目标，英国不仅在手段的使用上与美国持不同意见，而且怀疑出口控制能“改变中共政权的政治路线”，并“不愿意为这样一个目标而实行控制”<sup>①</sup>。

9月9日，在会见英国商业界代表时，沃尔顿·巴特沃斯建议，美英等西方政府应一道“有选择地控制那些中国的经济生活所必需的商品，不一定非要强行阻止这种商品的流通，但可以作为我们能够对中共采取惩罚性措施的象征而采取行动——如果将来有必要采取这种行动的话。”<sup>②</sup>但是，英国人似乎不想以这种惩罚性的行动对中共进行威胁。他们不象美国人那样，认为这种威胁会使中共采取令西方满意的路线。而且他们还确信，这种威胁政策会动摇英国在华的商业地位。尽管开端是不祥的，但英国人仍认为，一个理智的时期是会来临的，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将需要许多有关贸易、航运、银行、制造等行业的外国专家，这种观点为英国在华商业界所强烈坚持，同时其驻伦敦代表和中国协会亦是如此。在制约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诸因素中，保持香港及与之毗邻的新界的原有商业地位的愿望，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香港和新界的生存，有赖于与中国大陆的持续不断的贸易。

英美不仅对其在华商业利益估价不同，而且对贸易控制或经济威胁的政治效力也估价不同，这显然影响了两个政府对国民党的封锁的态度。和英国相比，美国很少表示要对封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封锁使其遭受的贸易损失要少于英国，并且它比英国更相信经济压力作为政治工具的效力。

---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875—878页。

② 同上，第872页。

两个政府对台湾的未来地位和国民党在台湾的军事实力的不同估价，也影响着它们对封锁的看法。如本书第四章将要指出的那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虽然美国军队无需对台湾的防御承担义务，但对美国来说，台湾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故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是：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努力使台湾及澎湖列岛不落入共产党手中。

8月4日，美国国务院“鉴于单纯的政治和经济手段目前已无法阻止那些岛屿为共产党所控制”，故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重审其2月10日提交的关于台湾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备忘录<sup>①</sup>。参谋长联席会议依言照办，于8月27日再次向国防部长提交了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备忘录，重申台湾“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但“只要我们的军事力量和我们的全球义务不相匹配”，就不应该由于其战略意义而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sup>②</sup>。

在9月9日的英美官方会谈中，美国国务院的利文斯顿·麦钱特（他不久前为执行特殊使命在台湾呆了几个月）解释说，“美国目前无力承担保卫这个岛屿的军事义务”，但“在外交上将全力支持台湾现政府，并全力对该岛提供经济援助”。沃尔顿·巴特沃斯补充道，尽管全力支持，也不能排除“该岛最终被共产党接收的可能”；当然不会马上接收，“共产党在接收之前，得需要一个充分准备的时间”<sup>③</sup>。

英国也认为台湾“极有可能”陷入共产党手中，但它的态度更带有宿命的色彩。在英国人看来，既然这种接收不能被有效地阻止，那么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对该岛的占领“不会是灾难性的”。德宁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让台湾人向联合国呼吁“举行公民投票，或由联合国托管”，但他和巴特沃斯都感到，只要蒋介石控制着台湾现政府，出现这种呼吁的可能性就是极小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369—371页。

② 同上，第376—378页。

③ 同上，第388—389页。

的<sup>①</sup>。

在美国国务院对台湾的态度和英国外交部对维持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态度之间，有一种类同之处是令人费解的。美国国务院相信台湾最终会落入共产党手中，但仍极力阻止其成为事实；英国外交部认为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把英国商人赶出中国，但又极力推迟这一天的到来。由于信守这些短期目标，致使英美两国在封锁问题上的分歧更加严重了。国民党实施的封锁损害了英国人的商业目标，却有利于美国人的政治目标。

9月13日，艾奇逊和贝文继续就对华政策问题在华盛顿进行广泛的会谈。艾奇逊告诉贝文，他应该选读一份有关中国形势的备忘录，因为它“如此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随后，艾奇逊自己选读了几段注号为1994的电报，这是9月3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约翰·韦斯利·琼斯于南京发来的<sup>②</sup>。其中建议说，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必须考虑下面三个因素：（1）中共的统治会持续“一个时期”，任何依赖外援的抵抗运动都不会成功，还看不到能成功地领导反对中共革命的运动的领袖。（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等待“中国铁托主义的发展”，以实现把中国与苏联分离的目标。（3）在这一等待时期，美国不应“对中国统治者”采取“公开的敌视”政策，因为这只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美而不反俄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也无助于实现分裂中苏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应对新中国的统治者表现出“调和的姿态”，因为这种姿态不仅会遭到美国公众舆论的反对，而且还会被中共看作是对“共产党的理论——美国外强中干”的证明，看作是美国“对市场和原料的极度渴求”。琼斯认为，经过一段艰难困苦之后，中共自己就会醒悟，中国和苏联结盟，“失去的远比获取的多”。因此，美国不应做任何“有助于中共政权得到安定”的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389—390页。

② 同上，第81页。

事；只要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它就别指望得到美国的援助<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承认中共是否有助于实现离间中苏关系这一共同目标的问题上，贝文和艾奇逊的看法是不同的。贝文坚持说，“如果我们太冷酷，就会把中国人赶到俄国人一边，而若审慎从事，就能削弱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吸引力”。然而，对于承认中共是“使中国不为俄国人控制的强有力手段”的说法，艾奇逊持怀疑态度，因为无论如何，中国人都要倒向俄国。贝文有一种观点是艾奇逊所赞同的，即英美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是“策略上的，而不是战略目标上的”<sup>②</sup>。

美英只是在策略上有分歧的说法似乎是令人怀疑的，但华盛顿和伦敦在基本目标上又确实是一致的。两国都要使中国与苏联分离，都期望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与中共政权建立关系。过去几个月的事态发展表明，英美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艾奇逊—贝文会谈几乎没有提出消除这些分歧的任何办法。但是，即使如此，英国外交部仍于9月30日发给其驻南京外交机构一份电报；乐观地宣称：“在对华政策上，联合王国与美国之间发生显著分歧的危险已经解除了”，那种“在承认来临之际我们必然要和美国发生分歧的看法已经不能成立”<sup>③</sup>。

英国外交部的乐观情绪，或许是由于受到美国打算留在中国这一事实的鼓舞而产生的，因为它暗示着美国最终要承认中共政权，并愿意就这个问题与联合王国和其他大西洋盟国进行磋商。鉴于此，英国人所考虑的，便是使美国放心，他们不打算匆忙承认中共，他们非常愿意就承认问题和他们的盟国及英联邦成员进行磋商。然而，美国人却认为，承认可以，但最要紧的是讲清承认的条件，尤其是中共使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条件。美国人的这种先决条件，在可预见的将来，实际上只能被看作是走向承认的道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519—521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83—84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6F14701。



路上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在艾奇逊—贝文会谈期间，巴特沃斯曾简洁地道出了中共与美国在承认问题上的冲突。他说，共产党不顾条件期限的规定，单方面声明要废除一系列条约，而美国则不能容忍对任何一个条约的废除<sup>①</sup>。当时贝文虽然说“必须保证（共产党）承担他们的国际义务”，但英国人在后来放弃了这一立场<sup>②</sup>。

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也有可能使他们在承认问题上发生冲突。道格拉斯大使在8月26日曾与贝文谈过一次话。根据贝文就这一谈话所写的备忘录，道格拉斯曾说，英美两国间的主要分歧点，是美国“认为应把中共和西方大国间的贸易往来限制到最低点，以使中共受到一切可能的压力……这会使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和西方建立适当的贸易关系对他们是何等的重要”<sup>③</sup>。这样看来，承认共产党政权虽然和英国关于扩大贸易、避免限制（武器控制除外）的政策完全一致，但却和美国试图通过施加经济压力迫使中共改变其态度的政策相抵触。如果套用胡萝卜和大棒这种为人熟知的政治术语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承认中共虽然合乎逻辑地是英国胡萝卜的一部分，但却削弱了美国大棒的威力。

非常清楚，英美各自对香港和台湾未来地位的关心，也使它们在承认问题上难免发生分歧。英国人希望香港免遭共产党控制，方法是强调香港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表示愿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问题与共产党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只要承认共产党政府，这两个方法就能加以应用，并达到目的。出于战略考虑，美国人也想尽可能地使台湾免遭共产党的占领，但这一日的

---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82页，中共关于废除这些条约的立场，是在所谓的1947年10月10日宣言（由毛泽东起草）中提出的，它宣布了“八项基本政策”。其第八项称：“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150页。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8f16417。

<sup>③</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4F12843。

不可能因承认共产党政权而达到，反倒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在当时情况下共产党是不会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政策的一一即使在30年以后，虽然大体上不再提武力“解放”，但在事实上中共仍未放弃这一原则。总而言之，英美对其各自利益和影响中共的方法的不同认识，导致它们在其所关心的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早期承认的问题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 第二章 承认与撤退

### 13 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0月1日，周恩来向驻北平(这时已改称北京——编者注)的各国领事馆发送了毛泽东的公开声明，并请它们将该声明转交给各自的政府。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定都北平，恢复它原来的名称——北京。最使各国驻北京的机构感兴趣的是声明的最后一段：“我们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她同样希望与所有信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sup>①</sup>

周在给各国领事的信中更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所公开声明的观点，即“愿意”与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他说：“我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十分必要的。”<sup>②</sup>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省略了毛的声明中“各国”一词后面的限定词。这些限定词引自毛的声明发表三天前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第56条，而这个纲领是新中国的暂定宪法。但是，就是毛所引用的词语也未完全阐明共同纲领中有关与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所需要的各项条件。根据该纲领的第56条，外国政府还必须“与国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3卷第144—145页。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3卷第95页。

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友好态度”<sup>①</sup>。这一附加条件是外国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关键，至于是否持“友好态度”，只有由北京单方面地加以判定。只要中共政府对已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共产党国家做出了这种判定，它就会邀请它们的代表来北京，以便检查其是否具备建交的资格。

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这样的要求。北京与莫斯科几乎是闪电般地建立了外交关系。10月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德鲁·葛罗米柯向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确信，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着“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愿，故“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sup>②</sup>。如此迅速（而又自信）的反应证明，莫斯科早已通过其他渠道得知了毛的声明和周的信，而外国领事——如美国总领事直到10月1日晚9时许才知道这些东西。周在给葛罗米柯的回信中表示，苏联是承认中国的“第一个友好国家”，对此，中国人民“无比欣慰”，“我在此向您通告，中国政府热烈欢迎中国与苏联迅速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sup>③</sup>。

中苏建交后不久，就在北京成立了由政治局委员和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任会长的中苏友好协会。类似的协会在中国其他地区已有不少，尤以满洲为甚。例如，8月27日，新华社报道各地分会代表会议的情况时，谈到“东北中苏友好协会”在沈阳宣告成立。”<sup>④</sup>其中某些分会于7月初便已成立<sup>⑤</sup>。事实上，早在两个半月前，中苏友好协会的筹备委员会就已在北京成立。7月16日，包括刘、周在内的698名发起者发表声明，宣布协会准备引

① 关于共同纲领的英译文，请看《时事背景》第9期，美国驻香港领事馆1950年9月21日发行。

② 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期号155，1949年10月4日，第16页。

③ 同上，期号155，1949年10月4日，第3页。

④ 同上，期号119，1949年8月28日，第4页。

⑤ 同上，期号78，1949年7月18日，第3页；期号100，1949年8月9日，第2—3页。

进苏联的科学技术，吸取其建设经验，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加强两国的友谊。声明宣告：“苏联的方向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方向。”<sup>①</sup>

刘少奇在北京中苏友协开幕式上的讲话也反映了和周类似的观点，这当然是不足为怪的。刘强调，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只有依靠苏联的援助，依靠苏联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超技术；与英美人不同，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将由中方指派任务，工作完成后便返回苏联<sup>②</sup>。

1947年中苏在旅顺和大连开始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密切合作，在1948年东北各城市落入人民解放军之手后，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了<sup>③</sup>。到1949年秋，东北城市中的许多工厂在中苏双方的管理下已开工生产<sup>④</sup>。7月31日苏联与其所称谓的“满洲人民民主政府”（中共报界称之为“东北人民民主政府”）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满洲向苏联提供大豆、菜籽油、玉米、大米和其他农产品，苏联则提供工业设备、汽车、石油产品、布匹、纸张和药品。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高岗，他当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共政治局委员<sup>⑤</sup>。

这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中共控制的地区、至少在东北，中共官方和苏联顾问之间已建立了广泛的工作关系，而莫斯科与国民党政府继续保持外交关系的事实并没有妨碍这种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华盛顿和伦敦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则常常被中共官员说成是妨害他们与英美官员达成任何暂时性妥协的障碍。

① 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期号78，1949年7月19日，第1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833F10691。

③ 埃德蒙·柯乐博，《中苏间谍活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79页；《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8F7879。

④ 见香港总领事馆急电，1950年3月31日，793.6149A/31—31ec, RGSB, DSNA（RG代表“档案集”，DSNA代表“美国国家档案馆藏美国国务院档案”，下同——译者注）。

⑤ 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期号90，1949年1月。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955页。

史蒂文森大使在获悉周10月1日的信之前，曾建议与新中国“外交部建立一条官方联络渠道，并在未直接收到中国新政府的成立通知的情况下，向英国外交部送交了要求建立这种渠道的草案文本。外交部对文本只作了一处改动，然后用它答复了周的信。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可能出于他对社会主义的敏感，建议用“有助的”一词替代文本中“有益的”一词。英国给予周的答复的部分内容为：“英中两国许多年代以来，在商业和政治上存在着友好和互助的关系，希望今后继续如此。联合王国陛下政府因此建议，在局势尚未明朗之前，陛下的领事官员与中央人民政府管辖的地方当局应建立非正式的关系，使双方政府更便于接触，并促进两国间的贸易。”<sup>①</sup>在发给驻各国首都的英国外交代表的电报中，外交部转发了致周的信的主要内容，并承认，“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这种联系渠道可以解释为事实上的承认”，但又强调说，此举的目的在于“诱使中共当局在承认问题仍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与陛下的领事官员建立工作关系。”<sup>②</sup>

美国和法国政府很关心英国致周的信中所暗示的事实上的承认，因为它可能破坏9月在华盛顿三方会议上达成的非正式协议。英国外交部表示，致周的信可以解释为英国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共控制地区的政府。但又指出，在过去，中共对事实上的承认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周在其信中说的是建立外交关系，除此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引不起中共的兴趣。外交部又强调，英国对中共当局与英国领事馆建立非正式关系一事的期待完全符合英国自年初以来所采取的政策，也与英国领事机构4月份向北平市长发送的信件的内容相一致。至于说到华盛顿三方会议上的协议，“内阁成员关心的倒不是事实上的承认，而是法律上的承认”<sup>③</sup>。

关于中共对事实上的承认的态度，英国外交部所言完全正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6F14782。

② 同上。

③ 同上，F14878。

确。他们对此毫无反应，根本不理睬英国要求建立非正式关系的建议<sup>①</sup>。

美国在10月1日对中共所采取的基本态度与当年1月时的态度完全一致。尽管华盛顿决定减少驻共产党占领地区的领事官员，并关闭共产党将要占领的地区的的所有领事馆，但是，美国的政策依然是在共产党控制地区保持其官方代表的存在。事实上，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美国官方人员是其在国民党控制地区的数量的5倍；到年底，美国官方在国民党控制地区的机构只剩下台北一个工作点，相比之下，在共产党地区却有四个工作点<sup>②</sup>。由此可见，美国已表明了它的官方机构留驻中国的意图并准备继续与中共当局打交道。

同样，虽然美国对同中共地区的贸易比前一年的态度更谨慎，但绝不是反对这种贸易。中共当局特别热心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在4月底和5月初，它曾向驻北平的美国总领事询问此事，总领事把这个消息汇报到国务院，随即由陆军部转告了驻日本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sup>③</sup>。5月27日，国务院批准让驻北平总领事通报中共当局：麦克阿瑟愿意考虑具体贸易事宜。总领事还有权向麦克阿瑟转达具体贸易建议<sup>④</sup>。与日本贸易的具体建议来自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私营企业，但贸易往来中包括共产党官方机构提供的产品。

例如，8月中旬，驻北平的美国总领事报告，三洋公司可提供帮助，使大豆、花生、粗盐、羊毛和驼毛、菱镁矿、滑石、焦化煤以及生铁等货物从营口或天津向日本出口。三洋公司提出用出口换来的款项购买日本货物。

9月8日，美国总领事馆向国务院报告：总司令（指麦克阿

<sup>①</sup> 关于中共对事实上的承认的态度问题，美美曾交换意见，见英国驻伦敦大使馆1952年3月31日急电，793.02/3—3152，RG59，DSNA。

<sup>②</sup> 见美国国务院《驻外人员名单录》，1949年10月1日及1950年1月1日。

<sup>③</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976—978页。

<sup>④</sup> 同上，第985—986页。

瑟——编者注)询问“能否提供焦化煤”，并要求三洋公司给以答复。9月19日，国务院建议总领事，劝三洋公司就此事直接与其驻东京代表举行进一步的谈判<sup>①</sup>。在这种谈判的基础上，中共控制的地区与被占领的日本之间开展了贸易往来，并且，这种贸易往来在当年的后几个月中有进一步的发展<sup>②</sup>。

尽管有国民党的封锁和美国官方的贸易控制政策，美国仍旧与中共地区有贸易往来<sup>③</sup>。美国商界仍坚守在中国，虽然规模不如从前，至于传教士就更不用说了，其大批人员仍未离开中国。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美国与英国一样，仍在中国保持着立足点；但与英国人不同的是，美国人不愿为赖在中国而不惜任何代价。

对美国人影响较大的是扣押其驻沈阳总领事沃德及其工作人员且时间长达十个月，虽然在6月份就表示要释放他们<sup>④</sup>。美国方面对沈阳事件耿耿于怀，这一点可从它对周10月1日的信的反应中看到<sup>⑤</sup>。柯乐博在向周恩来致回信时，注明收信地址是“北平”，并称周是将军，避而不称他的新官衔，以免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嫌——正象中共当局几个月来煞费苦心避免使用美国外交和领事人员的官方称呼一样。在回信中，柯乐博先说明已收到周的信，然后说：“我利用此机会提醒您注意，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安格斯·沃德先生及其工作人员自1948年11月起便被无故囚禁在领事馆……美国政府对此深为关注，这有悖于已确立的国际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994—995页。

② 同上，见第1000页—1001页；代理政治顾问1949年12月9日致盟军最高司令总电。

③ 同上，第964、969—974页。

④ 例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971页；《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64F9316。

⑤ 关于美国对周的口信的反应之重要性的另一种观点，请见威廉·惠特尼·斯蒂克著《通向对抗的道路：美国1947—1950年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查佩尔希尔：北卡罗罗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公德原则。尽管中共军事指挥部已收到我们提出的照会，但这种局面仍未改变。我们希望有关当局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sup>①</sup>对沈阳事件的最后一次照会是9月23日柯乐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提出的。在此之前，沃德总领事从7月19日至9月3日曾三次向沈阳地方当局提出申请，要求为领事馆人员撤离提供方便条件，可是均无回音<sup>②</sup>。不幸的是，柯乐博向周恩来提出改变沈阳局面的呼吁不但被置之不理，反而使沈阳的局面迅速恶化起来。

## 14 沈阳的考验

10月24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和4位领事馆工作人员（两位美国人：拉尔夫·里伯格和希罗·塔体密；一位意大利人：弗兰克·西考格纳；一位德国人：阿尔弗雷德·克里斯丹）被警察从领事馆带走关入监狱，罪名是殴打领事馆雇员齐玉衡（译音）。美国国务院最早是从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博的电报中知道这件事的，该电报记录了10月25日沈阳广播电台的有关内容。柯乐博的电报摘要描绘了那篇广播的风格：

10月11日，齐玉衡到沃德办公室要求付给他应得的工资……当齐试图据理力争时，沃德以其帝国主义的凶残本性疯狂殴打和侮辱齐，同时煽动其他4名领事馆雇员……将齐关押在楼里，几个人对他拳打脚踢……在那里的35位中国工作人员和工人已对沃德等人肆意殴打中国工人的粗暴行径提出书面抗议……公安机关将依法迅速调查这一事件<sup>③</sup>。

沃德不仅否认对他的指责，而且反过来指责中国雇员殴打他和他的同事。他称：“10月11日，我手下的中国人殴打我，多亏里伯

① 《美国外交文交集》1949年第9卷第117—118页。

② 《美国外交文交集》1948年第3卷第979页。

③ 《美国外交文交集》1949年第8卷第984—989页。

格手疾眼快，我才免遭另一位手持大棒的中国人的袭击。西考格纳遭到一群中国人的围攻，克里斯丹被打并受到侮辱，身受重伤。”<sup>①</sup> 尽管柯乐博和国务院在沃德获释出狱前无法听到他关于这起事件的说法，但是他们马上对广播内容产生怀疑，难道只是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才把沃德及其工作人员扣押在领事馆达数月之久，同时在领事馆内外设置士兵加以监视吗。候审期间，沃德和4位领事人员被单独监禁，只给水和面包，其他领事人员不能与之接触，也不允许法律咨询。受审期间，他们无权提出辩护证人，无权质问证人和原告，无权为自己申辩。5个人均被证实为有罪，判处了徒刑，后来减轻为驱逐出境。1949年11月21日，他们被释放<sup>②</sup>。

沃德及其工作人员入狱后的第四天，国务院在对他们被关押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指示柯乐博面见周恩来或其他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共高级官员，就此事提出“口头照会”。按照这个指示，柯乐博应向周说，美国政府“以极其忧虑的心情”注视着中共当局对美国驻沈阳领事官员的“专横行为”和拒不提供给他们撤离之方便的失信行为<sup>③</sup>。但是，柯乐博又没能见到周恩来或其他中共高级官员，只得再次递交了一封信。信中他不但要求“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还“特别要求给予英国驻沈阳领事代表一个机会，以使其能探望沃德先生和其他被指控犯殴打罪的人”。<sup>④</sup> 几天后，当柯乐博的信见诸报端后，这一要求引起了英国外交部的不满，因为美国国务院事先不和英国商量，视英国的帮助为“理所当然”。<sup>⑤</sup>

沃德等人入狱后，一向沉着耐心的柯乐博感到，“如果可能的话，现在是施加压力的时候了”。他建议国务院“在沃德等人

---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032页。

② 同上，第1026—1028页。

③ 同上，第988—989页。

④ 同上，第1000—1002页。

⑤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951F17381。

被释放并撤离沈阳之前”暂时停止“所有商业谈判以及与中国的贸易”<sup>①</sup>。他的建议得到国务院远东司的同情。助理国务卿帮办利文斯顿·麦钱特给国务卿艾奇逊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赞成以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为影响手段，使中共不仅释放沃德等人，而且也释放史密斯和本德，他俩被共产党扣押的时间甚至比沈阳那伙人还长。麦钱特认为有一个随手可得的机会，即中国人想从日本进口6万吨铁轨，1万吨钉子和接合板等物资。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对这笔交易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要求给以政策指导。麦钱特认为，应在北京和上海采取接近行动，从而向中共方面表明，只要沃德和他的工作人员以及史密斯与本德仍被关押，“这些贸易谈判似乎不可能达成满意的结果”<sup>②</sup>。

但是，国务院经济事务司反对走得这么远。它指出，麦钱特的建议不符合国家安全委员会41号文件所制定的政策，即：“利用贸易限制或讨价还价的方法解决美国与中共间的政治事件或处理非经济领域里的关键问题”是不妥当的。该事务司的官员对没有得到西方或日本支持的经济压力措施能否有效实施表示怀疑。他们回顾说，“在德国，捷克人和苏联人也扣押过美国人”，当时也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是遭到拒绝，而最终还是采用了“其他一些措施才使他们获释”<sup>③</sup>。

把日本与中共的贸易谈判作为释放沃德等人的讨价还价的筹码的主意在国务院引起了争议，而就在此时，国防部又有人提出以武力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张。当杜鲁门总统11月14日表示应探讨一下封锁从中国华北港口向上海运输煤炭的航道的可能性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开始关注这个问题<sup>④</sup>。两周前，杜鲁门曾对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布说，如果美国能用飞机将沃德等人撤出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000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996—998页。

③ 同上，第998—999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008页。

沈阳，他准备“在有必要和有把握的情况下，采取最强硬和可能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sup>①</sup>。11月17日，国务院派出一批人，由艾奇逊牵头，包括司徒雷登，劝杜鲁门不要采取极端手段——“无论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sup>②</sup>。11月18日，由布莱德雷将军签署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直接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战争，而且也不能保证沃德早日安全返回。它建议通过谈判达到释放沃德的目的，并且提出了一个谈判人选——“第七舰队的司令官。”<sup>③</sup>

三天后，在致总统的备忘录中，艾奇逊国务卿指出，上海并没有从华北港口输入多少煤炭，甚至封锁所有中国海港也不会“给中共政权制造出经济危机。相反，会使中共在国内外得到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以证明他们关于美国抱有帝国主义目的的说法”。艾奇逊和国务院强烈反对封锁政策或对“其他外国船只”诉诸武力的政策<sup>④</sup>——在对华贸易中，这当然最可能是英国的船只<sup>⑤</sup>。

与此同时，英国人意识到，由于沃德等人的处境，美国官方和公众的愤怒情绪正在与日俱增。11月9日，奥列弗·弗兰克斯爵士向英国外交部拍发了一份“绝密”电报，通知外交部说，司徒雷登大使（自8月以来一直呆在华盛顿）在与英国使馆人员的谈话中，“有很长一段话谈到国务院对共产党扣押沃德的担心，并指出公众越来越感觉到，在营救总领事问题上目前毫无作为”；司徒雷登甚至曾考虑过“在沈阳空降一支精干部队的可行性问题”；他想向英国人说的是，在与中共就“承认问题”进行的非正式谈判中，他们可以向中共表明，扣押沃德的行动使人难以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1355页。

② 《司徒雷登日记》第57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011—1013页。

④ 同上，第1015—1016页。

⑤ 见《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951F17388。

“理解共产党对外国公民、特别是对外国官员的意图。”司徒雷登强调，这纯粹是个人建议，国务院可能不愿谈这个问题，因为英国人可能认为，“在这时插一杠子可能会打乱”他们承认中共的进程<sup>①</sup>。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奥利弗爵士并没有觉得司徒雷登的建议会打乱上述进程。他告诉外交部说，他认为“这或许是事先提醒中共的有效方法，好让他们明白，在我们期望建立的关系中，有一些行为规范我们认为是起码的东西”；并且，它或许是帮助美国国务院度过难关的一次良机，因为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政策“被称作是无力的”，它由此而面临着“又一次沉重的打击”<sup>②</sup>。

在向英国外交部转交司徒雷登的建议后一周，弗兰克斯大使再次报告了沃德被扣押一事在美国引起的反应。一些报纸抱怨说，正当美国与中国关系紧张时，英国人却企图承认中国共产党。弗兰克斯建议，联合王国应迅速帮助沃德获释，从而“安抚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总政策”。他说，尽管他没见到艾奇逊，但他知道，“我们若采取友好行动将受到最热烈的欢迎”<sup>③</sup>。

外交大臣贝文同意这个建议，他指示英国驻南京使馆“尽可能早一点向能见到的共产党官员口头表明，英国不赞成（扣押沃德）”。贝文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如果任由中共如此对待外国官员而不予干涉，到头来我们自己将遭到报应”<sup>④</sup>。但是大使馆对此兴趣寡然，它回答说：“我们出面不利于沃德先生，反而会影响我们在中国的地位。”<sup>⑤</sup>

与此同时，国务卿艾奇逊于11月18日向在中国驻有代表的各个国家的外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请他们“迅速向在北平所能接触到的中国最高当局表明，贵国政府对美国驻沈阳领事官员被蛮横扣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950F16872。

② 同上。

③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951F17206。

⑤ 同上，F17359。

押达一年之久表示真切的关注”<sup>①</sup>。艾奇逊致“亲爱的埃尔尼”的亲笔信，通过美国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转给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sup>②</sup>。在致“亲爱的卢”的答复中，贝文指出，英国政府已经同其驻南京大使馆探讨了就沃德事件向中国人提出意见的可能性。接到艾奇逊的信以后，英国外交部即指示驻北京的总领事向中共当局表示英国的担忧。但是，由于对沃德的审判已经结束，英国总领事推迟了这一行动<sup>③</sup>。

11月26日，道格拉斯收到贝文信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沃德获释的第五天，沈阳当局突然将美国副领事威廉·N·斯托克斯带到法庭，指责他从事间谍活动，沃德把这一事件向驻北京的柯乐博作了报告，但他不知道斯托克斯在法庭上是被视为被告还是证人抑或是什么其他角色<sup>④</sup>。由于地区时差，国务院于11月25日就收到了这份报告。国务院随后的行动是极其敏捷的。在24小时之内，它向驻在那些仍有官方代表留驻中国的国家的美国使馆拍了一份电报，指示它们敦促所驻国家的政府，如果为沃德一事的照会尚未向中共提出，那么就把手托克斯再加进去；如果为沃德的照会已提出，则请它们再为斯托克斯一事提一个照会<sup>⑤</sup>。国务院还指示柯乐博设法会见周恩来，讨论斯托克斯问题，同时向周递交一份有关此事的信件<sup>⑥</sup>。但国务院还未来得及完成所有这一切工作，就获悉斯托克斯在被带到法庭的当日就返回领事馆了。

在伦敦，美国大使馆收到国务院关于斯托克斯一事的指示，同时还有附加的另一个指示。这个附加指示说明，美国国务院并不

① 《美国外交文集》1949年第8卷第1010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951F17683。

③ 同上，F17917及F17557。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021页。本书作者曾于1985年9月29日拜见斯托克斯，据后者说，沃德给柯乐博的报告是有误的，他11月26日那天只是去出席中共当局对美国代理人的审判，这是他自愿答应下来的中共方面的要求，而且他的行动也完全经过了沃德的批准。

⑤⑥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022页。

认为沃德获释就降低了因扣押他而向中共当局提出恰当的抗议的意义。这种意见通过美国使馆一等秘书林沃尔特的一封信很快转到了英国外交部，可是被外交部断然拒绝。在11月30日写给威廉·斯特朗爵士的一份备忘录中，埃斯勒·德宁说，英国在中国的官员“最不愿”做那些可能“有损于他们不稳定的地位”的事。对此态度，他完全赞同。他认为，美国人“关于我们若与中共当局有关系就应采取恰当行动的建议，是对我们的过高要求，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关系”<sup>①</sup>。12月1日，他在回复林沃尔特的信中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一观点，加上贝文于11月25日给道格拉斯的信中所表达的观点，一起转发给了英国驻南京大使馆以及英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的高级代表<sup>②</sup>。

虽然印度行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它更同情美国的要求，而不是英国的立场。12月1日，印度政府指示其驻南京大使以书面形式向中共当局通告：印度政府对沃德和斯托克斯的遭遇表示关切<sup>③</sup>。至于加拿大，尽管其外交部与英国观点一致，认为照会没有用，但是它驻南京的代表已接到指示：“利用一切恰当的机会以一般的语言向中共当局申明，不管领事官员所属的政府对承认持何种态度，领事官员应有权行使自己的职责。”<sup>④</sup>英国人对美国建议的反应甚至不如印度和加拿大驻南京的代表，这确实使美国国务院大失所望<sup>⑤</sup>。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受到的粗暴待遇，使美国公众对中共的态度急转直下。这里我们有必要推测一下，为什么遭难的偏偏是这个领事馆？人们自然而然会怀疑苏联在当地的强有力影响，在那里的美国人则更肯定地对苏联人持怀疑态度。例如，在6月份，据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报告，新华社的一条消息说，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操纵着一个间谍网。司徒雷登说，“所有的指控程序和细节

①②③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652F18156。

⑤ 同上，F18898。

无不露出苏联影响的痕迹”。他暗示，“在这样晚的时候才发出指控，可能是由于受苏联控制的中共沈阳当局感到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同时意识到一旦沃德获释吐露真情，会对他们不利”<sup>①</sup>。柯乐博总领事也一再向国务院表示，他坚信苏联在沈阳事件中发挥了巨大影响。比如，他在11月5日的电报中说，“苏联在满洲的强大势力”是“普遍感觉到的事实存在”。他猜测，“苏联人或许对处理沃德事件的方式负有责任”<sup>②</sup>。

沃德一行离开中国不久，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向国务院发了一份长篇电文，报告该市对苏联的“贪婪和扩张”所日益增加的忿恨。关于苏联在北京的影响，各领事馆的看法不一样，但一致认为“苏联在满洲势力强大”，而且大多数人都“确信”，对沃德事件，苏联人应负首要责任”<sup>③</sup>。另外，负责向各领事馆转达消息的中国官员也急于将沃德事件的责任推给苏联人。这似乎说明，中国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一事件破坏了中美关系，并想替自己开脱<sup>④</sup>。

苏联在处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事件中的影响问题，在沃德和其他在华美国官员的脑子里，经常与中共内部的所谓亲莫斯科派联系在一起。据说亲莫斯科派在中共东北局中居主导地位，有时他们与在北京的中共核心集团发生政策分歧。因此，沃德获释后告诉国务院，他“开始相信，中共亲苏派在利用逮捕总领事和故意恶化局势的手段把楔子打入美国与中共温和派之间。”<sup>⑤</sup>

能证明共产党的中央当局和东北地方当局发生磨擦的不可多得直接证据，是由会讲汉语的美国驻天津副领事菲力浦·曼哈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970页。

② 同上，第1005页。

③ 同上，第634页。

④ 英国商会也为“沈阳事件”对中美关系产生的不利影响感到悲哀，它递交的一份题为“迅速承认问题”的密查备忘录说，它担心美国人会由此更加“不相信并痛恨”“共产主义的一切东西”，而且，这个事件“有可能加强对迅速承认持反对意见的那些人的势力”。见703.02/1-450, RG59, DSNA。

⑤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044—1066页。



德提供的。他同天津公安局一起负责沃德一行离开沈阳前往天津的具体事宜。他清楚地记得，在公安局就此事举行的会议上，两位来自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的年轻官员向他强调指出，沃德受到这种待遇很不幸，但这并不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曼哈德认为，这些官员想确保沈阳领事官员在天津受到与沈阳完全不同的对待。在曼哈德协助他们作出具体安排时，他们那种不厌其烦的认真态度给他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sup>①</sup>。

## 15 英国考虑承认问题

英国人之所以不愿为沃德事件而冒开罪于中国人的风险，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外交部想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22日，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埃斯勒·德宁向外交大臣贝文提交了一份致内阁的文件草案。该草案阐述了外交部法律顾问的意见，认为承认中共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之举“不能说违背了国际法准则与实践。”贝文批准了草案，并指出，在他看来，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抵抗“目前希望渺茫，而它对中国大陆任何地方的控制都不过是徒有其名”<sup>②</sup>。

10月27日，英国内阁研究了这份草案，决定和英联邦国家及其他国家的政府磋商此事<sup>③</sup>。于是，外交部向其驻各国的外交使节发了一份电报，请他们把英国的承认意见转达给所驻国家的政府<sup>④</sup>。毫不奇怪，这个想法与外交部在8月16日提交给美国国务

<sup>①</sup> 根据作者于1961年12月11日同曼哈德的谈话。另据1985年9月29日斯托克斯对作者所言，他并不相信中国官员对曼哈德所讲的为中央人民政府开疆的话，他认为，美、英、法领事馆起初受到的待遇（由沈阳市长所给予的）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政策，而北京只是发出了改变这种政策的指示。另见斯托克斯《未来》一书第15—16页。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8F1302B。

<sup>③</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4FC1022/176。

<sup>④</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8F16390。

院的备忘录在观点上是一致的。现在，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告成立，英国当然要做出自己的决定。外交部拍发给各驻外使节的电报以及随后英国驻美大使馆在11月1日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反映出自8月份以来形势发展的情况。

简言之，11月1日的备忘录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除代表其统治集团外再也不代表任何东西”，“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能代替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共产党人“现在已是中国大多数人的统治者”。“据他们自己的声明，他们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偏爱苏联和苏联的路线”，虽然这种偏爱能持续多久仍需观察，“但对此视若罔闻是错误的”。苏联可能把它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的事实“加以充分利用”，“趁西方在中国尚未立足之机，谋求对中共政府的影响，使局势对其他大国不利”。中共需要同西方进行贸易，但是“如果不能够发展这种贸易，他们最终会说，他们可以勒紧裤带不要西方的经济援助”，而苏联是会鼓励这种观点的。联合王国不得不考虑自己在中国的贸易利益，这一利益“相当可观而且由来已久”。备忘录最后说：“承认共产党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现在的条件下”不会被看作是“违反了国际法准则与实践”；根据这些政治和法律的考虑，英国政府最终决定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sup>①</sup>。

国务卿助理巴特沃斯在仔细阅读了英国的备忘录后，向英国大使馆参赞休伯特·格雷夫斯提出三个问题<sup>②</sup>。巴特沃斯指出，“根据国际义务，在宣布承认之前，应得到中共当局的保证”，可是备忘录没有提到这一点。他问，这是否表示英国政府不期望得到回极。格雷夫斯回答说，英国政府认为，“在要求中共保证遵守国际义务方面所能得到的好处，远远不能抵销不承认所付出的代价。”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151—154页。

<sup>②</sup> 同上，第149—151页。

巴特沃斯又问道，“英国是否已经和中共当局预先商讨过……从而寻求到了某些共同的立场，使英国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上不致显得太‘突然’”。格雷夫斯回答说，英国驻华盛顿使馆不知道有这种探索性的商讨，但是他自己猜测也许有过。（外交部后来指示他通告美国国务院，英国没有进行过这种事先的商讨<sup>①</sup>。）

巴特沃斯问到的第三点是关于东南亚国家是否会赞成承认的问题。据美国方面得到的报告，他们是不会赞成这样快就给予承认的。巴特沃斯说，他猜测，英国代表在即将召开的新加坡会议（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武吉瑟林会议）上将调查这个问题。格雷夫斯回答说，他确信，会议将讨论这个问题，他将为巴特沃斯搜集这方面的消息。

但是当消息传来时，情况与巴特沃斯所预料的不尽相同。11月4日，英国驻东南亚最高特派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

新加坡会议赞同墮下的驻华大使馆和香港总督的观点，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

会议认为，从东南亚和远东总的形势来看，越早承认越好，至迟不应晚于今年年底<sup>②</sup>。

巴特沃斯获悉这样的结论后告诉格雷夫斯，由于考虑到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和在中国的投资，他理解英国对承认问题的看法，但他不同意英国对东南亚所持的观点。他和斯普劳斯指出，美国国务院认为，尽早承认中国会在东南亚造成普遍的不利影响，他们对新加坡会议的估价“实质上与国务院的估价大致相同。”<sup>③</sup>

当新加坡会议赞同尽早承认中国时，美国国务院对此感到意

---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8F16417。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9F19589。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184—187页。

外是可以理解的。在当年早些时候，麦克唐纳曾提醒英国外交部，在英联邦的婆罗洲、马来亚和新加坡（那里中国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政治上势力颇大的华侨是“尽可能拖延在外交上承认中共政府的因素”。麦克唐纳担心，中共领事代表一旦“置身于当地华人中间会很危险”，因为许多华人可能对中国领事代表施加的压力格外敏感<sup>①</sup>。但是在新加坡会议上，人们不再担心承认之后中国领事在这些华人中会干些什么，而是担心英国政府如果对中国新政府不予承认，将会招致这些华人的敌对性反应<sup>②</sup>。很奇怪，在东南亚的英国官方人物，对毗邻国家是否应当承认中共政府的问题未作出相同的结论。12月15日，麦克唐纳向英国外交部报告，在靠近马来亚边境的泰国南部的松赫拉（Songhla）市建立一个中共领事馆的可能性令他不安。中共领事馆在那里会支持边境双方的恐怖主义分子，“会对马来亚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麦克唐纳因此认为，“泰国政府应尽量拖延对中共政府的承认，此举尤为重要”<sup>③</sup>。

麦克唐纳不必担心泰国政府如何处理承认事宜。正如泰国总理在曼谷对英国大使所说，他的国家对承认的政策是等着瞧。自从泰国和国民党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时起，驻曼谷的国民党使馆就一直要求为数众多的华人心向中国。泰国人担心中共使馆也会这样做<sup>④</sup>。的确，泰国人的担心是颇有远见的。当时，中共正想取代国民党在泰国的位置。据史蒂芬·费茨杰拉德说，它的政策“在许多方面与国民党如出一辙”。中共完全可能竭力把海外华侨作为它的第五纵队<sup>⑤</sup>。在这种情况下，泰国等了28年才承认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4F13406，及见371/75821F17093、F17095。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26F18695。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27F18786。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28F19237，另见371/75826F18103。

⑤ 见斯蒂芬·费茨杰著《中国和海外华人：观念与政策》，载《中国季刊》1970年10—12月号第8页，另见埃德温·W·马丁著《东南亚与中国：遏制的终结》（博尔登，西方观察出版社1977年版）第46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

独立的泰国对承认的态度预示了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态度。英国官员在新加坡会议上的建议并未反映当地领导人的真实态度——如具参照他们其后的行动来看的话。例如，英国承认中共政府一年后，马来亚的中国商业协会（其中包括新加坡的商业协会）向英国政府拍发了一份电报，声称陛下政府承认北京中共政府的举动，对“正在与共匪作斗争的马来亚政府和人民是极大的打击”。电报“请求陛下政府把撤消对北京中共政府的承认视为适宜的举动”<sup>①</sup>。颇有意思的是，在独立之后，马来亚等待了近20年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后的马来亚同沙巴、沙撈越联合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1974年同我国建交——编者注），而新加坡则在更久地等待。

新加坡会议明确地认为，把承认中共政府和镇压在马来亚的中共“恐怖分子”的行动一致起来，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矛盾<sup>②</sup>。但是，会议也的确明显地担心这些基本的判断会是错误的。于是，会议建议“应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讲清承认不等于违背我们在东南亚的反共政策”<sup>③</sup>。

这一宣传运动所针对的目标之一，是英国陆军部，因为它担心承认一事会影响东南亚的安全。1月18日它曾提醒外交部，承认会“鼓舞恐怖分子的士气”，会对其“情报的搜集产生不利影响”。陆军部还有一个最大的忧虑是在马来亚出现中共的领事馆，它建议“应采取一切手段将此事拖延下去”。陆军部还担心承认会影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它警告说，法国对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扩张所呈现出的无能为力状况，“将对我们在东南亚的

<sup>①</sup> 美国驻吉隆坡总领事馆1951年1月17日致国务院急电，783.02/1-1751，RG 59，DSNA。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26F16696。

<sup>③</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9F16589。

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尽管陆军部认为，鉴于香港的地位，承认是必须的而且是有利的，但它仍敦促说，从军事战略上看，承认的时机应仔细推敲，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印度支那的影响<sup>①</sup>。

仅仅在几天前，英国外交部曾听法国人说过他们对印度支那的忧虑。在11月12日的备忘录中，法国外交部担心中共部队在越中边界大批集结会造成“全球性的后果”。法国人希望英国人照顾到法国与其相关国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特殊情况，避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这是不成熟的举动”<sup>②</sup>。

英国就承认一事所作的试探表明，其他国家的反应虽不象法国（和美国）的那样可以预料，但多数国家赞成推迟承认的意见。在英联邦国家中，印度对早日承认持肯定态度，但又不想让英国首当其冲，巴基斯坦和锡兰也大致同意英国的决定。但是英联邦其他国家则同英国的欧洲盟国一样，赞成推迟承认的日期<sup>③</sup>。英国在12月中旬做出的关于来年1月2日（后来推迟到1月6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只代表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甚至英联邦内少数国家的意见<sup>④</sup>。

英国做出决定的消息和做出决定的理由，在12月16日以类似绝密电报的形式传给了各英联邦国家的政府首脑。例如，给新西兰首相的电报宣称，“对抗俄国影响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共产党中国与西方接触，越早接触越好”。电报向英联邦各成员国首脑保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25F18073。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8°1/75823F17467。

③ 关于英联邦其他国家的观点，请看《英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200—201页；《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21F17052、F17163、F17204、371/75823F17462、F17471、371/75826F18322。关于布鲁塞尔条约国的观点，请看《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28F19217。

④ 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提供的数字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英联邦国家支持内阁决定。有28%的英联邦国家赞成承认北京，而反对的则占45%。见布赖恩·E·波特著《英国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崛起》（纽约：奥克斯福德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2页。

证，这一决定“根本不意味着英国减少在东南亚或其他地区抵抗共产主义的决心，联合王国实际上要运用自己所能动用的一切力量来“加强反共的抵抗力量”，并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如此。电报说，英国并不期望美国在承认问题上也照此办理，但也有理由相信，美国政府“能理解我们所处的地位，并且也能意识到，我们比美国有更多的岌岌可危的利益”。最后，电报强调，“在这一主要涉及到亚洲人的问题上”，“我们的亚洲朋友”的观点必须予以考虑<sup>①</sup>。

在同一天，贝文向艾奇逊传达了与上述向英联邦各成员国首脑的通报几乎一致的意见，只是又加了一段话。贝文说，他希望英美两国“能在这一问题上步调一致”，但如果美国觉得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他将“十分理解美国的立场”。他还说，“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们愿意与您保持密切联系，但我们必须慎重，不能失去对亚洲局势的控制，并且必须考虑我们的亚洲朋友的意见”<sup>②</sup>。

很难相信贝文在这种时候真是希望美国与英国步调一致。两国政府一直在进行官方联系，艾奇逊自从9月中旬在华盛顿举行内阁级会晤以来，至少两次向贝文转达了他的意见。在11月11日的巴黎外长会议上，他又重申了美国的意见，即：“没有必要匆忙”解决承认问题。他再次强调，在承认之前，中共必须首先满足某些条件——例如释放扣押在沈阳的美国领事官员，同意尊重国际条约义务，并保证美国在华资产的安全<sup>③</sup>。

12月8日，艾奇逊召见英国大使富兰克斯商讨承认问题。国务卿再次对匆忙承认表示反对，他清楚地表明，美国“将不理睬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27F13997，另参见D·C·瓦特《英国和远东冷战，1945—1958年》一文，载纳凯与伊里依合著的《亚洲冷战的起源》（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97页。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1849年第9卷第224—226页。

<sup>③</sup> 同上，第219—220页。

其他大国所采取的行动”，“不会匆忙行事”<sup>①</sup>。随之他提到了司徒雷登大使7个月前所表达的意见，即承认已成为讨价还价的手段。他对富兰克斯说：“除了苏联及其卫星国以外，中共确实需要其他大国的承认。据此，大国如果放弃向他们施加压力从而使之承认现存义务的机会是要后悔不迭的。”<sup>②</sup>

艾奇逊和贝文都过高估计了承认一事在影响中共政策方面的重要性。艾奇逊和美国国务院以为，北京急于得到西方的承认，以致不惜通过让步来达到目的。贝文和英国外交部则认为，承认北京新政权以后，英国就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动建立外交关系，就会削弱苏联势力的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估计都不正确。

但约翰·哈奇森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是正确的。他是一位第三代中国问题专家，后来在史蒂文森大使卸职后任英国驻南京临时代办。11月12日他向英国外交部发了一份电报，谈到中国报刊广泛出现的亲苏宣传。他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中共乐于通过其他大国的承认或者其他外国人的援助来对抗苏联的影响，这样的设想只是一厢情愿。”<sup>③</sup>尽管如此，哈奇森仍是英国承认政策的坚定分子。在以后的章节中将有不少篇幅涉及与他有关的事情。

很凑巧，就在英国宣布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的当天，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戏剧性地演出了中国一边倒的政策。自然，这一事态只是使抵销政策的倡导者更急于承认中国。令人奇怪的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所熟悉的中国人解释说，毛出访莫斯科是克里姆林宫使出的一个反抵销政策的计谋。毛早晚会访问莫斯科，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但是据这些人士说，这次访问的时

---

① 在重申美国反对匆忙承认北京的立场时，艾奇逊还对美国报界的流行的观点作出了反映，见塔克著《尘埃中的模式》第123—125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224—225、219—220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23F17484。



间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承认举动”有关系<sup>①</sup>。然而，有关的说法和其他消息来源都不足以证实这一猜测。这一猜测的逻辑推理似乎是，西方承认中央人民政府的举动实际上对英美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的共同目标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一猜测的要点是，毛此行不是出于中共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是迫于莫斯科的压力。但是这样的推论并没什么新颖之处，许多提供中国消息的人很早以来就一直这样解释中共历次强烈的亲苏举动了。没有证据说明毛出访莫斯科是被迫的；事实上，这与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几个月中的言行是完全一致的。

对毛出访莫斯科的时间的安排，使他可以参加约瑟夫·斯大林70周岁的生日庆典，克里姆林宫给了他特殊的优待。在庆贺斯大林生日的仪式上，毛紧靠斯大林右侧站着，并被安排第一个发言<sup>②</sup>。他利用这一机会强调，“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到斯大林同志所给予的友谊的重要性”，他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伟大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sup>③</sup>苏联报刊披露，在十月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着斯大林收到的礼物，其中有一张很大的毛的照片，照片上用中文写着：“致我们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sup>④</sup>。苏联报刊展示这个照片，是想让全世界确切地知道，毛已承认斯大林的领导地位。

毛在这时出现在莫斯科，是美英在离间中共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这一共同目标上付出的努力归于失败的象征<sup>⑤</sup>。事实上，毛出访莫斯科表明，美英的离间目标远非他们的力量所能及。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640页。

② 见《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313FC10338/3, 371/75835F16234。

③ 新华社：《译巨新闻稿（发布）》，期号235，1949年12月29日，第171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75835F18153。

⑤ 如同J·K·卡利肯所说，“1949——1960年冬天，毛泽东率领中共高级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商谈中苏条约之日，……正是国际秩序中的两级靠近之时”。J·K·卡利肯：《中美危机的模式》（纽约：坎布里奇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16页。

## 16 美国考虑对台湾的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政府迅速崩溃。蒋介石委员长早在8月1日就把总部正式迁到了台北。临时首都于10月中旬从广州移至重庆后，他与李宗仁总统的分歧也日见加剧。美国不愿出钱不讨好，索性对国民党政府要求军事援助的呼吁充耳不闻<sup>①</sup>。罗伯特·斯特朗是随国民党政府一起到重庆的，他于11月15日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的部分内容反映了这种悲观看法：

高级官员早先关于在西南建立政治和军事团结并从事改革的希望已化为泡影。

.....

在军事战场上依旧是退却、叛变，杂乱无章的指挥，漏洞百出的漫长防线，军队的薪水、食品和衣物不足，资金物资匮乏，相互缺少信任。政治上仍然是蒋委员长与李派集团的严重分裂，毫无和好的希望。

.....

美国的军事援助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被视为拯救政府残余和收复部分失地的唯一出路<sup>②</sup>。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不久便迫于共产党军队的压力第三次迁都。英国总领事M·C·吉勃特在政府迁都时是这样描述政府的战略的：“国民党已毫无战斗力可言，他们的信条是：‘不要打了，打也无关大局了，只要保住一个政府，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可能很快），美国将不得不为我们而战。他们将满足我们的要求，正如上次大战中他们所做的一样’。”<sup>③</sup>这位被国民

<sup>①</sup> 列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590—593页，及第8卷第604—605页。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583—584页，尽管斯特朗并非中国问题专家，但当年34岁的他却已经在中国呆了两年多。他起初在青岛担任领事职务，后来又任美国驻广州使团的办公室第一秘书。

<sup>③</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246FC1019/16。

党的外交部“授予和国民党政府保持接触之特权”的吉勒特<sup>①</sup>，接着描述说解放军于11月28日到达长江南岸，翌日开始在无抵抗的情况下渡江，国民党在重庆的最后两个团已逃往成都——他们的新首都。

可是，重新聚集在成都的国民党政府残余，未及喘息又被逐出了他们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12月6日，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这次迁都实际上宣告了李宗仁总统的政府和其军事幕僚白崇禧的末日。尽管蒋介石3个月后才正式重登总统职位，但迁都台北恢复了他对政府的绝对权威，李宗仁奈何不得，只好赴美就医。

国民党政府失掉了中国大陆，这使美国政府又一次面临是否有必要与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抑或象英国那样把它降为领事级别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曾在7月通知司徒雷登大使，只要国民党继续呆在大陆并且是中国唯一的政府，美国愿与它保持外交关系<sup>②</sup>。现在这两个可能都不复存在了。临时代办斯特朗在11月15日的电报中提出：“尽管在大陆应使大使馆继续存在并保持接触，但另一个政府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国务院需要就与海岛政府的关系问题做出新的决定。”<sup>③</sup>

斯特朗没有随政府残余去成都，在此之前的几天，他离开重庆去了香港<sup>④</sup>。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已先期抵达。在那里，斯特朗和叶决定安排李宗仁总统去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sup>⑤</sup>。恰值李宗仁启程赴美的时候行政院(国民党政府的行政机构)从成都迁往台北。

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重整旗鼓”，使美国方面欲把这个政府和台湾区别对待的政策变得不切实际了。台湾在政治、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17F15732。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1849年第3卷第696页。

③ 同上，第583—584页。

④ 同上，见第718页。

⑤ 同上，见第603—604、606—611、619—620页。

经济和外交方面是不能与共产党相抗衡的，除非它与各大国的关系不被割断。因此，美国在12月中旬决定在外交上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关系。斯特勋接到指示：如果美国政府接到“中国政府迁都台北的正式通告”，并且其外交部长叶公超不再以部长身份滞留香港<sup>①</sup>，那么，他就去台北。上述两项条件具备后，特朗便出发去了台北。12月26日，他在那里首次拜会了叶，发现“叶情绪很好，信心十足。”<sup>②</sup>

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台政策再次引起英国的注意。英国外交部对美国把军事装备源源运往台湾表示忧虑。11月上旬贝文与艾奇逊在巴黎会晤时，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随后，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匆忙于12月6日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说到大量坦克和B-25轰炸机正从美国海运到台湾。英国人认为，这些装备无助于阻止共产党夺取台湾。他们担心，如果台湾陷落，共产党会把这批装备派上其他用场<sup>③</sup>。

弗兰克斯大使在12月8日与艾奇逊讨论这一问题时，流露出对中型和重型坦克的严重关注。如果这些武器落到共产党手里，它们就会被用于进攻香港。艾奇逊指出：运往台湾的剩余装备的价值不足800万美元，而1948年“援华法案”的总额为1.25亿美元；鉴于台湾已拥有“大量物资”，贸然取消这批装备的供应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然而由于弗兰克斯已经强调香港没有对付中型和重型坦克的武器，艾奇逊只好同意调查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出口许可证没有签发的话，或许可以想些办法<sup>④</sup>。

弗兰克斯还问艾奇逊，自9月中旬贝文——艾奇逊华盛顿会晤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否有变化，艾奇逊回答说：杜鲁门总统“已经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台湾在战略地位上不十分重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19页。

② 同上，第721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437—438页。

④ 同上，第442页。

要，美国不想动用军事力量阻止它陷入共产党手中，但我们会利用一切可行的政治和经济手段避免这样的结局”；因此美国最近告诫蒋介石委员长，“由于岛上拥有成功的全部条件，所以他应加强这一阵地”<sup>①</sup>。

尽管美国国务院已向蒋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在对于蒋防止共产党进攻的能力的估计上，它并不比英国外交部更有信心。12月23日，国务院颁发了一份秘件，题为“政策情报纲领——台湾”。鉴于中共力量可能占领台湾，该文件建议制定“情报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美国威望的损害和对别国士气的影响”。该文件声称，台湾的失落“已在普遍意料之中”，“那里的军民状况在国民党统治下已经恶化，因此，出现这种结果是合乎情理的”<sup>②</sup>。

国务院发布关于台湾情报政策纲领文件的同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称，“为反共的台湾政府制定一项适当的目标明确的以及有严密监督的军援计划，将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基于这一论点，参谋长联席会议想“立即着手调查台湾所需军援的性质和程度，以便保住台湾”<sup>③</sup>。

12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艾奇逊、代理副国务卿腊斯克、巴特沃思以及麦钱特一起商讨了这个备忘录——当时这份文件已转送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为备忘录辩解说，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已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我们预想的要久，这样，我们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443页。

<sup>②</sup> 该文件转载于邱宏德（译音）著《中国和台湾问题》一书（纽约：普雷格1978年版）的第215—218页。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460页。1950年1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关于这份文件的一则新闻，从而在亲国民党集团中引起巨大反响。英国大使从美国国务院中国处的富尔顿·弗里曼那里得知，消息是在东京泄露的，然而，弗里曼认为这则消息的公开可能会增加公众对国务院立场的支持。见《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01C1022/53。

<sup>③</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460—461页。

即可对中共加强其自身政权的努力施加影响”；只要共产党仍须与台湾竞争或者征服台湾，他们就不会向东南亚扩张<sup>①</sup>。

艾奇逊反驳说，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东南亚国家的方法是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建立内部安定局面，帮助它们生产更多的食品，那怕只是有限地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第四点计划”的基本精神。艾奇逊接着说，“总之，我们必须使自己站到民族主义运动一边，由于欧洲殖民主义的魔爪已被斩断，这一任务已不难完成”。艾奇逊反问道，假如采纳备忘录的建议，使台湾晚一年失落，那么，为了这一推延，我们将付出什么代价呢？很简单，这就是美国威望的再一次衰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会激起“中国人仇视外国人的情绪”。如果美国因此而获得一个对其防务至关重要的岛屿，这个代价也值得。但是艾奇逊认为，“似乎无以证明，失掉台湾会使我们的防务网开一面”。<sup>②</sup>

在会议临结束时，布莱德雷“强调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纯军事观点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国会已拨款支持那些抵抗共产主义的人们”<sup>③</sup>。布莱德雷指的是国会7400万美元的拨款。提供这笔款项的根据，是1949年《共同防御援助法》的第303条，它规定，在“泛指的中国地区”（指中国及其周围国家——译者注）可使用这笔款项。第303条给了总统很大权限来应付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迅速变化的形势，而且不必说明资金的使用情况。尽管国务院反对将这笔款项用于对国民党政府的直接军事援助，但它愿意考虑在中国大陆支持反共的秘密活动，并且建议用这些钱来加强针对中国的反共宣传活动<sup>④</sup>。

艾奇逊和国务院反对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的主张在国家安

①②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2卷第463—467页。

④ 见国务院备忘录，10月21日及24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568—576页。另见罗伯特·M·布伦纳著《划线：美国在东亚政策的缘起》（以下简称《划线》）（纽约：W·W·诺顿1982年版）第8章〈关于此项资金是否依法应用的情况说明〉。

全委员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12月30日，该委员会再次肯定了保证台湾不被占领的多种手段，但军事援助除外<sup>①</sup>。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重要讲话。他宣布，美国政府“既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咨询意见，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那里的局势”<sup>②</sup>。虽然该声明并不意味着美国政策的任何变化，但是杜鲁门把美国的意图如此开诚布公地说道出来，就等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了一个信号：从军事上看，如果大陆进攻台湾，不必担心美国的动向。一周后，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重申了这一主张，即台湾和朝鲜不在美国的防线之内<sup>③</sup>。

在1949年12月30日至1950年1月5日之间，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后和杜鲁门的重要讲话发表之前，代理副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对英国使馆的德卫克·豪伊·米勒保证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变化，而且，美国现在将不允许轰炸机和重型坦克之类的东西运往台湾；但是，国民党可以用他们剩余的资金购买其他物资，豪伊·米勒重申，英国担心，台湾的军事装备可能会落到共产党手中，然后它们将被用来进攻香港<sup>④</sup>。

有必要指出，杜鲁门和艾奇逊关于美国将不对台湾提供军援和保护的公开声明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估计到共产党可能于3月份进攻台湾，至迟也不会超过当年夏天。由于预计共产党会很快进攻台湾，故在台湾减少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美国领事官员。留守人员的家属也都撤离了<sup>⑤</sup>。在共产党的宣传中，马上“解放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7卷第1215页。

②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1月16日，第79页。

③ 关于这篇讲话的原文，请看《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1月23日第111—113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256—257页；关于英国的看法，请看《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79FC1022/30。

⑤ 本书作者也是离台人员之一（转到仰光任职），虽然在台湾才呆了四个月。据回忆，当时人们都在议论人民解放军会在何时、何地进攻台湾；没有谁怀疑这种进攻的可能性。

台湾”的消息接踵而至。早在9月份,《人民日报》就指责美国有肢解台湾的可疑计划,它警告说,“胜利进军广东和福建省的人民解放军正沿着福建海岸消灭残敌。不久,人民解放军将渡海打到台湾,解放那里的同胞。”<sup>①</sup>当时有报告说,台湾对面的大陆沿海地区有部队调动,附近港口集结了大批帆船和小船。1月20日,驻广州的英国领事报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军透露,他的部队将在3月份参加进攻台湾的行动。为此,有关方面正在准备飞机和船只。柏吉斯在评论该报告时说,美国估计,“1950年内”台湾将遭到进攻。同时他还说,最近的新华社广播已经表明,进攻台湾是中国武装力量的首要任务之一<sup>②</sup>。

## 17 英国承认人民共和国

在杜鲁门总统宣布其不干预台湾事务的政策后的第2天,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驻华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的说法,这一巧合“使承认宣言得以免遭攻击”。大使馆发现,美国新闻界对英国的承认宣言“令人吃惊地持赞同态度”,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国务院做了极其出色的教育工作”<sup>③</sup>。在杜鲁门声明发表之前,富兰克斯大使曾有点担心美国公众对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应,尽管他不怎么担心杜鲁门政府的反应。在1月3日发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绝密电报中,他曾报告说,华盛顿的气氛“比一个月前更加不利,我们承认共产党中国后可能马上陷入麻烦的境地”。富兰克斯还评论说,美国“两党对远东的看法从未一致过,国会内的一些共和党领袖很难放弃以牺牲政府

① 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期号128,1949年9月6日,第21页。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43FC1019/16。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2FC1022/108,及371/83280FC1022/87。



(指台湾国民党政府——编者注)来捞取资本的机会”<sup>①</sup>。然而，奥利弗爵士认为，杜鲁门和艾奇逊将严守他们现在的立场。他将此立场归纳如下：

(a) 尽管他们(指美国人——编者注)对我们承认共产党的决定表示遗憾，但他们不会指责我们。

(b) 他们反对对台湾进行军事干涉及派遣军队……但是，总统出于政治原因或许不得不屈服于国会的压力，采取旨在保护台湾的措施，或者以某种方式使台湾免遭共产党的征服<sup>②</sup>。

从美国的另一方面得到的反应，对英国人来说或许是出乎意料地令人满意。11月13日，驻东京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英国代表艾尔佛里·加斯可因爵士报告了他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谈话。

在谈到我们承认北京政府一事时，麦克阿瑟将军今天向我保证说，他认为在日本不会出现重大反应。他说他完全理解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赤色分子的原因，这完全是出于我们的经济利益……他说：我们(此处指美国——编者注)尚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但是，我们要促进那些在更长时期内必然要发生的事件……美国显然不得不承认北京，但是要使美国人民明白，承认一个政府并不等于赞成它。虽然他希望我们应从承认中捞取实际的好处，但他觉得我们从一片废墟中不会捞到什么<sup>③</sup>。

英国外交部有意给英国驻南京的临时代办发去了不加密的电报指示，以便给中国政府24小时的时间为英国政府对它的正式承认做准备，所以，当总领事格雷厄姆于1月6日下午会见中华人

<sup>①</sup> 甚至作为保持“两党一致”对外政策的支柱的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也是如此。他曾于1月3日写信给国务卿(当时离英国声明发表还有3天)说：“我真的希望我们在联合国的主要伙伴能够被说服，使它至少在我们之间或许达成一致意见之前不承认中共政府。”793.02/1—350, RG59, DSNA.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79FC1022/26.

<sup>③</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2FC1022/155. 麦克阿瑟对杜鲁门关于台湾的宣言的满意程度甚至不及他对美国承认北京一事的满意程度。加斯可因报告说，麦克阿瑟重申了他以前多次主张的立场，即“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是至关重要的”。他告诉加斯可因说，他的建议已经获华盛顿政府接受，杜鲁门的宣言“对地和杰瑟普大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见《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7FC1024/18.

民共和国外交部官员总务司司长王炳南和西欧与非洲司司长室乡并正式提交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时，中国人并不感到突然<sup>①</sup>。在前一天，中国国民党驻伦敦大使被召到英国外交部，他被告之：英国不再承认他所代表的政府为中国政府。

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中，围绕承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似乎承认就等于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毛在1949年10月1日的声明和周写给外国政府的信只提到建立外交关系一事。作为第一个响应毛声明的国家，苏联也省略了承认手续，建交前只是表示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东欧的共产党政府也照此办理。

所有这一切可能鼓励了这样的想法，即承认和建交是同样的事，至少外交关系会随承认自然而然地建立。但是，当缅甸政府于1949年12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愿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中国政府却要求缅甸政府派代表团到北京“举行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显然，建交的程序对非共产党国家和共产党国家是不一样的<sup>②</sup>。

北京对缅甸政府的这种态度对英国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外交部在联合王国发表承认宣言之前就看到了。12月30日，外交部远东司的A. A. E. 富兰克林断言，北京对缅甸的态度“使人感到非常不愉快”，它可能证明，共产党企图使承认带上“附加条件”。富兰克林猜测，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共产党可能“会在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把所有关键问题都和我们论说清楚”。他认为，这种局面会使英国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并估计“这种谈判会旷日持久”。然而英国驻南京临时代办哈奇森的看法与富兰克林不同。哈奇森倾向于认为，这种谈判可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如“建交的级别、特使名称、会见时间、使馆驻地等等”。他说，中国对缅甸承认中国一事的上述反应导致了缅甸的怨恨和

<sup>①</sup> 见《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0FC1022/46。

<sup>②</sup> 见《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627F18000，及371/70621/18434。

不安<sup>①</sup>。缅甸报纸上的一篇社论就反映了这种情绪，该社论称北京的回答是故意“奚落”缅甸所表现出来的诚挚友谊之情<sup>②</sup>。

中国政府与缅甸和印度（它们均于12月30日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时所确立的方式，此时又套用在同英国的交往上<sup>③</sup>。当英国政府于1月6日通过贝文给周恩来的照会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时，还要求中国政府接受哈奇森为英国临时代办。1月9日，周答复说，中国政府接受“贝文任命的临时代办J·C·哈奇森先生来北京就有关建交问题进行谈判”<sup>④</sup>。哈奇森说，中国政府并没有明确接受他作为临时代办。他建议询问中国政府，他们“是否会以这个名义接受他，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外交关系已经建立”<sup>⑤</sup>。

1月13日，英国外交部指示驻北京的格雷厄姆总领事向中国外交部说明，英国认为，刚刚在中国和英国政府之间交换的照会表示了外交关系的建立，并且要求北京接受这一观点<sup>⑥</sup>。如果不予接受，格雷厄姆应声明，哈奇森只能以临时代办的名义去北京<sup>⑦</sup>。当格雷厄姆来到中国外交部陈述英国关于外交关系业已建立的观点时，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不置可否<sup>⑧</sup>。随后，中国外交部通知格雷厄姆，哈奇森可以以代办名义来北京讨论有关建立外交关系的预备性和程序性问题<sup>⑨</sup>。尽管中国对关键问题——外交关系是否已经建立——没作出任何解释，英国外交部仍决定派哈奇

---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229F19434。在到远东司任职之前，富兰克林曾在天津担任过两年的领事职务（包括共产党占领天津之后的八个月时间），所以，他的同事都没有他那样的经验。他还曾担任过其他四个与中国有关的职务。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230F19473。

③ 关于印度，见《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0FC1022/44。

④ 同上，FC1022/57。

⑤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0FC1022/58。

⑥ 印度持同一观点，见《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2FC1022/102。

⑦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5FC1022/68。

⑧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5FC1022/215。

⑨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0FC1022/89。

森前往北京。①

对于英国给予的承认，中国的反应令人沮丧，而且不仅仅表现在北京执意要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上。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斯科特·L·伯德特1月14日在写给英国外交部的一封信中说，承认“并没在哪方面改变现状”；任何层次的接触仍被拒绝，信件不是毫无道理地退回就是被搁置一旁②。1月30日英国总领事从广州报告说，尽管承认一事“必将带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局面的期望”，但是情况却没发生任何变化③。几周后我们仍“受到严格的限制，毫无松动”，邮局依旧扣押写给领事的信函④。

驻上海总领事在2月4日的电报中说，英国人在上海以外的活动依然受到限制，中国方面认为在战时限制是正常的。然而，一位警察局官员曾对英国一位想通过广州去香港的商人说，一旦“承认生效”，就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在关于该电报的外交纪录中，富兰克林评论说：“活动受到限制是因为没有承认和没有建交，而不是因为战争。”⑤

英国外交部从中国的报刊上也无以自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不领英国对其承认的情，其报刊反说英国之所以如此是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海《大公报》曾（恰当地）指出，英国工商界早就敦促承认中国。现在该报却宣称，英国希望与中国建交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多少有些嘲讽意味的是，针对英国外交部关于承认将给中国政府的亲苏政策提供另外一个选择的观点，《大公报》吹嘘说，人民共和国在中央政府成立仅3个月的时间里就赢得了一场彻底的外交胜利，这是“执行毛主席一边倒政策”的胜利。《大公报》同时宣称，英国的承认扩大了英国同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3FC1922/175。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5FC1022/224。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46FC1919/81。

④ 同上，FC1919/82。

⑤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69FC1582/10。

美国的分歧，并且将英国人民的友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截然区分开来<sup>①</sup>。

2月3日，南京《新民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认清英帝国主义”的文章。文章追溯了英国19世纪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和20世纪上海、杭州的反英起义。文章警告说，英国承认中国是不得已的，中国人民不应期望英国改变作法；帝国主义分子是一贯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敌的<sup>②</sup>。

而在英国人方面，当哈奇森准备就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事开始“预备性和程序性”会谈时，英国驻台湾领事E·T·彼格斯正在谋求使英国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省级关系。这样，英国人即以其明确的一贯性原则，继续奉行他们以前在中国大陆所奉行的政策，他们要在执政者不为他们所承认的领土上保留一个领事馆。与共产党不同，国民党根据国际惯例接受了英国的立场。

当彼格斯会见台湾省长吴国楨并且通知他英国已承认共产党政权时，吴期望能与英国继续保持贸易关系和相互交往的渠道，并且保证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彼格斯及其下属和英国侨民的安全<sup>③</sup>。但是，虽然有吴的保证，一群士兵仍冲进英国领事区，扯下了领事馆的旗帜。显然，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sup>④</sup>。1月12日，当彼格斯照会吴省长就此事提出抗议时，吴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他保证说，冲入领事馆区的士兵将被撤离，今后绝不会发生类似事件。他同意彼格斯重新升起领事馆馆旗。吴还告诉彼格斯，国民党政府已批准英国领事馆继续行使其充分的职能，其中包括使用密码、外交文件袋及海关设施等。英国领事官员自然只能和省级官员打交道，不与国民党外交部及中央各部发生关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6FC1022/255。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27FC1051/3。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7FC1024/1。

④ 同上，FC1024/3，FC1024/5。

系<sup>①</sup>。

既要同已不予承认的国民党政府打交道，又不想影响与中共的关系，这显然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使得英国政府进退维谷。因此，当国民党空军飞机于2月5日轰炸香港的邻近城镇深圳时，英国外交部决定不向任何人提出抗议，只要求香港总督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内容是任何未经许可的飞机飞越香港领空，都有被击落的可能。彼格斯领事在淡水受命将声明全文送交台湾省省长，并要求他转交有关当局和国民党空军总司令。3月10日，声明在香港如期发表，同一天也送到了台湾省省长手中<sup>②</sup>。

可是在声明送出的几天前，外交大臣贝文给驻上海的英国总领事发去了一份内容似乎矛盾的电报。当时，这位英国总领事正为国民党轰炸一事忧心忡忡。贝文说，他不认为通过台湾省级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抗议会产生“实际效果”。贝文推测：“即使在撤销承认之前（指英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编者注），抗议也无济于事。如果我们大张张扬，他们（指国民党当局——编者注）必然会拒绝，正象我们所设想的那样，这可能会使哈奇森先生在即将举行的与中共政府的谈判中处境不妙，中共会说，这一行动提供了我们与国民党政府保持接触的证据”<sup>③</sup>。

## 18 扣押美国领事馆财产

在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天，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一个行动，这一行动使美国尽早承认中共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该委员会宣布，七日之内，某些外国在“不平等条约”下获得的建有兵营的土地将被征收<sup>④</sup>。当天夜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7FC1024/3。

② 同上，FC1024/24。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44FC1019/28。

④ 关于这项声明的原文，请看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期号261，1950年1月16日，第77页。

里，在美、英、法、荷领事馆的墙上都贴上了登载这个声明的大字布告。次日晨，英国领事馆墙上的布告被揭下来，但另外三个国家的财产却被正式征用。由于这个原因，美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走了全部官方人员<sup>①</sup>。

从表面上看，中国方面只是征收了美国（及法国、荷兰）政府驻北京领事馆的财产，但这一举动还包含着更严重的问题，即是否尊重以前的政府所达成的协议以及是否尊重西方多年来形成的一般国际惯例。征收行动表明，中共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就后一点来说，合乎情理的传统是：不论当事国之间在国家一级关系上是否正常，它们各自在对方国家的领事馆都可以在地方级别上照旧行使其职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共当局不承认这一传统，他们固执地将外国领事和外交官视为普通外国公民，这不仅制造了与西方大国的磨擦，并且阻塞了与西方驻中国代表的联系，以致当问题出现时，不可能进行正常谈判。

在奉行无视外国领事官员权利的政策的同时，共产党当局还拒绝将领事馆财产视为外国政府的财产。甚至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政策的端倪就已显现出来。当时，地方的共产党权力机关试图对外国政府在天津和北平的领事馆的财产征收税款，似乎这些都是私人财产。

美国的立场是，根据国际法，一个主权国家的财产不应被另一个国家课税，无论它们之间是否相互承让。因此，由主权国家的政府所有并为其所用的财产是无须缴税的。由于美国国务院承认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外交财产而非领事馆财产，所以它表示：“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或许有必要按要求纳税；但是应提出抗议，而且“缴纳这种税还须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明确同意”<sup>②</sup>。

---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3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1104页。

9月14日，美国驻天津总领事馆交付了美国政府在当地所有的领事房产的税款，此举发生在中共地方当局拒绝美国的免税要求和英法领事已缴付了这类税款之后。在报告这一事件时，总领事提醒国务院，正如“八个月来所表明的那样”，“共产党当局一直坚持这一立场：只要没建交就不会承认领事馆的职权，领事官员和财产也不能享受官方待遇”<sup>①</sup>。

在处理外国政府的财产方面发生的问题，也表现在地方当局颁布的外国财产登记法上。在天津，当地方土地局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领事馆对它们提交的登记申请表做出某些修改时，出现了一种荒唐可笑的局面。下面是英国外交部的有关记录：

6. 11月14日……四国总领事提交了政府财产登记申请。土地局通知总领事们，申请表在获准之前须做如下修正：

- (a) 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外交部”之前要加上“前”一词。
- (b) 在“所有权契约”前加上“伪造的”一词。
- (c) 在陛下总领事的签字后面加上签字人私人的中国字印章。
- (d) 提出一份证明，表明陛下总领事授权处理这一问题。

7. 对美国 and 意大利总领事也是这样要求的。法国的申请表在经过略微修改后获得批准，表中“伪造的”一词可能是在法国总领事不知道的情况下加上的，据说被中国雇员在三份申请表中的两份上加了这个词，对第三份申请表（一份帝国地契）没作此种要求。

……

9. 到11月29日，英、美、意总领事们表示，对第6条中的四点不必再从(a)至(d)地予以坚持，他们准备接受(c)，可是土地局拒不接受把原来国民党的土地管理机构视为“前”土地局的做法，它坚持要加上一个“伪”字。

10. 英国驻南京使馆指示总领事不能接受“伪”字，因为这将被解释成前国民党土地局签署的所有契约全部作废，包括英国人在天津所拥有的财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3卷第1110页。



产①。

驻天津的英国总领事非常恼火，他认为土地局执意要加“伪”字是一种专横霸道的典型表现，地方下属机关竟被允许用这种态度来处理一般涉及外国人特别是领事馆事务的问题②。既然如此，1950年1月6日发布的征收在北京的某些外国领事馆财产的声明，当然就不是出自地方当局之手了。在这个声明发布的第二天，美国总领事收到北京市军管会聂荣臻将军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征收领事馆财产的声明，同时要求柯乐博派一位有权的代表移交正义路22号的“前美国军营”。

柯乐博收到信后，给国务院去电请求指示。1月9日，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柯乐博致函周恩来，告诉他正义路22号的财产是美国根据1901年9月7日由中国和其他11国在北京共同签署的条约所拥有的，1943年的中美条约重申了这一权利——在这一条约中，美国放弃了治外法权③。柯乐博还告诉周恩来，所谓的“兵营”早已改造成了美国总领事的办公楼。柯乐博在致周的信的结尾处申明，美国政府希望不要采取“剥夺美国政府权利的举动”④。

第二天，柯乐博又给周写了一封信，1月13日，一封给聂荣臻将军的信也跟着发出。他在给聂的信中强调，军管会要征收的房产是美国政府用来办理官方事务的，“是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的财产”。他还声明，他既无权力也没得到指示要移交这一财产，如果被征收，“中央人民政府应负全部责任”⑤。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向周恩来或者它可能接触到的其他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转达一个口信——美国政府认为，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479FC1463/26。

② 见给英国大使馆的电报，南京，1950年1月30日——同上，FC1463/1。

③ 关于美国对这一法权的立场，请看《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121页。

④⑤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1月23日，第119—123页。

英国刚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理应比美国更容易接近中国官员——口信的内容是，美国政府不反对将美国领事区以西不包括美国政府所拥有的楼房的缓冲区的财产移交有关当局；但是，如果中共当局征收领事区的任何一部分财产，美国政府将视此举为侵犯美国的权利，那么美国将别无选择，只好关闭所有驻中国的官方机构并撤回其官方代表<sup>①</sup>。

尽管英国外交部有某些疑虑，贝文仍于1月12日电告英国驻南京使馆，指示沃尔特·格雷厄姆总领事（他已从沈阳调往北京）要“尽其所能”“在1月13日前后尽快”向周将军转达美国的口信。贝文认为，对关系到美、法、荷政府的麻烦，英国政府不应脱身不管，“尤其因为此举是共产党蔑视中国条约义务的第一个公开企图。”（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意识到乌鲁木齐市政府已于12月29日收回了美国驻该市的领事馆。）他认为，“根据他们对西方大国的一般态度”，似乎“他们会进而企图征收其余的大使馆房产”<sup>②</sup>。

但是，贝文又不愿过多地和美国的口信以及口信中“强硬的语气”绞在一起。他强调说，格雷厄姆总领事“应表明，在此事中，他仅仅是传话而已，并且要以他认为是恰当的方式让对方确信，虽然我们也怀有相同的忧虑，但我们绝对没有参与口信的起草。在传递美国的口信后，格雷厄姆应说：我对事态的发展感到迷惑和不安，我相信，地方当局绝无蔑视各国在使馆财产的控制上享有的条约权利的意图。”<sup>③</sup>

贝文给格雷厄姆的指示必须经过英国驻南京大使馆转达，可是到格雷厄姆接到指示的时候，征收领事馆财产的工作已经开

<sup>①</sup>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1月23日，第119—123页。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270—272页。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79FC1463/12，关于乌鲁木齐的问题，请看371/83480FC1463/30。

<sup>③</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79FC1463/12。

始。格雷厄姆在1月14日报告说，征收工作于当日上午10时开始，他在外交部拜会宦乡是在下午3时。不过柯乐博已在1月12日将美国政府的口信转达给了中国外交部。因此，中国当局在征收前就已获悉美国同意移交其他财产的态度，也知道美国要以撤回其官方人员的做法来要挟<sup>①</sup>。

尽管柯乐博已先于格雷厄姆转达了口信，可是格雷厄姆仍将美国的意见转达给了中方。在转达时宦乡对他说，兵营的存在是不平等条约的耻辱标志，中国人民理应将它收回。格雷厄姆与宦乡会见后确信，中方的意图是“也要收回我们的财产”<sup>②</sup>。

当然，不平等条约早已废除，兵营也早已改造成了办公楼，但对共产党收回这些财产仍然具有宣传意义。比如1月19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说：“1943年，美、英、法和其他国家宣布废除在中国的特权，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主义统治下，侵犯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兵营仍完好无损。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真正完成了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特权的任务。”<sup>③</sup>

格雷厄姆总领事给英国外交部拍了一份电报，评论了中国对美、法、荷驻北京的领事财产采取措施的时间和背景，他说，当时北京流行的说法是，收回举动，“纯属军方设计的方案，对此外交部没有过问，甚至可能不同意；事实上，朱德（解放军总司令）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向周恩来施加了压力……并且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而使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毫无可能”。格雷厄姆的电文继续说：“与此观点相反的证据是，同恩来外长随后承认了印度支那的胡志明政权，这一举动恐怕同剥夺美国财产一样，也使法国很难承认人民政府。外交部与军管会的协调行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275、276—277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479FC1463/18。

③ 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期号261，1950年1月18日，第77—78页。

动排除了军方与文官政府有严重分歧的可能性”<sup>①</sup>。格雷厄姆认为，对发布征收命令的时间的选择“很难说是偶然的”。近一个月以来，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愈益明显，在这个时机征收领事馆财产是别有用心的。他最后说，中国当局先是在1月6日晚将征收通告贴在英国领事馆墙上，几小时后又将通告取下，这一举动可能是为了“要强调承认的国家与不承认的国家之间的区别”<sup>②</sup>。

格雷厄姆还对中国当局是否对征收在北京的美国领事馆财产的后果有所预见的问题作出了推测。他认为，不能说他们预见到了这一点，但无论怎么说，在损坏中美关系和在中国清除美国领事馆的财产是否适当的问题上，人民政府内部意见是不一致的。他最后说，许多人对事态的发展感到心满意足，但还有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人的意见不能左右局势，他们对与美国一刀两断和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普遍恶化感到忧心忡忡。”<sup>③</sup>

格雷厄姆在作出这一评论时大概尚不知道，三天前英国驻华华盛顿使馆已向英国外交部去电报告，“中国人征收驻北京领事馆财产已激起公愤，此间舆论已赞成从中国撤回全部美国官方代表”。该大使馆还指出，“事件的突变已遏止了有利于承认的发展势头，在此之前，艾奇逊先生于1月12日在新闻俱乐部做了演讲，其后这一趋势已很明显。”<sup>④</sup>

杜鲁门总统根据国务卿艾奇逊的建议宣布，如果中共当局征收在北京的美国领事馆财产，美国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出其所有官方人员。1月24日，艾奇逊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他曾向总统提供过一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美国将就“征收”举动提出抗议，并将领事人员撤退到领事馆所剩下的地

<sup>①</sup> 关于中国对胡志明政权的承认，请见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期号261，1950年1月19日。

<sup>②③</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80FC1463/41。

<sup>④</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2FC1022/115。

方，“以军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他现在反对照这一行动方案行事，因为这很可能是“一连串屈辱的开端”，这样一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财产被征收，美国官员的行动会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渐渐地我们会屈尊降位，最后在中国被囚禁起来”<sup>①</sup>。然而艾奇逊的证词澄清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务院不仅是拿美国在北京的领事财产被征收作为撤出中国的藉口，它还希望中共当局改变主意。艾奇逊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

我们以前认为，他们也可能停下来观察一下，总统也决定……我们该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拿走这些财产，我们就从中国所有地区撤走，这些信息都已转达给了他们，他们非但不停止，反而变本加厉。

从1月6日到我们最后提出建议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对此严格保密，因为我们不愿减少中共可能回心转意的机会。我们认为，此事一旦公诸于众，所有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sup>②</sup>。

当征收美国财产的行动开始后，国务院立即按其警告所说，将所有在共产党中国的美国官员召回回国。1月1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剩下的四个领事馆接到电报指令，“在安排好撤走所有撤离人员的交通并在当地的英国代表承担起美国利益代理人的义务后尽快走掉。”<sup>③</sup>命令发出后，过了四个月才完成这些撤离前的工作，随即撤走了最后一个美国官方人员。

正如我们所知，英国人早就同意在中国维护美国的利益，并且已经开始在美国关闭其领事馆的所有地区照管其利益。1月19日，英国外交部正式接受美国国务院的请求：当美国在北京、南京、上海和天津的领事馆关闭后，英国政府照旧负责美国在这些城市的利益。但是英国要求，“美国在以上四个地区的代表在把钥匙交给英国同事之前，可以奉命将电台设备拆卸”<sup>④</sup>。

①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行政听证会》，第205—206页。

② 同上，第206页。

③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2月26日，第302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564FC1931/5。

在中国的英国代表对他们责任范围的扩展兴趣不大。例如，驻南京的英国临时代办哈奇森由于不能确定北京将如何对待他，所以在1月17日电询外交部：在英国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确立外交关系“和陛下领事官员的地位与职权被承认之前”，“除非在没有其他处理方法的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不让美国国务院要求我们代表美国提出照会<sup>①</sup>。

在上海，英国总领事厄克特于1月31日报告，英国商会已“表示担忧，怕我们保护美国会殃及英国的利益”。厄克特还批评美国从中国撤出的决定。他报告说，“普遍的感觉”是，“美国全部撤出的举动是小题大作”，如果在对西方国家更有利的基础上向中国“摊牌”，恐怕会更好一些。厄克特估计，在上海领事区的“530名美国官员、平民和家属”中，有100~125人、包括39位官员将离境<sup>②</sup>。

哈奇森在早些时候的电报中评论了“美国从中国撤出对英国利益的影响”问题。他首先指出，毫无迹象表明，美国对那种以高压和无礼方式剥夺其使用前军事建筑的权力的反应给中国人造成了什么惊吓……中国政府发言人没表现出任何沮丧，甚至也未感到突然”。哈奇森担心，美国的撤出会导致共产党内部极端派力量的增强，同时削弱那些“迄今或许还能起到一些温和作用的力量”。他继续说，“要是我说得对，那么国务院的行动减少了我们期望的中国放弃依赖莫斯科立场的可能性”<sup>③</sup>。

英国外交部更担心的是征收领事馆财产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不是美国撤出行动会影响中国对西方的政策。根据一份绝密的“关于中国的国际局势”的分析文件，英国外交部曾电告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564FC1931/6。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487FC1581/11。据美国国务院估计，在1949年年底的时候，大约有3000名美国人居住在共产党中国，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华裔或者混血儿，“他们的永久性家庭是中国，对他们来说，持有美国国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方便”，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847—650页。

<sup>③</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3FC1022/163。

哈奇森，“美国政府对我们的承认举动不是不同情，在正常情况下，它或许在局势缓和后也会如此”。电报继续说，“但是，在北京的美国军营财产被剥夺却导致了一次挫折。根据我们的看法，现在极难使美国政府公开向人民政府表示友好的姿态。同样，他们也难于采取行动阻止台湾国民党采取针对大陆的敌对行动”。该电报还表达了英国外交部关于征收在北京的领事馆财产一事对行将在那里举行的谈判意味着什么的担忧。对哈奇森已经在北京进行的预备性会谈，该电报“非常感兴趣”，它想从哈奇森处知道，在“征收兵营财产并且承认胡志明等行动当然地意味着北京政府与西方建立外交关系难上加难”时，他们“是否还真有与我们在友好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电报还指出，“法国人或许在批准他们与保大的协议后立即承认中国政府，现在他们则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sup>①</sup>。

## 19 中 苏 条 约

就在中国的行为严重地影响了英、法、美的利益并使英国外交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有诚意”与西方建立外交关系产生疑问时，中国领导人却与苏联就一项防务协定和其他一些协议举行了会谈。2月14日，谈判达到了高潮，周恩来总理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克里姆林宫当着毛和斯大林的面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三十年）条约”，并签署了苏联归还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对大连的控制权以及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的协定<sup>②</sup>。

在外交大臣贝文的指示下，英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准备了一份对中苏条约的分析报告。他们将该条约与苏联和东欧卫星国签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5FC1022/212。同保大（越南皇帝）及老挝、柬埔寨国王的协议，在2月2日获得了法国政府的批准。

<sup>②</sup> 关于该条约的原文，见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期号289，1950年2月16日，第80—84页。

订的条约相比较，发现它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在中苏条约的第一款中，写上了旨在防止日本和它的盟国发动进攻的内容。如果把“日本”换成“德国”，那么，它与苏罗条约的第一款几乎一模一样。中苏条约的第三款申明，任何一方不得与外国结盟反对另一国，这与苏捷条约的第五款很相似。第四款的条文讲到在有关问题上要相互磋商，这在苏罗、苏匈和苏保条约中也能见到。第五款的内容是关于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这“几乎与苏捷条约的第四款完全一样”<sup>①</sup>。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盖伊·伯吉斯指出，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自1949年10月1日以来中苏关系发展史上最完美的一幕。伯吉斯认为，这一幕表明了“中苏双方精心的成功的周密策划以及近来的协调行动”。这些有计划的协调一致的举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期的选择和苏联及其卫星国所给予的迅速承认；苏联和中国都宣扬在苏联与西方力量的对比上发生了重要转折；格奥尔基·马林科夫1949年11月6日在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上谈到“东南亚的曙光”，以及11月16日刘少奇在北京世界工会联合会大会上的讲话——他“充分发挥了马林科夫的说法，号召亚洲人民迅速拿起武器，投入到武装斗争的运动中去”。伯吉斯认为，中苏条约“似乎是为了（a）加强反对西方的苏中同盟，（b）加强中共在国内的地位以及作为支援远东‘解放运动’者的地位”<sup>②</sup>。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15FC10338/88, FC10338/89。关于美国对中苏条约和苏联与东欧国家条约的比较，见1950年2月16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给国务院的电报，其中认为“除了第2款之外”，中苏条约“与1948年苏联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友好条约十分相似”。66.931/2-1650, RG59, DSNA。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15FC10338/80。中苏条约签订几天前，科茨曾经写过一份备忘录，他同意英国驻南京大使馆的说法，即：“对苏联来说，共产党中国产生的主要吸引力，是它看到了共产党在东南亚的曙光。”他说，中苏两国将会实行共同的东南亚新政策，但是，科茨预见道：东南亚最终可能会使中苏之间产生矛盾。见《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14FC10338/50。2月21日，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美国外交部认为，中共政府“可能在近来以各种方式向东南亚渗透（除了进行公开的战争这种方式外）。”661.93/2-2150, RG59, DSNA。



在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看来，苏联政府似乎“让毛”从中苏条约和协定中“捞到了所有能捞到的好处”，而苏联只满足于“获得显示他们无私的好意和慷慨等宣传方面的利益”<sup>①</sup>。英国政府希望抵销苏联所获得的宣传利益，但是它对在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建交一事仍犹豫不决，它还无意得罪中国人。于是，英国政府一方面向其派驻英联邦各国的高级专员提供对抗中苏条约和协定的弹药，另一方面又告诫他们“在这种特殊关头避免批评中国人”。这些高级专员在接到不得轻举妄动的告诫后又接到指示，如果“英联邦国家的政府、朋友和记者要与他们讨论这一问题”，他们可以指出，虽然中国没有对苏联的让步给予明显的补偿，但条约表明，“苏联的政策象冰山，只能看到它很小的一部分。”另外，他们还可以表明，在考虑经济协定时，应以苏联1945年对满洲的劫掠以及自1947年贸易协定以来苏联对满洲的经济渗透为根据。而且，苏联将在五年内提供的3亿美元贷款与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南亚和东南亚所投入的21亿美元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sup>②</sup>。

由于美国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的顾虑，所以它对中苏谈判的诋毁不象英国那样迂回巧妙。早在谈判结束之前，艾奇逊就公开谴责苏联企图把满洲从中国夺走。他1月12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演提出了令人怀疑的证据。之后，美国国务院又向新闻界公布了“源于政府所得到的大量报告和数据的背景材料，”<sup>③</sup>力图证明艾奇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美国国务院还在暗中对中苏谈判发动了攻击。1月25日，在一份绝密的电报中，它通知美国驻巴黎大使戴维·布鲁斯：“国务院已从各方面收到有关斯大林——毛泽东谈判的中期报告，我们虽然对此有所保留，但是，如果能将它们巧妙地公诸之众，又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14FC10338/47。

<sup>②</sup> 同上，FC10338/59。

<sup>③</sup>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2月6日，第218页。

不致使人怀疑有政府参与的背景，它们就会成为有用的宣传手段。”<sup>①</sup> 提供给布鲁斯用来公诸于众的材料包括一份报告，该报告称苏联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100万劳工，其中的30万人已抵达苏联。这些谣言可以起到某种警告作用：中苏条约“可能在高唱友谊合作的后面附有令人难以接受的中国方面的让步，这些都隐藏在秘密条约和协定中”<sup>②</sup>。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预先抵销中苏条约的影响。

在中苏条约签订后，美国国务院很快又接连掀起了两次宣传攻势。3月15日，艾奇逊在加利福尼亚州俱乐部就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发表演说时，对条约进行了诋毁，而国务院在第二天又向香港和台湾送去了新的蛊惑人心的材料。艾奇逊告诉其听众，“苏俄保证要归还某些满洲财产，但是拒不交还红军于1945年掠夺的工业设备”，不仅如此，当中国四万万人民面临着从现在起到下个收获季节要忍饥挨饿的前景时……粮食却从中国运往苏联”。他还把苏联将在五年内提供的3亿美元贷款与1948年一年中美国国会批准给中国的4亿美元贷款相比较，极力贬低苏联贷款的重要性<sup>③</sup>。

发往香港和台北的材料是为了向“重要的中国官员、新闻机构和情报首脑秘密散发的”，要他们在讲演、社论和漫画里使用这些材料。此外，材料指出了“中苏条约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其他条约的相似性”，并提出了苏联破坏协议和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例证<sup>④</sup>。

针对这些反对中苏条约和协定的宣传战，2月14日，在莫斯科的条约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持的立场，他声明说：“条约和协定的签署是在斯大林元帅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革命事业积极支援的有力证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

① 见661.93/1-2559, RG59, DSN A.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03-311页。

③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3月27日，第468页。

④ 见661.93/3-1650, RG59, DSN A.

帝国主义集团动用所有挑衅手段妄图破坏我们两国的友谊。但是，这些可耻的企图都失败了……我相信，敌视我们条约和协定的人只能是帝国主义分子和战争贩子。”<sup>①</sup>

从表面判断，毛泽东本人对他在苏联所受到的对待和谈判是很满意的。据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两位工作人员的报告，毛一行在签约的前一天晚上，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一流芭蕾名星的演出，到场的观众向他们“起立、长时间的欢呼……毛一行面对雷鸣般的掌声显得兴高彩烈”<sup>②</sup>。在签约后的第二天晚上，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参加酒会的有500多人，包括斯大林、尼古拉·什维尔尼克、马林科夫、贝利亚和伏罗希洛夫，当然也包括毛和周<sup>③</sup>。

毛在莫斯科火车站发表的告别演说更有助于说明他当时的心情。他宣布：“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牢固的和坚不可摧的战斗团结会对全人类争取和平的斗争产生巨大影响。毛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信念，现在，这一信念在苏联得到了印证。毛丝毫没有表露出他对经济协定有什么不满。毛说：“苏联在经济建设和其他重要领域内的经验将是新中国建设的榜样”。毛在讲话结束时对苏联领袖给予高声称颂：“世界革命的导师、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大林同志万岁”<sup>④</sup>。毛在苏联访问了六个城市，在快到中国边境时，他似乎还不满足于在莫斯科献上的赞美之词，又向斯大林拍了一份告别电报，结尾处写道：“衷心祝愿您领导的苏联无限强大和繁荣”<sup>⑤</sup>。

① 《人民中国》，1950年2月1日，第28页。2月15日，新华社在一篇题为《中苏友谊中的新亚洲》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同上，第30—32页。

② 见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1950年2月14日致国务院的电报。661.93/2-1450, RG59, DSNA。

③ 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期号290，1950年2月17日，第94页。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14FC10338/55。

⑤ 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期号300，1950年3月6日。毛的这封电文以及周翰维辛斯基的电文占了《消息报》和其他苏联报纸的整个第一版。《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15FC10338/87。

中国新闻媒介密切注视着美国诋毁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的做法，并给予了回击。例如，3月1日《人民中国》发表了一篇社论说：

自从中国人民将蒋介石集团从中国大陆驱逐以后，美帝国主义迫不得已，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分裂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依然是他们对中国的一个主要战略。

在莫斯科达成的中苏条约及其各项协定……已证明，美国国务院近来企图在两个邻国间制造的阴谋是无济于事的①。

4年16日，同一杂志的另一篇社论说：“新近签定的中苏经济协定将加速被战争破坏的中国经济的复兴，并因此导致中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改善……在这种形势下，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如此丧心病狂地攻击这些协定就不足为怪了”②。

## 20 英国的挫折

英国派往北京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的代表是于1950年2月14日首次前往中国外交部的，这一天，正是中苏友好条约及其他协定在毛和斯大林在场的情况下签字的日子，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巧合。约翰逊·哈奇森在与中国外交部官员的会晤中重申，贝文和周相互交换的意见“已构成外交关系的建立”。他还说，很显然，中国政府认为必须首先讨论“预备性和程序性问题”，他想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但是中国外交部无意透露有关情况③。大约两星期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据哈奇森说，此人从来不闲谈）在接受对他的礼节性拜访时也没解释清楚这个问题④。

① 《人民中国》，1950年3月1日，第3—4页。

② 《人民中国》，1950年4月16日，第3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971/83285FC1022/215。

④ 同上，FC1022/221。

与此同时，印度派往北京进行“预备性和程序性”协商的代表A·K·森也在中国外交部进行了首轮会谈。据报道，要求通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举动“深深刺痛了”尼赫鲁。尽管如此，印度对中国的要求仍作出了让步，派代表“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了预备性和程序性谈判”<sup>①</sup>。在同外交部的谈判中，森被问到，印度在2月7日的联大会议上为什么对中国代表资格的议案投弃权票以及印度将如何处置国民党在印度的财产，哈奇森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他的印度同事对比感到沮丧”<sup>②</sup>。

3月2日，轮到哈奇森在中国外交部接受盘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宣读了一份文件。该文件通知哈奇森，中国政府认为，既然英国政府已宣布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应该断绝与国民党的任何外交联系”。随后章又指出，英国在安理会对苏联要求取消中国国民党代表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的行动以及在联合国其他机构所采取类似举动，应视为英国拒绝接受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和继续承认国民党“反动集团”代表的证据。他还要求澄清英国政府对“国民党反动集团”驻香港的机构以及对那里的中国国家财产的态度<sup>③</sup>。

章提到的联合国安理会议案是苏联大使雅可夫·马立克于1月10日提出的。这个议案要求安理会宣布，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是非法的，要求取消对他的承认证书，并将他驱逐出安理会。中国国民党代表蒋廷黻当时正主持安理会会议。1月8日，周恩来向安理会提交了一项照会，“要求联合国和安理会驱逐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1月10日，周再次照会联合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团主席，并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包括安理会的

<sup>①</sup> 见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电报，1月21日，793.02/1-2150，1月27日，793.02/1-2750，RG59，DSNA。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93285FC1022/218。

<sup>③</sup> 同上，FC1022/228及371/75827F18896。

会议与工作。”<sup>①</sup>

1月12日，各国代表就苏联的提案发表声明。其中美国大使欧内斯特·格罗斯声明说，美国反对苏联的提案，但是美国认为这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因此将不把自己的不同意票看成是否决票，如果安理会以7票多数作出决议，美国将接受安理会的决议<sup>②</sup>。第二天，安理会投票否决了苏联的提案，马立克退出会场<sup>③</sup>。

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与美国对她的不承认，使他们在安理会就中国代表权一事发生了分歧，但这绝不是不可调和的。英国的弃权表明，它在这个问题上不想反对大多数。美国也同样愿意尊重多数决议，即便这意味着国民党的代表被驱逐也罢。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外交部指示哈奇森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解释英国在安理会的投票，与此同时，驳斥“英国仍与国民党保持外交接触”的说法。哈奇森应当申明：

正如早已向人民政府所声明的那样，英王陛下政府自从那天起（指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编者注）就撤销了对前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当英王陛下政府在安理会就驱逐前国民党代表一事弃权时，该举动并不意味着支持前国民党代表或反对人民政府的代表。之所以决定弃权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尚没有达成多数决定的可能性，因此，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成熟的，在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作法概出于同一考虑。总之，一俟联合国各机构的多数成员国同意接纳中国政府，陛下政府当然欢迎人民政府的代表出现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sup>④</sup>。

英国外交部随后给哈奇森个人发了一份电报，详细阐述了英国的立场。安理会中只有五个成员国赞成接纳中国——苏联、印

① 新华社：《每日新简报（发布）》，期号262，1950年1月20日，第83页。

②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1月13日，第195页。

③ 同上，1950年1月23日，第145页。邹说等人认为，苏联欲把国民党代表从安理会驱逐出去的“企图”，“可能是它的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诡计，它想以此来把共产党中国和西方隔离开来”。见《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523—524页。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65FC1022/328。

度、南斯拉夫、挪威和英国。在多数成员国（7个以上）赞成接纳以前，英国仍将对接纳中国代表的议案投弃权票。英国外交部还坚决认为，“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必须首先由安理会作出决议”；在联合国其他附属机构考虑这一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中国人对英国关于它在安理会投弃权票的解释“抱有怀疑”，哈奇森有权以下述理由加以解释：俄国人的行为（在驱逐国民党的动议被否决后退出安理会）使局面对人民共和国“变得极其严峻”。他还可以指出，“人民政府未能与那些承认它为合法政府的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会使这些政府踌躇不决，而这些政府本来是可以投赞成票的”<sup>①</sup>。（加拿大就是一例。加拿大外务部事实上已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要它在北京对中国人这样说，而英国外交部自己也想到要这样争辩<sup>②</sup>。）哈奇森还应为英国对台湾的立场作如下辩白：“英国在淡水领事馆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外交关系的存在。根据英王陛下政府的惯例，那里的领事馆是为保护英国利益的，它只与地方、也仅仅是地方当局有事实上的关系。我们的做法有许多先例可循，在中国，无论是关内还是满洲，都有尽人皆知的此类先例。”<sup>③</sup>哈奇森3月17日将英国的答复转交给中国外交部，但他要等到5月份才能得悉中国人的反应。

与此同时，尽管印度政府对中国提出的问题没有作出令后者满意的答复，但是，中国政府仍批准了印度要求建立外交关系的申请。当中国人要求印度代表解释印度为什么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对中国的代表权资格的审查中投弃权票时，新德里指示其在北京的代表说，印度无意向别国政府解释它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sup>④</sup>。至于国民党在印度的组织机构问题，印度政府说它一无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5FC1022/228。

② 同上，FC1022/242。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5FC1022/228。

④ 同上，FC1022/235。印度曾在安理会投票赞成驱逐国民党代表，但是它在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却投了弃权票，因为它认为，由这个机构来做出一个政治决定是不适当的。

所知，但它的政策是承认个人避难的权利<sup>①</sup>。3月15日，章副外长通知印度在北京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印度的答复表示满意，可以举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承认印度代表为临时代办，并希望很快互派大使<sup>②</sup>。不到一周，中央人民政府就批准了前印度驻国民党中国的大使萨尔达·K·M·潘尼迦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sup>③</sup>。

在英国外交部，尽管弗兰克林对印度的成功表示满意，但对“中央人民政府实际上会同样满意我们的答复的看法表示怀疑”<sup>④</sup>。哈奇森在北京则持乐观态度。他相信（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据“印度同事的最后一次会晤”，中国政府或许对英国的答复也会表示满意<sup>⑤</sup>。

虽然英国人不象中央人民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起劲支持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事实上英国外交部一直在幕后活动，力图形成有利于此举的安理会多数。埃斯勒·德宁在3月28日给英国驻巴黎大使的信中指出，“安理会内的犹豫不决者如果看到法国改变态度，或许会倾向于投票支持人民政府的代表”。他建议，根据印度和英国在北京的谈判经验，如果法国投票赞成安理会接纳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到法国开始谈判时事情恐怕会容易得多。”<sup>⑥</sup>

一方面，英国政府期望它对中共的承认会直接导致外交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英国工商界希望对中共的承认会改善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前景，但是这两个愿望都被灭了。例如，“中国协会”在3月20日的公告中抱怨说，英国自承认新中国政府以来的两个半月里，英国在华公司和个人的地位丝毫没有改善；相反，它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5FC1022/235。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6FC1022/246。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7FC1022/279。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6FC1022/246。

⑤ 同上，FC1022/254。

⑥ 同上，FC1022/265。



(他)们的地位“可能日趋恶化”，据公告说，贸易和工业几乎陷于停顿，可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却不允许根据工商活动的缩小而相应裁员，膨胀的工资数额消耗了大量的流动资金储备，这一局面持续了9个月<sup>①</sup>。

在上海的英国商会指出，并不是法律和规定本身导致了工商界的困境，是不依法行事带来了一系列问题<sup>②</sup>，在3月29日的报告中，英国在天津的商会主席抱怨说：“甚至在解放已经一年的今天，可以说我们仍处于火坑的边缘，每天惴惴不安，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很遗憾，我们不能不说，英国在天津的贸易价值无论怎样也无法证明年初时的乐观与希望……未来是模糊不清和无法预测的……除了反西方集团的外国人外，这片我们所选择的广袤大地是不欢迎其他外国人的。”<sup>③</sup>在上海的英国商会于4月1日给该组织的中国总协会转发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宣称，英国在上海的商会“对关系到每一位在华工商界人士利益的发展趋势感到极为不安”，它呼吁采取措施“防止局势一发变得令人难以立足”<sup>④</sup>。在这之前，该商会曾强调国民党封锁上海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现在它转而认识到，在上海的外国企业的困境“主要是新政权上台后经济状况的动荡不安所造成的”。“即使解除封锁也无助于我们摆脱困境。”“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多数企业既无法顺利地经营，又不能“依靠自身摆脱困境”。该商会继续说：“它们想宣布破产，但是却遇到劳工近乎于敲诈的勒索……外国经理个人被指定负责企业在诸如缴付工资税务方面的义务，如拒不缴纳，无论有何种理由，最后都要被关进监狱。”<sup>⑤</sup>

尽管英国已承认中共，但是英国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对前英国兵营一事的处理说明了这一点。当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45FC1106/34。

② 同上，FC1106/40。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50FC1108/179。

④⑤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45FC1106/40。

征收财产的大字布告从英国驻北京领事馆的墙上被取下时，英国在华官员推测，中国方面对英国前兵营的处理将暂告一段落。哈奇森告诉英国外交部，如果兵营问题成为中共“建议在建交前举行谈判”的“唯一内容”，他是不会奇怪的<sup>①</sup>。

2月15日，中苏关于订立中苏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协定的联合公报发表后，英国人更加确信，英国兵营财产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公报说，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已相互交换照会，“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偿移交所有在北京的前军营财产”。在此宣布之后，英国便成为1901年11个签约大国中唯一在北京仍占有军事营地的国家<sup>②</sup>。

在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的签字仪式上，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对苏联的举动给予热烈赞扬，他说，“无偿移交在北京的所谓军事营地反映了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元帅的伟大友谊”<sup>③</sup>。事实上，据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报告，俄国在北京的军营早于1920年就已交还中国，许多年来一直作为布赖纳公司的仓库，后来中共当局命令该公司撤出<sup>④</sup>。

虽然英国认为“有理由拥有它的军事营地”，但是为了保持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也准备放弃它。外交部在向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解释这个决定时说，即便是放弃这一军事营地，也要同意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相应的谈判，这比法国与荷兰提抗议的做法要可取。如果拒绝谈判，会使中国人指责我们是帝国主义，“不象苏联那样顺应中国环境之变化”。外交部认为，这一宣传路线在中国应该是有效的，并且要顾及中国对英国有关香港的立场的反应。更重要的是，英国“与人民政府建立关系的主要意图”是利用中苏关系中可能产生的任何磨擦。因此，在发展关系的开始阶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80FC1463/30。

<sup>②</sup> 同上，FC1463/47。

<sup>③</sup> 《人民中国》，1950年3月1日，第29页。

<sup>④</sup> 见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1951年1月18日，661.93/1—1851.RG59,DSNA.

我就拒绝移交军事营地是不明智的<sup>①</sup>。

然而中国人根本不给英国人以讨论这个问题的机会。英国总领事格雷厄姆很快接到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一项命令，其措辞与同年1月美国、法国和荷兰接到的命令一样，要求英国交出军事营地。哈奇森此时给章副外长写了一封信，要求给予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他说，他估计“以礼貌的方式”达成对两国政府均满意的协议是不难的”。哈奇森的信还指出了单方面征收这一财产的含意，正如他向外交部报告的那样：“我要说，我完全相信，以这种方式征收财产将招致英国的批评，我觉得在我们关于建立友好关系的谈判正获得进展的时候，在我们期望排除任何不利、不必要、不友好和不受欢迎的行为的时候，这特别不可取。我急切希望副外长能帮助阻止这个命令的仓卒执行”<sup>②</sup>。然而，中国当局根本没有要避免不友好或不受欢迎的举动的意思。对哈奇森信函的反应是，中国政府外交部召见了，要他依照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行事；外交部副部长拒绝讨论这个问题<sup>③</sup>。

哈奇森告诉英国外交部他已无能为力，只能“猜测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机以这种方式采取这一行动”。正如他惯常所认为的那样，他的猜测是，“这一不友好、不礼貌的行为”表明，中国“政府内部极端亲苏和反西方的派别取得了胜利”<sup>④</sup>。

4月11日，在军营被中国人征收之前，哈奇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英国政府认为：英国“使馆所属的前军营是为官方所用，其使用权是1943年中英协定第三条所规定的。虽然我们曾准备并且现在还准备以协议的方式无条件放弃这一权利，但我们认为，中国方面无权以单方面的行政手段征收这一财产。”<sup>⑤</sup> 尽管中国外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80FC1463/47。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81FC1463/64。

③ 同上，FC1463/65。

④ 同上，FC1463/68。

⑤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82FC1463/98。

交部已从哈奇森那里获悉，英国愿意以协议方式无条件放弃兵营财产，但中国当局仍采取了征收行动，这一事实强烈表明，他们是出于国内宣传需要而有意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它可以使中国宣传机器说，“军事管制委员会向英国领事发布了一个命令”<sup>①</sup>。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使征收行动推迟了三个月，但最后，承认既没能防止征收，也没能改变采取这一行动的单方面形式。

## 21 离境的风险

当英国政府谋求通过与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来保住它在中国的外交和商业据点时，美国政府正为所有美国官员以及美国和英国希望离境的侨民作出安排。问题集中在上海，那里的外国人被持续的国共冲突所滞留。

当美国在1月中旬宣布撤走所有官方人员时，上海的局势已经非常严重。国民党的封锁使几乎所有船只不能驶抵该港口<sup>②</sup>，只有少数船只例外——其中包括美国所拥有的伊斯布兰德森航运公司的船只。乘这些船航行极其危险，但是，共产党当局拒绝让上海的外国侨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城市去。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领事团一致表示，希望那些已承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向中央人民政府呼吁，允许外国人，尤其是需要回国采取医疗和其他紧急措施的人到天津和广州去。但是领事团反对美国总领事要让“美国之音”以人道主义名义对这件事大加渲染的建议<sup>③</sup>。

仍在南京等候去北京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事宜的英国临时代办哈奇森认为，以人道主义理由向中国当局呼吁几乎毫无成功的机会，因此，他“极不情愿尝试这一举动，尤其是不愿从外部来采取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81FC1463/72。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1183—1184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99FC1582/1。

行动”。他认为，他或许最后能够着手处理个别侨民的困难，但所有侨民的困难“必须等联合王国陛下政府和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才能得到处理。同时，哈奇森认为，用“美国之音”对此事大加渲染是“最糟最蠢的主意”，应该予以制止<sup>①</sup>。哈奇森甚至认为，“在这个时候”要求中共当局解释为何不让已获出境许可的人到天津或广州去也是不可取的<sup>②</sup>。

美国即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走其所有官方人员的决定，使得那些希望离境的外国人更急于撤出。美国国务院曾研究动用飞机、火车、甚至海岸小汽艇作为撤出上海的交通工具。但是中国地方当局继续拒绝使用飞机和火车把外国人从上海转移到中国其他城市，而且，海岸汽艇的所有者也不愿到长江口狭窄的北水道冒险，这是国民党没有布雷的唯一通道。最后，国务院得到通知：上海当局原则同意使用吃水浅的船只将乘客渡到停泊在江口的大船上。美国的总统航运公司包租了两艘坦克登陆舰，它们将与该公司的客轮“戈登将军”号于3月20日进行首次航行<sup>③</sup>。

3月6日，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建议英国驻北京的代表设法就“戈登将军”号往返运送侨民（其中既有英国人又有美国人）的问题，代表英美与中央人民政府达成协议<sup>④</sup>。但是哈奇森持反对态度。他认为，与美国人携手向中共当局提出照会是“不合适的，从我们在那里的利益的角度看也是不可取的”。由于英国已承认中国政府并且希望保持在中国的领事地位，而美国拒不承认该政府并且关闭了自己的领事馆，所以哈奇森认为“没有共同行动的基础”。此外，英国想使更多的臣民来华，而美国则想把在华的美国人撤走。哈奇森最后说，联合行动只会使英国更难以使自己的臣民在中国得到良好的待遇<sup>⑤</sup>。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39FC1582/3。

② 同上，FC1582/5。

③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4月3日，第525页。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99FC1582/27。

⑤ 同上，FC1582/28。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厄克特反驳了哈奇森的观点，他说，“就我们目前利益而言，我们与美国人有着广泛的共同利害关系”。他认为：我们有“切实的理由”来和美国人一起把尽可能多的英国侨民撤走<sup>①</sup>。实际上，美国国务院已表明愿意让英国侨民优先使用美国的撤离设施。英国驻华盛顿使馆3月13日报告说：美国“国务院已指示驻上海美国总领事，在安排渡船时，他应‘尽可能’照顾英国撤离人员，让他们紧随美国人之后”<sup>②</sup>。英国外交部中国事务组的富兰克林评论说，美国“国务院在安排‘戈登将军’号渡船一事上表现出非常合作的态度，它帮助了中国境内的英国侨民”<sup>③</sup>。他提醒说，“我们必须避免使美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由于担心影响与中国人的关系而放弃我们的团结”<sup>④</sup>。他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人采取共同行动虽不会改善但也不会损害英国侨民的待遇。英国外交部指示哈奇森，无论如何“要及早面见中央人民政府官员”，请求批准坦克登陆舰进入上海<sup>⑤</sup>。

3月20日，哈奇森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他已就坦克登陆舰一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口头照会，并劝告美国总统航运公司将困难告诉上海外国侨民事务处；并且，中国外交部也承诺说要考虑这一问题。哈奇森在报告中还建议总统航运公司进一步靠近上海外国侨民事务处<sup>⑥</sup>。

在哈奇森发出报告的同一天，上海当局拒绝了总统航运公司几星期前提出的使用登陆舰的要求，美国国务院为此发布了一篇新闻稿，谴责这个决定，并把它归咎于“地方当局毫无理由地害怕这些船只不是商船”<sup>⑦</sup>。国务院还要求在上海的美国官员重新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0FC1582/37。

②⑥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99FC1582/35。

④ 同上，FC1582/28。

⑤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0FC1582/37。

⑥ 同上，FC1582/49。

⑦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4月3日，第525页。

考虑这一要求。

英国总领事厄克特反对美国国务院的这一立场。他于3月23日告诉英国外交部，“美国方面关于‘戈登’号正被迫等待，以观中国当局是否会‘重新考虑’或‘改变主意’的广播只会使事情更糟”。他建议，接受中国人不允许坦克登陆舰进入上海的决定，另觅其他替代办法<sup>①</sup>。厄克特刚刚见过黄华，后者告诉总领事，坦克登陆舰的禁令不能收回，并说，“美国人使自己焦头烂额是咎由自取”。厄克特向外交部建议。如果非要发表声明，也只能简要地说明中国当局仍不允许使用海军坦克登陆舰，但是我们正争取他们批准使用商船<sup>②</sup>。

中共当局现在不想承担不让外国人离开上海的责任，这一点已愈益明显。黄华在3月23日与厄克特举行会谈时说，上海当局正与天津商量，以便让一部分旅客从那个港口离境<sup>③</sup>。三天后，上海的报纸宣布，“任何有紧急理由要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应向外事局提出申请，更换出境许可证明，以便从天津离境”<sup>④</sup>。3月29日，厄克特报告了地方当局态度的变化，说他们现在似乎急于动用中国船只来运送愿意撤离的侨民。厄克特认为，哈奇森在北京的照会“可能对局势的转变起到了有力的作用”<sup>⑤</sup>。他后来告诉英国外交部，“中国人现在觉得，他们使自己（对美国的撤出决定）的怨恨发泄得太过份了”，这可以说明他们现在“相对合作的态度”<sup>⑥</sup>。

无论对他们态度的变化有何种解释，撤离行动的新安排正在加紧实施。4月7日，北京外交部原则上同意英国船只“安京”号、荷兰船只“布瓦塞万”号可以在上海接运旅客，但具体事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0FC1582/60。

②③ 同上，FC1582/61。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1FC1582/70。

⑤ 同上，FC1582/47。

⑥ 同上，FC1582/37。

宜必须由在上海的轮船代理人<sup>①</sup>和外国侨民事务处安排<sup>②</sup>。根据这一点，又安排了一艘中国的内河轮船来摆渡乘客，乘“安京”号船的旅客共有300名美国人和450名英国人<sup>③</sup>。

可是，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国民党决定在长江口北水道布雷，而此处正是摆渡的水域。国民党宣称，为防止共产党进攻上海东南面由国民党控制的舟山群岛，布雷是必要的。当时，共产党空军部队已部署在上海周围，在上海上空经常可以看到共产党的战斗机，这就使国民党更加害怕共产党对舟山群岛的进攻。3月25日厄克特报告说，“在每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都有巡航的战斗飞机”，有时多至八架飞机<sup>④</sup>。4月8日，上海搞了一次空袭演习，据厄克特说，“这是一次对喷气机力量的及时而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展示”。厄克特告诉英国外交部，从3月16日起，共产党军事当局已做好准备，打算从空中对国民党海军实施攻击<sup>⑤</sup>。

英国驻新加坡远东基地的总司令官置国民党对长江口北水道的布雷威胁于不顾，仍坚持撤离上海的既定计划。4月10日，他电告停泊在长江口的英国海军舰只，说它们会接到设法拖延国民党对北水道的布雷行动的命令，直到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侨民撤离上海为止<sup>⑥</sup>。虽然总司令告诫他的舰只以规劝的方式拖延国民党布雷舰的行动，但他还是希望通过英美外交渠道拖延布雷。然而，美国人根本不合作。美国公使罗伯特·斯特朗只准备要求把北水道的布雷推迟24小时。他担心，不仅共产党会从进一步的拖延中捞到好处，以便随后占领舟山群岛，而且会使美国国内政治反对派得到攻击国务院的炮弹，说它庇护共产党。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2FC1582/137。

②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4月24日，第636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1FC1582/67。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2FC1582/117。

⑤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3FC1582/143A。



在淡水的英国海军联络官怀疑他亲自拜会国民党海军上将桂永清“能产生什么结果，因为中国海军认为，封锁北水道是舟山防御的关键”<sup>①</sup>。的确如此，他与桂的会见没产生任何效果：英国的长江巡逻艇也没得到劝国民党布雷舰放弃行动的命令。

相反，撤离计划流产了，接踵而至的就是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对此，各方争论不休。美国国务院4月12日发表一份公告说，由于中共在外侨撤离上海的行动计划中拒不批准撤离船只的使用，加上国民党不能再拖延在长江口北水道设置水雷的既定行动，故使“从海路撤离上海的所有计划统统搁浅”<sup>②</sup>。在上海，厄克特总领事和英国海军副武官指责美国的公告弄虚作假，声称在美国发表新闻公告之前，“安京”号的使用和摆渡行动方案已得到共产党的批准。厄克特甚至说，“相比之下，共产党似乎倒是诚实的”<sup>③</sup>。

上海当局也想为自己恢复名誉，并且如弗兰克林所形容的那样，他们确以某种方式——“共产党处理此类事情所运用的一种有趣手段”——这样做了。他们在上海召见了英国船运公司的代理人。一个官员要求这些代理人签署一项声明，以他们及全体旅客的名义对中共当局的协助表示感谢，并解释说船运计划的撤销乃是因为国民党拒绝提供安全的航道，同时要求他们将中共当局的批准日期和允许船只进出港的日期记录在案；最后是对代理人的帮助表示感谢和对计划的未能实施表示遗憾<sup>④</sup>。

美国国务院在发表上述新闻公告前，很可能尚未获悉上海当局最后批准“安京”号进出港的消息。不管怎样，希望离开中国的美国人当时已被上海当局批准从天津离境。英国外交部的弗兰克林恰当地总结了撤离行动的全过程，他说：“在整个撤离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2FC1582/127。

②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4月24日，第630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62 FC1582/123、128及371/83503FC1582/128。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3FC1582/141。

过程中，共产党采取恩威并重的手段，同时又使自己免遭妨碍在上海的外国人离境的指责”<sup>①</sup>。

当然，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都负有阻碍外国人离开上海的责任，他们采取阻碍行动的动机是不难猜测的。共产党把外国人不能撤离的原因归咎于国民党，以便把外国人的愤怒导向国民党，并以此来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以便减少轰炸，解除封锁。外国人对国民党的愤怒在上海表现得极其强烈，尤其是在2月6日国民党轰炸该市的公共设施之后。一家为上海供排水系统提供全部动力的美国企业“上海电力公司”直接受损，死亡27人。据该公司负责人说，轰炸使25%的电厂设备遭到破坏，公司因此而彻底破产<sup>②</sup>。

2月6日的轰炸致使人们强烈要求美国干涉国民党的行动。如2月10日，中国协会（英国人在华的商会组织——编者注）要求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美国政府紧急照会，敦促它运用对“台湾国民党”的影响力制止其对上海的轰炸，这种轰炸使局势极度紧张<sup>③</sup>。在上海的美国商会已向美国国务院和驻华盛顿美国商会发电呼吁，要求对国民党采取干预措施以令其停止轰炸。另外，“所有外国平民的、宗教的和国家的机构都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对台湾施加压力，停止对上海的狂轰滥炸”<sup>④</sup>。

2月6日的轰炸确使美国官方就国民党空军“有意空袭美国在上海的财产、并且造成严重损失和威胁美国人安全”的行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sup>⑤</sup>。这一抗议书是由菲利普·斯普劳斯起草的，他于2月7日将抗议书送交麦钱特批准，并附有一份措辞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568FC1682/123。

② 见与上海电力公司的保罗·霍普金斯的谈话备忘录，2月6日及7日，898，2814/2—650，893，2614/2—750，RG69，DSNA。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244FC1019/41。

④ 同上，FC1019/39。

⑤ 见《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2月20日，第296页。

强硬的备忘录：

最近中国空军对上海袭击的频繁次数和袭击的方式，尤其是2月6日对上海的空袭，使美国所属的上海电力公司深受其害，并使美属标准真空石油公司的财产也受到相当损失，同时还造成中国平民的严重伤亡，这对美国利益已构成确定的有形和无形的损害……反美情绪在中国城市人民中骤然剧增，因为这些城市遭到美国制造的飞机的轰炸，其平民被使用美国汽油的飞机所携带的美国炸弹致伤致死。中共要煽动这一情绪几乎不必费力宣传①。

斯普劳斯指出，国民党的轰炸无助于改变国共冲突的态势。国民党现在对公共设施搞空袭，可是当初在共产党军队的进攻面前一溃千里，仓惶中丢下大量军事装备，甚至不能将在沈阳的中国最大军火库破坏。对此他极为愤怒。他接着指出，“中国政府在国民党撤出后没有破坏任何城市的公共设施，而国民党却从空中袭击这些城市。无论如何，他们对在上海的美国财产的袭击是不能原谅和毫无道理的”②。

在台北，斯特朗代办及时将美国的抗议书递交给台湾当局，但是，国务院发现国民党的答复令人咋舌。“它让我们的抗议见鬼去”③，艾奇逊叙述说。在给麦钱特的另一份备忘录中，忿怒的斯普劳斯觉得事情令人“难以相信……我们竟放任国民党政府如此公然损害我们在中国的地位”④。

正当艾奇逊与国务院私下和公开声讨国民党的空袭时，中共官员却谴责美国对空袭负有直接的责任，甚至说它是由美国一手操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军事指挥官朱德总司令2月28日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声明：“国民党匪帮使用美国提供的军舰封锁中国海岸；驾驶美国制造的飞机轰炸中国的城市；美国占领军派遣

①② 893·2614/2—750, RG59, DSNA.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14页。

④ 同上，第313页。

美国和日本军事人员直接参与轰炸行动和其他军事行动”<sup>①</sup>。

外国人以及中国人都受到那种认为轰炸代表美国政策的论断的影响。例如，哈奇森发电英国外交部建议，“无论有没有用”，外交部都应询问美国政府，“他们与中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的三张”与“支持轰炸几乎毫不设防的城市设施”的态度是否相矛盾<sup>②</sup>。

尽管美国已就轰炸上海一事向国民党提出过抗议，但它还不情愿强迫国民党解除封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从上个夏季以来，美国与英国对封锁的态度发生了分歧。现在美国仍不准备改变其撒手不管的政策。3月27日，副国务卿巴特沃斯致艾奇逊一份备忘录，预测英国将要求美国为解除封锁进行合作。该备忘录说明了美国的立场。它回忆说，杜鲁门总统在1949年10月1日曾通知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布，他希望“封锁有效”<sup>③</sup>。巴特沃斯建议，“应让英国大使了解美国总统的决定……和国务院的意见，即在现在条件下，不应作出改变和修改这一决定的努力”<sup>④</sup>。

虽然把希望离开中国的外国人滞留在上海使共产党达到了目的，但是外国人的怨恨也使他们付出了代价。厄克特向英国外交部表示，他们可能已改变了政策，因为到了3月底代价就太大了。然而，他们之所以改变政策还另有原因——他们在上海的空军力量得到了加强。共产党在那个地区已增派了足够的空军力量，用以改变他们在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面前无能为力的军事态势。总之，以外国人的压力来对付国民党的轰炸和封锁的军事上

<sup>①</sup> 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第号300，1950年3月1日。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美、日飞行员驾驶过国民党轰炸机。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44FC1616/43。

<sup>③</sup> 《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1141页。

<sup>④</sup> 693.0022/3-2760, RG59, DSN.A。我从未发现有证据可以说明英国大使曾在此时要求美国出面干预，以解除封锁。

的动机已基本不存在了<sup>①</sup>。

无论改变政策出于何种原因，共产党当局允外侨人从上海转移到天津离境的决定使得美国可以完全实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官方接触的政策。4月20日清晨，一趟特别列车从上海驶往天津，这趟车上的乘客准备登上从大沽港离境的“戈登将军”号轮船。各个国家的侨民陆续乘火车来到天津，登船的旅客共计1000余人，其中包括“所有的美国官方人员”<sup>②</sup>。

美国官方与中国大陆已脱离接触，这批人大概不会再回到中国，除非中国政府改弦易辙。这是艾奇逊3月1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俱乐部的讲演的明确意思。艾奇逊对中国人民说，美国代表与中国人民的分别“不是我们的意愿”，而是因为“中共当局在对待我们代表的方式上不遵守国际公认的正当的行为准则。实际上，美国代表是被赶出他们在北平的办公室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代表无法履行正常的公务。我们的人民对别去表示遗憾，但是我们的中国朋友明白责任在哪一方。”<sup>③</sup>

但是，美国官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脱离关系并不意味着双方一刀两断。美国人在中国的存在不仅依然继续了下去，而且也符合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国务院仍然准备有选择地给“那些愿意去中国共区的美国公民签发护照。根据1950年5月9日由菲利普·斯普劳斯签署、护照局局长鲁思·希普利批准的一封信，每一份护照申请都将接受严格的审查，是否批准要依“每一项申请的理由和申请人想去的地区的局势”而定。尽管国务院认为“家

---

① 5月初共产党就扭转了在同国民党抗衡中的不利局面，当时，国民党下令从舟山群岛不战而退，该岛屿是他们对于上海进行空中和海上封锁的重要基地。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40页注释1。

② 《人民中国》的一篇文章显示了中共政府对于它被指责阻止外国人员离境一事的敏感性：“戈登”号轮船4月30日驶离天津。船上载有690名外国侨民，这个事实完全揭露了美国政府的谎言即中国政府正在延缓美国侨民离境。”见该杂志1950年5月16日号第23页。

③ 《国务院公报》，1950年3月27日，第469页。

属和没有要事的美国公民不宜去中国”，但它却“不打算阻止与中国有关的美国宗教慈善机构和商业组织派出替换要员到那里去”<sup>①</sup>。

## 22 美国的一个试探性举动

3月22日，美国国务院指示总领事柯乐博尽力安排一次“与周恩来的非正式会谈”，或与其他能接触到的高级官员的会谈，目的是让中央人民政府了解美国从中国撤出其官员的原因，试探北京对美国的態度。但是，要保证使中国人不会把这一请求视为承认的先头步骤，或使他们感到美国在压力面前开始示弱。柯乐博应指出，“美国公众不能理解中共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诸如不允许美国官员和商人从上海离境、长期扣押史密斯和本德、在沈阳扣押和虐待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以及夺走在北平的美国领事馆财产”。他应强调说，这些行为在决定美国的公众和政府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态度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柯乐博的任务是弄清中共当局的观点和他们对于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態度<sup>②</sup>。

大约两个月以前，在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的房产被征收不久，柯乐博就曾建议国务院批准他在毛从莫斯科访问回来后的某个时间和中国外交部举行会谈。柯乐博希望能允许他对中国人说，美国政府认为并且期望被征收的美国领事馆财产会早日退还，“如果这样，美国政府将考虑承认一事”，在那个时候，柯乐博认为有几个因素可能会使共产党考虑退还上述财产，其中包括：美国对征收举动的强烈反应——在柯乐博看来，这一点大大超乎了中

<sup>①</sup> 这封信是给北美国外有道团中国委员会秘书罗兰M·克罗斯的，以作为对克罗斯4月23日致斯普劳斯的信的答复。克罗斯在信中告知，两个中国委员会的传教士已安全抵达北京，“这是传教士被允许返回中国的最初例子之一”，893·181/4—2653, KGEs, DSNA。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3卷第322页。

国人之所料；莫斯科谈判很可能破裂或不尽人意；以及中国经济的日益恶化，等等。柯乐博之所以要求这样做是因为他确信，“共产党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需要得到美国的承认”<sup>①</sup>。国务院通知柯乐博，它正在研究他提出的就退还美国领事馆财产一事与中共当局举行会晤的建议，但是国务院提醒他，不要做出退还财产之事“将涉及承认问题”<sup>②</sup>的表示来<sup>③</sup>。

中苏条约并未使柯乐博报告的关于毛和周可能大失所望地从莫斯科返回的预言破灭，相反，2月20日，柯乐博仍报告说：“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的种种反应表明，谈判是不顺利的。他们认为结盟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形势。且不说贷款远远不够，一个基本的现实是，贫穷的中国还必须连本带利偿还贷款。”<sup>④</sup>柯乐博曾估计中共领导人会对在莫斯科的谈判大失所望，现在，他力图确认这个估计。因此，他于2月23日报告美国国务院，他认为中共两位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国是中方发出的一个试探，其目的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柯乐博做出这样的估价是不足为怪的<sup>⑤</sup>。但问题是中方根本没作出这种试探，也没有具体证据可以说明毛和周对在莫斯科旷日持久的谈判的结果表示失望，或者他们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事实上，如前所述，他们的公开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传机器所表明的立场正好与此相反。

柯乐博与司徒雷登大使一样，在估价中共领导人期望得到美国承认一事上，总是过高估计“经济因素”<sup>⑥</sup>。例如，北京的民主同盟领导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张东荪当初曾对柯乐博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話，但却未引起柯乐博的注意。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286—289页。

② 同上，第308页。

③ 661·331/2—2050, RG59, DSNA。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21页注释1。

⑤ 据说，1949年9月13日在艾奇逊国务卿办公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司徒雷登曾评论说：“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相当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不能从苏联那里得到经济援助，为幸存下去，只有从我们这里得到它。”《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7卷第1205页。

张警告说：“中美关系的松动只有美苏和好或美国在战争中胜利才可能实现。对共产党来说，经济因素是不能够超出政治之上的。”另一位人士王树奇（译音）说：“尽管消除外国影响甚至外国人的愿望与中国经济的需要相冲突，但它却是支配政治现实”的一个因素①。

柯乐博接到美国国务院的指示后，于4月12日与“一位姓林的、据说是外交部负责美国和澳大利亚事务的官员”进行了会晤。柯乐博交给林一份“政治议题概要”，然后提出了一些“引起两国麻烦的重要问题”，如史密斯——本德事件②。林将柯乐博的照会斥为“无稽之谈”，并宣称，只要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要改善两国关系的任何谈判都是荒唐的。

柯乐博认为，这一令人沮丧的会晤，根本原因在于北京和华盛顿对谈判（解决其争端）的前提的认识有着重大分歧。他告诉国务院：“中共的政策……似乎已明显地为最近一些事态所证明，如果‘支持蒋介石’的一般问题能通过承认北京政权得到解决，其他具体问题可能都会随之而解，否则将一事无成。我个人认为，具体问题的解决会推动整个关系的改善。”③但共产党却一直认为——甚至在共产党中央政府未成立之前的日子里也认为，美国的问题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是不能谈判甚至也不能讨论的。另一方面，只要共产党当局拒绝讨论这类问题——更不用说改善关系，美国也难以承认共产党政府。几乎在一年前，傅泾波与黄华谈话时已讲明了这一点。当时黄说，只要正式外交关系一建立，类似沃德事件的问题便很容易解决。傅接着指出，这类事件只能使友好关系难于建立④。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27—328页。

② 共产党当局对释放史唐史和本德的一再要求一直不予理睬，而这两个人自1948年10月以来一直被单独监押。英国在1950年3月24日前一直代表美国就此案进行交涉，但从未得到中国人的答复。《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497FC1581/23。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29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377—378页。



美国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当然符合共产党的利益。或许毫不奇怪，中共应将美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作为它平息美国的不满的条件。然而奇怪的是，如果共产党真有促使外国断绝与国民党关系的兴趣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与美国官方和公众舆论如此针锋相对呢？这样就使人们产生疑问，美国如改变政策对自己有何益处？会减少北京的敌意吗？

尽管美国没有断绝与蒋和国民党的关系，但是它的最高决策层已经发出明确的信息：它已放弃国民党，不再支持他们抵御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的努力，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认为这种进攻当年就会成功。但北京毫不理会这一信息，征收了美国领事馆的财产，他们完全知道，征收行动将迫使美国官员离开中国。他们还与苏联订立了间接的但明显是针对美国的防御条约。更有甚者，自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他们对英国人的态度很难说会使美国那些赞成按共产党的条件先承认后谈判的人得到鼓励。英国的承认既没促成建交，也没能改善英国工商界的地位，更没有对中苏关系产生任何影响，这种关系反而比过去更密切了。

北京对英国的态度只会使其他国家望而却步。艾奇逊3月24日告诉两位在中国拥有利益的商人说：我们没采取任何承认中国的政策，部分原因是“迄今承认中国的国家比那些没有承认它的国家，在地位上似乎毫无改善”<sup>①</sup>。在3月初，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报告说：“推迟承认不完全是由于美国的态度所致，而且还是英国和英联邦内新成立的亚洲国家在努力与中国政府互换使节后所处的窘境所致。加拿大官方似乎对加拿大没有处于这种境况而暗自庆幸。”<sup>②</sup>

尽管英国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是英国

---

① 和国际电力总公司总经理W·R·赫罗德及上海电力公司的保罗·霍普金斯谈话备忘录，893、181/3—2450，RG59，DSNA。

② 793、02/3—150，RG59，DSNA。

外交部远东司那些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官员认为，中美关系僵化的主要责任在北京。1950年夏季，英国总领事厄克特返回伦敦后与这些官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弗兰克林在总结这次讨论的记录中强调：

中共没有并且从来不曾有过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真诚愿望。过去的一年已使这一点变得非常明确。为阻碍关系正常化，他们在沈阳扣押了美国总领事，随后在北京将使馆的军事场地征收。当美国国务院试图在美国驻北京总领事离境前与中国建立非正式关系时，中国人又拒绝了这一要求，个中理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认为，事情已再清楚不过了，在过去的一年半中，中共非常了解，如果他们确实想要与美国人建立某种关系的话，他们本来是可以做到的<sup>①</sup>。

## 23 中英相互不满

5月9日，恰好在艾奇逊——贝文的“部长级会谈”于伦敦开始之前，英国政府收到了中国对英国政策声明的答复，这一声明是3月17日由哈奇森转达给章汉夫的。中国方面的答复是令人不愉快的，在与艾奇逊的会谈中，贝文对中英关系作出的令人沮丧的估价，很可能是受到了这一答复的影响。据一份美国方面的报告，贝文“对目前联合王国的基本政治立场、商业立场和它对东南亚的影响作用”表示“非常怀疑”；但他强调英国的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未来的事态发展会证明英国的政策是明智的<sup>②</sup>。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5FC1022/528。加拿大记者约翰·傅礼泽曾报道过一篇“饶有兴趣”的讲话稿，多少能印证一下，弗兰克林的看法。那是在1978年秋，在北京民主墙，“一位知道许多外交政策的持不同政见的老者”说：“当初，因为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很明确地认为它是自私自利的；但因为把苏联看作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在解放初期没有对它进行适当的考查。我们当时应该立即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只要我们采取适当的对策并做出某种让步，这种正常关系是能够建立起来的，尽管有美国政府的抵制。”约翰·傅礼泽：《中国人——一个民族的写照》（纽约：最高级出版社1980年版）第251—252页。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3卷第1023页。

对英国在联合国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的弃权，中国人在答复中表示了不满。章汉夫告诉哈奇森说，英国政府“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它已“明确地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断绝了外交关系”<sup>①</sup>。

中共政府对英国还有一个不满，这就是它对在中国香港的国有财产的态度。这一问题主要是指停留在香港的70架左右的商业飞机，其属权是两家中国航空公司——中国国家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1949年11月9日，两家公司的总经理和工作人员从香港飞往北京，并声明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为共产党政府服务。新华社把这一事件报道为两家公司“4000名员工的起义”<sup>②</sup>。三天后，周恩来总理声明，这两家航空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业”<sup>③</sup>。然而，在这两家航空公司的职员叛逃后不久，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就要求香港当局将飞机和设备扣押于香港，不要使它们转移到共产党手中。12月10日，台北宣布中国国家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的财产已被卖给民用航空公司，后者公司是由克莱尔·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以飞虎队著称，其大量的资助系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sup>④</sup>。鉴于此，中国和中央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资产的所有权问题便不得不诉诸法律<sup>⑤</sup>。

根据陈纳德的遗孀安娜（即陈香梅——编者注）的回忆，在陈纳德看来，这一“辉煌的缴获式购买”拯救了台湾，因为它使由71架C—46、C—47、C—54和其他型号的运输机组成的整个机群免遭共产党的缴获，使共产党不能用这些飞机进攻台湾岛。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8FC1022/319。

② 新华社：《每日新闻稿（发布）》，期号198，1949年11月11日，第45页。

③ 同上，期号196，1949年11月14日，第57页。

④ 关于民用航空运输公司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请参见威廉L·利里和威廉·斯蒂克著《陈纳德、计划、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遏制和中央情报局航空企业的起源，1949—1950》（《外交史》第8卷第4册第349—364页）。

⑤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行政听证会》，第212—213页。

陈纳德夫人对这一判断的唯一评论是：“将军相信，如果他是共产党，并得到这些飞机，他一定会这样做。”<sup>①</sup>

不管中共政府是否会用这些飞机进攻台湾，有一点却是肯定的，这就是：它对英国政府在已经宣布承认共产党政府的情况下扣押这些飞机感到愤怒。英国拒绝放行这些飞机，是因为其所有权问题已诉诸法律。章汉夫对此声称，阻止这些飞机“飞回中国”的做法，并不能“使这些飞机得到很好的保护（已有7架飞机在香港机场受到损坏）”，它表明英国政府尚未对这些中国的国有财产和共产党政府对这些财产的支配权的行使尽到其应有的责任<sup>②</sup>。

章所陈述的共产党政府的观点，使英国外交部的德宁想起了“战前我们从日本人那里收到的数不清的意见信”，并由此感到，中国人肯定要采取强硬措施。在给威廉·斯特朗爵士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建议英国政府不要急于答复中国的意见，必须答复时，也要拒绝“其一切要求”。为避免看上去象在“受美国指使”，德宁提出“当美国人（指参加英、美部长级会谈的美国官员——编者注）还在伦敦时”不要答复中国人，另一方面，还要避免给人以“我们太急于或已准备向他们让步”的感觉。欧内斯特·贝文审阅并同意了德宁给斯特朗的备忘录<sup>③</sup>。

鉴于美国人在部长级会谈后已确实离开了伦敦，英国外交部便准备答复中共政府的非难。它根据德宁的强硬路线，指示哈奇森告诉中国政府：陛下政府已经

清楚地声明，一旦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倾向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英国政府就立即表示欢迎其代表进入联合国的各个机构。……英国政府感到非常诧异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评论这一问题时，

<sup>①</sup> 安娜·陈纳德：《一千个春天——一个婚姻的传记》（纽约：保罗·S·埃里克森1962年版）第322页，见《书萃》（加登城：纳尔逊·道布尔迪1963年版）。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8FC1022/319。

<sup>③</sup> 同上。

没有提到英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努力——劝使安理会各成员国同意接纳中央人民政府，以尽早就此问题作出决议。

象已经表明的那样……按照英国法律，英国即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等于承认了中国的国家财产理应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但英国政府必须重申的是，凡是在英国领地上有争议的财产，其所有权的确定，只能诉诸法律。这个原则已明确地规定了中国国家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所属飞机一案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些飞机的所有权是有争议的。……英国政府决不能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关于香港当局未能对这些飞机予以充份保护的指责①。

哈奇森还要重申，英国政府愿意与中共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所以，财产问题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很显然，这时的英国外交部已不再坚持哈奇森初到北京时所采取的避免讨论财产问题的立场②。当时，富兰克林担心讨论财产问题会耽误外交关系的建立。在5月22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他评论道，“中国人很可能会利用它（现有的非官方渠道）作为诉说其不满的手段，但却会继续拒绝或推迟建立外交关系。总的说来，我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即任何财产问题的讨论，都会有利于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在建交之前，用这些非正式的交流手段是不可能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③

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为承认后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建交，可是白白等了4个月，中国人一直拒绝建交。现在看来，要使中共满意，并同意建交，就得以消除他们与英国之间的争端为代价。哈奇森向英国外交部汇报了他的“看法……只要我们一天不在联合国投票赞成他们的代表权，只要他们不能有把握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8F 1022/319。

② 英国外交部曾向英国驻盟军最高司令部联络使团解释其立场说：“如果中国人坚持提财产问题，谈判就要拖延很长的时间，相应地，我们已指示哈奇森先生不要进行非程序性问题的商谈。财产问题只有在建立外交关系后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在这之前只能如此。”《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79FC1022/30。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9FC1022/350。

地占有他们的飞机，他们就不会在正式建交问题上有所前进”<sup>①</sup>。

在这两个争端上，哈奇森认为中英的立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相差甚远的分歧”，英国应努力“克服分歧”；避免“任何加剧双方观点差异的行动或语言”。他还认为，这样一个方针会使他和中国外交部之间“目前实行的心照不宣式的未加明确规定的工作安排”得以继续<sup>②</sup>。鉴于此，他询问英国外交部在给他的指示中是否充分考虑了中国方面的观点，其中“特别有实际意义的是，（中国人）既想要拥有在香港的中国飞机的所有权，又想要早日进入联合国”<sup>③</sup>。在随后的一份电报中，哈奇森认为，中国人是想当然地图解英国的政策。他说，中国政府“所想象的英国政策是，积极地亲美（按逻辑推理要积极亲近国民党）和基本上对人民政府唱反调，他们一般都是根据这种想象来解释我们的行动”<sup>④</sup>。

尽管哈奇森相信，鉴于中国人的感觉，英国必须努力克服分歧，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深中国人反感的行动，但外交部的弗兰克林还是怀疑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中国人十分清楚他们站在哪里，那就是苏联一边，也完全知道我们站在哪里，这就是苏联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什么友好态度是荒谬的；应该考虑的倒是置观点和利益的冲突于不顾，看能不能建立外交关系<sup>⑤</sup>。

和弗兰克林一样，外交大臣贝文也没有被哈奇森的论点说服。6月6日，他电告哈奇森说：“毫无疑问，拒不同意建立正常关系的是中国而不是英国，这肯定要使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停止对他们的承认，或不再进行促使他们进入联合国的努力。我不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89FC1022/325。

② 同上，FC1022/336。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0FC1022/368。

④ 同上，FC1022/369。

⑤ 同上，FC1022/368。

怀疑，如果中国政府表明更愿意和那些已经承认它的国家建立关系，那么现在予中国政府以法律承认的国家实际上会更多。“……我希望你在答复时把这个看法转达给他们。”<sup>①</sup> 贝文还指示哈奇森，要向中国政府讲明，“只有联合王国在为使中央人民政府取得入居安理会席位的必需票数进行努力。”<sup>②</sup>

贝文还为他如上所说的英国的行动进行了其他一些辩解。例如，5月28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报道，抨击贝文5月24日在英国下院辩论中就中英建交谈判问题所作的发言。它谴责贝文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和在中国在香港的国家财产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采取了极为含糊其词的态度。”报道还称贝文的讲话“对中国是极不友好的”，因为他“甚至说和中国建交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决定’”<sup>③</sup>。贝文得知这一报道后，马上指示哈奇森，如果章汉夫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就得向他说明中国发表的关于贝文讲话的报道是不准确的。哈奇森应该指出：“在辩论的前一天，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公布我们两国政府一直在进行的意见交流的译文，使这位国务大臣处于更加为难的境地……特别是一些要害问题，如，单方面征收我们在北京的兵营的财产，当我们承认他们几个月后仍不和我们建立正式关系，等等，这都引起了我们国内舆论的非难，并反应在随之进行的辩论之中。”<sup>④</sup> 至于贝文在下院发言时说到同中国建交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决定（不是中国人所报道的“令人不愉快的决定”）一事，哈奇森要申明，其明显的原因是联合王国在作出“不同于其他联邦成员和其他友好政府

<sup>①</sup> 很凑巧，就在贝文向哈奇森提出自己的观点时，英国驻美使馆参赞向美国外交部写了一封信，说他“一直在注意”美国有关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报道，一些“较重要的报纸倾向于认为，既然英国人未能从其承认中得到什么好处，美国人若采取同样的态度，除了遭到严厉的斥责和冷落外，也不会得到任何东西。”《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1FC1022/396。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1FC1022/381。

<sup>③</sup> 同上，FC1022/732。关于中国就此问题的正式声明，见《人民日报》1950年6月1日号第26页。

<sup>④</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1FC1022/381。

的决定后，没有得到中国人的信任”<sup>①</sup>。贝文的指示要点由哈奇森做了恰当的转达。事实上，北京非但不信任英国，而且还在谴责他们听从华尔街的命令<sup>②</sup>。

一如事实所证明，当英美两国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都背道而驰时，北京谴责英国政府追随美国是不公正的，它没有设身处地地根据英国人的处境来考虑问题，一点也没有因此而做出努力，促使英国人更接近中国人的观点。对来自中国人的谴责，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英国人是如何反应的。5月19日，英国前国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与苏联驻伦敦大使乔治·N·扎罗宾进行了一次谈话。扎罗宾提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英中谈判，说英国人的态度起初尚有逻辑性，可现在则简直成了美国人的应声筒。作为答复，麦克尼尔说，联合王国和美国的关系正由于两国之间对华政策的冲突而变得紧张起来。英国这一“有胆识而在道义上又符一般性准则的步骤”（指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编者注），非但没有得到中国人的感谢，反而还遭到冷落，甚至遭到在这两大国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攻击。在中国“按逻辑地和我们交换外交代表之前”，英国不会再为中国做什么事了。麦克尼尔接着抱怨说，“英国采取了有助于中国的步骤”，中国却“没有采取有助于我们的措施”<sup>③</sup>。

鉴于此，要使英国屈服于中国的观点和宣传，看来是不大可能了，尽管它采取了赞成中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政策。例如，英国外交部曾指示哈奇森寻找机会会见章汉夫，就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提出的论点予以答复，但不要透露在6月19日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会议上英国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投赞成票的打算。原话是“不要向中国人道歉，也不要过早透露6月19日将对中国投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1FC1022/381。

② 参见《人民中国》1950年6月1日号（第4页）关于中英谈判的社论。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1FC1022/383。



赞成票的意图”<sup>①</sup>。

哈奇森反对隐瞒英国改变政策的信息。他辩解道，不提早使中国人注意，就会“失去表示友好和积极态度的机会，而表现这种态度不会花任何代价”。对于哈奇森的辩解，人们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当旧政策即将被改变的时候，哈奇森不想和章重弹老调<sup>②</sup>。

但是，哈奇森的建议遭到否决，他不得不按指示要求，于6月18日当而把英国的老观点向章重述一遍。可以想象得到，章听后无动于衷。虽然他说要把英国的观点报告给他的政府，但很显然，他并未感觉到有什么新鲜之处。当哈奇森表示希望谈判能有所进展的态度时，章回答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用事实表明英国政府已和国民党残余彻底断绝了关系。中英外交关系未能建立的责任在联合王国，而不在中国。据哈奇森事后的报告，章仍未对英国的友善努力给予信任，他对哈奇森提到的英国在联合国的疏通工作和努力“一直保持沉默”<sup>③</sup>。

从柯乐博在4月最后一次到中国外交部会见章到哈奇森与章在最近举行会晤这段时间里，章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政府的态度：在未予承认的情况下，拒绝谈判和议定任何问题，在承认以后，若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争端，也不可能建立外交关系。事实表明，除了有机会讨论争端外，联合王国并未从承认中得到什么好处。英国外交部的一些人，把这种无外交关系的讨论仅仅看作是中国人准备的一种让他们对英国既吃又拿英国的两全其美的机会。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承认至少也勉强地给英国在华的外交和领事官员以较以往更多的接近中国官员的机会，使他们在维护英国在华商业地位及其他利益方面能发挥更多的影响。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2FC1022/403。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1FC1022/403。

③ 同上，371/83291FC1022/401。

## 24 外国企业受排挤

根据内阁的决定，英国外交部于5月18日向哈奇森发出指示，要求他在下院即将就外交事务进行辩论之前，同中国外交部讨论一下英国在华企业的困境问题<sup>①</sup>。英国外交部不仅要使中国人注意到英国在华侨民的困境，而且还要指出，如果英国公司能在中国坚持下去，中英两国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外交部要求哈奇森告诫中国人：英国在华的许多公司已处于财尽物竭的地步，“除了关闭再无别的选择”。哈奇森还须要求中国政府回答如何“减轻目前境况对联合王国在华企业的不良影响”的问题，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建议：比如它应该向那些流动资产枯竭的公司按照合理的利率提供贷款；应该健全劳动法，允许公司裁减冗员；在形势有利于开业之前，应准许一些公司倒闭，等等。

哈奇森还要努力使“英国侨民的处境”得到一些改善，使他们在中国境内有活动的自由，并且可以随时离开中国，同时应当要求中方允许那些愿意到中国来救济英国公司的人员入境从事救济工作，中国方面要向英国在华公司的人员和财产提供充分的保护<sup>②</sup>。

当时发生了一些带有不满情绪的工人殴打和关押英方经理的严重事件，地方政府对此很少或者根本不加干预。早在5月2日，哈奇森就写信给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提醒他注意这类事件。当时哈奇森指出，这些事件“伤害了英国经理和中国雇工的正常关系”，他建议当局“对这些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sup>③</sup>。英国外交部的奈杰尔·特雷克认为：哈奇森的信简直不能被称为抗议；哈奇森没有按英国外交部的要求向中国当局指出，他们先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46FC1106/69, 371/83347FC1106/115。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46FC1106/69, 371/83347FC1106/115。

③ 同上，FC1106/91。

前曾允诺要保证在华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特雷克看来，按照正常的惯例，英国应该要求中国政府惩罚那些制造暴力事件的打手<sup>①</sup>。

不管哈奇森的信是否构成了抗议，这封信看起来还是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例如，劳工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上海冷藏公司的经理兰福德先生在其办公室里被强制监禁了一夜后<sup>②</sup>，中国外交部于5月8日接到了哈奇森敦请注意有关暴力行为的信，它随即责成中国商业部的一位代表南下上海就该事件进行调查，结果是，兰福德被从警察手中私下保释出来。厄克特事后评论说，这一结果应归功于哈奇森“在北京的干预”，因为“我们都感觉到，在黄华领导下的上海外事局不仅毫无动静，而且似乎还对我们顽固地抱有敌意”<sup>③</sup>。两天后，厄克特又报告说，兰福德正在尽快地把他的办公室迁往天津，名曰在那里监督公司的经营，实则是迈出离开中国的第一步<sup>④</sup>。

在处理另一起劳工暴力事件的过程中，中国当局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据这起事件的一名英国受害事后报告说，劳动局的官员走访了他，就他在被工人拘留时的遭遇向他表示道歉，并且向他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后来，他又从他的职员那里了解到，在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后，那些肇事者已受到惩罚。这位受害者对中国方面的处理办法很满意，但是，他的公司的财政状况并未因此而得以改善，公司正在消耗大量资本，而却没有回收的希望<sup>⑤</sup>。

当时，虽然英国一些在华公司正准备清帐撤离，但他们又不得不慎重行事。5月27日，厄克特就此发电报给英国外交部说，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46FC1106/91。

② 同上，FC1106/110。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47FC1106/116。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48FC1106/125。

⑤ 同上，FC1106/160。

必须“始终如一地反对那些可能会刺激我们的侨民从中国撤离的任何企图”。他接着指出：“尽管美国侨民对前景感到悲观，急于要获准离境，并且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些人在离境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认为是遭到了扣留，但英国侨民基本上还是克制了自己，没有试图过早地强行离境。”<sup>①</sup>厄克特还引用英国商会的估计说，“如果经理们认为可能的话，20多家公司就会立即关闭”<sup>②</sup>。

在撤离中国的问题上，虽然英国公司可能比美国公司更慎重一些，但人们不难看出（和厄克特引用的说法一样），前者之所以还留在中国，和后者之急于离去一样是出于不得已，而不是出于自愿。例如，英国在华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原打算摆脱中方束缚，使它的欧洲职员离开中国，并把公司在华的经营事务移交给中国方面，但是上海税务局官员却不允许这样做，并告诉公司的代表说，“继续经营是公司的应尽职责”。英国外交部的特雷克对此评论道，当中国当局说私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可以起到一部分作用的时候，就等于在说私人经济是有义务起这种作用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sup>③</sup>。

尽管英国商人在中国遇到许多麻烦，但上海的英国商会会长约翰·凯瑟克却看到了一些良好的征兆。6月7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由于上海的许多组织在2月份向联合国递交了对封锁的抗议书，现在这座城市已不再受到台湾飞机的轰炸了。对美国人就其在上海的电力公司遭轰炸一事向台北提出抗议一事，他开玩笑地说：“电力公司身为美国的一家公司也许是很幸运的”，否则我们今天还要遭到轰炸；最近（实际上在同一周之内）已有一些“最初的迹象表明——无论这种迹象多么微弱——作为反通货膨胀收缩的结果，周期性的银根松动又开始了”。凯瑟克希望“这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48FC1106/134。

② 同上，另见FC1108/149。

③ 同上，FC1106/153，FC1108/167。

个微弱的变化兆头”能继续发展下去，而不要象我们一样可能被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吞没。在谈到众多的美国朋友撤离上海并大大减少他们在上海的经营活动时，凯瑟克乐观地希望他们能“返回来”<sup>①</sup>。

与英国商人相比，即便有更多的美国商人离开了中国——情况可能真的如此，那也并不是因为美国商人受到了更糟的对待。实际上，中国人给予美国商人的待遇似乎和给予其英国同行的没什么两样，只是美国商人不象英国商人那样对在中国做生意持比较乐观的估计而已<sup>②</sup>。而且美国官员全部撤出中国一事也使他们更加焦虑不安。当美国政府于1月份宣布撤出其全部在华官员的时候，一些美国在华公司就决定关门离去了。1月25日，美国总领事麦瑞希从上海报告美国国务院说，大部分美国公司的代理人和许多当地雇员，“由于担心遭到威胁、恐吓、关押，以及害怕令人乏味而毫无结果的谈判和不愿徒劳地向警方发出要求保护的呼吁，等等，不仅在感情上厌恶至极，而且还纷纷准备关闭公司，强行离华。总领事馆的突然关闭使各公司除了撤离就再无别的选择了，因为总领事馆存在时，公司代理人们多少能得到一点安慰，起码有烦恼时可以向它倾诉，并能通过可靠的通讯渠道向总公司报告一些实际情况，现在则连这样一点安慰也没有了。”<sup>③</sup>

同英国商人一样，美国商人发现，清理他们的业务和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例如，当上海埃弗雷特轮船公司经理试图关闭这个公司的时候，虽有18名当地雇员表示同意，却因4名雇员表示反对而未能如愿。这4个人是工会的领导，他们要求公司继续营业，并且发给每个人全部的工资，而这时由于封锁的原因，公司实际上已无事可做了。工会的领导人虽然担心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350FC1106/182。

② 见巴特沃斯3月27日备忘录，693·0022/3—2750，RGA59，DSNA。

③ 893·06/1—2550，RG59，DSNA。

上海埃弗雷特公司一旦关闭，就会成为其他轮船公司纷纷效仿的先例<sup>①</sup>。

另外，虽然上海公共事务局宣称私人拥有公共事业不符合共产主义的原则，并且表示美国人所拥有的上海电话公司由政府接收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他们却不急于接管这家公司，也不让这家公司的美国职员马上离开中国。2月5日，一份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发出的电报回答了出现这种情况的三个原因：“（1）假如公司名义上的所有权保留在美国人手中，就能最大限度地榨取美国用于支持电话公司的资金；（2）中国方面仍需要外国的技术使公司维持并发展下去；（3）公司为美国人所有，不失为一项对付国民党飞机轰炸的保护性措施。”<sup>②</sup>不管怎样，公司是不得已才支撑下去的，这种强迫式的经营清楚地说明了它在纽约的董事们为什么要把它从中国撤出。上海市政当局向公司征收了50%的营业税，却一直不许公司为维持起码的开销而提高电话使用费。同时，他们还剥夺了公司官员的所有管理权，强迫公司把它所有的银行帐户转移到人民银行，并规定公司所有款项的支付都要经过中国官员的批准<sup>③</sup>。

几个星期后，上海电力公司的一名代表和国际电力总公司的总经理向艾奇逊发出呼吁，要求美国讨论上海的形势问题。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希望他们能指出，在以上例举的关于中国当局变相扣留美国一些主要公司的经营者的三条原因中，那一条是最合乎逻辑的。他们回答说，三条原因的重要性可能是相等的，但在不同情况下，重要性又不尽相同。在上海电力公司的经营者看来，中国人扣留他们的动机可能是为了对付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而在国际电力总公司看来，中国人这样做则可能是出于使美国方面向公司提供资金的需要，以作为解决社会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手

<sup>①</sup> 见1950年2月14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893·053/2—1450，RG59，DSNA。

<sup>②③</sup> 893·2614/2—853，RG59，DSNA。

段①。

遇到撤离麻烦的还有美国在上海的标准真空石油公司，中国方面不允许该公司的董事们离境。5月5日，公司董事长给艾奇逊写信说，当他们得知所有在华的美国官员及领事代表都要撤走时，就已指示它留在中国的5名董事申请离境许可证，但是，直到最后一名美国官员启程回国时，他们五人中才有一人被允许于4月30日离境，搭乘的是“戈登将军”号轮船。这封信接着说，“石油公司及其他美国公司里的中方工会已经采取了行动，将董事们非法关押在公司的办公室等地方。很明显，在华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的人身安全能否得到保障，取决于我们能否满足中方方向公司提出的过份和非法的要求。”②

到1950年5月，人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之所以阻止那些想关闭他们在中国的公司的英美商人离境，可能主要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中国政府想从这些公司身上捞取最大限度的资金。美国总领事沃尔特·麦康瑞希回国后向国务院报告说，美国在上海的商人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要求“美国政府禁止从美国向中国汇款”，“使中国人不再可能为勒索赎金而把他们当作人质扣押”③。

① 1950年3月14日谈话备忘录，893·181/3—2450，RG59，DSNA。

② 893·181/5—350，RG59，DSNA。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91页。

### 第三章 朝鲜战争的影响

#### 25 台湾的中立

1950年4月27日，在与共产党军交战了大约10天之后，国民党军队放弃了中国南部海域中的大岛——海南岛。5月16日，他们又撤离了作为对上海周围海岸进行封锁的重要基地的舟山群岛<sup>①</sup>。这些事件使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更加低落，而且似乎还意味着台湾自身末日的来临。5月17日，美国临时代办罗伯特·斯特朗从台北报告说：“我和使馆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定，共产党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之间发动进攻。……我们感到减少美国在台工作人员比当初力守舟山群岛还要紧迫。我们不能断定共产党的炮火什么时候出现在台湾上空，但是从现在起随时都有可能。”<sup>②</sup>

斯特朗接着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减少官方人员，“郑重警告全体美国人迅速离开台湾”，转移精密仪器等。他告诉美国国务院说，他将“在6月15日之前，把所有必须转交给英国领事馆的文件准备好”，并“确定出内部和外部的撤离单位”<sup>③</sup>。5月26日，国务院回电斯特朗，同意他关于“尽早和逐步”采取有关措施以便为撤离计划的实施奠定基础的建议，并授权他秘密地与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30—336页。

<sup>②</sup> 同上，第340页。

<sup>③</sup> 同上，第341页。



英国方面“进行全部必要的筹划”，以备万一<sup>①</sup>。

几天以后，斯特朗向英国领事比格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大意是：只有当台湾肯定或即将要被共产党占领的时候，美国官员才会撤离，大概是乘军舰撤离；如果有迹象表明台湾马上就会遭到进攻，美国将向其在台侨民发出撤离警告，并逐步减少它在台的官员。比格斯事后将斯特朗的话向英国外交部作了汇报<sup>②</sup>。

当斯特朗确信台湾的厄运已经来临时，他先立即削减了美国在那里的少部分官方机构，并准备随之撤离全部机构。斯特朗的接任者卡尔·兰金这样描述了他上任时的情景：

当我在1950年8月10日赴任台湾时，我发现我们在这里的外交机构已处于衰败不堪的状态。它已称不上什么大使馆了，简直成了一个主要官员仍是临时代办的领官机关。工作人员已经减少到比通常所说的“骨头架子”还不如的程度。为了免遭共产党进攻时的毁坏，许多一流的办公和家用设备都被运走，建筑物和剩下的设备已破烂不堪，全部需要大修，文件、档案多被销毁。工作仅限于不断地修改撤离计划，并在人员极少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与国务院交流一些时事信息<sup>③</sup>。

当撤离台湾的上述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之时，美国国务院的少数高级官员却已开始考虑对美国的台湾政策来一个彻底的改变。5月18日，出任国务卿顾问才几个星期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国务院政策计划咨询委员会主任保罗·尼采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改变政策问题。随后，他又把备忘录的副本递交给副国务卿韦布。

杜勒斯认为，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中国，世界上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并且朝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的行为仍表现出一种允许那些“未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45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565FC1931/36。

③ 卡尔·兰金：《中国使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第124页。

确定地区”（指美洲和北大西洋条约国以外的地区）落入苏联之手倾向，那么，在类似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样“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美国就将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灾难”，甚至中东石油地区也将处于“危机之中”。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美国应该“迅速采取一种能够显示我们的信心和决心的全新与强硬的立场”。杜勒斯认为，在台湾采取这一立场是最有利的，他说：“如果美国宣布要使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容许它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容许它被用作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这一决策坚持下去，除非苏联发动公开的战争。”<sup>①</sup>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总统所采取的对台政策，就是根据杜勒斯的这一观点制定的。

在收到杜勒斯的备忘录后，腊斯克显然是以他自己的名义把它转交给艾奇逊的，因为我们在美国国务院档案中发现，腊斯克于5月30日给艾奇逊的备忘录与杜勒斯5月18日的备忘录在内容上是相同的<sup>②</sup>。虽然国务院的文件无法说明艾奇逊是否看过甚至是否收到过这份备忘录<sup>③</sup>，但英国方面的资料却可以证明，艾奇逊当时正在参加美国国务院召集的一次关于修改对台湾政策的非常秘密的讨论会。英国大使弗兰克斯在给德宁的信中说，6月5日，艾奇逊在一次“饭后闲谈”中曾经提到：他和他的顾问们正在思考台湾未来地位的问题，国务院“正在伤脑筋地注视着时局，看它是否有助于保持台湾目前这种不能使人欣然接受抑或尚不能确定的地位”。弗兰克斯接着说，“虽然艾奇逊没有把他的意思说完，……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在美国政府中，有一种改变台湾现有地位的急迫情绪，而且，他们也不再那么坚定地奉行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1卷第314—316页。

② 罗伯特·M·布卢姆（在他的著作《划线》第196—196页中）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迪安·腊斯克自3月份接替沃尔顿·巴特沃斯的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职务以来，一直都在试图改变现行对台政策。另见科学《艾奇逊与他的顾问和中国》载于博格同海因里希斯合著《未定之秋》第31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47页注释1。

他们在今年1月时的对台立场了”<sup>①</sup>。弗兰克斯当时未想到艾奇逊可能会赞成对台湾的军事干涉，但他却明显地感到，美国政府将努力使国民党“这个象征性的反共集团不致马上被消灭”。鉴于此，在中国的联合国代表席位问题上，英国不能期望美国的强硬态度会有所改变。

6月22日，英国驻美使馆参赞格雷夫斯写信给英国外交部的约翰·S·H·沙托克，就弗兰克斯的信补充说：“说来奇怪，美国国务院中比迪安·腊斯克地位低些的官员，竟没有一人听说过要重新考虑台湾政策的事，也不知道艾奇逊已经向英国大使谈了有关台湾的问题。”<sup>②</sup>事实上，我们从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中可以发现，至少有两名职位在腊斯克之下的官员——斯普劳斯和麦钱特也参加了台湾问题的讨论<sup>③</sup>。这些美国官员显然是故意对美国大使馆保密的：无论如何，他们都声称自己对美国将要修改对台政策一事一无所知<sup>④</sup>。

据格雷夫斯信中的说法，对于麦克阿瑟将军说服国家安全委员会修改美国对台湾政策的企图，斯普劳斯和麦钱特并不象英国大使馆那样感到担心。英国大使馆所担忧的，是有关美国打算修改其政策的一些传闻——白宫正在考虑发表一个“门罗主义式”的声明；美国陆军部正为把台湾划归麦克阿瑟管辖寻找根据<sup>⑤</sup>。

6月14日，为促使美国政府修改其对台政策，麦克阿瑟将军曾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过一份备忘录——格雷夫斯写信时可能已获悉此事，麦克阿瑟在备忘录中宣称，他确信，“如果与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325FCI0345/2。

② 同上，FCI0345/12。

③ 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47页。

④ 斯普劳斯曾经对格雷夫斯说，杜勒斯正在为主采取强硬立场，“以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但是，他丝毫没有表示美国将改变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声明中所阐述的政策。见斯普劳斯谈话备忘录，1950年5月8日，第311页。83/5—650，RG59，DSNA。

⑤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325FCI0345/12。

我们敌对的力量占领了台湾，美国就会遭受极大的灾难……时间会证明这一点的”。他要求美国政府“授权并命令他立即就防止共产党占领台湾所必需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条件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的结果作为美国制订对台政策的基础，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当麦克阿瑟在东京和杜勒斯讨论他的备忘录时，他很明确地表示希望由他自己进行这项调查，否则“便无法就如何实现我们所期待的目标的问题提出详细的建议”<sup>①</sup>。

6月25日，北朝鲜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说，在朝鲜共和国（指南朝鲜——编者注）遭到进攻的情况下，“如果共产党占领台湾，就将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美国军队在这一地区所履行的必要与合法的职责构成直接的威胁”。鉴于此，他继续说，“我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同时，我也将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停止对中国大陆的一切海空攻击。第七舰队将对此予以监督。”<sup>②</sup>

杜鲁门的上述决定，显然改变了美国原先关于它对共产党进攻台湾的行动不加干涉的政策，这一决定是根据艾奇逊的建议做出的。而艾奇逊的建议，是在6月25日的布莱尔大厦高级晚餐会上提出的，它所参照的，则显然是5月18日杜勒斯备忘录中关于使台湾中立的观点。据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瑟普准备的一份备忘录所载，艾奇逊曾建议说，“美国总统应命令第七舰队驶向台湾，阻止大陆对台湾的进攻，同时也阻止台湾对大陆的敌对行动。他说，在没有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之前，麦克阿瑟不应该去台湾。美国不应与蒋介石委员长保持密切关系，台湾未来的地位可能将由联合国确定。”<sup>③</sup>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86—387页。

② 《1950—1955年的美国对外政策：基本文件》（两卷本）（华盛顿：政府印刷所1957年版）第2卷第2468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157—158页。

美国国务院在发给其外交和领事官员的一份秘密传阅的电报中解释说，总统的决定只是“为保持太平洋地区和平而采取的一项紧急防卫措施，（我们）对有关中国政府的政治问题不存在什么偏见”<sup>①</sup>。这个说法与艾奇逊提出的美国不要与蒋委员长关系过密的建议是一致的。然而，不管怎样，杜鲁门对台湾的防御所承担的义务，不可避免地要对国民党政府的命运产生影响。由于无论是杜鲁门还是杜勒斯都不相信台湾军队的战斗力，国民党人无形中成了美国行动的受益者。在起草完给腊斯克和尼采的备忘录几天之后，杜勒斯曾经同国民党咨询委员会委员、台湾的中国广播公司负责人董显光进行过一次交谈，其间，杜勒斯坦率地表述了他对国民党军队战斗力的怀疑态度。杜勒斯事后说，我当时“不得不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美国官方和公众舆论对台湾军队的战斗力普遍失去信心。流行的观点认为，如果愿意的话，他们（指国民党人——编辑注）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来保卫台湾，但非常令人怀疑的是，他们是否愿意这样做。外界传闻说，有许多领导人包括委员长自己，为安全起见，都在打算离开台湾。过去的一些事实表明，这种说法是可信的。”<sup>②</sup>

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后，杜鲁门虽然把责任推在国民党身上，但美国国内的政敌却指责他说，是他的政府把中国拱手交给了共产党。对此，杜鲁门感到非常恼火。他曾在许多场合表示过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力图说明责任在国民党，而不在他的政府。例如，他在一封写给《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亚瑟·克拉克的没有寄出的信中说：“蒋介石的垮台是自作自受，他是用他自己拥有的武器和弹药将自己推翻的，因为他的将领们把我们给他的装备都交给了共产主义信徒（原文如此）。除非我们派出200万美国军队支援他，否则是挽救不了他失败的命运的，可是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67—368页。

<sup>②</sup> 同上，第343页。

那样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就非爆发不可了。”<sup>①</sup>

尽管杜鲁门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评价很低，但他似乎还是准备接受国民党提供的适于在平原和丘陵地带作战的“一支3.3万人的部队”入朝作战<sup>②</sup>。但是艾奇逊表示，他反对接受国民党的部队入朝作战，这不仅是因为让国民党部队守住台湾比让他们派人入朝作战更有价值，而且还因为，如果在朝鲜战场动用台湾军队，就可能导致中共“在朝鲜或台湾抑或两地同时”进行军事干涉（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尚未开赴朝鲜作战——编者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艾奇逊的意见，并指出，现有的运输工具最好用来运送美国军队和军用物资<sup>③</sup>。根据默尔·米勒所著《杜鲁门自述》中的有关记载，杜鲁门在几年后曾否认说：他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国民党的出兵请求，他认为“国民党军队没有任何用处，以前也从未有过”<sup>④</sup>。

麦克阿瑟也反对在朝鲜使用台湾军队，因为他担心这会给英国在香港的处境带来麻烦<sup>⑤</sup>。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方面婉言谢绝了国民党的出兵请求，理由是：“在对是否有必要削弱台湾的防卫力量而派兵前往朝鲜的问题做出明智的决定之前，最好由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代表与台湾军事当局讨论一下保护台湾岛不受侵犯的计划。”<sup>⑥</sup>

<sup>①</sup> 蒙特·M·普恩编《杜鲁门密信集》（波士顿：布朗·利特尔1982年版）第38页。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189页。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262—263页。

<sup>③</sup> 艾奇逊：《在创世的现场——我在国务院的岁月》（以下简称《在创世的现场》）（纽约：W·W·诺顿1969年版）第412页。

<sup>④</sup> 梅尔·米勒：《直言不讳——哈里·S·杜鲁门自述》（纽约：伯直利1973年版）第304页。

<sup>⑤</sup> 约瑟夫·C·古尔登：《朝鲜战争秘闻》（纽约：纽约时报1982年版）第152页。据艾奇逊说，麦克阿瑟“就象一些共和党参议员那样，也建议在朝鲜使用蒋介石军队”，但是，他的建议“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见艾奇逊：《在创世的现场》第369页。

<sup>⑥</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277页。

## 26 对中立的反应

杜鲁门总统关于派第七舰队到台湾的声明，在北京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在一份正式声明中，周恩来把这种做法称为“美国政府采取的掠夺性的暴力行动”，并说“这一行动并未使中国人民感到吃惊”<sup>①</sup>。的确，中国人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因为在此前的好几个月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通过它所控制的新闻渠道告诉他们，美国正在策划占领台湾的行动。例如，当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会干涉（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时，中共宣传机构说这是企图遮住人们视线的“烟幕弹”，更有甚者，还莫名其妙地推理说，这实际上更加“证实了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的企图”<sup>②</sup>。然而，不管周恩来总理怎样与中国新闻界一唱一和，声称美国的行动不会使中国人民感到吃惊，我们还是有理说，美国的这一行动，实际上使中国领导人吃惊不小，因为在此之前，美国从未使其军事力量介入中国内战。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才使毛泽东在早些时候告诉斯大林说——如果赫鲁晓夫的话是可信的话——，美国不会干涉北朝鲜向南朝鲜的进攻，因为那只是朝鲜的内政<sup>③</sup>。

有些人不愿意相信赫鲁晓夫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向他们证明，在杜鲁门1月5日声明发表的当时，北京并不象它所宣传的那样不相信这个声明。例如，据《人民中国》报道，陈毅元帅的第三野战军（该部队担负“解放台湾”的任务）的副总司令粟裕，虽然在2月份公开承认了解放台湾的困难，但却丝毫没有暗示他的军队将要与美国武装力量作战<sup>④</sup>。杜鲁门6月27日声明发

① 周恩来声明的全文，见《人民中国》1950年7月16日号第4页。

② 同上，1950年1月16日号第4页。

③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波士顿：布朗·利特尔，1974年版）第368页。

④ 《人民中国》，1950年2月16日号第8—9页。另见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第41页。

表后，《世界文化》杂志的一篇文章承认：“在6月27日前，解放台湾是人民解放军与有美帝国主义作后盾的蒋介石残余之间的对抗；而在6月27日后，解放台湾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较量，国民党残匪则退到了背后。”<sup>①</sup>

或许最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6月27日前未预料到进攻台湾会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例子是，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发表以后不久，他们原本相当强劲的解放台湾的气势就减弱下来<sup>②</sup>。鉴于此，乔治·凯南于8月3日向艾奇逊国务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如果我们没有作出象6月27日声明那样的反应的话，共产党军队很可能已经占领了台湾岛。”他认为，“在未来的6周内，他们企图进攻的可能性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如果这种企图在此期间不能实施的话，从目前情况的发展来看要再予实施便根本不可能了”<sup>③</sup>。几乎与此同时，埃夫里尔·哈里曼也向国内报告了麦克阿瑟将军的看法，他说：“麦克阿瑟将军确信，中共目前不会入侵台湾。他得到的情报和照片都说明中共军事力量没有高度集中，尽管他们正在建造一些小型飞机场。他还确信，第七舰队加上供他指挥的菲律宾群岛和冲绳群岛上的喷气式飞机，B-29轰炸机和其他飞机，足可以摧毁对台湾的任何进攻。”<sup>④</sup>大约两个月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份题为“中共入侵台湾的威胁”的备忘录中推断，中共在1950年内不会入侵台湾，否则就要冒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而在这一战争中，中共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sup>⑤</sup>。

当然，与美国作战的危险并未影响中国派遣成千上万的部队

---

① 转引自艾伦·S·阮廷《中国的政策和朝鲜战争》，载艾伦·古特曼编《朝鲜，冷战和有限战争》（列克星顿：D·C·希恩1972年版）第137页。

② 见理查德·C·桑顿著《1917—1980年中国政治史》（博尔德，西方观察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页，书中对中共军队的重新部署作了说明。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60年第1卷第363—364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第6卷，第429页。

⑤ 同上，第530—531页。



到朝鲜去，但需要指出的是，朝鲜的军事环境与台湾大不相同。在朝鲜，毛泽东可以用他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众多的陆军——去反击相对薄弱的美国陆军；但若进攻台湾（在6月27日后），就是强大的美国海、空力量对付处于相当劣势的中共海、空力量了。在中国大陆的內战中，毛若不是以其之长克敌之短，他将无从取得那一连串的军事胜利。人们从中可以悟出一些毛不会贸然进攻台湾的道理。

杜鲁门总统向第七舰队发出命令后，英国的反应至少在一开始是消极的。贝文在给艾奇逊的信中说：“美国以其大无畏的首创精神来处理在朝鲜发生的侵略问题，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全力支持。但是，对于美国宣布的对台政策，我不相信世界舆论会给予同样的支持。”贝文问道：“如果苏联同意帮助朝鲜恢复原状，但要以美国重新考虑其对台政策为前提，美国将如何反应呢。”<sup>①</sup>艾奇逊和杜鲁门总统看过这封信后，心里很不是滋味<sup>②</sup>。

艾奇逊答复贝文的信，被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称为“他在职期间所见到的最伟大、最鼓舞人心的文献之一”<sup>③</sup>。艾奇逊在答复贝文的信中说，美国不会与苏联进行这种交易，美国的立场仍然是：“台湾的最终命运要通过对日和约或联合国解决，总之要以和平方式解决。”但是，艾奇逊警告说，“我们不愿意看到在亚洲目前局势下，台湾不情愿地落入北平之手”。信发出后，艾奇逊又单独给美国驻英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发出一封电报，要求他“向贝文强调指出，这一答复在我们这里是得到最高批准的，它既代表了我个人的强烈看法，也得到了官方完全一致的认同”<sup>④</sup>。

在贝文与艾奇逊交换意见几天以后，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斯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329—331页。

② 艾奇逊，《在创世的现场》第418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376—377页。

④ 同上，第376—377页。

特朗再次向道格拉斯大使强调指出，英国最关心的是，“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亚洲国家对西方国家群起而攻之的局面的行动”<sup>①</sup>。英国这一立场当然不会令人感到新奇，因为它一直专心注目于亚洲特别是印度的对华政策。贝文就向艾奇逊作过这样的说明：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原因，是要保持与亚洲舆论的合拍。基于这个原因，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联合国出兵干涉和美国力图使台湾中立时，英国仍坚持其与亚洲一致的观点，当然，这或许部分是由于受到北京加紧使亚洲舆论反对美国的行动的刺激。

很能说明北京在加紧使亚洲舆论转而反对美国的例子，是周恩来6月28日的声明。周声称，美国煽动南朝鲜进攻北朝鲜，显然是要为它“入侵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周还把美国看作是“东方所有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人民”的共同敌人，并宣布，“无庸置疑，令人痛恨的美帝国主义，作为战争的发动者，最终将被埋葬在民族独立战争的烈火之中”<sup>②</sup>。周对美国的谴责，得到中国新闻机构的附和。例如，1950年7月16日出版的一期《人民中国》，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指责美国“在亚洲的行为是赤裸裸的、野蛮的和完全无端的侵略行径”，同时断言，“美国一直试图阻止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阴谋把亚洲的土地和人民变成其反对以苏联为首的进步人类的后备力量。为此，它在亚洲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半遮半露的侵略行动，在未得逞的情况下，便逻辑地发动了这次朝鲜战争。”<sup>③</sup>

在使亚洲国家转向反对联合国干涉朝鲜事务的立场的努力中，中共尤其注意印度。哈奇森在他7月25日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对印度大使来到北京和中印友好外交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最近的一次正式宴会上，印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349—351页。

② 《人民中国》，1950年7月16日号第4页。

③ 《人民中国》，1950年7月16日号第3—4页。

度大使潘尼迦是唯一和毛泽东干杯握手的人<sup>①</sup>。英国外交部的弗兰克林指出：毛的这个举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亚洲，中国人把他们对美国的攻击与全力赢得印度的同情和支持看作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sup>②</sup>。当然，这更加使英国人急于保持他们对新德里的影响。

当时，尽管北京全力支持北朝鲜对联合国的挑战，印度仍然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直接席位的主要亚洲国家。尼赫鲁总理相信，如果说服苏联重返安理会，朝鲜战争就可望结束。他表示，苏联退出安理会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没有代表席位，故此，使苏联重返安理会的唯一办法，是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同时驱逐国民党的代表）。尼赫鲁的推理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要使人接受，还得看美国是否愿意接受这一推理。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会情愿付出这个代价。在7月18日给尼赫鲁的照会中，艾奇逊坚持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有其自身的法律依据，而不取决于“非法侵略”或对联合国的“强制和胁迫”所造成的影响<sup>③</sup>。在美国的坚持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但不久后苏联代表还是返回了安理会。他的返回并没有促使朝鲜战争结束。

印度对英国的态度所产生的影响，使远东之行中的埃夫里尔·哈里曼非常恐慌，以致他8月份刚从远东返回华盛顿时，便向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抱怨说，联合王国将不得不“在美国和印度之间进行选择”。但是，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对哈里曼的抱怨置之不理，认为从整体上看，这种抱怨不能代表美国国务院和政府的意见，而只是他本人的感情发泄而已<sup>④</sup>。

<sup>①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8FC1022/439。

<sup>③</sup> 关于艾奇逊给尼赫鲁的照会的原文，见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7月31日，第170—171页。关于艾奇逊对中国企图以其它手段换取其代表席位的激法的挖苦性评论，见《在创世的现场》第418—426页。关于对此的不同意见，见斯托克著《通向对抗的道路》第198—202页。

<sup>④</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20FC10345/23。

对于美国的最新对台政策，英国最急于考虑的是把在远东发生的任何新的冲突都限制在当地，“不允许发展成与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全面战争”。7月20日和24日，英美就“当前世界局势”问题在华盛顿召开了研讨会。英国代表“特别强调指出，把中英和中美间的任何冲突都限制在当地的好处是”不仅能避免全面战争，而且还将“使中共政权逐渐脱离莫斯科的可能性得以顺利发展。”<sup>①</sup>英国强烈希望“中共对台湾的进攻能够限制在局部范围”。对此，美国代表指出“这也是美国的希望和意图”。但他们确信，鉴于“总统6月27日声明的性质”，“大陆不会进攻台湾”<sup>②</sup>。

从英国人方面看，他们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并不持乐观态度。英美在华盛顿讨论后不久，弗兰克斯大使便于7月26日写信给国务大臣肯尼斯·杨格说：“在恢复太平洋安全、和平解决台湾和日本问题及联合国对此采取措施期间，对台湾实行全面封锁，或许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方案。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为在适当时期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开了方便之门，但实际上，它带来的前景是令人怀疑的，因为美国已卷入台湾事务，很难从中自拔。”<sup>③</sup>奥利夫爵士（即弗兰克斯——编者注）对美台关系的感受是敏锐的，早在杜鲁门发表1月5日声明时，他就怀疑杜鲁门政府能把其对台不干涉政策坚持下去，现在，他又象预言家似地怀疑杜鲁门6月27日声明，认为美国人似乎不能够象他们考虑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撤回他们保护台湾的许诺。结果证明英国人的看法是正确的，由于1954年美台互相保护条约的约束，美国的保台许诺持续了近30年。

8月10日，在与腊斯克和杰瑟普就台湾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时，弗兰克斯透露，英国内阁完全接受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3卷第1091—1062页。

② 同上，第1663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20FC10345/17。

但起初也担心声明中关于台湾部分的内容会导致“许多麻烦”。虽然英国内阁开始意识到军事中立的重要性，“英国主要官员对此也表示赞同”，但是，麦克阿瑟将军的访台和中国国民党轰炸中国大陆的报道再一次引起了内阁的焦虑<sup>①</sup>。事实上，对于麦克阿瑟访台，华盛顿即使没有感到焦虑，起码也感到不愉快<sup>②</sup>。对于英国人的焦虑，腊斯克向弗兰克斯保证说，美国的政策会牢牢地建立在6月27日和7月19日两个声明的基础之上<sup>③</sup>。这一政策并不是用来作为跳板以达到美国进入大陆或让蒋介石反攻大陆之目的。弗兰克斯认为，有可能“在对中国问题的长远打算中，通过某些共同的理解，寻求到适当的联合国方案”，以减少英美两国在台湾政策上的分歧。但是，当他表达出这个意思时，腊斯克和杰瑟普却回答说，他们“不希望简单地通过决定谁是中国（指由谁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编者注）的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地位”<sup>④</sup>。这一回答所反映的是国务院的观点，即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台湾的命运，而不是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在向英国外交部汇报这次谈说时，弗兰克斯概括地说，杰瑟普和腊斯克已向他保证，“美国的政策是牢牢地把握住台湾的行动，而且这一政策将毫无保留地坚持下去”<sup>⑤</sup>。

在从华盛顿得到这一保证之后不久，英国外交部又从其驻淡水领事8月14日的报告中得到证实：虽然美国人“出于军事扩张的原因”与国民党合力防守台湾，给他们提供军事援助，但无任何迹象表明，国民党会争取到美国人和他们“共同反攻大陆”<sup>⑥</sup>。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431页。

② 见艾奇逊著《在创世的现场》第422—423页。

③ 后来，杜鲁门在给国会的一份特别咨文中重申了美国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见《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哈里·S·杜鲁门，1950年》第531—532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432页。

⑤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20FC10245/26。

⑥ 同上，FC10345/27。

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在前几周就努力向国民党说明了杜鲁门6月27日声明的完整含义。例如，在7月21日发给驻台北的斯特朗的电报中，国务院告之它已获悉国民党政府按其6月28日的保证暂停了对大陆的海、空军事行动，但又指示斯特朗说，要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清楚地知道”，第七舰队奉有明确的命令执行杜鲁门6月27日的指令，违反这一指令将被视为中国政府对自己所作的保证的破坏<sup>①</sup>。在7月22日给斯特朗的另一封电报中，艾奇逊指示他通知国民党外交部长叶：杜鲁门总统6月27日的声明不适用于金门、马祖等近海岛屿；一旦共产党发动进攻，除台湾和澎湖列岛外，美国不参与保护国民党控制下的其他岛屿的行动，但也不妨碍国民党保护这些岛屿的努力<sup>②</sup>。

有趣的是，鉴于国民党仍控制着金门和马祖岛的事实，当叶告诉斯特朗国民党中国政府将不顾金门岛“对中美的极大重要性”而正在考虑从那里撤出时<sup>③</sup>，斯特朗的感觉是“中国政府（指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编者注）要从金门撤出的意思已很明确”，美国人将成为“十足的替罪羊”<sup>④</sup>。关于这个问题，8月8日英国外交部从其驻华盛顿大使馆接到一份报告，其中谈道：有一个美国国务院官员“几天前”还向我们提到有关“国民党要从金门撤出的传闻，……可现在却推测说，由于麦克阿瑟的访台，他们很可能决定不撤了”<sup>⑤</sup>。毫无疑问，麦克阿瑟的访台，极大地鼓舞了蒋介石，但说国民党认真考虑过尽早撤出金门的问题，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到一年前，他们曾在金门击退过共军，这是他们少有的军事胜利之一。

尽管如此，国务院为向国民党进一步解释杜鲁门6月27日声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85页。

② 同上，第387页。这种政策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是一致的，见同上书第328—380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88页。

④ 同上，第390页。

⑤ 《美国外交文件集》37L/83320FC10345/18F。

明，于7月24日仍指示斯特朗：告诉外交部长叶公超，“假若中国政府在海、空侦察中不夹入对大陆的进攻性军事行动，美国政府就不会阻碍这种侦察。”<sup>①</sup>华盛顿不仅允许国民党的侦察，而且还准备协助其侦察。例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于7月30日授权麦克阿瑟将军说：“在你认为必要的时候，可在32度纬线以南中国沿岸上空进行周期性的飞行侦察，以确定是否存在对台湾发动进攻的危险。”<sup>②</sup>美国还准备允许国民党海军阻挡中国船只在这个地区进行的“视察和巡逻”，但对外国船只所进行的类似活动则不能阻止<sup>③</sup>。

鉴于对台湾承担的保护责任，这时美国对国民党保卫该海岛的能力比6月27日前更感兴趣，并改变了它以前限制对国民党出售军事装备的政策。新政策是在7月19日国防部长约翰逊给艾奇逊的信中提出的，内称：“为了增强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中国国民党政府应有权用自己的资金购买美国控制下的任何物资，包括坦克和喷气式飞机。……这些货物的装运应在美国的帮助下顺利进行。”<sup>④</sup>艾奇逊对此表示赞同<sup>⑤</sup>。

这会使人想起，早在几个月前，美国已停止向国民党出售坦克和喷气式飞机，现在，美国人做法的改变至少对英国人是一点安慰，因为他们一直担心台湾陷落（他们估计肯定会这样）后，共产党会缴获这批武器并把它们用来进攻香港。8月23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绝密备忘录中，就改变对台政策问题向英国大使馆作了基本说明，首先讲了国民党从美国那里得到军需物资的各种方法（包括1948年援华法案规定的1.5亿美元的拨款），然后解释说：“鉴于远东局势的发展对美国在那里的防务提出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91页。

② 同上，第395页注释1。

③ 同上，见第523页。

④ 同上，第383页。

⑤ 同上，第383页注释1。

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使台湾的防御变得重要起来，故决定，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喷气式飞机和中、重型坦克符合美国和台湾加强远东防务的追加需要的话，从逻辑上讲，美国政府就不应继续禁止向中国政府（指台湾国民党民政权——编者注）出口这些装备”<sup>①</sup>。

## 27 对贸易的影响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依据的，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2月制定的41号文件 和 同年12月29日制定的48/2号文件。后一个文件的标题叫“美国对亚洲的立场”，它重申了41号文件的精神，并清除了“41号文件在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含糊之处”<sup>②</sup>。例如，48/2号文件禁止向中国和苏联出口 IA 类可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材料物资，但允许向中国出口 IB 类可能具有军事或战略价值的多用途资本货物，不过，这种出口要有“数量限制，并在国家控制下进行”。关于与中国进行的“非战略商品贸易”，规定不许设置障碍<sup>③</sup>。

朝鲜战争初期，美国虽然采取了进一步的限制措施，但这一对华贸易政策仍基本上坚持实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仍未中断。所谓进一步的限制措施，主要是把石油产品的出口量限制到其所估计的最低民用限度。根据这一估计，对华石油产品出口量只及原来的四分之一。国务院把这一规定通知了美国在华的两大石油公司——标准真空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并让它们遵守这一规定<sup>④</sup>。但联合国军队出兵朝鲜不久，国务院即令这两家公司“暂时中断对共产党中国的石油产品输出，并停止所有合同的商议或追加货物的装运”。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建议英国大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444—448页。

② 同上，第621页。

③ 同上，第619—620页。

④ 见同上书第622—626页。



使馆说，英国在华第三大外国石油公司——谢尔石油公司也应采取类似的措施<sup>①</sup>。

起初，英国的反应有点含糊其词。英国外交部不愿劝使谢尔公司中断对共产党中国的石油产品出口，但表示可让谢尔公司不再扩大出口，同时解释说，对中国的需求而言，谢尔公司的出口数量无论如何都只是杯水车薪，“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sup>②</sup>。7月13日，艾奇逊在再次向弗兰克斯大使提出这一问题时说，美国公司都已自愿地中断了对中国的石油运输，英国应该意识到，在目前形势下，“对中国尤其是对华北实行完全的石油禁运是至关重要的”。弗兰克斯回答说，英国军界有可能支持美国石油禁运的立场，然而政界的态度可能是消极的<sup>③</sup>。但仅隔三天，弗兰克斯又通知艾奇逊说：“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征用全部石油物资，以作为对华禁运最有效、最简捷的手段。”<sup>④</sup>

此后，在英国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的会晤中，英方又阐明了把征用香港的石油产品作为阻止“英国石油流入中国”的最佳手段的缘由。实际上，英国政府不愿被人看成是在扮演一个歧视中共的角色；它想使一切行动都由英国政府而不是由香港当局来采取，以此来保护谢尔公司及其在华职员。与此相应，英国海军部开始征用在香港的所有石油产品，其中也包括美国公司掌握的产品<sup>⑤</sup>。

英国政府为了不给人留下“英国在对华问题上单方面与美国合作的印象”，要求美国寻求其他西方国家的合作，一道来采取对“所有苏联集团国家”的石油禁运措施。7月28日，参加“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译者注）的诸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5卷第640页。

② 同上，第642—643页。

③ 同上，第647页。

④ 同上，第650页。

⑤ 同上，第651页。

国政府一致同意，将6种石油产品列入“国际禁运货单I”之内，并规定，所有参加“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的国家，都不要把这些产品运往苏联、东欧、北朝鲜和中国<sup>①</sup>。

为了进一步避免给人以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英国政府也将石油产品禁运措施应用于台湾。继香港当局拒绝允许卡尔泰克斯石油公司向台湾出售航空汽油之后，9月13日，英国大使馆又通知美国国务院说：“联合王国和香港必须对中国大陆和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实行同等禁运。……如果想说明香港对中国禁运石油是由于英国军事需要的话，英国此举是非常必要的。”<sup>②</sup>

大约在朝鲜战争爆发三周之后，“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了一次会议，特别强调要“把最近通过的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政策应用于北朝鲜和中国”<sup>③</sup>。这正是美国一个时期以来所一直期待的目标。早在6月8日，艾奇逊就通知美国商业部长查尔斯·索耶说，国务院认为，“对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实行的IA和IB类物资的出口限制，应同时应用于中国。”按照这一政策，IA类物资应全部“非正式地禁止”向中国出口，不许有任何“以国家利益”为名的例外。至于IB类物资的出口限制的实施，也应基本上一视同仁，但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例外：一是“如果该项物资正由英国或其他西欧国家向中国供应，美国单方面禁运只不过是把市场转移至西欧时；”二是“禁运某项IB类物资可能严重危及美国在华人员及财产的安全”时<sup>④</sup>。

在“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中，美国与其他会员国相一致的地方是：对苏联和东欧实行的贸易控制原则和条款也要应用于中国。但在如何区分具体的禁运货品——即一种货品是属于IA类还是属于IB类或者它是否具有战略价值的问题上，美国和其他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638页。

② 同上，第660页。

③ 同上，第650页。

④ 同上，第699页。

会员国的看法则有巨大的分歧。不仅如此，在此类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例如，几个月前，当西德提出向中国输出15吨铁轨时，五角大楼认为这属于IA类物资，对中国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国务院则认为输出这些铁轨不会有什么危害，属于IB类的民用物资<sup>①</sup>。

在美国政府以及“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内部存在的此类分歧，无疑会使对华贸易受到抑制。但是，这种抑制不是绝对的，对华贸易仍在继续进行，甚至在某些领域还有所扩大。对于一些同中国做交易的英国公司来说，由于朝鲜战争，其生意越做越好，因为中国当局对于进口工业设备的兴趣越来越大。

然而，由于中国在朝鲜战争前长期执行的政策，另外一些主要业务在中国的英国工商企业则继续向下衰落。伦敦商会秘书在致英国商务部大臣的一封信中，认为中国政策的“重大”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日益倾向于建立国家贸易机构，并压制或吞并私人企业”。他建议，在中英建交条件中，应包括允许中英两国商人在对方国家中自由贸易这一条。伦敦商会同时也承认，无论如何，“在实际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允许它自己国家的民间商人到我们这里来的。”<sup>②</sup>

尽管人们能够理解由于条件变化而出现的对华贸易中的挫折，但是，伦敦商会的建议仍令人遗憾地表明，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革命是一无所知的。商务部一位官员礼貌而不失官腔地答复了该商会的建议，大意是：陛下政府不能因自由贸易的条件而损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但可以向商会保证，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将尽一切可能关照私人企业的利益<sup>③</sup>。

几个星期之后（8月23日），由主席W·J·凯瑟克率领的英国商会中国协会代表团访问了英国外交部，询问英国政府是否

<sup>①</sup> 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625—635页。

<sup>②③</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51FC1106/197。

准备保护英国在华工业公司不受损失。事后凯瑟克回忆说：在与中国协会的会见中，外交大臣贝文表示，希望英国在华企业能“坚持下去”。凯瑟克回答说：外交部应该知道，这些企业已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除商人、银行、保险公司“或许还能再坚持一个时期”外，工业家们都在准备收拾行李回家了。同时，中国协会还希望外交部知道，他们所焦虑的是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可能会使中国人对联合王国产生敌意，所担心的是国民党布设的水雷和他们对英国海上运输的攻击<sup>①</sup>。

外交部在与商务部磋商后，通知中国协会说，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英国企业应该“在中国可能的一些地方坚持下去”，但是否坚持应由这些企业自己决定；政府不能保证英国在华企业的利益不受损失<sup>②</sup>。商务部向外交部说明了拒绝为英国在华企业提供保护的两条原因：一是在其他一些国家的英国企业同样处境维艰，政府不能只偏袒在华企业；二是保证这些企业不受损失的努力会促使中国虐待这些企业。这里所说的虐待，大概是指中国会向那些已经亏损的外国企业提出过份的要求，并使它们不得不从本国取得资助，进而使中国获取她所需要的外汇和税收<sup>③</sup>。

不过，总的看来，朝鲜战争的爆发似乎并没有影响中国对外国在华公司的态度。实际上，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在9月7日报告英国外交部说，情况倒变得“有点好转”。这主要是由于“税收减少了”<sup>④</sup>。同时，朝鲜战争爆发前的那些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例如外国企业“无权减员”，“中国政府日益垄断”，等等，致使工业公司“主要靠消耗库存”勉强度日，而且还要满足其他一些公司的“资金要求”，尽管要求额不象以前那么高。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51FC1106/206。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52FC1106/215。

③ 参见《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52FC1106/216。

④ 同上，FC1106/213。

## 28 英国残存的立足之地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预备性和程序性会谈便一直未能重新开始。中国人好象一直对此兴趣不大，尽管英国尽了最大努力来满足中国方面的要求。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R·H·斯科特曾写信给哈奇森，询问中国方面是否真心希望与英国建交。9月11日，哈奇森回信说，他相信“中国人并不认为我们会非常迫切地、不惜任何代价地与之建交。……另一方面，有迹象表明，他们也不急于和我们建交，因为我们已经向他们做出了足够的表示希望和解的暗示和说明，如果他们愿意同英国建交的话，早就应该感到条件充分地满足了。”<sup>①</sup>哈奇森认为，中英谈判未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英国人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而中国人又认为英国是美国的卫星国；鉴于中美和苏美关系的现状，中英两国要建立一种“真诚的关系”是很困难的。他还注意到，尽管中国人对他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持“礼貌和友好的态度”，但不能由此而做出太多的判断<sup>②</sup>。

在中国方面，周恩来一再表示对英国政策的强烈不满。9月9日，潘尼迦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事后他报告说：周表示他并不担心英美关系，因为他不幻想英国会为了与中国友好而反对美国，他感到不安的倒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继续“支持国民党”<sup>③</sup>。潘尼迦还把这一谈话内容通报了哈奇森，并失望地说，他以前认为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同英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想通过他来促成建交谈判，可现在他却不这样想了。英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4FC1022/483。罗伯特·斯科特当时刚从东南亚司司长升任助理外交次官，他从1930年以来在中国工作过很长时间。

<sup>②</sup> 同上。这些观察表明哈奇森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中国外交官员给予他和他的职员友好待遇，哈奇森至迟在五月份就开始予以重视了。

<sup>③</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4FC1022/480。

国外交部的弗兰克林评论说，印度大使“总是愿意持乐观态度，并为中国政府开脱”<sup>①</sup>。后来，哈奇森在一份电报中承认：“潘尼迦在与我的交谈中，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他自己的观点与周恩来先生提出的观点有什么不同。”<sup>②</sup>

时隔不久，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公开解释了中英谈判失败的原因，他说“我们与英国方面的马拉松式的谈判，迄今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他认为，“其原因是英国政府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政府的同时，又在联合国承认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的合法性，让他们继续占有中国的席位。……对在香港和其他一些地区的中国居民，英国的态度是极不公正和极不友好的，这不能不引起中央人民政府的极大注意。”<sup>③</sup>

周所指责的英国“极不公正和极不友好”的态度，也是章汉夫先前所抱怨过的。6月17日，当章最后一次会见哈奇森时，批评香港的移民限制政策是英国对中国不友好的明显一例<sup>④</sup>。实际情况是这样的：4月底，英国重新修订了移民法，其目的在于阻止大量涌入香港的中国移民，因为这些移民使香港的人口膨胀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根据新的移民法，讲南方方言以及与香港方面有业务往来或其他关系的中国人可被允许入境；而讲上海话或其他北方方言的中国人则不允许进入香港，除非有极充分的理由<sup>⑤</sup>。结果，中国政府对于“英国当局对中国人进入香港的限制政策”提出了正式抗议，认为这一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是极端无理和不友好的”。同时指出，在过去的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4FC/1622/476。

② 同上，FC1022/481。

③ 《人民中国》，1950年10月16日号第6页。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4FC1022/404。

⑤ 见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给国务院的电报，1950年5月2日。893.181/5—250，RG59，DSNA。

100年里，“中国人从来不是以外国移民的身份出入香港的”<sup>①</sup>。

中国方面一再谴责英国对中国移民的不公正态度，并且不理睬英国在联合国就中国代表席位问题所进行的调解努力，尤其拒绝与哈奇森恢复谈判，等等，都明显表明中国政府已对中英建交失去了兴趣。

当然，英国并未与中国政府完全断绝关系。根据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英国临时代办（英国人是这样称呼的，而中国人则不承认）仍在向中国政府陈述如下问题：英国在商业方面对中国的兴趣；允许英国巨民在中国出入；英国的海运受到的攻击；在香港避难的国民党军人，等等。尽管哈奇森通常得不到答复，却也偶然地能得到一些结果<sup>②</sup>。哈奇森虽因中英无外交关系而难于见到毛泽东或周恩来，但却想方设法地与中国外交部西欧和非洲司司长会见了几次，并责成自己的工作人人员大约每周到外交部走访两次。另外，他的办事处也与中国外交部保持着正式和非正式的通信联系<sup>③</sup>。这在事实上就使中国方面被迫接受了与英国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对英国人来说带有某种程度的屈辱性质，但伦敦若想在华得以继续立足，有这种关系毕竟比根本没有要好一些。

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当时它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已经根本断绝，但因为有几百名美国公民仍居住在中国，故使它与驻留在中国的英国官员形成了一定的共同利害关系。朝鲜战争爆发时，尽管居住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人是自愿留下不走的，但仍有一部分人不愿继续留在那里了。他们之所以走不掉，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批准他们离境，就是因为他们已被监禁起来。为了这些被阻留在中国的美国人，英国在华官员曾一再向中国当局提出陈请。

<sup>①</sup> 领事馆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1950年8月10日，893.1846G/5—1050，RG 59，DSNA。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5FC1022/504。

<sup>③</sup> 同上，FC1022/507。

朝鲜战争爆发之际，仍有4名美方飞行员被关在中国的监狱中。与当年5月8日被最终释放的史密斯和本德不同，他们都是民航飞行员。美国方面不仅依靠英国向中国当局提出陈请，要求保护这些美国人的利益，而且往往只有通过英国领事馆官员，华盛顿才有可能获得关于这4名被关押者的可靠消息。例如，美国国务院所得知的美国飞行员卡登和麦高恩被拘留的消息，就是由英国驻昆明总领事埃瑞克·希普顿提供的。卡登和麦高恩说来也很不走运，当他们于1949年12月23日驾驶亚洲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在昆明着陆时，正值卢汉将军发动兵变向共产党投诚不久。尽管飞机是在菲律宾注册登记的，卢将军还是没收了飞机，并将两名飞行员扣留<sup>①</sup>。希普顿开始很担心这一扣留行动会导致“严重后果”，可是共产党在接收昆明后，竟允许卡登和麦高恩享有6个月左右的“完全地区性的自由”。这似乎使希普顿感到一些安慰，可6个月过去后，中国人借口“保护他们的自身安全”，还是将他们看守起来<sup>②</sup>。

在北京，哈奇森写信给中国外交部，要求尽快释放卡登和麦高恩。但是，和以往一样，哈奇森没有得到任何答复。鉴于此，8月14日，他再次给外交部写信请求释放这两名飞行员，并要求允许他们与家人通信<sup>③</sup>。这次与以往不同，昆明政府以释放行动做了答复。这是不是哈奇森的请求奏了效，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

1950年8月23日，英国驻昆明副领事亲眼见到卡登和麦高恩被武装护送到西域门。他在报告中说，“他们看上去是不愉快的”<sup>④</sup>。三天后，副领事被召至警察总部，在那里得到卡登写的一封信。信中说，当副领事读到这封信时，两名飞行员可能已经踏上了归乡之路。10月2日，副领事收到卡登从离中国边境不

① 同上，FC1581/1。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498FC1581/47。

③ 同上，FC1581/57。

④ 同上，FC1581/60。



远的城镇腊戍拍来的电报，说他们已平安抵达腊戍<sup>①</sup>。到达菲律宾后，卡登告诉美国在马尼拉的外交官员说，英国驻昆明领事馆官员在援助美国侨民离开中国一事中，采取了最合作的态度<sup>②</sup>。

英国的努力得到美国国务院和那些靠英国帮助提出请求的美国人的特别赞赏。例如，斯密斯和本德于5月获释后，美国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写信给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弗兰克斯，感谢他们在以上两人获释过程中给予的合作，并特别对英国驻北京代办和驻青岛总领事的工作表示感谢。韦布说，他们的努力“可能为这次事件的圆满结束立下了汗马功劳”<sup>③</sup>。

然而，尽管英国所做出的努力得到华盛顿的赞赏，而且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英美在向中共提出陈请或抗议时，并不总是观点一致的。例如，6月20日，驻伦敦的美国大使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7名美国商人为得到离华许可证不得不在上海长期滞留一事，认为中国的作法“违反了国际公认的行为规范”。美国大使要求英国政府指示其驻北京临时代办，就此事提醒中共最高层人士注意，除非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这一事情作出反应，否则，美国政府将“不得不把此事交给联合国处理”<sup>④</sup>。但是，临时代办哈奇森告诉英国外交部说，他认为美国的言论是“判断失当和不明智的”，“可能会使中国政府感到极其愤怒，并使许可证的签发时间被拖延得更长”。在哈奇森看来，经验已经“充分地证明，只有用礼貌和理性的接近方法，才能取得最大的成功机会”。他要求美国国务院允许他自己决定在什么时间和用什么语言向中国方面交涉<sup>⑤</sup>。对此，美国国务院的回答是：“在开始的时候”，哈奇森可以自作主张，但如果在“适当的时间”

① 《美国外交文译集》3:1/83498FC1581/51。

② 同上，FC1581/69。

③ 同上，FC1581/45。

④ 同上，FC1581/51。

⑤ 同上，FC1581/52。

内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他就应该按国务院原来的要求进行交涉<sup>①</sup>。

事实上，无论英国代表怎样努力，他们为被阻留或拘押的美国人所进行的交涉却不是经常能够奏效的。当时，有另一起与卡登和麦高恩事件相类似的事情发生，这就是在卢汉将军发动兵变的当天晚上，（陈纳德经营的）中国民航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的两名飞行员曾驾机着陆于云南省的勐策。地方当局没收了他们驾驶的飞机，且不准他们离开勐策。1月21日，驻伦敦的美国大使将这一消息告知了英国外交部，并希望英国在华官员立即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这两名美国飞行员。英国外交部马上将美国的请求转告给英国驻昆明的总领事希普顿，并询问他采取什么行动才能搭救这两名飞行员<sup>②</sup>。

希普顿在答复中指出，这一事件很复杂，因为他曾听说（陈纳德经营的）中国民航公司一直打算将中国国民党第26军从勐策空运到海南；如果能弄清该公司在勐策的真实业务情况，将有助于他的工作。当然，他表示同时要就此事与中国方面交涉。至于结果怎样，他说，不要指望这次交涉能比为卡登和麦高恩所做的交涉更有成效<sup>③</sup>。3月3日，希普顿又报告说，那两名飞行员——布奥尔和若贝尔，随同（国民党的）中国航空公司的8位人员和10名政治犯一起<sup>④</sup>，被带到昆明监禁起来。几周后，驻伦敦的美国大使通知英国外交部：“据陈纳德将军说，中国民航公司是从事从勐策空运锡精矿石到海南的业务。”陈纳德承认，有一些中国国民党官员可能已经搭机飞到了国外<sup>⑤</sup>。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感到，“即使飞机运送的主要货物是锡精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98FC1581/52。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97FC1581/6。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98FC1581/5。

④ 同上，FC1581/16。后来证明，若贝尔是哥斯达黎加人，而不是美国人。

⑤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497FC1581/24。

矿石，而不是国民党官员，我们还是应该了解一下，这些货物是否属于军用物资，布奥尔机长是不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命令下行动的”。早些时候，英国外交部法律司曾认为，“似乎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布奥尔在帮助国民党军队”。鉴于这些新的情报，英国外交部如果再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要求责成其驻北京的临时代办接手这个案子的交涉工作，就会不合情理了<sup>①</sup>。使英国政府不愿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英国正在请求中国释放另一名美国飞行员詹姆斯·麦戈文上尉，如果在这一事件未了时再引入布奥尔事件，可能会影响英国为释放詹姆斯·麦戈文上尉所做出的努力。詹姆斯是于1949年12月4日在中国南部强行着陆时被俘的，据说他正被关在南宁的一所监狱中，且疾病缠身<sup>②</sup>。鉴于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释放布奥尔是没有道理的，英国外交部乃指示哈奇森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布奥尔地区性的活动自由，并请求允许驻昆明的英国总领事希普顿去看望他<sup>③</sup>。

在从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得到了有关布奥尔被拘留前的活动情况的进一步消息后，英国外交部又于10月5日指示哈奇森，如果看不到有什么障碍的话，就请求中国政府释放布奥尔。英国外交部指出，布奥尔已经被拘留了9个月，“显然未经过审讯，而且在我们看来拘留他也没有什么理由”<sup>④</sup>。10月14日，哈奇森按照指示的要求向中国方面提出了释放布奥尔的问题，但是直到年底也未见布奥尔获释，英国外交部也没有再费心去回复哈奇森的奏报<sup>⑤</sup>。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33407FC1581/35。

② 同上，FC1581/25。

③ 同上，FC1581/23。

④ 同上，FC1581/67。

⑤ 同上，FC1581/73。布奥尔又在监狱中被关了5年，当他1955年9月获释时，体重只有100磅，出狱后3个月他就死了。詹姆斯·麦戈文比布奥尔早获释几年，但是，在莫迪府陪都前一天，他被越盟的高射炮火打死了（他的同伴都称他为“厄斯麦克·麦克思”）。见陈纳德《一千个春天》第333页。

## 29 焦点在联合国

朝鲜战争爆发前不久，在如何对待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的问题上，美英两国就已经分道扬镳了。1950年6月中旬，英国决定投票赞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这个决定招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尖锐批评。英国大使报告说，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政府一直试图使国会两党的观点取得一致，现在，正当有迹象表明其努力快要收到成效的时候，英国政府却作出了这一决定，这尤其使艾奇逊感到不安<sup>①</sup>。

在评论英国大使的报告时，英国外交部美洲司的A·R·K·麦肯齐警告说，即使美国国会两党就对华政策达成了一致意见，也不应该认为这就意味着美国会承认中共政权，或者是美国消除了它与英国立场的分歧。他认为，虽然应该积极地对待和考虑美国政府的姿态——因为它已引起了公众舆论界的重视，但是，如果英国外交部满意自己现行的承认政策，那么英国就应该继续执行之，并投票赞成北京的代表进入联合国；至少在美国11月选举之后，英美两国才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希望<sup>②</sup>。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支持英国立场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了。艾奇逊在一份给贝文的电报中概括了美国的态度：

对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美国并没有什么不公开的想法，但是我们的确强烈地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联合国按其是非曲直加以解决。……（a）在共产党对朝鲜有侵略威胁或者（b）苏联在联合国缺席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联合国还不能公正地处理此事，也不会以给予北京代表席位作为其报答。如果它们停止了这种高压性的行动，联合国就可以用一种正常的方式解决中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两个政权同时就一个席位提出要求，这种情况还是史无前例的。也许，在联合国进行充分的讨论之前，中国代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63292FC1022/423。

<sup>②</sup> 同上

表的席位可以先空出来①。

到8月1日，苏联结束了它的缺席行动，但是，共产党对朝鲜的侵略威胁却依然存在着。9月14日，在英、法、美三国外长会议上，艾奇逊再次明确地说，联大会议一开幕，美国就将竭尽全力去击败想要接受北京代表团进入联合国的任何企图②。9月19日，美国的努力成功了。

尽管如此，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仍然乐观地指望美国改变其政策。贝文参加了联大的开幕式，他从纽约给国内的外交部打电话说：“虽然要到选举之后才能有产生实际结果的希望，但是从报界情况和可靠的消息来看，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我由衷地认为，假如中国政府能克制地使自己的行动显得温和一些的话，它的代表在几个月之前就会被联合国接纳了。……但是，中国荒谬地认为，美国怀有侵略它和朝鲜的企图。”③

与此同时，周恩来于8月24日向苏联代表雅科夫·马利克（任联合国安理会8月份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递交了一封信，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这使英国对美国的台湾政策有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增添了一份担心。周恩来在他的信中声称：“联合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谴责美国政府侵略中国领土的行径，并且有责任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促使美国从台湾和其它中国领土上撤走其全部侵略军队。”④

8月25日，贝文在给弗兰克斯的指示中对此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美国政府必须修改其对台政策，理由是，美国的现行政策不可能在联合国获得多数国家的广泛支持。由于北京政府已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348—350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322FC10345/69，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3卷第224—225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4FC1022/489。

④ 关于周信原文，请看《人民中国》1950年9月1日号第4页。

经对安理会在中国代表席位问题上采取拖延办法的行为提出了谴责，贝文主张立即“争取尽可能多的大国达成协议，执行同一方针”，而这个方针首先必须征得美国方面的赞同<sup>①</sup>。

按照贝文的指示，弗兰克斯大使与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进行了三次会谈（艾奇逊参加了其中于8月31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双方就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执行一种什么样的政策的问题交换了意见<sup>②</sup>。通过这几次会议，英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和分歧之处都具体化了，一份在9月1日为英美法三国外长会议准备的备忘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双方一致同意“不管怎样确定台湾的最后地位，在研究中都必须考虑到《开罗宣言》的有关规定”，但是，至于这一宣言的重要性，双方却持不同看法。英国认为，如何确定台湾最终的地位，关键应注意《开罗宣言》的有关规定，而美国则不以为然，认为《开罗宣言》大可不必看重<sup>③</sup>。双方都一致认为，台湾暂时的军事中立化与其最终地位的确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对于台湾在将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令人满意的选择——与大陆统一，独立（可能通过全民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还是由联合国托管——的问题上，双方的意见毫无共同之处。英国怀疑进行全民投票表决的可能性，认为台湾独立“是与《开罗宣言》的规定背道而驰的，而且，这对于中国两党来说也都是无法接受的”。另外，在英国看来，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某些行动与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并不十分合拍，台湾的军事中立化只不过是美国政府的一厢情愿<sup>④</sup>。

英国和美国一致认为，应该由联合国成立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来负责处理台湾问题，但是，在到底应赋予这个委员会以什么具体职责的问题上，两国又产生了分歧。英国政府的意见是，要由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320FC10345/26。

② 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464—468、473—475页。

③ 关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请看《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98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478页。

它规定出把台湾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并且确定出实现这一移交的各项条件<sup>①</sup>；而美国政府则提出，应该由这样一个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一项适当的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sup>②</sup>。换句话说，英国主张先确定台湾问题的解决办法，而美国则试图通过考虑（在其它一些事情上）台湾当地居民的意愿，使这个问题悬而不决。

使美国政府稍得安慰的是，美国国务院保证说，对于台湾未来的地位它持一种未定论的主张。但美国这种模棱两可的意图却使中国国民党政府深感不安。8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假如朝鲜问题获得解决，美国就没有必要在台湾海峡保留第七舰队。”<sup>③</sup>另外，对美印两国关于中国问题的谈判，以及印方强烈呼吁从联合国驱逐国民党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取而代之等问题，报界也都作了报道，所有这一切都更增加了国民党的担忧。

9月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向新到任的美国驻台北临时代办卡尔·兰金表达了国民党的不安。同一天，兰金用电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下面是对这个汇报的摘录：

叶对最近关于中国国民党政府、军队和台湾居民的一系列报道感到悲哀。他知道美国准备让联合国调查它对台湾的“侵略”问题，但是，他担心目前进行这种调查为时尚早，……（因为）大批台湾人将会把联合国的调查看成是直接针对国民党政府而非美国的侵略的行动。

叶希望美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台湾现在已成为亚洲最和平与安定的地区之一……（国民党）在改善政府效能、经济和军事状况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近的一些事件以及由于美国公开宣布台湾未来地位必须和日本一起等待和平解决而引起的谣言，都给台湾造成了不安。叶认为，如果美国能公开承认台湾现在已经十分稳定的事实，并且愿意为台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467页。

② 同上，第475页。

③ 《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哈里·S·杜鲁门，1950年》第307页。

湾进一步消除不安因素，那将是十分有益的。对于台湾问题来说，无论是限期“由联合国讨论”解决，还是采取一种“国际行动”来解决，都可能意味着这样一个结果，即：任何处于酣睡之中的台湾人都会在醒来时发现，他们处在一种国际权力的控制之下了，这必将导致混乱，而中共将会在混乱中占领台湾<sup>①</sup>。

有趣的是，叶公超并不反对把台湾未来地位的确同日本问题的和平解决联系起来，也许他认为，苏联和中共将不会参与这样一种解决方式。然而，兰金在回忆录中讲到他与叶的这次谈话时说，叶反对把台湾问题同日本问题相联系<sup>②</sup>。这是令人难于理解的。

收到兰金的报告后，美国国务院做出了反应。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外面有一种谣言，认为印美谈判是“拿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做交易，谋求托管台湾”，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国务院重申，有关台湾的任何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而非军事的办法加以解决。美国的这一表示也许可以安定国民党的人心，但是，美国的声明又说，台湾问题无论是按照日本和平条约的规定来解决，还是由联合国讨论解决，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都将是多边的和按照常规渠道进行的”<sup>③</sup>。国民党对此依然心怀忧虑。

美国国务院还同时向兰金发出了指示，要求他在和国民党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提醒他们，“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并不普遍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它不应该拒绝通过国际渠道解决台湾问题<sup>④</sup>。虽然这种说明明显地反映了美国国务院对政治现实的观察，但它在技术上却是错误的。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是承认国民党政府的。

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说，印美谈判的目的在于“寻找中国干涉

---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484页。

② 兰金：《中国使命》第65页。

③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485页。



朝鲜的证据”<sup>①</sup>，但是，对于美国对台湾的意图，印度也通过谈判转达给了北京方面。9月3日，美国大使洛伊·亨德森向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吉尔贾·巴杰帕依爵士递交了一份非正式备忘录，提出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sup>②</sup>。巴杰帕依询问亨德森是否同意把备忘录的主要内容通知潘尼迦大使，以便潘尼迦可以在同中国的谈判中使用，亨德森说，印度对这件事可以自作主张。但是他指出，该备忘录并非正式文件，不能把它看作是美国政府向“北京政权”发出的什么信息。

9月4日，巴杰帕依把他收到美国非正式备忘录的情况告诉了英国驻新德里的代理高级专员，并且说：“现在尼赫鲁总理已指示他，把美国方面最近的这个令人鼓舞的姿态通知印度驻北京大使……同时也通知北京政府，并要求劝告北京方面，在政策和宣传领域采取合作而非挑衅的立场是十分重要的。尼赫鲁总理认为，北京最近的言论在世界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从现在到联大召开的时间不多了，北京应立即着手消除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坏印象。”<sup>③</sup>

英国的看法与印度相似。在还未了解印度政府的想法之前，贝文就致电尼赫鲁说，北京就台湾问题给联合国的信是“非常不幸的”，很可能引起舆论对中国的反感。他说：“许多问题”将取决于北京政府代表团到达纽约后的言行，如果他们按照俄国的指示行事而言行过激，那将会令人为难；我们可以问一下，尼赫鲁认为向中国人提出一些慎重的告诫是可取的吗<sup>④</sup>？

当然，尼赫鲁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当英国代理高级专员把贝文的电文交给巴杰帕依时，尼赫鲁又了解到了巴杰帕依对台湾问题的一些“个人看法”。巴杰帕依认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① 艾奇逊：《在创世的现场》第452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485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9FC1022/462。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4FC1022/465。

的时机尚未成熟，“美国公众舆论对联合国大会形成议案影响极大，当前进行的联大辩论可能会损害议案的公正性”<sup>①</sup>。有趣的是，新德里和伦敦起初都认为，美国的中立政策的后果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是，他们现在似乎都更担心北京的言行会对它自己起到相反的作用。

同时，美国也很担心它在联合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会受到国民党人对反攻大陆的宣传的影响。9月4日，陈诚将军公开谈到要发动一次大反攻。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要求兰金提醒国民党官员，美国除了保护台湾不受侵犯之外不支持他们反攻大陆的任何计划。国务院在电报中对兰金说：“我们要努力在安理会和联大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如何评价这种努力是很微妙的。美国和中国强大友国——特别是英国与印度的态度使问题变得复杂了。国民党政府的行动很不利于在联合国达成和平解决问题的议案……（它的行动）除了损害自己外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别的效果。”<sup>②</sup>

台湾一方面大谈反攻大陆，另一方面，它又企图从美国寻求长期保护这个海岛基地的保证。但是，华盛顿并不打算作出这种承诺。美国国务院告诉兰金说，可以向国民党方面“保证，美国认为联合国是和平公正地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渠道”。国务院甚至预料：“联合国也将发现，在问题最终获得解决之前，继续谋求台湾中立是可行的和适当的”<sup>③</sup>。

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信件发出三天之后，周恩来又写信给雅科夫·马利克、吕格弗·利和艾奇逊，强烈抗议美国军用飞机袭击位于满洲和北朝鲜之间鸭绿江沿岸的中国领土，并要求美军全部撤离朝鲜。其中，写给艾奇逊的信还要求美国政府惩罚那些侵犯中国领空的空军飞行员，并向中国的受害者赔偿损失。8月31日，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571/83294FC1922/465。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514页。

③ 同上，第514—515页。

周恩来再次给马利克和吕格弗·利写信说，美国空军的连续侵犯已“给中国造成了一些人员伤亡”，他再次要求美军全部撤离朝鲜<sup>①</sup>。

哈奇森向国内汇报了中国的抗议（中国外交部已将周致吕格弗·利的信的副本送给了他）。他认为，中国的抗议可能预示着它将加强针对美国在朝鲜和台湾的行动的 anti 美宣传运动，而且，中国还可能以此来证明自己干涉朝鲜事务的合理性<sup>②</sup>。应该指出，美军和其他联合国军队此时还正在南朝鲜的纵深地带进行防御性战斗，对中国几乎还没有形成什么威胁。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科兰·克罗斯指出：“中国的宣传机器正在全速运转，就一些事件大肆渲染，其目的是证明中国干涉朝鲜事务或对香港发动进攻是合理的。……（这种宣传）无论如何是非常危险的，它可能会使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骑虎难下。”<sup>③</sup>然而，对于中国对美机侵犯事件所作出的反应，哈奇森当时的看法是比较冷静的。他报告说，自从8月28日以来，虽然关于美机侵犯行为的报道已充斥了中国报界，而且这种侵犯被说成是“挑衅性的，目的在于扩大朝鲜事态”，但是，他现在并不认为中国宣传界的基本方针有何变化，也没有发现什么中国政府计划干涉朝鲜问题的迹象。哈奇森说，这些报道本身是“简短和实际的，没有煽动性”<sup>④</sup>。但是外交部的克罗斯认为：“这些报道或许不是煽动性的，但它们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我认为两者密不可分。”<sup>⑤</sup>

在中国对美机的侵犯提出抗议之后，美国的反应如果不说是温和的话，也算不上是挑衅性的。8月29日，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瓦伦·奥斯汀大使写信给吕格弗·利，欢迎就中国提出的

① 《人民中国》，1950年9月16日号第26—27页。

②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321FC10345/28。

④⑤ 同上，FC10345/26。

抗议进行一次实地调查<sup>①</sup>。后来，他又提出由印度和瑞典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中国对美国的前前后后的指控<sup>②</sup>。美国的建议得到了英国的支持。

印度大使潘尼迦把美国的建议转达给了北京政府，同时，美国还通过潘尼迦向中国表示：中国就美机轰炸其领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当要求，美国都愿意尽力满足。潘尼迦还受命向北京表达了印度政府的意见，他说，如果中国同意的话，印度将指派一名代表和瑞典代表一起行动，调查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土的事件，并估价中国方面所受到的损失。据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说，巴杰帕依告诉他，印度政府认为美国的建议是慷慨大方的，中国一直指责美国没有赔偿其领土遭受轰炸造成的损失，现在，中国没有理由再这么做了<sup>③</sup>。

10月中旬，虽然潘尼迦向印度政府报告说，中国政府表示他们正在考虑调查事宜，可是，北京的报纸却出现了他们对此持反对态度的迹象。事实上，北京正是反对进行调查的。可是，在英国看来，美国的建议和贝文的电报至少都“向印度政府表明，中国人可能产生了某些误解，美英都渴望它能消除这种误解。就这一点来说，美英的作法都是很有意义的。”<sup>④</sup>

### 30 中国在朝鲜的介入

1950年暮春，对于美国在北朝鲜进攻南朝鲜问题上可能作出

<sup>①</sup>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9月11日，第41页。

<sup>②</sup> 同上，第439页。关于中国的这些指控，总见美国国务院备忘录，1950年9月26日，611.932/9-2650，RG59，DSNA。

<sup>③</sup> 1950年9月30日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611.9326/9-3050，RG59，DSNA

<sup>④</sup> 《美国外交文粹集》371/83321FC10345/56。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对美国飞机轰炸南朝鲜一事进行调查的建议，也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见《美国国务院公报》1951年2月26日，第35页。

的反应，莫斯科和北京明显地作了错误的估计。同样，在这一年初秋，美国也没有能正确地估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和能力。杜鲁门命令美军越过三八线的时候，中国通过潘尼迦警告美国说，美军的这种行动将会导致中国参加战争。然而，杜鲁门忽视了这个警告。当时杜鲁门政府的职员诺伊施塔特后来解释道，杜鲁门的顾问们没有认真地对待中国的警告，而且，即使他们是认真的，杜鲁门也会毫不在乎。诺伊施塔特写道：

五角大楼非常担心的是莫斯科而不是北京。由于联合国军队正在推进，如果仅是中国参战，似乎轻易就可抵挡，所以，这种来自中国的干涉极不可能发生。……华盛顿和麦克阿瑟司令同样缺少准备来“认真对付一个迄今为止以其政治和军事力量薄弱而闻名的国家。”

甚至当北京显得更加强硬，其态度也更加认真而不是在讹诈的时候，以及当周恩来选择英国人而不是潘尼迦向美国转达中国的警告的时候，要求杜鲁门的主要顾问们考虑停止麦可阿瑟的全线推进计划，或者推迟执行联大的决定，也都是不可能的。即使那些顾问们提出了劝告，杜鲁门也不可能接受①。

作为杜鲁门的一位有影响的顾问，国务卿艾奇逊没有对中国给以足够的重视，他的回忆录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艾奇逊说美国政府正在通过印度“寻找中国干涉朝鲜战争的证据”，但是，当印度大使潘尼迦于10月3日向他转告周恩来的警告时，他却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警告”而已，并非表示“国家政策的官方声明”②。美国人之所以没有重视周恩来的警告，部分原因是那些多疑的美国官员不喜欢替周恩来传话的潘尼迦。约翰·K·埃默森当时在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任计划顾问，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与潘尼迦打交道的美国官员都很讨厌他，这就象他们不喜欢

① 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总统的力量》（纽约：约翰·怀利——桑斯1960年版）。这段话引自一本《影印图书》的软皮复盖面上的拨语（纽约：世界文化新美国图书馆发行，1964年版），第131页。

② 艾奇逊：《在创世的现场》第452页。

印度长期以来在联合国的代表克里希纳·梅农一样，没有人相信潘尼迦的话，他所转达来的周恩来的警告我们没人当回事。”<sup>①</sup>

但是，艾奇逊和总统的其他顾问们曾经有过认真对待北京的动向的第二次良机，与没有重视最初的那次警告相比，他们没有能把握住这次机会也许是令人费解的。联合国军队刚进入与中国接壤的北朝鲜地区不久，数量庞大的中国军队就开始出现在前线，他们中的一些人被俘了。11月2日，北京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开进朝鲜援助朝鲜人民。11月6日，麦克阿瑟在给联合国的报告中也承认了中国参战的现实。当联合国军队停止向鸭绿江前进后，战斗也就紧接着暂时停了下来。

麦克阿瑟认为，“他的空军将阻止中国从满洲越过鸭绿江向朝鲜进行的增援，而且将消灭已经到达朝鲜的中国部队”<sup>②</sup>。麦克阿瑟想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于是在11月24日重新发动了进攻。美国国务院对此越来越担心，英国和法国也极力主张在联合国军队控制的地区和中国边界之间留下广阔的缓冲地带<sup>③</sup>。然而，华盛顿并没有改变麦克阿瑟的命令，而是允许他根据自己的决定继续前进。约瑟夫·古尔登研究了許多有关朝鲜战争的文件，他指出，“10月底，小股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进入了朝鲜，甚至这个事实也没有使麦克阿瑟的命令有任何改变。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美国并无侵略中国领土的野心，中国人是能够相信美国的动

<sup>①</sup> 约翰·K·埃默森：《日本人的恶癖：以外求生存》（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1978年版）第310页。早在12月12日，美国国务院就收到了来自香港的电报，其中称：“中国将派出25万人的部队支援北朝鲜”。6天后，它又收到一份电报说，“中共部队将作为志愿军进入朝鲜，但将携带武器。”但是，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国务院也认为情报来源“十分不可靠”。见1950年12月12日和18日香港电报，661.93/9—1250和66193/9—1850，以及国务院电报9月26日，661.93/9—2850，RG59.DSNA。

<sup>②</sup> 古尔登，《朝鲜》第312页。

<sup>③</sup> 例见贝文给弗兰克斯的电报，1950年11月13日，9：1138—40。另见斯图瓦，《通向对抗的进程》第249—250页。

机的。然而，中国人并不相信这一点。简短地说，杜鲁门政府（总统、艾奇逊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犯下了与麦克阿瑟同样巨大的错误。”<sup>①</sup>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古尔登的观点，美国政府本来是有第二次机会考虑并抛弃它的通过战争使朝鲜重新统一的政策，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艾奇逊在回忆录中承认，他当时没有辅佐好总统<sup>②</sup>。不过，如果华盛顿做出了让麦克阿瑟停止进一步推进的决定，是否就能避免他11月24日重新发动进攻后出现的混乱，这一点就不怎么让人清楚了。要想作出判断，部分先决条件是对中国的意图做出估计。然而，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澄清一下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

如前所述，美国并无侵略中国领土的野心。美国当时高度保密的文件和外交活动都说明，白宫是打算把战争限制在朝鲜范围之内。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8月25日制订的文件NSC73/4——“对于苏维埃运动在朝鲜的可能的进一步发展，美国所要采取的立场和行动”，我们可以多次看到美国的这种意图。例如，该文件说，“如果中共部队进攻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国军队应按既定命令击退之，但是，不要使美国军队卷入一场与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战争。在任何情形之下，美国陆军都不应在台湾担负责任”。又说，“如果有组织的中共部队公开投入朝鲜战争，……美国不要使它自己陷于一场同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战争”。文件还说：“如果有组织的中共部队向印度支那公然发动进攻，美国也不应该使自己卷入一场同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战争，但是要与联合王国一致行动，支持法国和同盟国家。”<sup>③</sup>虽然该文件主张，如果中国干涉朝鲜战争，就对中国实行空中和海上的报复，但

<sup>①</sup> 古尔登：《朝鲜》第244页。

<sup>②</sup> 艾奇逊：《在创世纪的现场》第466页。另见斯图克：《通向对抗的道路》第243—246页。

<sup>③</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1卷第383—389页。

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万一中国干涉朝鲜战争，美国将按既定计划从地面进攻中国。事实上，当中国真的出兵朝鲜的时候，美国在空中和海上对其进行报复的政策也没有付诸实施。美国对鸭绿江边中国领土的轰炸，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的，或者是违反作战命令的<sup>①</sup>。美国政府多次否决了麦克阿瑟将军关于封锁和轰炸中国的提议<sup>②</sup>。

上述政策并非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的盟国强加于军方的，而是美国国防部自己制订的。五角大楼希望美国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因为这可能削弱美国的力量，妨碍它履行自己在欧洲的义务。所以，五角大楼不仅反对联合国军队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而且，它也欢迎通过联合国或者那些承认北京政府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国干涉朝鲜的问题。同时，五角大楼还建议就联合国军队并不打算进攻中国一事作出公开的保证<sup>③</sup>。

杜鲁门和艾奇逊作出了这种公开保证。11月16日，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声称联合国军队企图把战火越过边界烧到中国去，这不过是它在朝鲜进攻联合国军队的借口。他宣告，联合国以及美国的政府和人民都不想进攻中国<sup>④</sup>。在前一天的外交事务市民会议上，艾奇逊为了减少中国方面的忧虑，也就美国的意图作了解释<sup>⑤</sup>。

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还向中国政府转达了私下的承诺。11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通过哈奇森向周恩来递交了一封私人书

---

① 关于周恩来8月28日和29日指控美机轰炸中国领土一事，美国国务院曾于1950年9月28日致电其驻联合国代表团，见电报338号，611/9326/9—2850, RG59-DSNA。

② 艾奇逊：《在创世的现场》第514—517页。

③ 古尔登：《朝鲜》第313页。另见美国驻香港领事馆11月9日发给国务院的电报，611.93/11-950, RG59, DSNA。

④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11月27日，第852—853页。

⑤ 同上，第853页。腊斯克对市民也作了讲话，内容见1950年12月4日的《美国国务院公报》第889页。



信，信中保证，联合国军队在朝鲜的行动决不会损害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合法利益将会得到充分的考虑<sup>①</sup>。

中国是在10月底开始在朝鲜部署军队的，如果麦克阿瑟的军队那时不再往前进攻，我们无从知道中国下一步会如何行动。但是，在战场上和外交上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出兵干涉的目的远非仅仅为了保护其边界。从11月24日起，麦克阿瑟的军队遇到了势不可挡的反击，在12天之内，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就收复了北朝鲜首都平壤。9月30日，周恩来曾经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声明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sup>②</sup>中国志愿军的行动给了周恩来的声明以实质性的内容。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中国出兵朝鲜的目的，是防止北朝鲜被击败。这种说法是与周恩来9月13日的声明相一致的。据赫鲁晓夫说，在北朝鲜军队被从南朝鲜赶回，而且美国空军掌握了制空权之后，毛泽东便派周恩来去见斯大林。周恩来提出“中国应对北朝鲜给予积极的支持”，斯大林开始有些犹豫，但他最后还是同意了<sup>③</sup>。事实上，如果中国只是为了在中朝边界保持一段缓冲地带的话，它就不会出兵支持北朝鲜了。

11月26日，中国派去向联合国指控美国的官方发言人——伍修权将军在安理会发表了演讲，他清楚地告诉人们，北京出兵的目标远不只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队向中国边界的挺进<sup>④</sup>。伍将军要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327FC1951/14。早些时候，美国曾经试图通过瑞典政府向中国保证，它“没有对中国大陆发动战争的任何企图”，“美国也不想朝鲜建立任何军事基地”，参见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和瑞典大使博希曼谈话的备忘录，《英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1141—1142页。

<sup>②</sup> 《人民中国》，1950年10月16日号第7页。另见麦克法夸尔《1949—1970年的中美关系》（纽约：普雷格1972年版）第84—85页。

<sup>③</sup>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372页。

<sup>④</sup> 陪同伍修权将军到联大的有中国外交部的两名官员，一个是亚洲司司长乔冠华，另一个是章汉夫的妻子费普生。伍修权是林彪手下的参谋长，他到联合国执行外交使命时正担任外交部苏联和远东司司长。

求美国和其他外国军队从所有朝鲜领土上撤走，并对“侵略者”予以制裁，同时他还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台湾<sup>①</sup>。中国军队的反击是远远超过边界防卫的需要的，它的规模很大，从而使伍修权将军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产生了戏剧性的力量。应当指出，为了配合这次经过秘密准备而发动的大反击，中国代表团曾故意耽搁了一段时间才到达成功湖（在纽约近郊，1952年以前为联合国秘书处所在地——译者注），比预定日期晚了整整10天。结果，恰好在联合国军队全线退却时，伍修权将军赶到了联合国并且提出了北京的要求。

同10月中旬联合国军队取得惊人的仁川胜利之后的情形相似，中国人在北朝鲜击溃了联合国军队之后，也面临着是否越过三八线的抉择。尽管联合国要求中国军队停下来进行谈判——这个建议是由13个亚洲和中东国家在12月5日提出的，但是，中国方面对此置之不理。后来，根据这13个国家的提议，联合国大会于12月14日通过了一项决定：由联大主席组织一个三人小组，来确定令人满意的停火条件并尽快向联大提出建议<sup>②</sup>。

可是，就象他们不愿停止在三八线一样，中国人对停火也并不感兴趣；中国政府指示伍修权回国并断绝了同联合国停火委员会(the UN Cease-Fire Committee)的联系。12月2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再次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目标远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边界。他说，“人们现在不要把目光仅仅局限于朝鲜问题”，美国“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对中国“东北”进行轰炸等问题也必须一起获得解决。众所周知，在后两个问题上，中国人对美国一直是心怀不满的。周恩来说，联合国应该接受中国提出的要求，即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出台湾以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他指出，要把实现这些要求作为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的“基础”，“抛开这几点就不可能使朝鲜问题和亚洲的

<sup>①</sup> 关于伍修权发言的全文，见《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6日增刊。

<sup>②</sup>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12月15日，第100—105页。

其他重要问题得到和平的解决。”<sup>①</sup>

两天后，在一次庆祝“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胜利”的大会上，朱德总司令重申了中国的这些广泛的战争目标。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样的立场，那就是，所有外国军队必须立即从朝鲜撤出，朝鲜的内部问题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美国侵略军必须立即从台湾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在联合国拥有合法的席位。只有当这些要求得到实现的时候，亚洲问题才能够获得和平的解决。”<sup>②</sup>

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迅猛地击溃了联合国军队，经过休整后的朝鲜人民军也越过三八线继续南下，周恩来和朱德正是在胜利的陶醉中讲这番话的。1951年1月4日，中朝军队占领了南朝鲜的首都汉城，北京的《人民日报》宣称，这次胜利说明，“虽然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装备很差……但是，他们一定能够消灭美国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如果美国人不愿意从朝鲜离开，那就把他们赶到海里去”<sup>③</sup>。

中国人对取得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以致瑞典驻北京大使托尔斯滕·哈默斯罗姆感到，朝鲜停火毫无指望了。他向本国政府报告说，或者以武力证明“中国人不能在朝鲜为所欲为”，或者联合国接受中国提出的条件，除此以外别无选择<sup>④</sup>。几天之后，他对一名在香港的美国领事说，因为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得到了一个把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的绝好时机，周恩来已经拒绝为停火事宜接见他<sup>⑤</sup>。

中国对朝鲜战争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使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达到了顶点。与美国不同，英国是不反对接受中国提出的停火

① 原声明的全文见《人民中国》1951年1月1日号第4—5、29页。

② 《人民中国》，1951年1月16日增刊第8页。

③ 同上，1951年1月18日号第28页。

④ 见1951年1月2日腊斯克谈话的备忘录，《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3—4页。

⑤ 1951年8月8日香港急电386号，693.00/8—851, RG59, DSNA。

条件的。长期以来，伦敦一直都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且它常常担心美国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难以自拔，从而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力量。对英国来说，接受中国的条件与坚持它自己原有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1950年12月初，在杜鲁门总统和艾德礼首相举行的会谈中艾德礼称（据艾奇逊说）中国对朝鲜停火的要价“并不太高”<sup>①</sup>时，人们并不感到吃惊。

而美国则认为，不应该鼓励中国对朝鲜的侵略，如果美国不承担它对南朝鲜承诺的义务，人们对它所做出的保护欧洲的价值诺言也就会产生怀疑。同时，如果美国军队在欧洲盟国的压力下从朝鲜撤出，也会严重影响美国国内对北约组织的支持。杜鲁门和艾奇逊主张首先停火，然后再讨论其他政治问题，英国政府最终支持了这种方针<sup>②</sup>。

杜鲁门和艾德礼的这次会谈揭示了英美两国在如何更有效地同共产党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由来已久的分歧——是采取胡萝卜政策还是采取大棒政策。艾德礼呼吁亚洲舆论支持他的以在联合国和台湾问题上向中国让步来换取朝鲜停火的主张。而且，英国政府认为，以这样的办法对中国表示亲近可能会促使北京修改它的一边倒政策。美国的看法则正好相反。艾奇逊强调说，“如果把台湾作为侵略行为的产物而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事实将会在最坏的意义上被滥用。……假如我们让步，他们将会变得更加富有侵略性”<sup>③</sup>。

香港现在成了美国主要的中国情况观察站。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沃尔特·麦康瑞希对于英国人立场的看法与艾奇逊相似。他认为，英国人在会谈中“过份强调了我们拒绝把台湾交给北京的立场会给亚洲舆论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对于把台湾交给北京的做法

<sup>①</sup> 艾奇逊，《在创造的现场》第480页。

<sup>②</sup> 见杜鲁门——艾德礼会谈文件，12月4—3日，载于《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3卷第1706—1788页。

<sup>③</sup> 同上，第1712页。

可能带来的后果，他们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sup>①</sup>。

中国是否有对东南亚的“侵略计划”，这可以撇开不谈，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当他们在朝鲜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怎么能把敌人的让步单纯看作是自己胜利的结果，并认为这是对其政策英明的证明。事实上，这样做似乎体现了中国宣传工具的自负趋向。比如，《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说：“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已经遭到并还将遭到更加悲惨的失败，而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并与苏联结盟的中国人民……已经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和亚洲人民力量的中心。”<sup>②</sup>

就英国人而言，杜鲁门—艾德礼会谈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他们更加谅解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在当时形势下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马歇尔将军在一次会上说：从北部的日本到南部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延伸的岛链，我们把台湾看成是这个岛链中的一个“楔子”；从军事的观点看，“如果说放弃台湾是非常危险的话……那么，切断这个岛链就更加危险了。”<sup>③</sup>

就象英国外交部官员罗伯特·斯科特所说的那样，虽然英国政府设法把保护台湾的安全和承认国民党政府分成两个问题，但是，在杜鲁门和艾德礼的会谈中，他们还是接受了美国关于“台湾在军事方面的作用的观点”<sup>④</sup>。最后，尽管英国仍然坚持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他们却不再要求把台湾交给共产党中国了。

12月9日，英美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不仅反映了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新姿态，同时，还坚持了美国政府自9月份以来一直倡导的两个观点，即：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605页。

② 见1951年1月1日《人民中国》增刊第14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3卷第1736页。

④ 同上，第1737页。

考虑到台湾人民的利益，并且要有助于保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定<sup>①</sup>。公报呼吁对台湾问题进行讨论。但是，1951年2月7日当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决定接受这一呼吁时，英国却“鉴于远东地区形势不稳定的状况”向联合国提出了暂停讨论台湾问题的议案<sup>②</sup>。美国对此表示支持。最后，该议案在38票赞成、5票反对和8票弃权的情况下获得通过<sup>③</sup>。这个结果当然使国民党人感到高兴。据兰金从台北发回的电报说，国民党一直希望美国“在可能的情况下瓦解、或者至少设法无限期地推迟目前联合国关于台湾未来地位的所有讨论”<sup>④</sup>。

### 31 灵活性的终结

在结束了与杜鲁门的会谈返回伦敦不久，艾德礼首相开始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意图担起心来。1951年1月8日，他在一封给杜鲁门的信中说，我有这么一个印象，特别是艾奇逊国务卿1月5日致贝文的信使我感到，美国政府可能打算放弃把战争局限于朝鲜的政策，转而采取一种对中国进行有限战争的政策<sup>⑤</sup>。艾德礼担心美国会怂恿联合国军队“对共产党中国进行一场颠覆活动，或者由蒋介石分子开展一场游击战争”。他说，英国政府历来反对“在目前形势下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也反对要求集体措施委员会 (the Collective Measures Committee) 考虑针对中国的措施。”艾德礼提出，首先应该在停火委员会 (the Cease-Fire Committee) 最新拟订的一系列原则基础上制定决议，以“统一目前联合国内部的混乱意见”<sup>⑥</sup>。

① 联合公报的全文，见《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12月18日，第960页。

② 邱 (Chiu)：《中国和台湾问题》第153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569页。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586—587页。

⑤ 艾奇逊的信，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27页。

⑥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37—38页。

杜鲁门立即向艾德礼保证说，正如美国方面已经同意的那样，除非联合国军队被赶出朝鲜，否则，“抵抗”仍将继续下去，但美国的愿望依然是“把战争限制在朝鲜范围之内”，美国政府并不打算推动联合国进行颠覆大陆中国的活动，也不想由“中国国民党军队”开展一场游击战争。他说，美国最关心的是“在目前的朝鲜形势下……联合国所采取的行动应当是诚实可敬和遵守集体安全这个重大原则的”<sup>①</sup>。

最后，英国和美国都如愿以偿了，1月13日，联大第一委员会(the First Committe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批准了停火小组(the Cease-Fire Group)的补充报告所提出的五项原则<sup>②</sup>。接着，挪威提出的由联大第一委员会主席向中国政府传达这五项原则的建议也被采纳了<sup>③</sup>。相当于新的停火建议的这五项原则，在满足中国的要求方面超过了联合国以前所提出的任何方案，因为它建议召开一次讨论包括中国在联合国席位以及台湾问题在内的远东问题的专门会议。但是，在中国看来，这五项原则却有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它的“先停火后谈判”的要求，中国政府认为，这只是敌人在受到打击后妄图得到“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的诡计。如同1949年中共谈判者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停火建议一样，他们用十分相似的语言拒绝了五项原则中的这一条。中国坚持以先谈判后停火作为谈判的基础<sup>④</sup>。

北京的做法为美国提供了可乘之机，1月20日，美国提出了一项断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进行侵略”的议案。议案宣称，“联合国军队决心在朝鲜继续战斗，抵抗侵略”。另外，它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39页。

② 五项原则的原文，见《美国国务院公报》，1951年1月29日，第164页。

③ 该建议的内容，见《美国国务院公报》，1951年1月29日，第163页。

④ 关于中国对联合国的答复，见《人民中国》1951年2月1日号第30页。甚至在中国拒绝了五项原则之后，美国也仍然准备“在原则上同意与中共政府就其他远东问题进行谈判”，以达成一个满意的停战协定，见腊斯克于1951年2月7日给约翰·穆乔大使的密电，《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59页。

还保证美国将继续“坚持在朝鲜结束战争的政策”，并要求联大主席“立即指定两个他认为合适的人，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利用他们的调停作用使战争彻底结束”<sup>①</sup>。

瓦伦·奥斯汀大使在为这项议案辩护时强调说，中国已经多次拒绝了“在远东问题上先停火后谈判”的倡议，而且要求“在谈判结束之前拥有向联合国军队进攻的权利”。他说，北京的谈判条件，实际上是想让联合国方面在开始谈判之前就接受它在台湾和联合国代表席位问题上的政治要求。他认为，中国的立场无非是“其主子——苏联统治集团的意见的反映”。奥斯汀揶揄地反问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否企图“用迫击炮和手榴弹来冲破联合国军队的防线？”<sup>②</sup>

虽然英国政府打算谴责中国的侵略，但是，它却反对美国在其议案中提出的由集体措施委员会 (the Collective Measures Committee) 立即考虑补充措施以对付中国的侵略的主张，英国人宁愿等一等，看调停委员会可能拿出什么方案来。1月26日，弗兰克斯大使在与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和约翰·D·希克森的谈话中，就英国持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的根本原因提出了三点“个人看法”：首先，英国不相信联合国军队在朝鲜的指挥以及美国的意图；其次，尼赫鲁在最近举行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发挥了影响；第三，英国与美国的看法不同，伦敦认为，来自北京方面的最新的信息包含着“更大的希望”<sup>③</sup>。

1月27日，艾奇逊打电话告诉弗兰克斯，在他同腊斯克、希克森和总统进行了讨论之后，他已指示在美国提出的议案中增添补充意见，如果“其他委员会”（指调停委员会）工作进展顺利，集体措施委员会就可以不采纳美国的议案。艾奇逊强调说，这是美国在满足英国政府的愿望方面可以作出的最大努力，不仅

① 这项议案的原文，见《美国国务院公报》，1951年1月29日，第167页。

②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1年1月29日，第166—168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34—136页。



总统和内阁，而且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都已同意作出这种让步<sup>①</sup>。修正建议当天就由美国国务院向它在联合国的使团作了传达，同时还附加了一份说明，其中说，“如果修正建议有助于英国支持我们所提的议案”，美国就愿意对议案作出这种修改。美国国务院认为，对议案的修改“可能还有助于使它得到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投票赞成<sup>②</sup>。果然如此，修改后的美国议案得到了英国和西欧国家的拥护。1月30日和2月1日，美国议案以绝对优势的得票数先后获得了第一委员会（the First Committee）和联合国大会的通过<sup>③</sup>。

英国之所以支持美国的议案，部分原因可能是周恩来对尼赫鲁的信反应冷淡——这封信要求周发表一份声明，宣布中国愿意使太平洋地区保持和平。1月24日，12个阿拉伯和亚洲国家曾联名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由美国、埃及、苏联、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一次会议，以便了解周恩来对联合国1月13日停火建议的答复的“所有必要的说明和补充”<sup>④</sup>。尼赫鲁显然认为，如果周恩来发表一个表示中国和平愿望的声明，将会使上述建议获得更多的支持。然而，周恩来私下拒绝了他的请求。周恩来说，只要联合国打算以决议方式谴责他的政府是“侵略者”，那么，发表这样的声明就会使人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它的谴责面前怯懦了<sup>⑤</sup>。

在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助理次官斯科特等人对周的反应感到“彻底的沮丧”。他们向美国大使馆指出，在同联合国谈判的问题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36—137页。

② 同上，第137页。

③ 关于修正议案的原文和投票情况，见同上书第148—151页。

④ 关于这12个国家联名提出的议案的原文，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30—131页。美国对这项议案持反对意见，因为它认为该议案“从根本上偏离”了1月13日停火决议所包含的五项原则，美国认为这五项原则是体面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低的基础”。

⑤ 同上，第149页。

上，中共从来没有表现出主动精神，而且，在英中两国举行的建交谈判中，中国也显得同样消极，这使斯科特等人的热情深受打击。虽然，中共政府有时要求英国说明其立场，但是，它一直没有表示使英中关系正常化的愿望。斯科特等人认为，周恩来的作法只是为了影响对美国议案的表决，而这是愚蠢和无效的<sup>①</sup>。对斯科特等人来说，周恩来拒绝尼赫鲁的建议等于是对他们一系列打击中的忍无可忍的最后一击。据美国大使馆报告，斯科特等人认为，“现在，每个人都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以下几点了：中共政府（a）从来没有打算在远东问题上认真谈判以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b）从来没有真诚地希望同联合王国建立外交关系，（c）从来也没有为进入联合国而进行真正的努力（如果不是因为它知道根据条件它将不会被接受的话），它只是打算制造麻烦而已”<sup>②</sup>。2月，当哈奇森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进行告别性访问时，中国对中英建立外交关系缺乏兴趣的迹象进一步显现出来了。章汉夫“有意地表现出冷淡”，哈奇森要求他对恢复两国建交谈判一事发表意见，但是一无所获<sup>③</sup>。

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幻想破灭了，这可能对英国支持美国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议案起了促进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它在最初还没有影响到英国政府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的立场。美国的意见是，不应该允许一个已被谴责为侵略者的政府进入联合国。2月15日，贝文在致弗兰克斯爵士的电文中特别拒绝了美国的这个观点。贝文认为，谴责性的议案同“联合国代表席位的问题没有什么联系，代表席位问题只应依据对事实的承认来加以解决，而与道德上的赞成或反对无关”<sup>④</sup>。

不过，在大约两个半月之后，当艾奇逊向赫伯特·莫里森递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545—1546页。

② 同上，第1546页。

③ 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电报，1951年2月27日，641.93/2-275, RG59, D SNA。

④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2卷第228—229页。

交了一封私人书信（由于贝文生病，莫里森已在3月份接替了他的职务），提出华盛顿和伦敦应该暂时停止它们在是否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的争论时，莫里森还是表现出了兴趣。艾奇逊在信中说中国现在正与联合国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并且中国还否认了联合国宪章的有效性，在这样的局势下，英美两国的争论将会造成“最严重的分裂后果”，并“在最大程度上鼓励中国一意孤行”<sup>①</sup>。

5月10日，莫里森给艾奇逊回了信，表示对艾奇逊的看法很感兴趣，他说，暂时停止争论可以防止使“我们众所周知的政策分歧……演变为两国之间产生误会的根源”。莫里森还重申了英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立场，他说，英国的这个立场是无可争议的，英国政府“不会支持由蒋介石的代表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讲话的幻想”。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说道：“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坚持它目前的方针不变，英国也不会热心地支持它进入联合国。”<sup>②</sup>

很明显，鉴于这种情况，当时在由谁代表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无论对台北政府还是北京政府，英国都不想投赞成票。台北政府代表不了中国，而北京政府却正在同联合国军队进行一场战争。艾奇逊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美英两国应该支持联合国作出决定，推迟对应当由哪一个政府代表中国的问题的投票表决。这个意见被莫里森接受了，美英在此问题上的争论也暂告结束。事实上，这样的结局只能使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继续保持下去<sup>③</sup>。

英国政府在解释其新立场的时候清楚地告诉人们，它仍然承认中共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它“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进行了侵略，并且拒绝以体面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2卷第247—248页。

② 同上，第246—247页。

③ 同上，第247—248页。

的方式解决朝鲜争端”<sup>①</sup>。1951年秋天，保守党取代工党组成了新的英国政府。新上任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表示，他愿意坚持其前任采取的同美国“暂停争论”的做法，但是，对于任何有可能使人认为台北比北京“更有资格”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说法，他都表示反对<sup>②</sup>。

随着11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大反攻的发动，要求全面禁止美国同共产党中国贸易的压力在华盛顿迅速增强。有趣的是，尽管外交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大陆中国经济萧条，而在事实上，它向美国的贸易出口却高于进口。据美国商业部长说，美国从中国得到了“大量的钨”以及“一些木材和锡”，但是，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的85%却是棉花；“没有任何具有军事价值的商品输出到中国去”<sup>③</sup>。

美国商业部在1950年曾经颁布了一项规定，要求所有准备向中国大陆、香港或澳门出口商品的人都必须办理出口特许证。该规定从当年12月3日起生效，虽然它在原则上允许不具有战略价值的商品向中国出口，但是，美国财政部认为它“实际上等于全面禁止了对华出口贸易”<sup>④</sup>。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在他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只实行贸易限制而不扼制中国的财源的作法是自相矛盾的，除非截断其财源，不然，中国仍然“可以从其他国家得到美元和类似的重要商品”<sup>⑤</sup>。财政部要求从财政上加以控制，以便把所有同中国有关的财政业务控制在国家特许之下<sup>⑥</sup>。

然而，美国国务院认为，“现在，美国不应对共产党中国实行完全单方面的贸易限制和财产冻结措施”。正如人们预料的那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2卷第251—252页。

② 同上，第271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666—667页。

④⑤ 同上，第574页。

⑥ 同上，第667—668页。

样，这一态度除了受到财政部的反对外，还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更坚决的责难。后者称，国务院的立场是“反常的”，因为“它使共产党中国一面向联合国军队进攻，一面还可以得到援助和安慰”。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断向国务院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对共产党中国实行单方面的和彻底的贸易限制，并同时采取财产冻结措施”<sup>①</sup>。

1950年12月16日，美国开始在其管辖范围内对共产党中国的财产实行管制，并且禁止所有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在大陆中国的港口停泊。艾奇逊在于此两天前召开的国务院高级官员会议上承认：虽然采取这种措施“对中国并没有什么真正影响”，但是，为了平息公众舆论的不满，也有必要这样做<sup>②</sup>。国务院在发给所有美国外交官员的一份传阅指示中指出，美国并不“愿意使限制永久化”，并且仍然希望中国“放弃它在当前远东危机中所采取的与联合国的利益和目标相抵触的行动”<sup>③</sup>。

中国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了美国人。12月18日，中国政府下令立即对美国政府及美国公民的所有在华财产和企业实行管制，同时立即对美国政府及公民在中国银行的所有存款实行冻结<sup>④</sup>。

1950年12月31日，上海的一家美国公司的经理写给他 在香港的办事处的一封信，这样描述了中国实行冻结令的经过：

本月30日，我和穆先生接到通知，前往参加由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召集的会议。所有美国公司的代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那里，中国人通知我们说，由于美国政府的行动，中国有必要对美国公司实行管制。他们指出，这种措施并不等于没收，只是意味着控制和监督。……当天下午，军管会的五名代表来到了公司，他们解释道，他们的职责是进行监督，……除此以外，一个中队的士兵（有32人）也驻扎进我们的东岸（Tungku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680—681页。

② 同上，第681页。

③ 同上，第682—683页。

④ 《人民中国》，1951年1月15日第28页。

的译音——编者注)集散站①。

1951年1月8日,卡西石油公司把这封信的复制件交给了美国国务院,同时它还附了一封信说,公司“在上海的工作已完全不在我们管辖之内,我们所出售的商品只是共产党占领上海前的存货”②。

2月30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向本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说,卡西石油公司受到的对待,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在上海的公司、特别是那些拥有巨额财产的公司的境遇。这份本来是一名“负责的美人”写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报告还说道:美国的电力和电话公司已经——

完全处于军管会代表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以前的管理人员只是在奉命行事,中国人告诫他们不要期望得到或者服从来自董事会或纽约总公司的指示。

中国政府的代表掌握了所有拥有巨额财产、股票和大批职员的公司的事务,他们在公司办公,实际上直接指导着这些公司(主要是石油公司)的事务。在公司的所有事务上,他们至少发挥着否决权的作用。……支票必须由公司和政府的代表共同签字,中国人还常常要求这些公司把它们同当地的外国银行和独立经营的中国私人银行的业务关系,转移到中国的国家银行去③。

在“全面控制”了自己与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联系之后——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承认这种控制是进行“经济战争”的手段——美国便极力劝说联合国的其它成员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可是,对于对共产党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是否符合自身利益”的问题,其它国家却有不同的看法。于是,美国不再用这个问题向别国施加压力,而是明确地提出:“作为惩罚措施,在最低限度内应该由联大作出决议,立即对中国实行汽油、原子能材料、枪枝、弹药

①② 893.2553/1-851, RG59, DSNA.

③ 见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急电3725号,1951年2月9日,611.93231/2-851, RG 59, DSNA.

和其它军事物资的禁运”<sup>①</sup>。1951年5月18日，联大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是以美国的这个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决议在结尾处强调说：“联合国仍将坚持在朝鲜停火的政策，争取以和平手段实现它在朝鲜的目标，并要求调停委员会继续履行其职责”<sup>②</sup>。

虽然英国支持了这项决议，但它的态度是勉强的。香港和新加坡政府的强烈感觉反映了这一点，它们认为，尽管联大的附加措施委员会目前要采取的都是英国已经实行了的措施，但是，联合国做出这样的决议仍然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它们担心，这个决议可能是对华实行全面的经济和政治制裁的开始——一面英国对此是坚决反对的<sup>③</sup>。英国外交部认为，只有在调停委员会的工作“失败”之后，附加措施委员会才可以将其报告提交联大。然而，美国官员指出，英国的意见与联大2月1日决议相矛盾，根据这个决议“的授权，附加措施委员会只有在调停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的情况下才可以延期提交其报告”，而事实上调停工作已经完全失败了。在美国国务院看来，“英国政府仍然认为那些补充措施可能会刺激中国继续进行侵略”。美国的观察家指出：“实际上，即使人们进一步向中共提出有助于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也一定会侵略别国的”<sup>④</sup>。对于是否把经济制裁作为政策手段，英美两国的看法再次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949年。

当然，英国早就对中国实行了包括汽油在内的战略物资的禁运，北京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怀着忿怒的心情指出了这一点。在严厉谴责联合国“非法通过”对华禁运措施的声明中，这位发言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926—1927、1953—1954页。

② 这项决议的原文，见同上书第1988—1989页；或《美国国务院公报》1951年5月28日，第849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686页。

④ 同上，第1952—1953页。一名荷兰专家与美国观察家持不同意见，见香港总领事馆急电，1951年2月13日：《荷兰大使馆秘书杰·维科思伯克斯论中共政策》，693.60/2-1351，RG59，DSNA。

人称：“应当指出，在联合国通过美国的所谓提案之前，英国就已经步美国后尘在贸易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不友好的行动，而且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所有那些追随美国对中国和朝鲜实行贸易禁运政策的国家，必须对由于其敌意而带来的一切后果负责”<sup>①</sup>。

北京对联合国通过的物资禁运决议进行谴责，是人们预料之中的事，这并不能阻止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把这项决议的规定付诸实施。据国务卿艾奇逊和国防部长罗伯特·H·洛维特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递交的一份报告说，“主要是在议案获得通过之后”，到9月25日，不仅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和一些非成员国表示愿遵守决议的规定，而且“许多国家最近还采取了对决议的一般理解范围内的限制措施”<sup>②</sup>。另一方面，这份报告也承认，“仍然有巨额价值的商品输入中国，其中还包括一定数量的战略物资，但是，直接的军用物资是没有的。……有些国家试图通过走私和其他途径冲破规定同中国进行贸易，对此，美国政府正紧密加以监视，并且设法引起其政府的注意”<sup>③</sup>。大约一个月之后，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拉德·索普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指出：“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当然，苏联集团国家除外”<sup>④</sup>。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美国政策强硬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恢复了美国对国民党的大规模军事援助，同时，还向台湾派遣了众多的军事顾问团。1951年5月30日，美国驻台北临时代办兰金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递交了一份外交照会，内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援助中华民国一些军用物资，以使台湾在可能的攻

<sup>①</sup> 《人民中国》，1951年6月1日号第33页。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998页。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2025页。

<sup>③</sup> 同上，第2025—2026页。

<sup>④</sup>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1年11月12日，第762—763页。



击面前得以自卫”。照会还说,在提供援助之前,台湾必须“就如何使用和储存援助物资”的问题同美国达成“谅解”。美国要求国民党政府只能把美国的援助物资用来“保护其内部的安全或者进行合法的自卫”,并且,要接纳美国政府职员在其政府内任职并为他们提供便利的条件,以“监督物资的使用情况,保证物资按照双方的契约使用”。2月9日,台湾政府在外交照会中答应了美国提出的条件<sup>①</sup>。

2月16日,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杜鲁门总统拨出了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援助的主要项目有报警装置、坦克、机动车、小型武器、弹药、工程技术和医疗设备<sup>②</sup>。美国国务院给其驻台北的使馆打电报说:“海军和空军的援助装备(分别价值520万美元和1600万美元)也已经由国防部准备好了。这笔拨款是由国务院向总统提出的,目前已获批准”<sup>③</sup>。

5月1日,威廉·查尔斯少校率领的第一个美国军援顾问代表团到达台北。兰金虽然担心到台北的美国官员的数量会过份膨胀,但是,对美台关系的这种发展他仍然表示欢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盛顿终于作出决定,改变了我们不再向中国派遣这种代表团的早期立场。我曾经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增加驻台美国武官数量的办法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采取断然的措施可能更好。查尔斯少校在任职于台湾的四年时间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sup>④</sup>。

应当指出,兰金以上提到的美国政策的变化是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才发生的。在回忆录的另一章中,兰金列举了自1950年6月27日之后“美国对台政策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6月27

---

①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1年5月7日,第747页。原文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521—1522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584—1585页。

③ 同上,第1585页。

④ 兰金,《中国使命》第105页。

日，杜鲁门宣布美军进入朝鲜和台湾中立），其中包括前面已经提及的1951年2月的军援，以及1951年4月20日美国致台北的关于派遣军援顾问团的通知书，“1951年6月21日签拨”给国民党政府的“近4200万美元的追加经济援助”，和1951年10月批准的共同安全经费——包括在“1952年财政年度的大约3亿美元的对台援助”中<sup>①</su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以及它拒绝联合国的停火建议之前，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中国介入朝鲜问题的后果，请看1951年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的文件NSC48/5，题为“美国的亚洲政策”。这份文件反映了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威胁越来越担心的情绪，也说明了美国为什么要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文件指出，美国当时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不承认台湾隶属于同苏联结盟或由苏联控制的任何中国政府，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sup>②</sup>。我们可以看到，这份文件中提出的对华政策与美国在1949年所奉行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例如，1949年1月制订的文件NSC34/1主张，要在中国各党派之间采取灵活的政策，而文件NSC49/5（原文如此，疑为NSC48/5之误——编者注）却号召中国其它党派的领导者和人民反对“北平政权”，并提出美国应支持反共分子。文件NSC41（原文如此，疑为NSC34/1之误——编者注）主张美国和日本同中共统治的地区进行贸易，而文件NSC48/5却要求继续对华实行贸易限制，并争取其它国家对采取政治和经济的制裁措施。1949——1950年美国的政策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表决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而文件NSC48/5却要求美国说服其他国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sup>③</sup>。到1951年5月中旬，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当强硬的敌视政

① 兰金，《中国使命》第123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6卷第35页。

③ 同上，第35—37页。

策，甚至据此提出了大约20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特点。如同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由于中共在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军事胜利之后所采取的政策以及它对朝鲜问题的介入，美国的这些政策才大大地发展了起来。

即使在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的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并没有放弃同中共领导人建立一种非正式联系的努力，在1951年1月至6月，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计划人员伯顿·马歇尔等人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虽然这些美国官员的努力在周恩来的谈判技能面前显得毫无价值，但这毕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沟通美国与北京之间的联系的愿望<sup>①</sup>。当然，由于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曾经了解了马歇尔等人的努力，我们不能有把握地把这种努力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中共领导人。然而，这在另一方面却说明，即使在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的时候，美国政府也仍然是愿意就中美之间的分歧进行讨论的。

## 32 被监禁和阻留的人

对于在在中国的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来说，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后果，要比战争本身所带来的后果大得多。在战争爆发和美国宣布台湾中立之初，虽然中国加强了反美宣传，但是，在华西方人的处境并无明显变化。大多数想要离境的人都得到了批准并得以离去<sup>②</sup>；那些愿意留下的人也或多或少地能象战前一样从事自己的活动。商人们仍被拒绝发给离境许可证，他们要是打算离开的话，就得交出什么别的“抵押品”<sup>③</sup>。美国国务院希望那些传

---

① 马歇尔等人的努力，有许多记载于《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2部分。

② 参见英国一名领事于1950年7月28日从上海发回的报告，载于《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4FC1582/159。

③ 参见这些文件的备忘录，1950年8月29日，893.181/7-1950，以及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备忘录，10月31日，893.181/10-3150，RG59，DSNA。

教和慈善机构能在中国保留下去，最迟在1950年11月2日，助理国务卿帮办麦钱特在写给美中群众教育运动委员会主席杰勒德·斯沃普的信中还说，“现在，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阻挠人们从本国汇款赞助在华的慈善机构，对于个人或组织从财物上支持在华的传教或类似机构的事，国务院也从未加以干涉。事实上，源源不断的赞助一直是那些慈善机构得以生存的主要财源，它充分表达了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sup>①</sup>。然而，中国出兵朝鲜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申请离华的西方人的数字激增，被监禁或者被拒绝离华的西方人的数目也戏剧般地增加起来。

对于那些派兵参加了联合国军的国家来说，人们并不难预料中国介入朝鲜问题会给它们在华的侨民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影响。1950年10月9日，在获悉了中国要介入朝鲜战争的最初信息之后，英国外交部就指示在北京的哈奇森说：如果有可靠的证据说明“有组织的中国军队将会开进北朝鲜”，他就应当“劝告在中国的所有英国臣民，特别是靠别人亲生活的人以及妇女和儿童离开中国”。外交部还说，“至于那些代表着英国重大利益的重要人士”的去留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外交部“并不希望他们过早地放弃他们自己所追求的目标”<sup>②</sup>。

11月3日，英国外交部通知哈奇森说，如果确有必要劝告英国人离华的话，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也希望英国驻华官员对它们的在华侨民发出同样的劝告<sup>③</sup>。但是，哈奇森本人还不打算普遍发出这样一个官方的告诫，他回答外交部说，他将只求领事人员告诉那些普通的英国国民：根据他个人的看法，现在是离开中国的时候了。哈奇森叮嘱领事人员说：不要发布文字性的劝告书或者召开专门会议，在内地的传教士应该由其各自所在的教会团体写信通知他们，但是，信中不要引用他和领事人员说过

① 893.10/11-250, RG59, DSNA.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4FC1582/160.

③ 同上, FC1582/178.

的话。他还说，通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等国侨民离华的方式也应如此<sup>①</sup>。

当西方国家发出要求它们的侨民离开中国的指示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公开承认它的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事实了。实际上，他们早在10月份就开始进入朝鲜，大约在同时，北京当局也停止了向美国人发放离境许可证的工作。11月18日，哈奇森报告英国外交部说：

很清楚，北京目前至少是不允许美国人离开中国的，他们在大约六周以前就开始这样做了。最近，有許多人，包括一些完全无辜的学生的离境申请也遭到了拒绝。中国人告诉他们，不批准他们离境只是“暂时的”，……假如在中国各地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那么，我们是否值得向美国人发出建议离境的通知，看来就令人怀疑了。我在北京没有发出过任何通知（鉴于通讯工具的特点，要慎重地通知侨民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已经尽可能地暗示在各地的外国人离开中国<sup>②</sup>。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正在尽全力使在华美国人尽快离开中国，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已经长期被阻止离境的商人。12月8日（这时，联合国军队已全线退却），罗伯特·斯特朗在交给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主任埃德蒙·柯乐博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在中国大陆有美国代理人”的美国商业和慈善机构，应当要求这些代理人设法离华，寻找安全的避难所，无论付出多大的财政上的牺牲，只要能离开中国都是必要的。斯特朗说：“有关的公司应该不惜重金将他们保释救出”<sup>③</sup>。

柯乐博不同意斯特朗关于发出总的撤离警告的想法，他在备忘录中批示道：“传教士和商人已经多次收到了要求他们离华的警告，只有一些‘坚决的核心人物’仍留在中国，而且，英国最 很可

①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6FC1582/195第199页。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6FC1582/208。

③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3卷第597—598页。

能也向他们发出了警告，故没有必要再发出一个总的撤离警告。”助理国务卿蒂办麦钱特与柯乐博的看法相同，他认为，警告只能助长这些人的幻想，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于帮助他们是无能为力的<sup>①</sup>。

但是，美国的社会团体并不需要政府方面敦促他们如何做。中国出兵朝鲜在美国和中国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促使美国的社会团体劝告其在华人员迅速撤离。中国参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美国决定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并且切断了美国与中国的财政业务。这样，那些受美国支持的在华组织便失去了基本的资金来源。另一面，中国政府查封了美国人在华的所有财产，由美国人资助建立的讲堂和大学完全处在了中国政府的单方面领导之下<sup>②</sup>。同时，中国新闻媒介的反美宣传也加强了。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曾经描述过当时岭南大学的气氛，他说：大学里出现了令人痛苦的“惊慌”，“那些与外国人有联系的人”受到了公然的恫吓<sup>③</sup>。

教会组织之所以指示传教士离华，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的基督徒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例如，1950年1月，哈奇森从北京报告说，中国内地教会（它可能是最大的新教组织）认为，“在中国的传教士目前极不可能履行他们的使命”，因此，为了使中国教徒免受“不利影响”，该教会已决定撤离其大部分传教人员。据哈奇森的报告说，几乎所有的美国和英国教会都在原则上作出了这样的决定<sup>④</sup>。

在新教传教组织作出撤离中国的决定后，来自教会方面申请离境的人数陡然增加了。一些人没过多久就领到了离境许可证，但有的人一直等待了两年之久，许多人则被软禁起来，还有一些人被监禁了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传教士受到何种待遇似乎取决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598页注释3。

② 关于这种情况的第一手材料，请看威廉·G·休厄尔著《我在中国》（伦敦，乔治·艾伦——昂温1966年版）第5章。

③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6FC1582/226。

④ 同上，FC1582/218。

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他们所在的地区及与他们有联系的传教组织的情况以及他们个人的传教历史。

有的传教士受到了大会批斗。1951年秋天，根据对中国杂志《天风》（Tien Feng的译音，下同——编者注）所报道的详细情况的分析，美国基督教教会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份《中国公报》，对批斗大会的情况做了如下描述：

受到批斗的传教士一般都是美国人。……中国人对他们的指控是：1. 把宗教置于政治之上。2. 唆使人们热爱、赞美和敬畏美国人的学说。3. 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4. 为本国搞间谍活动。5. 以“小恩小惠”骗取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一些传教士曾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帮助过中国人民。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然而在以上的最后一条指控中，他们全都遭到了不分清红皂白的谴责。

……

很明显，大会并非是人们自己发起的，而是在当地政府宗教事务局的压力之下才召集起来的。……政府官员不仅策划了这些会议，而且还积极参与了编造这些指控的过程。

尽管有政府作后台，批判运动并未取得多大的成功。……这使《天风》杂志的编辑很忧虑。为了激发人们一直萎靡不振的批判情绪，8月18日和25日，该杂志连续发表了两篇社论<sup>①</sup>。

批判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些中国教徒拒绝谴责他们的外国同事，虽然这要冒与官方主持的运动不合作的风险。比如，老资格的传教士休·哈伯德和他的妻子梅布尔·哈伯德遇到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在中国传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他们以及他们的邻居文丽斯·哈金斯的经历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新制度和甚至是自由传教士的愿望之间出现的这场不可避免的冲突究竟是怎么回事。

休·哈伯德是一位农村改革者。汤普森在他所著的《中国面

---

<sup>①</sup> 《中国公报》，1951年10月31日。

对西方》这本书中曾经提到过他的事迹<sup>①</sup>。1950年6月，休·哈伯德再次参加了华北基督教乡村事业联盟，这个组织是在25年前由他帮助建立的。他希望能为中国的农民工作更多的年份，并且希望自己能适应新的制度<sup>②</sup>。当他在美国的家人问他为什么要留在共产党中国继续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许多做出了留在中国的选择的传教士的感情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1950年7月2日，他写道：

我是带着三种信念来到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的华北地区工作的，

1. 我要努力更加忠实地相信上帝。……上帝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以神秘的方式工作着，但却常常被自己的孩子们误解。……

2. 我要努力察看当前的制度中什么是美好的，并且与任何有建设性的运动相合作，这样就可以使基督教运动赢得其传播的权利。我们必须首先挖掘自己基督徒的信念并以牺牲性的工作表达之。……

3. 我准备接受并且相信中国政府的领导……我们已经给了我们的中国朋友必要的基督精神，让我们相信他们会懂得——可能比我们更清楚地懂得，在他们民族历史的决定性关头，基督徒应该做些什么。

在哈伯德重新和华北基督教乡村事业联盟一起工作的时候，恰好朝鲜战争爆发了。不过，在整个秋天里，他们的工作似乎进行得很顺利。10月29日，他们和“十三县专区办公室”的人一块儿参加了一次庙会。他写道，庙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管理庙会工作的主要政府官员对我们的参加非常赞赏”，哈伯德说：“我们感到，也许我们正在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愿望，这一切都使我们的心倍觉温暖”。另一方面，他也写道，一些地方出现了反基督教的声明，还发生了反传教士的行为，他为此感到不安。

在华期间，哈伯德参加了政治学习小组，官方要求所有加入

<sup>①</sup> 詹姆斯·汤普森，《中国面对西方，1928—1937年在国民党中国的美国改革者》（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

<sup>②</sup> 这个资料以及下面有关哈伯德经历的记述，除有注释者外，均引自他的没有出版的个人文件。



了某种组织的人都参加这种学习。几年以后，哈伯德这样记述了他这一段的经历：

我们在中国人所称的学习班中上课，每周两次……我们其中的一个曾经在北京接受了三个月的共产主义教育，他是一个忠诚的基督教徒。……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们发现他已被指定为我们小组的组长。同给我们安插一个外人相比，他给我们上课要容易得多。……他总是先宣布一下晚上开会的主题，可能再做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他就依次询问每个人是怎么想的，你必须回答……不许沉默不语<sup>①</sup>。

哈伯德回忆说，开始的时候，他所参加的那个华北基督教乡村事业联盟学习小组“没有遇到任何麻烦”。然而，中国介入朝鲜问题后，他便不再参加学习了，因为他发觉，“是否参加这样的学习小组已成了区分人们进步和不进步的分水岭”<sup>②</sup>。

哈伯德后来说，他退出学习小组是在12月份，那时，他和他的妻子都申请要离开中国。在此之前，他们在同一个月中收到了来自美国教会董事会的两封电报，其中第二封提出了要求“传教士一定要尽早地完全撤离中国”。1950年12月31日，哈伯德在一封信中这样概括了他当时的处境：“如果有可能的话，传教士必须离开。倘若不接受董事会的劝告，就必须找到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办法。即使如此，他们（指在华的外国传教士——编者注）与中国组织团体之间的联系，也将不利于后者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也不利于它们切断‘与外国的所有联系’。”

从提出申请到最后获准离境的15个月中，哈伯德一家生活得相当轻松。虽然他们不能也不会被允许去进行他们通常的传教活动，而且哈伯德无法实现从他家所在的通县走13英里去北京检查一下他的牙齿的愿望，但是，他们一家每天都可以散步或者骑自行车

---

<sup>①</sup> 引自哈伯德口述历史录音带，13—336。这些录音带为哈伯德的女儿格拉迪斯·哈伯德·新威夫特所有，但转录带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口述历史研究室 N. Y. 10027。

<sup>②</sup> 哈伯德口述历史录音带，13—365。

车旅行,接收从美国寄来的邮件(除了杂志和报纸),无忧无虑地展现其个人的爱好。1951年7月2日,哈伯德在信中写道:“最近,我又花了许多时间把我们的养鸟方面的书籍译成汉语,并且做些阅读、汉语研究和木雕方面的工作。”<sup>①</sup>他在家信中多次提到,尽管中国政府正在进行刻薄的反美宣传,但中国人私下对他和他的妻子仍很友好,他说:“我们努力每天都安排一次骑车旅行或者散步。每天都有朋友或者度假的士兵来拜访,那些士兵很愿意来,他们非常友好,热爱和平。一想到有人要把这些善良的孩子们送到前线被我的国家的人打死,我就非常痛恨。反过来也一样。让我们祈祷战争能尽快地结束吧。”

哈伯德一家留在中国期间受到了很宽大的对待,这与他们的朋友和邻居艾丽丝·哈金斯受到的对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金斯在一所教会创办的女生学校里工作了几十年,但当局从外面往学校里安排了一个女人,在这个女人的带领下,学校的学生接连不断地批斗并从身体上折磨她<sup>②</sup>。女学生们甚至创作了一首叫作《哈金斯坏蛋》的中国歌曲,把她说成是一个极端堕落的女人。据哈伯德说,学生们经常“随意闯进她的房间,打开她的皮箱,检查她的东西,并且……向她示威”。在毕业典礼上,一个女孩子毫不客气地批判她,而她曾经以金钱帮助过这个女孩子。最后,哈金斯被从她的房间中赶了出去。

为什么哈金斯会受到如此的磨难?当哈伯德对中国人把哈金斯赶出房间的做法表示抗议时,学校的校长告诉他,学校召开了有全体教师、学生和职工参加的群众大会,是群众大会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校长称之为“人民的一次起义”。哈伯德感到,在革命的条件下,这意味着中国人把哈金斯当成了一名压迫者和阶

<sup>①</sup> 哈伯德会讲汉语,他曾经与人合著过一本有巨大价值的关于华北鸟类的书籍。

<sup>②</sup> 哈金斯曾把她1950年秋天在该学校的经历写成小说,见艾丽丝·哈金斯《俄龙的胜利》(费城: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53年版)。

级敌人。他认为，反对哈金斯的活动的 主要目的 在于激发反美情绪，并且清除美国在这所学校中的任何影响。

1951年秋天，中国各地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西部的一位英国传教士，对中国革命有着全部的热情，但是，他的那些打算离开中国的同行所受到的对待却刺痛了他的心。一名中国官员告诉他，“很久以来，外国人总是趾高气扬地出现在中国老百姓面前，他们一贯宣称自己是对的，拥有超人的智慧，有权利指挥别人。我们被蒙蔽了许许多多，我们必须让每个人都知 道，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人的势力已经被摧毁了。”<sup>①</sup> 这位官员说，即使最有好意的外国人也不自觉地充当了异族文化的传播者。换句话说，革命不仅要摧毁这些外国人的势力和影响，而且还要使人们看到这一点。由于这个原因，召开对外国传教士的批斗大会就成为必要的了，就象对待中国的地主和其他压迫者一样，他们的势力和影响也是必须要被摧毁的。

中国人虽使哈伯德一家滞留了15个月才得以离境，但在此期间却没有把他们——至少是休·哈伯德——当作批斗对象，对此，人们似乎无法作出适当的解释。但是，哈伯德没有受到批斗，显然是因为他在“华北基督教乡村事业联盟”的中国同事们拒绝这样做。他的一个同事告诉他，实际上，联盟的成员们承受了要求批判哈伯德的“巨大压力”，但是，他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如果有人出来批判哈伯德，他们所有的人就反过来批斗他。不过，在其所属教会的其它所有的人都获准离华之后（艾丽丝·哈金斯除外），哈伯德仍被在中国阻留了很久，他本人对这种情况曾作了分析。有人可能认为，共产党会把哈伯德当作一个同情他们事业的人，因为他从事了多年的乡村重建和群众教育工作，其中有些工作是在日本占领华北初期，他在共产党游击队控制的地区进行的。可是，一位中国朋友告诉哈伯德，尽管他

<sup>①</sup> 休厄尔，《我在中国》第126—127页。

致力于乡村工作，帮助农民使用优良种籽等等，这些事实却一点也不能说明他对共产党的信赖。“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位朋友说，“你是为美国效劳的，你的立场站错了，你是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这样做的”。哈伯德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传教士，很多人都知道他，他的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共产党认为他们自己才应该是最强大的人，在共产党看来，哈伯德作为一个非凡的人的事实也许正是他的主要的罪行，它使哈伯德因为不受信任而成了一个特殊人物。他显然是犯了改良主义的罪行，就象教堂里的一位新的中国领导人所说的，“改良主义是一个阴谋，它企图打着‘社会福音’的幌子取消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热情”<sup>①</sup>。无论如何，还有许多其他的传教士，他们被在中国阻留了长短不一的时间，而当局从没有向他们说明原因。

有些传教士在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的情况下就被投进了监狱。弗朗克·库利就是其中的一人，在一个四米宽六米长的单人牢房里。他过了50天与世隔绝的监禁生活<sup>②</sup>。库利在重庆大学工作，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名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代表着基督徒的新一代。他太渴望在新政府的制度下从事自己的事业了。他的一名伙伴说：“库利与工作人员一样生活简朴，在周围的传教士中，他的汉语说得最好，他曾拿出自己的大部分工资保释重庆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共产党来到后，库利便开始教育他的同事，以便他们与新政府友好相处。……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强化了其反美宣传，对于库利来说，他的一切都结束了。于是，他只有申请离开中国。他无缘无故地等待了10个月，没有经过审判就被投进监狱呆了两个月。之后，中国政府责令他离开这个国家。”<sup>③</sup>

① 见吴耀梁（译音）的文章，载《人民中国》1951年12月1日号第16页。

② 《中国公报》，1951年12月11日，第2页。

③ F·奥林·斯托克韦尔：《主伴随我在红色中国：在中共监狱两年的经历》（纽约：哈珀——布拉斯斯1953年版）第64页。

据说，大多数被监禁时间较长的美国人都被指控为搞间谍活动，他们常常表示服罪。一些人确实认为自己有罪，另外一些人则不过是把服罪当作获释的手段。有三名美国人，他们在北京住监狱的时间合起来有11年，他们都写了有关自己这段经历的书，书的名称就反映了他们各自对当时情况的想法。享受富布赖特奖学金的博学的阿林和阿德勒·里基特夫妇把他们的书名叫作《自由了的囚徒》，而天主教大学的校长哈罗德·里格尼神父则把他的书名叫作《我在红色地狱的四年》<sup>①</sup>。1950年秋天，随着中国介入朝鲜问题的迹象的出现，中国政府就开始拒绝一些人离境，他们三人正是那些没有获准离华的人们中的几个。

1951年7月25日，阿林·里基特和里格尼神父被捕了。那一天，在北京有许多外国人遭到了逮捕。一位英国外交官的美国妻子写道，当时，“我听说至少有20名外国人被捕……7月25日，……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宣布这些逮捕行动……从来也没有宣布过。……被捕的不仅有美国人，还有比利时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他们之中有牧师、修女、教授、商人和医生”<sup>②</sup>。

美国国务院曾于5月21日告诉报界，可能已有30多名美国人在中国被捕，具体数字不能肯定，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地的中共政府都不对这些逮捕作任何说明，也不通知有关的社会福利机构，或者告诉人们被捕者的下落”。而且，中国人还拒绝具有合法身份的外国领事和英国官员接近被捕者，因为他们认为，自从美国领事馆关闭之后，“这些人一直代表着美国的在华利益”<sup>③</sup>。

<sup>①</sup> 阿林和阿德勒·里基特夫妇：《自由了的囚徒》（纽约：卡梅伦协会1957年版）。哈罗德·里格尼神父：《我在红色地狱的四年》（芝加哥：亨利·勒涅里1956年版）。

<sup>②</sup> 皮特·卢森：《北京1950—1953年》（伦敦：罗伯特·黑尔1958年版）第71页。

<sup>③</sup>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1年5月11日第947页。

面对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司法程序，不仅要帮助被捕的美国人还要帮助那些被捕的英国人和英联邦其他国家的人，英国官员当然早就了解了其中所包含的巨大困难。1951年夏天，英国驻天津总领事给英国外交部的一封电报谈到了中国政府进行审判的情况：

实际上，合法的辩护是不存在的，因为法院不允许有任何律师出庭。

……

在审问之前或审问过程中，被告人不许询问任何问题，不许反复询问证人，而且，实际上被告人要被迫认罪到当局满意的程度后，他才会被带到法庭的面前。……

审判时，有一名法官负责记录，审判由始至终似乎不过是在这名法官面前进一步确认被告人的罪行，案卷早已在警察审问和“教育”犯人的过程中写好。……

我听说，在审讯、释放或者宣判之前，被告人总是要被单独监禁至少三天①。

这位英国总领事说，“中国地方当局认为这种司法程序是令人满意的和正规的”，“我担心，任何一个中共地方政府都不会象在英国那样对待被拘留的外国人”。他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承认英国之前，如果要求同这些被拘留起来的人建立联系，中国政府很可能是不会理睬的。

在对总领事的见识进行评论时，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写道：“即使在那些承认我们的领事权的共产党国家里，我们也同样无力保障英国臣民的合法利益。”他引用在波兰的经验指出，波兰的司法程序同目前中国的行为方式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波兰政府“不告诉我们有关逮捕英国人的问题，而让我们自己去弄清是怎么回事”。另一名官员补充道：“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实质上也与波兰相同。……即使一个人并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性，他也往往被拒绝接近那些被捕者。”②

---

①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504FC1582/163。

中国监禁了许多美国人，美国政府既无法得到关于这些人的任何消息，也无法通过英国人接近他们，这成为使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的一个热点问题，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和这些人被遣返回美国之后很久，其影响都没有能够消除。但是如同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这却成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进行直接外交联系的原因之一。

1951年12月8日，美国国务院向报界解释说，它反对把那些在中国被监禁的人的名字公开，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1）他们的亲属或同事担心这样做会危及被监禁者的社会福利；（2）那些正在帮助我们向中共提出交涉的国家认为，由官方公布这些人的名字——特别是在他们为美国人活动期间，可能不利于其努力取得成功。”<sup>①</sup>威廉·华莱士博士是基督教南方浸礼会的一名传教士，在梧州（Wuchow）一个监狱被单独关押期间死去了，他的事例有助于说明这些被监禁者的亲属或同事不愿公开姓名的原因。1951年5月21日，总领事麦康瑞希从香港拍出电报，通知了华莱士博士死去的消息，他说：“在香港的教会使团代表要求我们眼下不公开这个事情，不然的话，中国人可能会对在梧州的海斯小姐和7名美国玛丽钟声教会（原文如此——作者注）的牧师进行报复。海斯目前没有被捕，但是她领不到出境许可证，那7名牧师据说已经被捕了。”<sup>②</sup>至于第二个原因，在1951年夏末，美国同一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了接洽，希望它们在北京的代表设法使中共政府重视被监禁的美国人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是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瑞士、苏联、瑞典、挪威和丹麦<sup>③</sup>。据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莱昂内尔·拉姆（他在2月份接替了哈奇森的职务）的一系列报告说，尽管由这些国家的代表共同进行交涉一事遇到了一些反对意见，但是，

<sup>①</sup>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1年12月12日，第1014页。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581—1582页。

<sup>③</sup> 同上，第1797页。

他们大多数人都愿意为美国提供帮助<sup>①</sup>，只是印度和瑞士的代表担心美国方面“会不慎重地把事情公开”<sup>②</sup>。

为什么美国国务院要公开说明它不向外界透露被监禁者的名字呢？这是由于在早些时候，威廉·F·诺兰参议员把32名在华被监禁的美国人的名字泄露了出去，这些名字是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出于信任而于10月份告诉他的<sup>③</sup>。据12月11日发表的《中国公报》报道，这份名单包括了13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9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7名商人和3名享受富布赖特奖学金的学生。

到1952年9月，美国的总统竞选活动进入高潮，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中共面前过于软弱，这促使美国国务院对于中国监禁和阻留美国人离境的问题采取了愈益强硬的立场，这个立场随之影响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9月10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奇逊国务卿简要介绍了由于受到虐待而死去的4名美国人的情况，下面是他讲话的摘要，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点美国政策的变化：

大家都已知道弗朗西斯·福特主教死在了共产党中国的监狱里。……我们一直不能肯定他遇到了什么不幸。大家知道，在这个悲剧性模式的共产党警察国家中，逮捕就意味着完全切断了被捕者与外界的联系，当局不会公布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根据可靠的报告，福特主教在狱中饮食粗陋，并且常常受到虐待。……

格特鲁德·科恩是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她于1951年2月申请离开中国，但遭到了拒绝。这年夏天，她患了癌症。……她要求打电报让从香港寄一些钱来维持生活，结果没有得到允许。……1952年2月18日，她被用担架抬着穿过边境来到了香港，48小时之后，她便死去了。中国政府从没有指控她犯有任何罪行。……

① 拉姆是继哈奇森之后英国外交部中最有经验的中国问题专家，他30年的工作生涯几乎都是在中国任职度过的。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808页—1810页；关于亚欧外交官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各种行动，见第1827—1829、1836—1837、1845—1846页。

③ 见“编辑接语”，同上，第1864页。



威廉·华莱士博士是美国基督教新教浸礼会的一名医生……他于1950年12月19日被捕。……（他）受到了严刑拷打和折磨。1951年2月10日，他死在狱中。

菲利普·科莱因是一名美国商人，他于1951年4月被捕，中国指控他搞间谍活动。由于健康状况欠佳，几个月后他获得了释放。他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1951年8月他再次被捕，中国人强制他接受没完没了的审讯。……1951年10月，中国人又释放了他。……科莱因于1951年11月中旬在青岛逝世。他死去的主要原因是，在他被关押期间，中国人拒绝使用胰岛素为他治疗糖尿病<sup>①</sup>。

艾奇逊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对报界的谈话，他说，“我们只知道”，“相信人类起码的正义和公正的人们将永远谴责中共所犯下的罪行”。艾奇逊的讲话并没有使在华美国人的境遇得到什么改善，但有必要说明的是，在这之前，美国国务院是很谨慎地避免使用他讲话中的这种语言的，只是在此之后，才不再象以前那样谨慎了。

驻中国的外交代表们为搭救被关押的外国人士四处活动，但是，人们却很难预料这些活动会有什么结果。1953年年中，拉姆在从北京到伦敦的途中对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说，他曾经认为外交代表们的活动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在他离开中国之前，上海的天主教牧师遭到了大规模的逮捕，这使他的希望破灭了。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外交代表们的活动不会对中国当局有什么根本的影响，在是否释放人质的问题上，中国当局似乎有自己的安排<sup>②</sup>。

美国人在中国所受到的对待，毫无疑问地也使其他国家的公众和官方舆论对中国变得严厉了。但是，总的来看，美国人所受到的对待并非都是歧视性的，因为中国人给予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和商人的待遇也是同样的，而且给予这种待遇不过是“革命的正义”。

<sup>①</sup>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2年6月22日，第400页。

<sup>②</sup> 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1953年7月2日，693.60/7-253，RG59，DSNA。

义”制度的要求，它既适用于外国人，也适用于有关的中国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它也只能是偏袒外国人的，因为他们对本国的“敌人”镇压得更加严厉。但是，无论这个制度是否具有歧视性，它都永远不能得到西方的宽恕。

中国人从他们的国家中清除美“帝国主义”的文化是使美国人感到十分痛苦的事情，而清除活动又是在这样一种司法制度下进行的，美国人就感到更加恼怒了。不仅象艾奇逊这样的冷战政治家，甚至传教士和其他人的情绪也都由此变坏了。例如休·哈伯德，他本来决心要在中国新制度的政策中找到建设性的东西并且与之合作，他反对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对华政策，但是他失望了。1952年4月1日，他和他的妻子以及艾丽丝·哈金斯乘船离开了天津，这一天，他在船上写下了在“人权和正义”领域“对共产主义的控诉”一文。他描写了人们所熟悉的群众批斗大会的情况，并举出了自己所了解的一些事例，然后他说道，“警察的职能和所谓的正义就是保护革命去反对它的敌人，党外的人没有任何权利”，哈伯德决非对中国新政府的成就视而不见，但是他替那些党外的人感到伤心。他在自己获得自由的第一个日子里写道：“这是我们从前不能用笔来描绘的一张图画的一个侧面，我们会尽自己所能把全部美好的事情都告诉你，我们可以把中国人在许多领域里取得的建设性成就排成一个令人印象很深的表格，但是，一想到紧紧包围在这张表格……特别是我们的基督徒朋友周围的恐怖统治，我们的心里就充满了悲哀。”

### 33 苦 果

朝鲜战争给中美关系留下了痛苦的遗产，它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对中美双方特别是美国方面都产生着影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研究有关的中美关系文件时指出：“到签订停战协定的7月27日那一天止，美国军队的伤亡超过了142000人，其中死亡33629

人。(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的记载,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期间,中朝军队共歼灭美国和其它国家的侵略军以及南朝鲜李伪军1093839人,其中歼灭美国军队的数字远远超过了142000人——编者注。)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他们的伤亡人数,但是据联合国估计达90万人,(据同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的记载,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亡数字是36万余人——编者注,)毛泽东的一个儿子也牺牲了。所有这些流血的记忆,在以后的年月里都成了横亘在美中之间的一道痛苦的壁垒。”<sup>①</sup>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政治和经济制裁措施将无法很快得到修正,因朝鲜战争而繁殖起来的麦卡锡主义分子的歇斯底里也会始终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sup>②</sup>。

停火谈判本身使美国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美国政府在拖拖拉拉的谈判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认识,就象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53年年初,艾森豪威尔继杜鲁门之后成为美国总统——编者注)所说,中共“只尊崇武力而蔑视忠实于自己诺言的人”<sup>③</sup>。停火谈判头10个月中的美方主要谈判者C·特纳·乔伊海军中将写道:

“中共一点儿也不为自己撕毁协定而感到难堪。很清楚,协定应该是文字形式的,可是这样的话,共产党人又会说是你们的翻译出现了错误。”<sup>④</sup>他补充说:“不管人们多么庄严地达成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本身并不见得具有特殊的效力。除非它对共产党

<sup>①</sup> 麦克法夸尔:《中美关系》第82页。

<sup>②</sup> 拉塞尔·D·布伊提:《苏美在亚洲的关系,1945—1954》(诺曼:俄克拉荷马州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sup>③</sup>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改革训令》(纽约:大不列颠出版社1963年版)第123页。

<sup>④</sup> C·特·纳·乔伊:《共产党人如何谈判》(纽约:麦克米伦1955年版)第130页,另见艾伦·E·古德曼:《边谈边打——C·特纳·乔伊海军上将在朝鲜停战会议期间的日记》(斯坦福: Hoover 研究院出版社1973年版)。

的目标有利，否则，共产党人是不会遵守它的。”<sup>①</sup>

停战协定生效不久，美国人的这个认识就得到了印证。协定第六十节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和生效之后的三个月内，由交战双方的国家各自指定代表召开一次较高级的政治会议，通过谈判解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朝鲜争端的和平解决方法问题，等等。”<sup>②</sup>1953年8月28日，联大通过的一项决议批准了交战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并欢迎按照协定的建议召开一次政治会议，还建议苏联“也参加这次政治会议——如果另一方面（指中朝方面）愿意的话”。这项决议还指定美国和中朝方面一起为政治会议的召开进行筹备工作<sup>③</sup>。

根据联大的决议，美国国务院通过瑞典外交部分别向中国政府 and 北朝鲜政府递交了一封信，就政治会议召开的的时间和地点提出看法。在这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已经分别向北京和平壤传达了联大决议的内容。北京谴责这个决议是非法的，并且要求派代表参加联大会议，对政治会议要讨论的所有问题重新加以考虑。它还要求某些亚洲的“中立”国家参加政治会议。鉴于出现的僵局，美国表示愿意派代表同中共政府和北朝鲜政府的代表举行会谈，讨论如何着手政治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国和北朝鲜同意了美国的建议，并提出会谈在板门店举行（板门店是双方进行停战谈判的地方），时间是1953年10月26日，它们还提出在会谈中既要讨论政治会议召开的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也要讨论由哪些国家参加政治会议的问题。经过双方的安排，朝鲜战争结束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参加的第一次外交谈判开始了。

1953年10月26日，在所谓的朝鲜问题政治会议预备会议开始的时候，就现场的形势而言，人们很难认为板门店会比别的地方更有助于谈判产生结果。数万相互为敌的军队固守在横亘朝鲜半

① 乔伊：《共产党人如何谈判》第134页。

② 停战协定的全文，见《美国国务院公报》，1953年8月8日，第132—140页。

③ 《日内瓦会议上的朝鲜问题》，美国国务院出版5309，1954年10月，第4页。

岛的非军事化地带的两侧，谈判地点就在这个地带内的一座房子里。这座房子坐落在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上，南朝鲜的士兵守卫着它的南门，北朝鲜的士兵则守卫着它的北门。谈判桌上盖着一条绿色毛毯，毛毯的中缝大致与南北朝鲜的分界线相重合。在非军事化地带的另一个地方，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印度军队正看守着数千名还没有对自己的去向作出最后抉择的战俘。中国战俘中有许多人不愿意再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以致北京停止了说服他们的工作，转而严厉谴责联合国方面破坏停战协定。在这种对抗、敌视的环境下，预备会议没有产生什么结果是在人们预料之中的。

会谈的失败并非是由于美国政府缺乏谈判的诚意，至少代表联合国方面参加会谈的这个小小使团的团长阿瑟·迪安不是如此。迪安是一名受人称颂的市民，作为纽约一家公司的出色的律师，他还是杜勒斯国务卿（1953年年初，杜勒斯继艾奇逊之后出任美国国务卿职务——编者注）曾在其中工作过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成员。迪安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对会谈将在10天或两周之内结束这一点感到乐观。在去朝鲜的途中，他告诉代表团的成员说，取得这次谈判的成功对艾森豪威尔的新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sup>①</sup>。

迪安在预备会议一开始时就指出，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节的规定，应该由朝鲜战争的交战国参加政治会议，这些文字规定不仅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其措词也是由北朝鲜方面在停战谈判中提出的。尽管如此，迪安最后还是同意了把由哪些国家参加政治会议以及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列入预备会议的讨论议程。双方在会议议程上形成的这种契约是整个会谈所产生的唯一结果。会谈当中，联合国方面修正了它所坚持的不同意中立国家参加政治会议的早期立场，但是，迪安绝不接受把苏联也视为中立国家的主张，尽管他表示联合国欢迎苏联正式参加会议，并且在会

<sup>①</sup> 此系根据本书作者的个人回忆，我曾陪同迪安参加谈判。

议中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承担义务。

迪安表现出的灵活性是谈判的另一方无法相比的。当会谈进行了大约一半的时候，北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分别是奇石福和黄华）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以战俘问题为核心的一些枝节问题上。他们不断指责联合国方面有意拖延会谈，以便实现它对拒绝回国的共产党战俘的“恶毒的阴谋”。他们还常常攻击美国的动机，最后甚至对迪安的谈判权限也表示怀疑。总之，他们停止了谈判。12月10日，在一次长时间的会谈中，当他们提及北朝鲜战俘营于1953年6月单方面释放辛格曼·里的事情，并以此来攻击美国的所谓叛卖行为时，迪安气愤地离开了会场。预备会议成了一幕可笑的滑稽剧。

回国之后，迪安于12月21日在一次无线电广播中就会议失败的原因向全国作了解释。他说：“对方坚持把苏联作为中立国家，并且反对个别的中立国家参加政治会议，除了这两点我们没有接受外（其实我们接受这两点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安排无投票权的观察员参加会议以及观察员的权利和投票程序问题上，我们完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sup>①</sup>在谈到在朝鲜实现“真正的和平”的可能性时，迪安的看法是“悲观的，但也绝非毫无希望的”。他强调说，共产党方面“并不急于”提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找到这种办法就“需要我们付出全部的智慧、精力、决心和耐心”<sup>②</sup>。

但是，美国国务院显然希望迪安在板门店的谈判中表现出更多的耐心，国务院尤其对迪安的突然离开会场而去感到吃惊，并试图重新开始预备会议。为了挽回面子，国务院要把12月10日发生的这一令人不快的事情从记录中删去。1954年1月，与会双方的联络秘书举行了五次会谈。联合国方面提出要交换记录以删去指责联合国方面没有诚意的文字，但是，北朝鲜和中国方面拒绝

---

<sup>①②</sup> 迪安的广播报告全文，见1952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

了这个要求并退出了会场，会谈就这样不了了之<sup>①</sup>。

1953年12月初，当板门店预备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美、英、法三国在百慕大举行了一次首脑会议。虽然对华政策并非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但它仍是三国首脑所关心的一个问题。美国国务院担心，由于朝鲜战火的平息，在中国的联合国代表席位问题上，英国可能不会再支持延期表决的立场。这一年6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联合国问题顾问鲁斯·培根在预测停战协定的签订问题时曾写过一篇论文，她指出，英国正期待着“早日结束”对中国代表席位问题的延期表决立场，“只要停战协定一签字，英国就将支持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培根还担心，如果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取得成功，法国可能也会改变它的立场。所以，她希望尽快“在原则上达成一个协议，保证三国政府在联合国各个机构能共同维护一些程序性的措施，以便推迟对（中国的代表席位）问题的表决。”<sup>②</sup>

培根曾经同英国驻美大使馆和驻联合国总部的代表团成员进行过会谈，她的担心无疑是在这些会谈中产生的。然而，在百慕大三国首脑会议上，丘吉尔首相（1951年，丘吉尔取代艾德礼再度成为英国首相——编者注）表示，英国将在中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上支持美国的意见。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说，丘吉尔告诉他：虽然英国并不打算疏远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但是英国将永远和美国一道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他引用丘吉尔的话说：“英国当然更愿意把美国而不是红色中国作为自己的盟友。”<sup>③</sup>事实上，在远远超出丘吉尔这一届首相任期的时间内，

① 本书作者当时就是联合国方面参加会谈的联络秘书。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年第3卷第673—674页。培根博士1933年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是国务院中职务最高的妇女。

③ 艾森豪威尔：《改革训令》第249页。一位在此期间同丘吉尔关系密切的人写道，丘吉尔“一直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资格表示怀疑”，“义和团运动以来，他对中国的看法几乎毫无改变”，见麦克莫兰·威尔逊·莫兰著《丘吉尔：为生存而斗争的人（1940—1965）》（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66年版）第594页。

英国的确坚持了延期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的立场——也就是在这一问题上同美国“暂停争论”的立场。

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前相比，美英的对华政策这时在策略上靠近了许多。但是，在如何促使北京和莫斯科分裂的问题上，它们之间仍有巨大分歧。这个分歧，与1950年时它们之间的分歧实际是一样的，只不过当时在华盛顿和伦敦执政的政党现在都已下台了。1953年12月7日，杜勒斯在三国首脑会议的一次有限会议上发表了他的看法。一份绝密的会议备忘录对此作了记载：

虽然对共产党中国与苏联关系的看法很难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但是，杜勒斯相信美国政府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是，中苏关系存在着紧张因素。……这种因素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它可能最终会给予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共同的利益促使中苏分裂。

三方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联合王国和美国之间。……关于如何促使中苏分裂，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通过我们对共产党中国表示友好的办法使中国脱离苏联。另一种是，如果我们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使我国同中国的关系保持紧张，就会迫使中国向苏联提出更多的苏联无法满足的要求，这样，中苏关系中的紧张因素就会增加，最终导致它们的分裂<sup>①</sup>。

杜勒斯接着强调了美国的立场，即：“应该继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并且，在不发生战争的限度内，也要在军事上施加压力。”美国政府认为，与其竞相在中国面前讨好，倒不如采取施加压力的政策。杜勒斯说，虽然英国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承认“并不意味着英国必须在政治、道义或经济上给予他们支持。”<sup>②</sup>

杜勒斯这些话的实际意义在于说服英国，使它在中国代表席位问题上坚持延期表决的立场，如前所述，他的努力成功了。但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还是很清楚地告诉他说，英国政府仍然相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1954年第3卷第711页。

② 同上。



信承认中共政权是接近中国的明智之举。他指出，苏联和中国也正在试图分裂美英法三国同盟，“就如同我们正在试图分裂中苏同盟一样。这种情况本身多少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完全切断同中国的联系是不明智的。无论如何，我们目前同中国的关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sup>①</sup>

几个星期之后，世界上的四个大国美、英、法、苏在柏林举行了外长会议，成功地完成了板门店预备会议所没有完成的工作（柏林四国外长会议达成协议：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由中、苏、美、英、法以及其他直接有关的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编者注）。会议同意，有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的参加者由朝鲜战争的交战国和苏联构成<sup>②</sup>。中立国家则不出席。英国外长艾登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他当时发给伦敦的一封电报，其中说：“杜勒斯先生认为，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并不妨碍它同中国人进行会谈，实际上，这样的谈判正在板门店进行（指双方联络秘书间的会谈——译者注）。”<sup>③</sup>

美国毕竟早在1952年就同意了停战协定第六十节中关于同中国举行政治会议的规定，并且曾在板门店试图说服中国人遵守规定。然而，尽管美国长期以来是赞成这一规定的，但是，当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一次不仅与朝鲜问题有关而且把印度支那问题也纳入议程的会议时，他们仍然招致了国会中坚持强硬路线的人以及台北和汉城的许多非难。罗伯特·兰德尔在分析日内瓦会议（即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编者注）发起召开的意义时指出：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年第3卷第712—713页。

② 见《四国联合公报》，1954年2月19日柏林发行，载于《日内瓦会议上的朝鲜问题》第33—34页。

③ 安托尼·艾登，《复原》（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60年版）第97页。

美国人同中国人在即将到来的日内瓦会议上的谈判与早些时候同他们在板门店的谈判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旨在讨论东亚问题的大国会议。……它将在瑞士的一座著名城市中举行，这座城市曾经是国际联盟的所在地，并接待过其他一些国际会议。板门店作为朝鲜战争的交战国曾经举行会议的地方，几乎就位于炮火纷飞的战场。……日内瓦将会给中国政府带来一些国际声望。它可能给中国政府一个充分的机会来实现它的愿望——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是有理性的并且是完全有资格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总之，美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会给人一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出现也会提高它自己的声望，而这正是诺兰参议员等人所反对的①。

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顶住了国会内的“中国帮”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压力，没有改变美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但是，艾森豪威尔等人还是费了一些力气向美国公众保证，参加日内瓦会议并不意味着承认共产党中国，恰恰相反，美国将要求中国对它的侵略行为作出解释。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则强调说，她将以大国的身份参加这次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②。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转变

朝鲜的停战并没有给英中关系带来任何重要的改善。中国政府没有为恢复两国之间的建交谈判作出丝毫努力，在1950年6月17日哈奇森和章汉夫举行会谈之后，他们便使这种谈判夭折了。他们仍然把英国驻华临时代办称为“英国建交谈判代表团团长”。汉弗莱·杜维廉是在停战协定签订不久后担任临时办任职务的，他在回忆录中描述他与中国外交部的交往情况时说：“在我第一

① 罗伯特·F·兰特勒，《1954年的日内瓦，印支战争的解决》（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② 见约翰·吉廷斯《世界和中国，1922—1972年》（纽约，哈珀—罗1974年版）第194页。另见卡利基《中美危机的模式》第100—101页。

次正式访问之后，外交部再也没有接见过我。很清楚，他们并不把我当作事实上的临时代办对待。我写给他们的信只有当章汉夫副部长想要进行攻击和作出公开的答复时才能得到回音，否则便一去不知下落。我要求同外交部的官员会谈，他们也毫不理睬。”<sup>①</sup>

英国政府尤其关心英国在华商人的待遇问题。在停战协定签订前三个星期，英国前临时代办莱昂内尔·拉姆对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说，英国在华公司的清理和撤出工作几乎毫无进展，中国人正把外国商人当作人质，以便从公司榨出更多的钱来<sup>②</sup>。

这些情况固然都是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的往事，它们在战争期间依然存在也并不令人惊奇，但是在停战协定签定之后，人们则期望杜维廉会看到形势有所改善。可是，杜维廉发现情况变得更加奥妙了，他在回忆录中说，中国人当时所“使用的方法是向公司施加各种压力，迫使公司向中共政府交出其所有财产，这样一来，外国人就无法对他们提出任何赔偿要求了”。其中一种压力是不给商人们发放离境许可证（这种办法很常用），使“英国的经理和助手们……成为事实上的囚犯，既不能营业，也不能离去”<sup>③</sup>。

虽然朝鲜的停火并没有使英中关系得到任何改善，但是，日内瓦会议却做到了这一点。杜维廉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会议，在这里，他能够做他在北京做不到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英政策在日内瓦突然松动了，杜维廉回忆说：“我同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司长宦乡和中国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译音）举行了正式会谈。……英国在华侨民遇到的许多麻烦现在都获得了解决。出境许可证发放了，就英国在华公司遭到关闭问题进行的谈判也取得了进展。”<sup>④</sup>中国人还在日内瓦发出了准备改变其不

<sup>①</sup> 汉弗莱·杜维廉：《同共产党人生活在一起》（波士顿：甘比特1971年版）第51页。

<sup>②</sup> 香港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1953年7月2日，693,00/7-253，RG59，DSNA。

<sup>③</sup> 杜维廉：《同共产党人生活在一起》第53—54页。

<sup>④</sup> 同上，第80页。

同英国建交政策的第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几乎是随便发出的。在一次为周恩来举行的宴会上，当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抱怨他（指周恩来——编者注）没有向伦敦派驻一名代表时，他（还是指周恩来——编者注）表示愿意派遣这样一个人。”<sup>①</sup>周恩来是有可能在宴会场合非正式地作出这种表示的，因为后来一名中国官员向杜维廉解释说，中国最后派到伦敦的官员将“象杜维廉一样作为谈判代表”<sup>②</sup>。

无论如何，杜维廉重返北京之后便享受到了象真正的临时代办那样的待遇，他不仅第一次被称为临时代办，而且还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告诉他说，他将挑选一名非常合适的人作为驻伦敦的代表。中国外交部开始安排杜维廉拜会他以前所不能见到的中国官员，比如朱德、郭沫若、文化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部长<sup>③</sup>。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补充道。

在1954年9月2日的外交照会中，中国政府任命了驻伦敦的临时代办，他象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一样担负着相同的职务和责任。中国的这种作法实际上是对1950年1月6日英国照会的反应。从此，中国便把英国政府在北京的代表机构称为“英国临时代办办事处”。显然，中国已经决定同英国建立正式关系，并且不再把英国临时代办作为“谈判代表”了。在中国方面的驻华外交人员名册里，临时代办一栏的下面也出现了英国国王陛下临时代办的字样<sup>④</sup>。

英国终于实现了它自1950年1月以来在英中关系上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个成绩只是在北京表示愿意的时候才取得的。1950年中国拒绝同英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众所周知的原因，到

① 安东尼·艾登《复原》（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60年版）第138页。

②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27F18896。

③ 美国驻伦敦大使馆1954年7月8日和21日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641.93/7---2154, RG59, DSNA。

④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27F18896。

1954年依然存在着，比如，英国对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的立场，中国人在马来亚受到的“迫害”，香港政府实施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移民政策，所有这些都毫无改变。英国方面始终表示，如果英中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就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北京却更愿意把这些问题的存在作为拒绝同英国建交的理由<sup>①</sup>。

虽然英国政府明显地欢迎中国对英政策的转变，但是，对于中国对美政策发生的变化，美国政府却只是勉强和有限度地表示接受。实际上，北京和华盛顿在日内瓦所表现的姿态，意味着它们都已经改变了自己在朝鲜战争之前的立场。在日内瓦，当杜维廉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向中国官员提出美国在华人员被阻留一事时，中国人回答说，如果美国关心其侨民，就应该直接同中国接洽。反之，如果美国要求北京承认英国有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的权利，那么，北京也将指定一个国家代为保护中国在美国的利益，美国必须允许这个国家拥有这样的权利。

由于决定参加一次有北京而不是台北的代表出席的日内瓦国际会议，艾森豪威尔政府早就在政治上受到了攻击，而现在，它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直接的双边会谈；另一方面，它也不能答应由别的国家来代为保护中国在美国的利益，因为这属于代表国民党政府的大使馆和领事馆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然而，从人道主义的观点看，为了解决美国侨民在中国被拘押的问题，美国又不能拒绝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谈判。

美国因此同意了在日内瓦同中国举行直接谈判。在谈判桌上，两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秘书长分别被指定为各自政府的代表。美国人曾经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同中国人在板门店进行过谈

<sup>①</sup> 多年来，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态度以及英国与国民党政府的领事级关系，都是中国拒绝和英国互派大使的原因。见《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827F18896。

判，现在又正同中国人一起在日内瓦参加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多边会议，可是，一想到自己要怀着敬视的心情单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坐在谈判桌前，美国人就显得不那么高兴。他们主张杜维廉也参加谈判。杜维廉回忆说，美国人实际上“企图造成一种假象，让人们认为是我召集了一次美国和中国偶然出席的会议”<sup>①</sup>。6月15日，美国国务院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美中将举行第一次会谈的消息，国务院的说法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它说：“为了努力使在共产党中国被监禁或者被拘留的美国人获得释放，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出席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将陪同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汉弗莱·杜维廉，于今天同中共代表团的一名成员举行会谈。”<sup>②</sup>虽然美国曾经作了详细说明，要求中国谈判代表的资格不得低于其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sup>③</sup>，但是，国务院没有提到将要参加会谈的中国代表就是王炳南大使。

美国人制造的幻影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打破了，因为中国人对此感到不能容忍。杜维廉作了这样的描述：“前两轮会谈我都作为参加者和仲裁人。虽然美国人试图使我留下来，但是，在第三轮会谈一开始，中国人就非常礼貌和巧妙地指出，会谈应该在两个人（即约翰逊和王炳南——编者注）之间进行。我便退了出来。”<sup>④</sup>

即使不能说这次会谈是美中一系列双边谈判——即更加著名的华沙谈判的开始，那么，它也是华沙谈判的胚胎。1955年8月，双方再次举行了大使级会谈，两国的代表仍然分别是约翰逊和王炳南，谈判的地点也仍然是原联合国大厦的一个小会议厅。双方在那里的会谈一直持续到1957年12月。1958年9月，谈判地点

① 杜威廉：《同共产党人生活在一起》第84页。

②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4年6月21日，第850页。

③ 杜威廉：《同共产党人生活在一起》第85页。

④ 同上。

转移到了华沙<sup>①</sup>。

中国提出就一些美国人在华滞留的问题同美国官员进行讨论，这标志着中国转变了它在1949年和1950年初所奉行的政策，当时，美国的外交和领事官员还留在中国，中国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或者美国支持国民党为理由，一直拒绝同美国官员讨论诸如美国侨民被监禁之类的问题。1950年4月，当柯乐博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外交部的官员提出同中国谈判时，中国人回答说，只要美国不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进行谈判就是毫无意义的”。那个时候，杜鲁门曾经公开宣布美国将不为台湾提供保护，将减少它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并不再给予其军事援助。然而今天，尽管美国已公开声明它要保护台湾并给予了台湾数十亿美元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当然它也仍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却愿意在日内瓦就那些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了。

1954年6月，约翰逊和王炳南两位大使举行了五次会谈。会谈中，约翰逊敦促中国释放那些被监禁或被阻留在中国境内的美国人，而王炳南则强调美国方面阻止了一些在美华人返回他们自己的祖国。5月29日，作为对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的谈话的反应，美国代表团曾经发表声明，讲述了有关问题的“事实”。声明指出，在共产党占领了中国时，有数千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根据自愿，绝大多数学生不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去”。声明承认，自朝鲜战争爆发后，有120名中国“学生”“暂时没有”领到出境许可证，但是，已经获准离开美国的有314人，声明还强调说：“在美国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受到监禁、拘留或者虐待，他们在迁徙、通讯和选择职业方面享有完全的自由。”<sup>②</sup>

美中双方同意就对方侨民离境受阻问题重新进行检查。在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前，6名一直受阻的美国人领到了出境许可证，

<sup>①</sup> 本书作者同约翰逊大使一起参加了1954年5月、1955年8月和1957年6月至12月的会谈。

<sup>②</sup>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4年6月21日，第949—950页。

约翰逊大使也通知王炳南大使说，滞留在美国的中国侨民中有15人获得了离境的自由。在最后一次会谈中，双方商定就此问题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别的谈判。但是，后来几个月的谈判没有产生进一步的结果<sup>①</sup>。

很清楚，中国对英美政策的重要变化的发生，并非是由于英美两国改变了它们的对华政策。在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领导下，英国的对华政策虽然变得稍微强硬了一些，但是，自从1950年1月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这一政策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前后不同之处。当然，美国的政策比原来强硬多了，但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中国人在1954年比在1949——1950年间更愿意同美国谈判是美国政策变得强硬的结果。

看来，北京之所以修改其政策，可能主要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已经完成了自己国内的紧迫任务。用A·多克·巴尼特的话来说就是：“从1952年起，中国逐渐放弃了它把世界分成两个阵营的观点，这个观点自1948年以来曾一直决定着它的外交政策。现在，中国重新回到了它的统一战线思想上去，其目标在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sup>②</sup>埃德蒙·柯乐博在他所著的《20世纪的中国》一书中推测，中国在路线上的转折“可能是1952年8—9月间在莫斯科决定的，当时，苏联领导人同周恩来总理和粟裕代总参谋长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一个月之久的谈判。”<sup>③</sup>当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后，中国的这种新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发展了。

假如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朝鲜战争一定向北京证明了把

<sup>①</sup> 关于约翰逊大使对这些会谈的看法，请看亚历克西斯与热夫·奥里瓦雷斯·姆克利斯特尔合著的《政权的支柱》一书（恩格尔伍德·克里夫斯·N·J·普伦蒂斯—霍尔1964年版）第233—236页。

<sup>②</sup> A·多克·巴尼特，《中国和东亚六国》（华盛顿：图书研究院1977年版）第181页。

<sup>③</sup> 埃德蒙·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43页。关于对此问题的另一种看法，请看伊什沃·C·欧嘉：《过渡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71年版）第180—181页。



世界分成两个阵营的观点的错误，同时也说明了根据美苏之间将发生一场新的战争的判断来制订自己的政策是毫无益处的。毛泽东曾把非共产党的阿拉伯和亚洲国家蔑视为“走第三条道路的人”，而事实却证明它们是中国的朋友，它们在联合国为结束朝鲜战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它们提出的停火条件要比后来中国所希望的条件优越得多。同时，朝鲜战争并未扩大为一场美苏都参加的世界大战，这也是出乎中国人之意料的。

英中外交关系的建立，有力地配合了中国新制订的国际战略。虽然中国几乎不能期望同英国结盟，但是，建立同英国的关系却有助于分化美国及其盟国的对华政策。同时，在共产党国家看来，中国表示愿意同美国举行会谈，不再紧紧抱住其两个阵营的世界观不放，是理智的表现。而且，中国还迫使美国在一对一的基础上同它打交道，这就证明了它的说法——中国是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英外交关系的建立也更有力量地说明了这一点。

促使北京的对美英政策产生新的灵活性的另一个因素，无疑是美英两国在华势力的被消灭。柯乐博指出：“到1952年，‘帝国主义’在中国拥有的特权已被彻底取消。……外国人在中国投资的环境遭到了破坏，曾经是外国人活动中心的通商口岸也遭到了相应的打击。”<sup>①</sup>到1954年，中共政府不仅摧毁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和文化机构，而且还把它的权力扩展到包括西藏在内的全中国大陆。同时，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它打击了它所说的在党和国家机关以外的敌人，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权<sup>②</sup>。这样，到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可以使它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

<sup>①</sup> O·埃蒙特·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第332页。

<sup>②</sup> 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简况，请参莫里斯·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代史》（纽约：弗里出版社，1977年版）第95—97页。

## 第四章 总 论

1949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用“灵活性”一词来概括美国对华政策的新特点。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国民党的事业似乎已经注定不行了；而另一方面，共产党的事业又是敌对的。美国虽然不想对任何一方承担义务，但却想在中国原地不动，并希望和中国的新主人建立某种工作关系。这个时期，美国的对华态度非常相似于美国，而且两国都试图避免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不过，情况很快就明朗起来：尽管英美的目标相同，但它们试图用以实现目标的手段却迥然不同。

然而，一如事实所证明，尽管这些手段迥然不同，但其应用的结果却没有什麼迥然的差异。这是因为，只要西方人的目标与中共的革命目标相冲突，任何手段都难以用来实现西方人的目标。当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和华北取得一系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后，它就取得了驾驭中国的地位；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调整其对华政策也是势在必行。在天津“解放”后三个月——1949年4月，英国驻天津的一位领事言简意赅地描述了共产党的胜利，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已在实际上掌握了政权，他们已经站稳了脚根。他们有自己的政策、纲领和学说。他们要彻底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他们不可能不冲破传统的束缚，也不可能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甚至也不可能为国际上的复杂形势所左右。他们坚信他们能成功。”<sup>①</sup>

在和英美打交道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清楚

---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25754F7099。

地确定了他们和西方的关系；取得革命的胜利是高于一切的，西方的亲善也好，承认也罢，或是进入联合国，甚至和西方建立贸易关系——这一直被英美看作是其手中的王牌，都不能和取得革命胜利的目标攀高低。这种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肃清在华的西方“帝国主义”及其文化、经济机构。毛现实地意识到，这一革命过程与中英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基本上是水火不容的。故此，他“不急于”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sup>①</sup>。

与毛相反，许多在华的外国侨民，特别是以上海的商业团体为典型的外国人团体——它们不时被叫作旧中国的掌管——，却满脑子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天真地以为，共产党的胜利对他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英国外交部1950年年中的一份备忘录，集中地描述了当时在华外国人的幻想。该备忘录说：“在很长时间内他们持有这样的观点：这是另一个合法的中国政府；典型的中国人总是要搞贸易的；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的性格和共产主义是相排斥的；进行必要的接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随后一切都会顺利进行，我们将继续在我们原来的地方进行贸易。”<sup>②</sup>虽然该备忘录描述的是英国商业团体的态度，但是在上海的美国商业团体中，也有一些类似的观点存在，只不过总体上不太乐观而已。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伯特在1948年（似乎应是1949年——译者注）5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

<sup>①</sup> 在1949年3月5日向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中，毛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一如戈尔茨坦指出：“中共简直不相信国内外的现实条件会允许建立积极的对美关系。”见史蒂文·M·戈尔茨坦《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机会和抑制，1944—1950》一文，收录在《未定之秋》第275页。类似的观点还可见罗伯特·G·萨特著《中国观察：中美和解》（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2页。另见奥卡赫·塔特苏密著《冷战与中国》，收录在纳盖和伊里依主编的《亚洲冷战的根源》第241—244页。与此不同的观点，请参见塔克著《尘埃中的模式》第43页；迈克尔·H·亨特著《毛泽东与美国和解的结局，1948—1950》，收录在《未定之秋》。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5FC1022/328。

道：“餐后，许多商人认为，在共产党接收后他们仍有可能继续做生意。我最后不得不予以有力地反驳——我说他们将慢慢地被扼死。也许我是错的，因为我不了解我所任职的地方——中国，但是，我认为我了解共产主义。”<sup>①</sup>卡伯特对上海外国商业团体的命运的预言被充分地证实了。和这些团体中的代表性人物相比，虽然同样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但由于他了解共产党的行为方法，所以他能更全面地认识时局。

商业团体的看法显然是痴心妄想；对谋生方式的理解是很不现实的。当厄运来临时，其自然的反应便是寻找一个替罪羊；英国商业团体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就找到了一个。例如，1950年7月31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R·W·厄克特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谈道：“事实上，他们（美国人）在远东的错误，已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且一定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sup>②</sup>应该说，厄克特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美国的政策中确实有一些错误，其中代价最大的是决定派美国军队到朝鲜的三八线以北。但是，把在上海的英国商人所遭受的困境归咎于美国，则是想回避共产党革命的现实。

总的看来，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现实的认识是一致的；它们的分歧在于如何应付这一现实，如何以有利于它们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利益的方式来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起初，它们的方法未见有什么显著差异。事实上，一如厄克特1949年7月致电英国外交部时所说，在与共产党当局打交道方面，美国一开始所付出的努力的艰苦性是联合王国所不及的。司徒雷登不仅和黄华进行了直接会谈，而且还努力通过“第三势力”的中间人使美国的观点为中共领导人知

<sup>①</sup> 卡伯特：《第一道防线》第42页。大约与此同时，美国驻南京的一位外交官在日记中写道：“令人惊异的是，这里的美国商人相当一致地认为，谁掌权都无所谓，他们能组织做生意。”见梅尔比著《天命》第267页。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83295FC1022/528。

道。美国还努力答复周的新方针，尽管未得到任何积极的令人鼓舞的反应。这一切都是英国人无法相比的。另一方面，英国官员也没有遭到美国官员曾经遭到的那些羞辱，如监禁美国总领事沃德及其在沈阳的随员，骚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等。在美国与中共当局进行联系的努力连遭失败后，也就是在美国驻沈阳和上海的领事人员遭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和羞辱后，美英在对中共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然而有一点在英美之间还是一致的，这就是它们都把自己用以影响中共态度的手段，特别是贸易政策看作是自己手中的王牌，并为此而自以为了不起。两国都认为，中国严重的经济困难给它们提供了一个作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之上的杠杆。只是在对这一杠杆的使用上，它们采取了几乎完全不同的方法。英国人采取的方法是：利用共产党人的经济困难，向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贸易品，以诱发他们的友善。美国人的方法则是：通过贸易限制，迫使中国人为免遭经济崩溃面做出让步。鉴于此，杜鲁门总统才认为，国民党的封锁有利于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然而，无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方法，都未得到其预期的效果。北京设法以可能进行的贸易活动相应付，使贸易引诱和贸易惩罚都未能影响它的政治方针。

在中国对待在华外国公司的态度方面，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是这些公司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而不是这些公司所从属的国家正在实施的对华政策。汉弗莱·杜维廉曾在日内瓦会议上举例说明这一点。当时他告诉美国代表团成员说，他找不到任何证据说明，英国公司所得到的待遇在优惠条件上少于那些已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公司<sup>①</sup>。在这之前，也就是在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不久，哈奇森就注意到，共产党当局并未因承认的举动而和英国银行做生意，相反，却和那些尚未承认它的国家的银行搞交易。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年第18卷第8(4)页。

英美官方显然都过高地估计了中共对得到承认和进入联合国等事情的兴趣，进而也过高地估计了这一兴趣能够给它们带来的影响中共政策的力量，不仅如此，在如何使用这样一种力量的问题上，它们之间又发生了分歧。联合王国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会为北京提供一个与莫斯科拉开一定距离并寻求一种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的机会。这一立场有很多条理性，但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受到中共宣传机构的一大堆嘲弄。与此同时，美国却采取了相反的立场：拒不承认北京，也拒不接纳它进入联合国，以迫使其改变在国际问题上的态度。但是，这一立场也同样未能奏效。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但其反西方亲苏联的立场基本没有改变。中苏两国代表团通力合作，对西方和联合国采取了强硬路线。一如杜维廉所评论的，中国人主要是向亚洲听众讲话，毫不介意美国或西欧有什么感想，当一些西方人一度希望或担心北京为进入联合国而采取探索性让步措施时，杜维廉恰当地预言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其固有权利上考虑会继续要求获准进入联合国，但决不会为此而做交易，也不会做出什么让步<sup>①</sup>。

英美固然不再拥有能够改变有损其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或胡萝卜，或大棒），但它们成功地实现了两个目标：英国保住了香港，美国阻止了共产党对台湾的占领。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重视经济纽带的政策，对维持香港原状或许是有帮助的。美国人则是由于废弃了单纯以外交手段防止台湾被共产党占领的起初的政策，采用了武力威胁，才使这个岛屿免遭北京政权的控制。

非常值得怀疑的是，如果香港和台湾的大多数居民愿意倒向北京的怀抱，无论是联合王国还是美国，是否还会或者能够实现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年第15卷第804页。

这些政策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联合王国和美国似乎对这两块中国领土都执行了帝国主义政策：在香港，英国维护了老牌帝国主义的遗产；在台湾，美国无可争辩地制造了一个新帝国主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两国显然是在保卫容纳着许许多多中国人的避难地，这些中国人因恐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逃到了这里。而且，台湾的土著居民从未表示出要使大陆的革命扩展到他们的岛屿上来的任何迹象，尽管国民党在那里进行了政治镇压。

杜鲁门总统为使台湾中立化而派出第七舰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转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灵活性政策。例如：当时美国还不准备保证台湾归国民党所有，该岛的前途还在设想之中；美国人和日本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虽然受到了日益严格的限制，但毕竟还未中断；金融交易还未加限制，财产也未加冻结。此外，许多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仍未遭禁止地留在那里。总之，灵活性政策到1950年秋季虽然陷入了困境，但还没有死亡，只是当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时，该政策才在朝鲜战场上呼出其最后一口气。

英国外交官员不时暗示，如果美国人不固执己见，美国的政策就会向英国政策的方向靠得更近，就不会为美国国会中一伙强烈亲国民党的保守份子所左右。但是，文献资料表明，艾奇逊的论点是靠得住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在他任职期间，“那些纯朴人的非难”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sup>①</sup>。例如，到1949年底，即参议员乔·麦卡锡对美国国务院中的“共产党人”提出臭名昭著的控告前几个月，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接纳它进入

<sup>①</sup> 艾奇逊：《在创世的现场》第369页。另见塔克著《尘埃中的模式》第99页。麦克乔治·邦迪恰当地指出：“如果北京政府能改变它的策略，并理智行事，就会在美国政府和它的对手之间引起真正剧烈的争论……但是这种情况未能出现，1949—1950年初之间在承认问题上出现的论战，不过是一场摹拟战。”麦克乔治·邦迪：《责任的模式》（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51年版）第190页。

联合国的问题上，在对贸易、封锁和台湾等问题的态度上，英美之间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从美国方面来看，这些分歧是被外事处和国务院中的许多职业和非职业官员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菲利普·斯普劳斯和全权代表莱顿·司徒雷登，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具有长期在华工作的经验。他们和他们的英国同行间的分歧，反映了美英双方对自己在中国、香港和台湾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不同估价；反映了美英对中共脆弱性的不同感觉；也反映了美英不同的传统外交方式（例如美国政策中的道义成分）。

对于1949年6月以后美国对中共政策中灵活性的减少起了主要作用的，不是亲国民党势力的影响，而是美国官方日益感觉出来的中共对美政策的敌对性。关于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原因，艾奇逊在1949年9月曾做过解释，即：中共政府拒不承担其国际义务（英国当时也同意这一观点），对美国在华侨民，特别是驻沈阳的领事人员给予了不公正的待遇。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当时正在表露出亲国民党的情绪，事实上这种情绪那时在国务院或白宫内并不强烈。

这样，到1950年1月，在不增进美国与国民党关系的情况下，在不改变对台不予保护的的前提下，美国决定撤回其在华官员。杜勒斯在同年5月中旬的备忘录中提出在台湾划定阻止共产党扩张的防线的主张，实际上不是什么亲国民党情绪引起的反应，而正象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就指出的那样，是由于台湾是一个不动资产，对美国来说具有战略上的意义，有利于美国防线的划定。在和国民党的一位官员会见时，杜勒斯实际上吐露出了美国官员和公众对台北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而当时他正主张对台湾进行保护。

美国公众对台北政府的不信任，仅次于他们对承认北京共产党政府一事的反对。1950年4月7日，明尼苏达人休伯特·汉弗莱参议员送给艾奇逊国务卿一份民意测验报告，内称有58%的人反对派军队或军舰去帮助台湾的防御，59%的人反对承认北京政



府<sup>①</sup>。早在三个月以前的某个时候，《纽约时报》就“中国舆情”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一方面，“现在承认共产党会招致忿恨”；另一方面，“对蒋的命运应持更全面的中立”态度<sup>②</sup>。

即使把防线划到台湾以后，美国仍保持着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距离，并继续把台湾和国民党政府加以区别。美国当时不仅严禁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而且还限制国民党的军事行动。美国的立场仍然是：台湾的未来地位还未确定，这个问题将通过国际协商来决定，但要格外注意该岛土著居民的意愿。美国在事实上承担保护台湾原有地位的义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战争并拒绝联合国的停火提议之后，主要是由于美国这时已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交战状态，而不是由于亲国民党的情绪。

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将一种强硬性铸进了他们对英美的政策中去，其动力在于他们把世界划分成两部分，并要肃清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这一动力的作用，在1949—1950年间，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象后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采取的那样比较灵活的立场。另一种解释很可能也是成立的，这就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致使中国共产党无法灵活开展其对英美的外交活动。而且似乎还有可能的是，鉴于沈阳事件对美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严重影响，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官员在满洲的密切合作，苏联有意识地要恶化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sup>③</sup>。从

<sup>①</sup> 793.02/4—753, RG59, DSNA。

<sup>②</sup> 见远东委员会副秘书长戴维·艾克勒1950年1月6日给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新的备忘录(793.02/1—653, RG59, DSNA)。关于这一民意测验的类似结果，参见塔克著《尘埃中的模式》第131页，尤其是第31条注释。

<sup>③</sup> 拉塞尔D·布伊特甚至断定，“苏联施加的压力”是“1949年中共不能与美国实现某种缓和的主要障碍”。见布伊特著《苏美关系》第83页。1950年1月英国外交部认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大概是要使共产党中国与其他的外都世界隔绝，以防止它与西方大国建立外交关系”。见《美国外交文件集》371/83313FC10358/23。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来看，似乎由于在处理与英美关系方面的固执和无创造性，才使其失去了对苏联施加反影响的机会。如果认为北京打心眼里担忧美帝国主义与它相对立的话<sup>①</sup>，那么也可以认为，北京的政策直接助长了美国的敌对情绪<sup>②</sup>，而且它也没有利用机会来减少这种敌对情绪。

在1949—1950年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可用来减少敌对情绪的机会。例如，如果美国领事官员能随时被允许同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就美国的苦衷或不满进行讨论而不遭到断然拒绝的话，某种工作关系势必会建立起来的。另外，即使双方之间的交涉不能使长期遭受痛苦的美驻沈阳领事人员在1949年10月1日前得到释放，共产党政府至少也不必匆忙地使总领事沃德和其他工作人员被单独监禁起来，并将这种监禁作为对柯乐博提出的豁免他们的请求的答复。事实上，如果共产党政府真心想与美国建立关系，就应立即释放沃德及其工作人员，释放斯密斯和本德以及其他被拘押的美国人。这样一个姿态会使美国方面的主要不满情绪得以消除，并会引起美国公众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的支持。而且，如果利用（面不是漠视）总领事柯乐博提出请求的机会，就沃德一案邀请他谈一谈，周恩来就能将调和的意图直接向华繁顿提出——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再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1月对英国承认新中国的行动予以酬答，也会使承认的选择在美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最后，如果共产党政府接受美国的提议，用美国在北京领事馆的其他财产换取被北京地方当局征用了的财产，美国就不会将所有的驻华领事官员撤出。当然，这些行动是否会促使美国尽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

①见约翰·吉廷斯著《政治家》，收录于迪克·威尔逊编《在历史的天平上——对毛泽东的初步估价》（纽约：坎布里奇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57页。

②一如阿姆斯特朗所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结盟，实际上使它的安全更易受到威胁。见J·D·阿姆斯特朗著《革命的外交——中国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理论》（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68—69页。

---

个问题，但它们至少会使许多美国人的反对承认的论点失去基础，并会提供一种寻求妥协的办法——，自从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起，美国就一直寻求这种妥协办法。

